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费正清文集

中国：传统与变迁

费正清/著
John King Fairbank
张 涛/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前言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前言

费正清 赖肖尔

1978 年以来的10 年中，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折。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否定了毛氏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以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替代了阶级斗争。外贸、外资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较少过问及众多其他方面的变化都显示出了中国的勃勃生机。

欲知中国的潜力、前途与局限何在，首先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本书在费正清、赖肖尔(E . O . Reischaue了）及克瑞格（Albert M . Craig) 著《东亚：传统与变迁》（1978 年版）的基础上，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章进行了修改与增补。本书第一章的部分、第二至第六章由赖肖尔撰写，其余九章由费正清撰写。两人在撰写的过程中都曾互相提出过建议、批评和修改意见。

在撰写这部古人类1 / 4 人口的民族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借鉴了大量东西方学者的劳动成果。有些是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了帮助与建议，但更多的是通过其著作给我们以很大帮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可惜限于篇幅，恕不想一一列举了。书后亦未引参考书目，因为如果列出的话，势必显得过于简略并且很容易过时。这里我们谨将特别的敬意献给以下诸位：已故的克来克教授（Professor Edward A . Kracke) ，他对本书第五、六两章提供了很多帮助；费慰梅（Wilma

Fairbank)，她承担了挑选插图的工作；还有克瑞格，他提供了有关台湾的最新情况。

书中的人名与专名采用英语国家史学界通用的威妥玛-贾尔斯拼法。至于普通地名，则按旧中国邮政体系（即南方方言而非普通话音译）。如中国近五六百年来的首都北京，其拉丁拼法为Peking，威妥玛一贾尔斯拼法为Pei - ching，而其实际读音则近似Bag - jing 。

第01章 中国概况

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亦与西方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第三，他们正经历着一场迅猛的发展与变革。论人口、论国力，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相坪。今天中国人口达13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 / 5 到上/ 4 。近几年来世界迅速"变小"，与这么庞大的一群人打交道显然将会深刻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1941 年以来中国国内与边境上的三次战争已使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要做到这一点，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自上一世纪以来日渐频繁的接触当然有助于弥合这一差距，但某些其他因素反而扩大了这一分歧：首先是中国人高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其次为中西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再者就是中西对于战争的不同体验。部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偶然性原因，西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形成一种远远优于中国的平衡，而这一经济上的差距就铸成了（有时甚至还扩大）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尤其是美国，从未像中国那样在本土经历过战争，美国人的生活变迁属于循序渐进式而非革命性的突变，因此无论是其文化传统或其当代生活，均与中国人大相径庭。

了解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和平。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及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记载，就某些时代或某些领域而言，远比西方丰富、详实。

通过中国历史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因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其次，通过研究中国人审美、认识和制度的衍变，最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些方面取得的独特成就。这与中国的现状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在中国

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

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本书因之亦分为两大部分：3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的衍变，及自近代以来作为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回应，这一文明所经历的变故与转型。

一、东亚的土地、民族与语言

中国是所谓东亚文明的母源与主体。当欧洲人首次由西向东远航到震旦（Cathay）、日本和印度时，他们很自然地将这些地区通称为"远东"。同样，如果美国人西跨太平洋到达这些地区，也会把这些地区称为"远西"。不过对当地人而言，这些地区既不"东"、又不"西"，更谈不上"远"。一个较好的术语是"东亚"，因为它排除了陈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中国在东亚拥有辽阔的幅员，又长期在这一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必将涉及整个东亚地区。在本章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中国的东亚背景，进而再对中国的地理、传统经济与社会作进一步的研究。

"东亚"有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最后一个含义所指最狭，除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并未把以下另外两大地区包括在内：其一为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该地游牧民族的历史通过商业、战争和占领已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其二为东南亚地区，该地文化似乎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与东亚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上的联系亦日渐紧密。

自然环境

东亚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几大文明相互隔绝而自成格局。高山大漠把东亚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而东亚发展出一种大体上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范式。如世界各国的现代文字均脱胎于西亚的字母文字，唯有东亚的文字— 汉字完全是另外一套体系。

西方文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等几个相互密切联系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它扩展到欧洲大部、北非、西亚后才一分为二，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河流域（现巴基斯坦境内）是古代文明的第二大中心，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 年入侵这一地区亦证明西方和印度在古代就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 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气候寒冷恶劣，在驯化马和骆驼之前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于交通的山地丛林。在这种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古人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在今天，从西伯利亚到马来西亚也只有两条铁路及若干公路可通。

气候对东亚的文化也很有影响。欧洲和西亚的气候主要受大西洋控制，降雨大多发生在春秋两季。北欧日照较短而地中海和西亚地区降水较少。因此，欧洲和西亚并不讲究深耕细作，一般每年只耕种一次。和印度一样，东亚的气候主要受亚洲大陆影响。冬季，中亚上空的干冷阴沉气流南下，在亚洲南部与东部边缘地区形成干冷天气；夏季正好相反，中亚上空的气流受热上升后，潮湿的海洋性气流取而代之，在大陆边缘地区形成大量降水，受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在生长季节中有充沛的降水。充沛的降水，再加上低纬度地区惯有的高温日晒，这就使得深耕细作和作物一年两熟成为可能。

这种特殊的气候使东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东亚的许多畜牧农作物，像水稻、大豆、鸡、水牛和猪，似乎都来自暖湿的东南亚地区。在西方，牧养牛羊成为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重视精耕细作的东亚地区较少使用畜力，他们更多是依赖人力。小麦是西方的主要谷类作物，而在东亚及印度大部分地区却是水稻。水稻十分适应水田种植及该地区潮湿的夏季气候，亩产量也远远超出小麦，因而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这样，从农业上我们就看出，东亚、印度与西亚、欧洲的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大不相同。甚至到现代社会后，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加了欧洲的人口，当时处于前工业时代的东亚和印度的人口密度仍是遥遥领先。

民族

亚洲在地理上一分为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是蒙古人种分布的区域，而以西（包括印度大部分地区）为伊斯兰文明地区及白种人（高加索人种）西方文明的家园。黑种人则不规则地分布于南部非洲、亚洲南部边缘及美拉尼西亚群岛等地。

人类各种族的起源仍是一个未解之谜。1927 年在北京附近发现的"北京人"是今天东亚人的祖先之一。他们生活在公元前40 万年以前，能制造工具，会用火，并以狩猎为生。"北京人"具有某些蒙古人种的生理特征。最近又发现了蒙古人种更早的祖先"蓝田人"，他们距今约有60万年。

东亚文明产生之初，蒙古人种已经广泛分布于该地区。他们四肢较短，这有利于保持体温，他们眼睑狭窄、下垂，这使他们避免了积雪折射的损害；有人认为这是适应其栖居地东北亚寒冷气候的结果。他们的肤色和白种人一样随地区不同而有深浅的变化，如北方肤色为淡黄，南方如印尼则为深棕色，这无疑也是环境的产物。另外，蒙古人种毛发平直，呈黑色，面部较为扁平，眼睛为黑色。

蒙古人种并不仅见于东亚地区。有些北上西迁，有些进入北美（如较晚的爱斯基摩人），而像美洲印第安人则被认为是假道阿拉斯加从西伯利亚迁徙而来。考古发现推测，东亚北部与中部的蒙古人种先民不断南迁并向外扩展入海，像大约700年前泰人从中国西南迁至今天的泰国，就是上述大迁移的一部分。

不过蒙古人种也并非这些地区的唯一栖居者，东亚边缘边区还有不少其他的种族存在。如现居日本最北端的阿依努人（虾夷族），便具有许多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例如他们毛发旺盛，这使他们与蒙古人种构成鲜明的区别。

汉语

东亚和欧洲一样，按语言分为若干民族。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但事实上，讲汉语、日语的民族和讲德语、匈牙利语的民族一样都不止一个。

汉语（或汉藏语系）是东亚最大的的一支语系，与分布在欧洲、伊斯兰一印度文明区域的印欧语系可以等量齐观。汉藏语系各语种主要分布在东亚中部，包括中国的中原地区和西藏、泰国、老挝、缅甸

大部，可能还有越南。除了西藏人以外，他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定居该地，均以耕种为生，这与游牧为生的古印欧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大的一支。讲汉语者有文字记载以来便生活在中国北部，后通过迁移逐渐扩散开来，并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了当地的部落集团。他们逐渐古据了整个中原地区，后来又控制了满洲、内蒙古大部、新疆部分地区、台湾大部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尤其是马来西亚（今天中国人口该国人口的40％强）和新加坡（该国人口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在扩张中汉语分化为彼此不易了解的几大方言，其差别一如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瑞典语与德语之间的差别。其中"官话"(mandarin）作为母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它的变体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中大部及西南地区。自上海至越南的沿海地区的语言，通常被误称为"汉语方言"，但实际上与"官话"大有不同，这些方言包括吴语、闽语（又分为福州话与厦门话）、客家语与粤语。台湾与东南亚华人区主要便用这些语言，其中粤语更是美国华人区的通用语言。

阿尔泰语及其他语族

汉藏语言区以北的蒙古语既非汉语，也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得名于境内阿尔泰山的阿尔泰语。讲阿尔泰语的各民族与古代印欧人一样是养马牧羊的游牧民族。他们四处迁徙，有的民族甚至完全脱离了东亚。土耳其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一般被认为是阿尔泰语族的三种主要语言。操土耳其语者现居土耳其及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他们大多已具有白种人的血统，蒙古人居于蒙古大部及中亚、西亚若干地区。讲通古斯语的民族如满族，一度是满洲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居民。山于朝鲜语与日本语在结构上与阿尔泰语极为相似，朝鲜人与日本人有可能是东进农业地区之阿尔泰人的流民。

南亚语系是东亚第三大语言，它包括马来西亚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及台湾土著语言。至于柬埔寨语，则很有可能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在古代，印欧语使用于东亚西北部的一些农牧地区。公元9 世纪时的新疆人为白色人种，讲伊朗语或现已绝迹的某种印欧语言，由于讲上耳其语的民族不断向西迁移，最终这种语言就消失了。这样，东

亚的印欧语言特征在1000年前就绝迹了，直至近几个世纪前，随着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才又重新引入东亚。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

与西方和印度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很不统一的，因为它缺乏地中海或广阔的平原所提供的便利交通。中国的华北平原远远小于印度北部的平原，更不用说北欧大平原和北美的中西部大平原了。

相互交错的两大系列山脉（从中国西南向东北延伸到山西、满洲西部的山系；与之平行，从广东经长江流域到山东半岛、中朝边境的沿海山系。）把中国分割为好几块。与之相交的有三条平行山系，彼此相距差不多远，自西祖东而入太平洋。南端的山系正好是广东境内的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北端是东西走向的山脉将华北与蒙古高原分割开来；两者之间的秦岭是藏北昆仑山脉向东的延伸，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并同淮河一道成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山系交错形成若干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造成不少困难，并且对军事战略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河流

中国的江河为人烟稠密的山村提供了水源。黄河全长2700 英里，进入离入海口约500 英里处的华北平原后，它流经一大片冲积平原，这时河流坡度很小，每英里不过1 英尺的落差。夏季山洪泛滥，携来大量黄色的淤泥，黄河即由此而得名。由于黄河水道不定，中国统治机构自上古时起，就不得不通过筑堤来固定河道。结果，这条灾难之河往往在离地10 至40 英尺高的河堤中穿行，河堤只要有一处决口，就会造成方圆几百英里内几英寸到几英尺不等的积水，对几百万农民的生存形成威胁。水灾过后多年才能重新种植庄稼，而饥荒亦每每随水灾而来。这个老大难问题，直到1949 年后通过植树造林和修筑堤坝才开始得到解决。

长江比黄河更大，全长有3200英里，其流域与降水量均为黄河的两倍。与黄河不同的是，长江可以通航，在适当的季节，万吨汽轮可航行630 英里到达汉口，小些的船只还可继续通航1000 英里。雨季到来时，河水从汉口上游的三峡以每小时14 英里的速度涌向下游，这时就需要特别的汽轮才能通航。长江支流众多，每年携裹大量的淤泥入海，而长江三角洲则以每70 年1 英里的速度不断扩张。长江下游的几

个大湖起着水库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每逢雨季到来之时，内外堤的水位落差亦可能高达4O 英尺一50 英尺，因此洪灾并不鲜见。

气候

中国大部分的国土都在欧洲以南，像北京的纬度低于那不勒斯与马德里，而广东的位置则与撒哈拉沙漠大致相同。中国比美国东部纬度要低，北京、上海、广州大致与费城、莫比尔、哈瓦那相对应。中国地属亚洲大陆，大陆性气候明显，与美国同纬度的地方相比，冬季偏冷，而夏季也更为炎热些。如北京，7 月份的气温酷似开罗，1 月份又同斯德哥尔摩一样寒冷。

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夏季时这股海洋性气流深人内地，有时还会到达蒙古。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降水达60 多英寸，不仅可以灌溉稻田，也有利于航运。长江中下游地区内河航道密布；与之相反，西北地区每年的降水量不足灌溉作物所需的2O 英寸，也几乎无内河航运可言。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O 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 / 3 人口的稻作经济，秦岭以北则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外一条分界线是原为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它将中原农业区与其北部降水不足以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地质学家们推测，冰川期晚期时亚洲内陆来的大风把细腻的黄土吹到中国西北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黄河每年在华北平原淤积的就是这种黄土。幸而这种黄土比较肥沃，其中所含的矿物质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并未流失掉。尽管如此，北方地区仍经常会发生饥馑：作物生长期太短，降雨太少而且极不稳定。北方农民在用上电泵之前，常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1800 年中载于史书的饥荒不下1800 起。

南方由于降雨较多，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南方的高地中只有15％的上地是宜于栽种的平地。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种双季稻，这里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生活水平也稍为高一些。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因此不难理解，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尽管中国的史书和别

国一样，往往忽视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总结出典型中国百姓生活的几点特征。第一，中国的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几乎四倍于美国的人口。80％的农业人口生产出的粮食只能维持其余20％人口的生存，除了猪和鸡，他们还未学会畜养更多动物来提供食物。由于缺少牲畜，农民主要依靠人粪即所谓"夜土"来给庄稼施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中国的农业也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必须把稻种密密地播在苗床上；而在主田里收割冬季作物后，又需耕地、放水准备插秧，1 个月后稻秧长到大约8 英寸高时，又得花费人工将它们插种到主田里，整套工序大致和美国种植小麦、玉米一样，都需用手操作。因此，推行机械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了。

同样，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人无穷的人力。一磅刚刚孵化出的蚕总数约有70 万条，人们采来桑叶喂它，经过五周的精心呵护后便进入成熟期，这时原先一磅重的蚕可重达五吨，在此期间消耗掉的桑叶则有12 吨，但最终产出的丝只有150 磅。半机械化的剥茧抽丝不过是这种耗费人工的程序中最后一个环节。中国南方的另一传统家庭工业— 种茶，其拣选、分类、烘焙、再拣选、再分类、再烘焙直至包装一整套工序也需要类似的人力投人量。

通过人力汲水、灌溉的辘护或水车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经济方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再如运输，无论是登山用的滑竿、平地上的手推车，或是水路用的灿板、城市中常见的轿子（近代代之而起的是黄包车和三轮车）, 也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载的人数也相差无多。

中国农业自古就在每小块土地上投人大量的人力和（如果有可能的话）水。拥有土地因此成为一切经济奋斗和投人的主要目的。土地制度与农业赋税世世代代都是让官员和平民们大伤脑筋的事情。而且，由于农民缺少资本和贮存设施，只能听任中间人贱买贵卖，忍受每月二分甚至更高利息的高利贷盘剥。这就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农民们可能会不得不把收成的一半都交给地主。如何把农产品运往市场也一直是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分散型贸易，即各村都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集市及周围脚程以内的村庄形成的贸易单位极

易受到天灾（如水灾、旱灾）的破坏，但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总还能维持下去。因此，面对战争、入侵和各种社会变革，这种传统的集市与乡村经济总能依靠其自发、自足的特性并连同其惰性通过固定的渠道保留下来。尽管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水库、更多的引水渠、电泵、植树造林及作物改良等等，但这仍不过是重新塑造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开端。

社会传统

尽管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而多样化的社会作出几点概括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但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仍须牢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中国的亲属关系涉及上下五代，庞杂无比。一家老少数代同堂为其理想模式，但这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做到。典型的中国家庭一般大约有五口人，与西方家庭其实大致相似。

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都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因此在中国有一整套繁复的专门术语来称呼各种亲戚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家里的财产并决定子孙们的终身大事。所谓"百善孝为先"，就说明了这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关系。家庭包办婚姻（这时老练的媒婆正好大显身手）则再明显不过地象征了这一点。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传统上妇女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寡妇不得再嫁，而男人却能三妻四妾。除了嫁妆，妇女无财产权可言，婚后也必须作为外来者低声下气地在婆家度日。改变这一现象在日后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竹理的必需厂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囚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孺家思想紧密地

结成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正如所有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和荣誉鸿沟。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作为教育阶层的"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同父权家庭一道，通过执行最高权威— 皇帝的命令，统治着公众生活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并为我们留下卷恢浩繁的史书— 自然它们是从当朝的角度来写的。

第02章 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

一、考古发现

中国的农业大约是在黄河转弯的地带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带位处西部高原林地与东部低地沼泽之间，渔猎为生的先民在此驯养家畜，并开始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渐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农业，继而又发展到华北平原。这里冬季气候虽然恶劣，上古之时却很适宜发展农业〕事实上，这一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在许多方面与埃及的尼罗河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及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很类似。它们都因降水不足而森林缺乏，这反而有利于开荒种地，同时这几条大河，如果控制得当的话，不但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而且通过定期泛滥还能保持土地的肥力。有一点很重要，即华北平原在东亚农业区中是最容易从印度和西亚到达的地方一、：就我们所知，西亚出现古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时间远远早于东亚，所以这些文明要素有可能是通过中亚的草原、山地逐渐传入华北平原的口这方面有不少证据，如种植小麦，驯养马牛羊，使用战车、青铜器和铁器等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近期考古发现证明东亚和西亚同时在一万年前发明了陶器，而泰国北部出现青铜器可能还要早于中东。今天东亚地区的主要作物— 大米，源自东南亚，在史前长江流域地区就开始大量种植了。上古时期的中国已出现了丝织业，很久之后才传入西方。几种重要的家畜原产地不同，且各有分工，如猪、鸡、狗用作食物，而水牛则用来耕地。东亚的基本农业工具是锄而非西方的犁。东亚最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是石刀，其他地区则是石斧；东亚典型的新石器是半月形的石刀及绳纹灰陶，这些器具与西亚及欧洲均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东亚的农业与上古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西北黄河转弯地区的文化亦脱胎于东亚文化，但似乎问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日前并无证据表明这些影响来自于战争或迁徙，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似乎便是今天中国人的嫡系先祖、甚至在那时，中国北方的文化就已经显示出了东亚文明的独有特征。

彩陶与黑陶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相继发现了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起初它们被认为是西亚文化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产物，但近期研究表明，黑陶文化是在彩陶文化基础全几发展起来的。

彩陶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广泛分布于山东以外的华北地区，而在寸扩肃持续时间最久。其最重要的遗址位于西安（古称长安）附近的半坡村，距今已有七万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红黑二色的大型陶瓶，上面往往绘有粗了醒目的几何图案。尽管它们与西亚彩陶不无相似，但我们不能因之便断定仰韶的彩陶在文化上摹仿了西方，因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考古线索可以证明它到底从何而来。

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黑陶文化，与彩陶文化覆盖的地区相同（除了西北一隅），另外还延伸到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黑陶薄而有釉。黑陶文化显示出某些来自西亚的影响（如驯化的绵羊、马匹及陶轮）已进入华北地区；与继起的一青铜时代相比较，也能看出明显的文化同一特性，如它们都有足部中空的三足鼎，相同的神道体系和城墙筑板，而后者在今天的华北地区仍能见到。

青铜时代

至迟在公元前15 世纪，中国人就发明了不同于西亚的青铜铸造技术。早期的青铜器多为一些小件武器，主要发现于黄河大转弯的南部地区，如河南一带；中期青铜器以郑州出上的文物为代表。该地当年是显赫一时的商朝国都，四周为20 英尺高的夯土城墙，面积达一平方英里。城外有两座青铜冶炼场，精美的礼器就是在这里铸造的。

晚期青铜器以安阳为代表。18 的年，中国学者发现一些北京药店出售的"龙骨"上刻有古代文字，之后他们按图索骥寻到安阳，在这里发现了迄今最为古老的汉字及其中所记载的上一古历史文化状况。

这些文字中记载了历代商王的名字及有关商朝后期社会（约公元前l400年至公元前1050 年，当时国都即在今天安阳一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然，考古发现证实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当时疑古派的学者不得不改弦易辙，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商这个朝代。

二、上古中国传统

中国现存的最古文献成书于公元前500 年之前，对上古历史均语焉不洋。不过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却撰写了大量讲述中国文明起源及上古历史的书籍，而且越是晚出的书，讲述的历史也就越为古老。这些书谈到的自然都是作者生活时代的信仰与风俗而非上古所有者，不过此外多少也还保留了一些早期的神话与传统文化，当然也有若干真实的历史记录。

从这些文献及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中国从母系社会逐渐向由众多氏族（或类似的集团）组成的父系社会进行转化。"姓"就是从上古的氏族名称发展而来的，当时就同现在一样冠于人名之前，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缀于名后。中国人历来强调异姓通婚，所以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同姓的人不宜结婚。

当时的宗教思想集中在氏族及其神格化的祖先上、祖先崇拜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此外，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还十分重视对于农业生户：至关紧要的"天"、土地的肥沃程度、谷神及宇宙万物和气象历法方面的知识。权威有极强的宗教性，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祭司与历法的制订者。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政治大一统的理念。由于他们对西方各大文明一无所知，他们以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周围的人则为"四夷"因此他们自称其地为"中国"（意即"中央国家"，不过常被误译为"中央帝国")，这种称呼一直沿川至今。而所谓"天下"，也不过是指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余地区罢了。对于上古历史的知识与推测，也是按照政治、文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帝下世系严密衔接而成的历史事件序列。

文化英雄

中国人对于臆造出的上古历史说法不一，最常见的一种始于"三皇"（可能为父系部落的首领）、继之以"五帝"及"三代"（夏商周）而进入真实的历史。三皇五帝常被视为文化英雄，因为早期的文明成就，像用火、渔猎和农业的起源、历法、医药、文字都归在他们（及其他相对不那么著名的人）的名下。如黄帝的妻子被认为是丝织业的创始人，因为丝织是典型的女性工作。

五帝中的最后两位尧和舜，其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迹是将天下禅让给有才能的人而非自己的儿子。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这三位是

中国最有名的帝王楷模。禹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化英雄，曾治理洪水，将全国划分为九州。中国人对全球性大洪水的记忆在"大禹治水"这个传说即可窥见一斑。

上古的王朝

从禹开始，中国历史的可信度就强多了。他建立了夏朝，其时约在公元前2205 一公元前1766 年之间（亦有人认为是在公元前1994 一公元前1523 年之间）。历代夏王的在位年数，与上述文化英雄玛土撒拉式的夸张数字对照起来看，显然合情合理得多了。

夏莱无道，于是百姓在汤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建立了商朝。商朝一般被认为存在于公元前1766 一公元前1 122 年或公元前1523 一公元前1027 年之间，并得到考古研究的充分证实。在安阳和在郑州发掘的遗迹就分别与商朝晚期和早中期的记载相吻合。这使得我们想知道夏朝背后的文化传统是怎样的：它会不会与最早的青铜时代或继起的黑陶文化有些渊源?

商纣荒淫残暴（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记载亦能证实这一点），像周文王就曾受到过他的残暴对待。文王之子武王最终起兵讨伐，按照历来的说法，于公元前1122 年或公元前1027 年推翻了商朝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周朝：他的弟弟周公则在武王死后辅佐幼主成王，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周朝的建立不无后人美化的成分，其早期记载大部分还是可信的，因为中国最古的典籍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公元前841 年之后的历史纪年就更为确凿可信了，如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公元前8 世纪的一次日食就曾确实发生过。

三、中国的文字

安阳发掘的晚商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甲骨文。这不仅是确凿无疑的汉字，而比也是至今在东亚文明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字的雏型。其中某些甲骨文字即使在外行人看来也与今天报纸上出现的汉字几无二致。这种情况就好比今天埃及或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能认出当年的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并间或念出其中的单字一样：中国人对古人，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文化上，一向有种强烈的认同感，甲骨文便是很好的证明、与西方对古埃及、两河流域或古希腊、罗马的态度相比，他们更有理由感到他们的文化是从商代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

汉藏语系有一个特点，即多为单音节词，古代汉语尤其是这样。汉语和其他大多数汉藏语言的另一特点是没有词形的变化。如"山"，既可指一座山，又可指众多山脉。至于动词就更明显了，其词形根本没有过去式、过去分词、第三人称单数的变化。汉藏语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每个字都有声调。单音词的声调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调一样，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种声调，以"ma "为例，一声为，"妈", 二声为"麻"，三声是"马"，四声则成了"骂"，意义各不相同。

汉语方块字

汉语为单音节语言并缺乏形式变化，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保留了一种类似古埃及图形文字的文字。但汉字又不完全等同于象形文字，因为每个单音节字都必然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字形。由于缺乏曲折变化，中国人很早就不得不发展出了一套运用灵活的语音体系。

在安阳发现的文字已是经过长期发展、早已超越了图形阶段的文字。该文字的前身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的半坡遗址中发现的那些符号。这种文字的书写由上而下，这种方式一直保留到近代。商代遗址中发现的2000多个汉字，大部分看起来与现代汉字颇为不同，但与稍后出现的文字十分相似）而且当代常用的八九千汉字（中文字典中一般收人5 万字及异体字）中的所有使用规则在商代甲骨文中都已定型。

许多象形字虽然已高度程式化，但与现代汉字相比，大部分就像一幅图画，其意义更易得到确认。如"日"的甲骨文就是圆圈中加一根线；"月"的甲骨文依稀便是一轮新月的形状，"木"写作" "，大约就是树根、树枝的样子。有些象形字则相当复杂，如表示献祭的一个字（祭），其形为双手倒执一鸟，其下的符号表示"神灵"。

此外还有大量的会意字，即超越象形的表意文字：数词"一"、"二"、"三"即归此类。"上"、"下"在甲骨文中为"⊥"" "，自然也属此类。其他较为复杂些的字也一样，如双木为"林"，日月为"明"等等二许多会意字同时也高度象形，如"安"字是屋顶下有一女人的形象，意为和平，又如女、子为"好"，表示"美丽"或"喜欢"。

第三种字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同音转借：在商代己出现了许多同音转借的象形字，如"来"原指一种谷物，后转指同音的来到之"来"。

按语音造的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声旁和形旁构成的复合字，声旁之字表示该字的大致读音，而常居字左或其上的形旁则表示字义。如与树木有关的几百个字，像梨、枝、植、板、枪、梯等等，都由形旁"木"外加一声旁组成。

今天使用的汉字大部分都是形声字，因此这些字中的形旁就成为今天最常见的检字法的基础。在这套体系中共有214 个部首，大部分都是形旁，其下按笔画排列同一部首的各字。如"梯"即在"木"首下七画处。与西方字母排列相比，这种分类着实麻烦，有些字还只是勉强归于某一部首之下，但它总算使杂乱的字海稍稍具备了条理。

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显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一能掌握汉字。而每个汉字都很复杂，平均每个字就有十二三画，有些多达25 画。在有能力阅读简单文本之前至少需要记住二三千汉字。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由于复杂，汉字比字母文字较难掌握，而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才－有可能学习文化知识。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虽然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汉字印刷却要比字母文字的印刷难得多，而且迄今为止，能够打印汉字的小型印刷机或电脑犹未获得成功。近来对常用汉字进行的简化虽然不无帮助，但未能解决其文字本身的根本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汉字却具有某些字母文字所不具有的优点。这种文字因其复杂性及象形特征，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在东亚，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也是所有形象艺术的母源，因为毛笔除了作为写字工具之外，也是绘画的工具。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

汉字本身还具有一种字母文字所缺乏的生动性。如掌握了"安"、"好"等字，谁会忘记它们听蕴含的原始意义呢？与硬性规定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似乎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语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一经掌握，汉字甚至比字母文字更易于阅读。

我们很难像中国古人那样赋子汉字以神奇的魅力。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惟独很

少见到演说问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往往胜人一筹的原因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也远远高于其余经济水平相仿佛、但文字较为简易的国家和地区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藉，并且把这种汉语文言视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字母文字，中国恐怕早就分裂为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个国家了。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

东亚文明更是有赖于这种语言，对汉字的热爱与尊崇成为连结东亚各国的坚固纽带。直到一个世纪之前，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大部分书面材料都使用汉语文言而非本民族的文字，甚至今天中、日、韩二国的知识分子犹能认得对方书面材料中的好几千字，尽管这些字的读音并不一致。如果中国当年采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东亚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独特集团了。

四、商文化

甲骨文之外，安阳和其他商代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青铜器了。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礼器为主，往往有可观的体积，看来是用陶范或木范浇铸而成的。由于化学作用，这些深埋地底的青铜器铜锈斑驳，反而平添几分秀色。商代晚期的青铜浇铸技术极其高超，说冠绝全球都不算为过。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纯粹的东亚风格，以铜鼎为例，它们的风格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空足鼎器。有些礼器采用动物造型，如象尊，这是因为当时气候较为暖湿，华北曾有大象栖居。

青铜器的主要图案是婆餐，即牛、羊等动物的正面像，通过高度程式化的手法，以瘦削的线条描绘而成。在安阳出土的骨器和大理石雕像中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图案。这种纹饰与史前文明或西方古代文明的做法大为不同，因为后者通常只是以动物的侧象为装饰。然而，餐餐纹饰亦见于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地区。这表明存在着一种环太平洋纹饰类型，而商即为其中最为古老的代表。少数早期青铜器上刻有铭文，但商代文字主要保存

在"龙骨"上。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牛肩脚骨等扁平骨片。这些甲骨和在龙山文化时期一样，用于预测吉凶，所以往往又称为"卜骨"，这种预测方法亦称为古卜。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甲骨一侧钻一槽纹并进行加热，然后观察由此产生的裂纹，以此来判断神意的赞同与否。

这些甲骨1 / 10 以上刻有卜间之辞，有些还记载着古卜之事的最终结果二卜问的范围甚广，往往涉及献祭、天气、收成、战争、狩猎、祖先的拓助或降灾及下旬（类似星期）的命运。当时的大臣可能都兼任卜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古卜活动在当时是何等隆重了）献祭也极其重要，通常使用动物，但有时也用酒（为一种麦酒），献祭时以酒洒地而成礼。献祭对象包括自然界的各大神灵及"帝"或"上帝"，后者可能就是殷商人的初祖

商代的国家与社会

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也饲养牛羊；。但殷商人似乎已经像后来的中国人那样讨厌动物奶和奶制品了。由于青铜物稀价昂，农具一般为木制或石制，：南方的文贝作为一种原始货币而得到使用，这一点从今天表示财富、贸易的字多有"贝"旁可以看出二玉石非常宝贵，在以后的年代咀也一直受到中国人的珍视。商王多为兄弟相及（13 例），父子相传者较少（7 例）、商朝先后有多个国都，郑州与安阳附近的遗址尤疑是其中的两个，商王统治的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从黄河东转处到山东中部的大片地区［都分布有商代文化遗迹，但其中不少地区只是商朝臣子的封地甚至是敌国的领土，因此商王治下的地仄可能只是不大的一块领土。当时商王频频出征，与邻国或入侵的游牧民族作战以保巨和打一张领土。

但另一方面商朝又强大得足以派遣出3000 至5000 人的军队，而郑州和安阳的商都遗址亦十分恢弘。其建筑风格与今天几无二致；与古代西方的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殿顶有梁柱支撑，夯土（后为砖石）制的墙壁只是用于装饰而非出于建筑的考虑。柱子有石基，其下为夯土建成的平台。就和今天大多数的华北建筑一样，商朝的官室无不坐北朝南而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商代平民百姓的房屋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为粗陋的穴居。安阳附近巍峨壮观的商王陵寝也说明了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王陵为大型地穴，深达43 英尺，占地5000平方英尺，中间实以夯土，通常还有为死者陪葬的大量器具和珍宝。另外在墓址中还发现了战车，这表明商朝也属于战车文化，这种文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大兴于从希腊到中国的各文明古国。

陪葬商王的还有许多贵族或随从以及各种人殉，通常一次有几十甚至几百号人陪葬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不管怎样，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商王先祖可能只是沟通神人的祭司，但经过大约500 年后逐渐发展为拥有崇高威权的君主。这样看来，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权力模式的起源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各种有趣的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而攫取权力的，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 如长城即表明厂这一点— 这可能也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为完成上述工作，必须有少数人来指挥、协调大众。有人认为，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日"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大禹（夏朝的建立者）治水的神话与这一理论恰好吻合，而协力治水确实发生在中国产生第一个帝国的前夜。但实际上专制政体是在商后的l000年中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农业生产更依赖于雨水而非灌溉。因此所谓"治水"理论仍难以解释商朝大一统集权政体的产生，尽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权力模式在后世一直延续下去并得到了加强。

五、西周

周朝

周族约在公元前1050 年灭掉了商朝，在此之前他们居住在黄河大转弯的渭河流域。他们的都城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尽管周人是农业民

族，他们与西北牧羊为生的"蛮族"相邻，在文化卜也与商朝迥然有别。旧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直到周人灭商时在渭河流域似乎仍有保留。

周显然曾是商朝的属国，负责保护西部边境，但经过文王、武王及武王之弟周公的努力，最终推翻了商朝，势力到达华北全境。其实，广泛分布的西周遗址表明周在克商之前，其势力范围已从渭水流域发展到山东东部、满洲南部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已经远远超过了商朝。由于当时的交通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要直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周公在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洛阳附近），同时分封了大量诸侯国。绝大多数诸侯都是周室子孙或亲戚，也包括一些异姓亲信和奉周朝正朔的地方贵族。这些诸侯分为上下秩序森严有别的公、侯、伯、子、男五等。每个诸侯国其实都是一个小型城邦，它以某一城池为中心，四周为田野。当时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已无从查考，不过到公元前8 世纪时，经过诸侯之间的兼并（另外周边诸侯国亦有新的增加），尚有大约200诸侯国保存下来。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国中却是万人之上的专制君主。这种制度称为"封建"，东亚人也用来指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很奇怪他们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制度。我们对西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世中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义、道德等统治原则时，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这种制度与西欧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家实行的"总督（Satrap ）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周朝和商朝同样为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世袭的周王依靠"士"（贵族武士）统治着众多农民和奴隶（后者常为家用奴仆）二后人声称西周每8 户农家在耕种自家土地的同时，还需共同耕种中间一块公室的土地。这就叫作"井田制"，因为"井"字体就是这种土地划分模式的形状。这种制度显系后世的美化，但可能也反映了在某一时代存在过的农业生产资料与收获公有这一史实。

周文化

周族文化相对比较落后，西周时商文化的持续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周朝继续铸造壮观的青铜礼器，铭文篇幅很长，但纹饰则略显粗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可能由于纹饰逐步失去原有的宗教意味而仅仅成为一种程式，这些纹饰的细部也越来越轻桃简略。文字继续在发展衍变，古卜也继续使用，尽管不久就被新的预测方一式取而代之了。

与商不同，周王的宝座是父子相承的（周公未能继位便是典型例子）。周王死后葬在巨大的方形土家下。周人的主神是"天"，其原型显然是人格化的天神("天"的古字即为人形）。周王自称"天子"，并以"天命"作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祭祖（天）是周王的主要礼仪活动，而各诸侯则宰杀牺牲以祭献后土。后世历代各朝直到20 世纪都沿袭了这种仪式，壮观的圆形天坛和方形地坛至今仍然矗立在北京。

第03章 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

一、东周

我们不清楚西周对四周被征服地区的有效统治维持了多久— 可能为时不久甚至只是暂时征服罢了。臣子对周王应尽的效忠义务随着时间发展也逐渐淡薄了。公元前841 年，第十任周王被国民驱逐出了国都，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4 年的"共和执政"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次暴动评价甚高，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人民起义。这次暴动引发了相当巨大的动荡，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中国历史纪年在此之后才变得确凿可信吧。

继起的周王复兴了周室的权力。据说这次动用了3000辆战车和3万人的军队，而牧野之战不过才用了350 辆战车。不过，当公元前770年中原诸侯国联合"犬戎"入侵国都后，西周就灭亡了。传统的说法是，周幽王为讨宠姬的欢心，"烽火戏诸侯"，而真有外敌入侵时却无人赶来救援了。周平王在洛邑重建周室，但此后直到公元前256 年东周灭亡，周王除了在宗教仪式和典礼上发挥作用外，在政治上、军事上已丧失了原来的影响力。

公元前770 年之前称西周，因为这时的国都建在镐京；公元前770年之后则称为东周，国都东迁到了洛邑。中国人尽管偏好十进制（他们几乎没有一打、一周7 天等概念），却素来不用世纪纪年，而是用朝代来纪年，如西周、东周，同时中国人又将东周分为"春秋"（公元前722 一公元前481 年）和"战国"（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下详）两个阶段。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后世中国人出于对大一统理念的信奉，一直把东周视作一个无可救药的礼崩乐坏时期。但这却也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和创造力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崩溃及诸侯竞争的多元性很可能为之提供了动力。东周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和浪漫的一个阶段。在公元前8 世纪，中国在技术上仍落后于西亚，但在世纪末已迎头赶上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当时战国七雄的人口加起来共有约2000万之多，接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总和。西亚人比中国人早1000

年学会了用铁，不过到了公元前5 世纪，中国也开始普遍用铁了。铁制兵器代替了青铜兵器，而铁制农具和用牛拉犁则给中国带来一场农业革命。于是华北有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海岛上的"蛮夷"也被纳人了主流文化。由于采用大规模的灌溉技术和其他水利设施，谷物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当时还大修运河，这表明地方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另外大量长途运输税粮及其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生产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的快速发展及财富的惊人增长。此时出现了各行业的大商人，他们所代表的新兴阶级对旧的贵族统治秩序形成了冲击，于是后者大约出于自卫的考虑，宣扬一种由上而下排列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理论。尽管这种理论甚至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很不现实，但它却成为东亚在此之后2 以刃年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东周列国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区划单位也在不断稳步发展起来，这一点从稍后的大兴水利即可清楚地看出、：华北地区混战的诸国中大约有10 国最称强盛，但在此之后的几百年间却渐渐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周文化区周边的国家。这些国家地处中原，发展空间狭小，受到更多的传统束缚而不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技术的变法革新。如鲁国和宋闰，虽然有骄人的历史（鲁是周公的封地，而宋是商王室的封地），在东周旱期曾强盛一时，但最终却沦为周边强国的附庸。

齐国便是一个典型的周边强国：、它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但其势力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山东半岛的大部分丘陵地区，到了公元前7 至6 世纪时领土已为原先的六倍，控制的地区与今天中国一省的面积大小相仿。在北方今山西境内，晋国的疆域也和齐国相坪。晋国东北部（现北京地这）一带是燕国，所以北京又称"燕京"或"燕都"仁，西部的秦国素来被邻国视为"半蛮夷"国家，他们古据了周朝原先所在的渭河流域。

南方的"蛮夷之邦"楚国到公元前8 世纪时，沿长江中游拥有广大的疆域。他们向来不奉周室正朔，其统治者一直自称为"王"。楚地以东为吴国。后者在公元前6 世纪时控制了长江下游一带的地区，近期考古发现证明，吴国是从西周时的"南蛮"各族发展而来的。吴国以南的沿海地区属于越国。吴、越、楚三国境内多有大湖与可以通航的大

河，因此这三国习于水战，均为水上强国。"吴语"（今上海一带的方言）即从吴国之"吴"而来，而毗邻中国南疆的越南，其本义即指"越国以南"的地区。

这些边缘国家绝大部分属于西周统治下，但有些居民是中原人所谓的"蛮夷"。北部和西部的"蛮夷"应为游牧部落，可能有些已经讲汉语了。南方的"蛮夷"同中原人一样从事农耕，但据说其语言古怪难懂（尽管很可能也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其文化亦独具特色。东周时期这些"蛮夷"归化了中原，其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西南一隅外，都逐渐融人了中原文化的主流。

政治革新与社会改革

周朝早期城邦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君主掌管祭礼，从而获得某种宗教性的正统地位。他们的心腹战将大都由亲族内部的人充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贸易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和版图的扩张，这种宗族式的贵族统治方式就显得过时了。在许多诸侯国中，这种宗族统治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都显得力有不逮了。

先前的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而新兴大族通过土地或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代替了"家天下"的旧式贵族统治方式。这种新兴家族有时甚至推翻并取代了旧的统治者。韩、赵、魏"三家分晋"即为一典型例子。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53 年并于公元前403 年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这两个日期都被视作是战国时期的开端。

要想统治广大的疆土并使臣民顺服，就必须采取一种比旧式贵族政体更为强大有效的统治方式。其结果便产生了相对较少人治色彩的统治制度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几项相关改革是由齐桓公（公元前685一公元前643 年）及其贤相管仲（《 管子》 一书据说即为管仲所撰）完成的。如按照地形将齐国人口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各级单位，建立了统一的税收体系，重建了军事力量，朝廷的军队由各级政府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各家各户供养，另外齐国还实施了主动型的经济政策，如力图控制市价、规定度量衡和鼓励发展贸易等等。一般认为，国家对盐、铁的垄断专卖亦始于管仲的改革，这在后世一直是中国历代集权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很难说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多少是在公元前7 世纪或是由齐国产生的。某些国家专卖项目的产生可能没有那么早，不过归在管仲名下的诸项重要改革在东周时期确已产生。大一统

的地方行政体系及明确的赋税征收制度，无疑是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此时出现了国家官吏代替以往的贵族协助国君进行统治。管仲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此外，从魏文侯（公元前445 一公元前396 年）开始，成文法规亦逐渐代替了以往建立在既定传统基础上的人治方式。

军事的发展

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交战双方均格守严格的战争规则，而且主张保存亡国的王室宗亲。这样，一些弱小的国家往往能够抵挡周边诸强的勃勃野心。但此时战争的规模升级，并且更趋冷酷无情。一国被灭掉后往往被编为战胜国的一个省份。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战国诸雄仿效楚王纷纷潜称王号，这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周室抛在一边了。尽管战车直到东周仍在使用，但铁制兵器的加入大大升格了军队的规模。农民充任步兵，代替了使用贵重的青铜兵器的贵族车战者，于是兵力大增，往往多达数十万。

引人骑兵是军事改革的又一举措。胡服骑射对汉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军事领域。骑马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这就促进了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当时西方的发明和观念加速流入中国，而后者得以赶上一度存在的技术差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甚至在视觉艺术领域，如西方对人像轮廓的重视，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后，也逐渐代替了商朝的纹饰风格。

由于骑马作战的优势，中国北邻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形成了更大的威胁。后果之一，是中原北部诸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入侵，这在后世联接起来称为万里长城二另一后果，是中原军队以骑兵作战代替了车战方式。弩弓的发明使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大约也促进了这一过程。骑战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则是胡服的引进：这种服装分卜衣和裤子，比传统的宽袍大袖更便于行动：）这样，中国人在农业民族中率先穿起了裤子。

寻求政治稳定的局面

东周各国在周室陵替、争战频仍的情况下，曾努力将战事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稳定政治局势。为此他们经常举行双边或多方会盟，纷纷提出裁军的建议，并签订盟约组成联盟。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是巩固联盟的重要手段，而对附庸国则向之索取人质以确保其不生二心。具

有"蛮夷"色彩的楚国对地处华北平原的呀'原诸国尤其构成威胁，于是后者频频结盟以合力对抗楚国。首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会盟发生于公元前651 年，盟主为齐桓公。不过这种结盟只是带来暂时的稳定，往往随霸主的去世而瓦解。齐桓公之后，晋文公于公元前632 年继起称霸。接着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这时结盟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公元前6 世纪中叶晋楚交相争霸，从而"天下"稍定。同时楚国东边的吴国也迅速强大起来，并于公元前482 年称霸，但随之即在公元前473 年被最具有"蛮夷"色彩的越国击败而覆灭。

建立秩序的努力失败了。残酷的争战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公元前453 年"三家分晋"之后，齐、秦、楚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楚国在公元前334 年、公元前249 年分另11 灭掉了越国和鲁国。齐国在田氏篡位后于公元前286 年吞并了宋国。秦国则干脆在公元前256 年，不声不响地灭掉了周朝。最后，经过公元前230 年至公元前221 年ro 年间的几场大战，秦国灭掉了其余的诸侯国，从而在中国历史__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二、诸子百家时代

早期诸子

东周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政治都得到～屹速的发展。旧有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崩溃与当时的变法一同产生了新的问题。过时的传统必须屏除，而人们也必须找到新的指导原则。人的思想现在可以自由驰骋了。这在东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这一思想繁荣的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的先知时代及古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当时所有文明世界中的哲学思考都十分活跃。当时几大文明之间思想的交流可能起了促进作用；其次，当时这些地区都很发达，社会足以供养起一大批思想家。此外，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也粉碎了传统的观念，因此各地方的人都开始自觉地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不过他们得出的答案大相径庭，从而使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就此分道扬镳，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在这一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类迥然不同的哲学思想，直至今日都是这几大文明的重要区别性特征。

从这时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之上了。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人道主义"或曰"社会性的"思路，因为它着重的是社会而非个人。这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思想是向这个方向发展。也许在一种巨大的单一文化格局下，东周列强纷争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使中国人感到政治和社会问题格外突出和迫切吧。

中国的早期哲学家，不管怎样看泞先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属于新兴的官僚阶级，这一阶级也正是随知识的传播及时代对更为复杂的政治体系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些哲学家们往往周游各国，如果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为之出谋划策。其中一些大思想家，他们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不论成功与否，都吸引了大批门徒而本人乃成为教师。这些门徒渐渐形成了各种哲学流派，而先师的一言一行，经过他们的加工、补充后便都逐渐成为诸子百家的经典。

经典

尽管当时的诸子百家通常也是大胆的改革者，但正如其他地区的哲学家一样，他们往往把以往的黄金时代视为他们的理想国。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前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孔子与当时其他哲人均将先前的著作视为经典并从中生发形成自己的学说，这种对古籍的尊重在东亚一直保留到了近代。2000多年来，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诊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在爱好秩序与经典的中国人心目中，"经典"并不泛泛指一切古代文献，而是特指儒家的经典。这些著作连同对它们的注疏一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门类。这些经典都成书于周朝之后，时间跨度也很大，但成书于公元前2 世纪之后的所谓"五经"（这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套儒家经典），却包括了最古老同时也最受人尊崇的儒家著作。

《诗经》 是五经之首，其中搜集了公元前10 至公元前7 世纪的305 首诗歌。其中有情歌、政治诗歌与祭祀时的颂歌，但其格律、韵律、韵脚都经过了文学的加工而非简单的民歌。甚至在当时，诗歌显

然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吟诵、写作诗歌一向都是后世文人雅士的标志。

《书经》 中包括了一些西周早期的准历史文献及演说辞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中瞬入f 大量后世的伪作，从公员前2 世纪发展出的古文，今文两种《 尚书》研究传统及正伪之辨使语文学家和析学家们一肖聚讼不已。

《 易经》 的成书也经厉了好几个时期，围绕八卦和六十四卦，《 易经》 创造出一整套不同于龟卜之术的占卜系统东亚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八卦，由或阴或阳的几交排列组合而成，用六交时则有64 种组合、通过挑选蓍草的奇偶，，可以得出某一特定的交象，再对照《 易经》 就可发现其涵义叮以说，《 易经》 其实是一本占卜用书。

《 春秋》 是鲁国历史的大事年表，其中记载的历史上至公元前722 年下迄公元前481 年，即所谓的"春秋"时期。该书只是罗列史实，言简义赅，但其作者孔子却以微言大义的史笔传统表达了丰富的思想。）不过，说孔子是《 春秋》 的作者，这种说法无疑是不真实的。

最后一经《 礼经》 ，是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 世纪编辑成书的。其中记录了儒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的主要观点，显系儒家传统的产物。不过其他四经也代表了儒家思想，因此这本书通常又称为"儒经"。

周亡1000多年以后，儒家学者又选出四本最能代表孺家学说的书来，这就是《 四书》 ，包括《 论语》 、《 孟子》 及《 礼记》 中的两章：《 大学》 和《 中庸》 、《论语》、《 孟子》 与五经等经典又介称《十三经》 ，其中《春秋左传》 算是三本书，其中的《 左传》 是一本详尽的政治史，在史实基础上不乏对细节的想象性创造。

非儒家的学者的著作一改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其他具有相同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古代著作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如屈原的《 楚辞》 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的《 离骚》 具有"南蛮"民族的特征，想象力丰富，在不同的时空里自由驰骋，而这正是《 诗经》 所缺乏的。

三、儒家与道家

孔子

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育家兼思想家，在东亚一直被视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称他为Confucius，即为"孔夫子"的音译，而"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孔子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551 一公元前479 年之间，他的生平大部分只能从《论语》 中得知。《 论语》 总是以"子曰"开头，绝大部分为孔子对学生疑问的解答。这本书是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编撰的，其中不免颇有添加之处。

孔子是鲁国人。他希望能在朝廷上谋得高位，于是为此而周游列国，但最终只是无功而返。他想做一名务实的政治家，无疑是失败了；但他无意之中成为一名教育家，时间证明却是空前绝后的成功。粗粗看来，孔子的学说平淡乏味。在他最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上，孔子具有当时的种种的偏见：尽管他也承认鬼神和天（有时认为他的使命是上天赋予的），但他显然对人类以外的领域兴趣不大。曾经有学生问人死后的情况，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甚至在政治领域，他也仅仅力求格守古代传统而将以前的智慧继承下来：孔子认为欲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使人们复归三代之治。

孔子认为，要恢复先王之道，人们必须在一个稳定的一统社会里各守本分、循规蹈矩，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孔子另外还提出"正名"的观点，要求社会实践与理论协调一致，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这些论点听来似乎极端保守，但事实上孔子却是一位伟大的（尽管他本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革新者，因为他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好的统治首先是道德的问题。孔子不反对君主世袭制，但他强调君主首先的任务就是以身作则按照道德准则办事。有一次他谈到政治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不是"力"，而是君主的"德"与老百姓的满意程度。孔子之前中国的思想可以说是"前道德"的。其中心为古卜与献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道德伦理学家，他开创的伦理道德传统，使中国文明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为注重伦理道德的价值。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君子"原指宗室之子或贵族，但在孔子那里意指高尚的人。也许最好的对译是"gentleman" （绅士），即有教养的人或上等人。他认为"君子"应具有多种德行，如"知"、"义"、"忠"、"恕"，特别是"仁"。

孔子认为，君子所必备的品质光有内在的德行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文"（教养或修饰）有"礼"（原指礼仪，此处指对止当的礼节及社会习俗的尊重）。孔子对浑金璞玉式的所谓"真人"不感兴趣，认为"质而不文则野"。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孔子同样认为合乎规矩的音乐有助于产生合乎规矩的道德观念。他对古礼的重视，使"礼仪"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古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东亚对通过一举一动来培养内心道德的强调也源出于此。这种教育准则无懈可击，但在当代西方则有可能会无人问津。

这种文质之间的平衡代表了孔子"中庸"学说的特点。印度和西方的大哲人和宗教领袖们往往宣扬绝对化的思想，即往往强调逻辑和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孔子却是一名相对主义者，其思想以社会和人类为出发点，从而奠定了东亚特有的惯于折中、寻求中庸之道的方式。孟子有句话概括得极好："仲尼不为已甚者"，即是此义。

折中与平衡也许能够解释为何儒家思想最终在中国获得了胜利。其保守的政治思想使它受到后世东亚统治者的欢迎，其严格的道德标准与权力世袭制度相比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统治基础，并且成为不断促进改进统治方式的动力。儒家思想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应时而生，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当时士— 官僚阶级正应政治的需要而缓慢发展，他们需要一种哲学来支持，而孔子的学说则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尽管孔子从未置疑权力世袭制度，但是他提出才学之士不分出身贵贱，都有权利参政议政。这样，孔子其实宣扬了一种"英才政治"的观念，这对权力世袭制而言基本上是革命性的，它对后者亦形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

道家思想

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道家思想总体说来是一种退避的哲学。当时有些哲人目睹无休止的战争、动乱和死亡，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而退出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争斗。面对无穷的时空，他们感到人类个体若非作为造化伟力的体现该是何等的渺小。这种哲学表达了普通人对于日益加深的独裁统治的不满，也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敏感的人对日益僵化之儒家道德论者的反抗。道德论者与统治者一道迫使大众服从社会规范，道家却大力鼓吹个体的独立性，认为人惟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与天（自然）保持一致。这种自

然就是"道"。孔子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但道家却赋予它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道家思想来源于楚国。这种思想标志着中国思想在吸收了"蛮夷"文化后更趋丰富了。上古中国人对白然神、生殖崇拜及君主沟通天人的能力十分关注，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能正是这一传统的哲学表述。道家思想的核心— 神秘主义，可能亦是脱胎于卜古的巫术思想。后者在自感的恍惚中直接与神灵交流；而道家则通过"坐忘"、"心斋"来体验一种恍惚的狂喜，从而达到"真人"的境界并直接了解完整的宇宙。这可能受了印度瑜伽的影响，因为道家和印度人同样强调吐纳的功夫。

我们对东周时期道家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作者和成书年代都难以确定的三本书。其中最受后世尊崇的是《 老子》 或曰《 道德经》 。该书约于公元前3 世纪后成书，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但通常把它归于老子这位神秘智者的名下。"老子"意为"老先生"，因其稍年长于孔子而得名。《 老子》 一书简洁古奥，致使后世中国学者对该书的解释言异义殊，当它译成西方语言后，各种译文也往往大相径庭。

第二本书为《 庄子》 ，大概也成书于公元前3 世纪，但作者庄子却生活于公元前4 世纪末。书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寓言、隐喻及诗体的段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述了早期道家最重要的一些概念。第三本书《 列子》 在内容和风格上都逼肖《 庄子》 ，成书年代从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3 世纪众说不一。

就像所有的神秘主义者一样，道家感到很难用语言将其学说中的基本概念表达出来）他们认为，"知人不言，言人不知"。"道"是建立在无名无形的"尤"，或质言之，建立在自然进程的总体性之f 几的。"道"尽管不断变化，但本体却是一样的，并无大小、善恶、生死的区分万物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道家的主要观点，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即为此意.

人若能超越世俗而与"道"合为一体，那么他就会远远避开一切危险而在各种冲突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与"道"合为一体的关键是"无为"「）道家认为，"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做书顺其自然，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若无人力干预，世界就会按照自身的和谐规律顺利地得到发展：人类干预或改造自然就会破坏这种和谐并产生

混乱。人为的干预只会损害宇宙间的大道玄机。圣人没有野心，所以也就不会遭到失败。他甚至不会去教导别人。若拿这点来衡量我们的道家作者，他们自已恐怕都不够合格吧。

道家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一样也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同样怀念上古的黄金时代，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圆方知识的时代，那时的人民浑浑噩噩，根本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道家认为，善恶之分正是人类悲惨境遇的根源所在，而儒家圣人乃是愚不可及的历史蟊贼，后者鼓吹的仁义道德正是罪恶产生的渊蔽。法律造成了各种犯罪现象；如果没有财富，偷窃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

混沌是道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知识只会产生破坏作用。《庄子》中有则寓意．讲到"疏"与"忽"为"混沌"凿七窍而"混沌"亡，又称赞一名农夫宁愿负水而不用辘护汲水，因为他认识到机巧会使人心随落，均是阐发此意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这样一种原始、消极的社会中"无为而治"而天下"至治"。

道家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后世受到贬低和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显然它具有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某种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一统局面和沉重的儒家伦理说教是不利于美感表达的，而道家鼓吹的个体自由与天人合一却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的艺术家和诗人，不论他们对儒家传统多么认同，其内心深处却总是认同道家的。

道家思想其实正是对中国主流文化而言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集权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的自由，儒教的道德伦理及其对个人服从社会的强调更是束缚了人的心灵。相反，在道家思想中个人能够真正地展现自我并白山地抒发性灵。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排斥异己、惟我独尊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同时信奉儒家和道家。也许这比单单信奉一种宗教更能形成健全的心理平衡。一名中国人在台上则往往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徒，在野时却成为与自然相亲的道家信徒，白天是积极人世的官吏，人夜却变成幻想的诗人或自然的爱好者。这种哲学卜和人格中的二元互补，一直持续到中国的近代。

四、其他哲学流派

阴阳家与名家

除儒、道两家以外，东周时期还活跃着其他各种哲学流派按照中国人特有的分类法，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其中有一派史称阴阳家，他们试图用某种宇宙原理来解释自然万物："阳"代表雄性、光明、温暖、积极等特性，"阴"则代表雌性、黑暗、寒冷与消极的一面,与地中海文明认为善恶二元永远对立的观点不同，"阴"、"阳"是相互补充、相捕相成的。"阳"愈是发展，愈有可能转变为"阴"。现在韩国的国旗即以此为主要图案。事实上，这种"阴阳"观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现象时可能比西方的二元哲学史更为有用．它与日夜、冬夏的韵律和男女两性的划分十分吻合如果拿这种观点来分析本章所讲的主要内容，则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思想中，儒家为阳、道家为阴

"五行"思想是阴阳学派的又一基本观点他们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各种不同搭配而形成。这与古希腊的地、火、气、水四大原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五行学说在后世导致了我韦之学的产生。五行及与之相对应的色彩、味道、声音、行星、方向等各组概念构成了宇宙间的各种关系，再加上术数、星相之学，这种关系的搭配可以趋于无限。古代历法的纪年亦属于这一体系，如大干、地支。天干、地支搭配起来以60为一周期，可以用来计算日期和天数。勘舆之学（即看风水）也是从这种伪科学中发展而来的。

还有一派称为名家，他们类似古希腊的诡辩学派，通过辨析字义形成一套逻辑体系。比如，他们在公元前4 世纪提出很多著名的命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白马非马"，强调共名与类名的不同。这些观点在后世被指为是琐屑无聊的雕虫小技。

墨子

墨子是早期儒家的主要对手。墨子生于孔子去世或稍晚的时候，其学说载于《 墨子》 一书。《 墨子》 同《 论语》 一样由专论和对话录组成二墨子对儒家的批判不遗余力，这表明墨家学说也许止是儒家的一支叛逆，而墨子对逻辑的兴趣也曾可能促进了名家的产生。；在大多数间题上墨子都采取了一种比孔子更为激烈的态度。孔子鼓吹学而优则仕，墨子却认为统治者完全应该把王位让给贤人：孔子说到底是传统主义者，墨子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宣扬采取各种措施来富国、增加人口和维持国家秩序凡是无助于达到这一目的思

想都遭到他的严厉抨击。他认为衣食住行只要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需要就可以了，各种审美艺术是毫无用处的，一切情感也应该加以抑制，因而音乐和儒家的各种"礼仪"应该全部摒弃。。墨子特别对儒家规定的葬礼中的种种繁文缚作与孝子为父母守孝三年的制度大加抨击。战争是最大的浪费，而墨子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力发展防御技术而使进攻成为不可能。墨子之后200年的历史显然证明他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与之相比，后人对孙子的兵法更尊敬得多。

墨子倒是不反对祭祀神灵以获取人间的福址，而且也承认存在着惩恶奖善的道德意义上的"天"。因此，他的学说中有明显的专制主义成分。他对其众多的门徒要求绝对的服从，而墨家一派的首领— "巨子"，则从墨子开始，代代相传。不难理解，他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种秩序严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下属人员在一切问题上均服从上级的命令。

墨子为这一功利主义的乌托邦开出了"兼爱"的药方。儒家从家庭关系出发，认为爱随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而有所区别，墨子则要求人们爱人如爱己，认为这样更能达到仁爱的目的。

为什么墨子一派在公元前3 世纪就消失了，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墨子的门徒更有组织性，其学说一度还颇占上风。西方学者认为墨家学说中的"兼爱"思想、功利主义、和平主义、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及对逻辑的兴趣，本来都能大大丰富中国的思想。但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太趋极端。他们并不喜欢墨子具有苦行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种种细微心灵表现的漠然态度；与崇高但不切实际的"兼爱"相比，他们更喜欢儒家那种中庸而适度的划分等级的仁爱思想。

孟子与荀子

墨子末能将他的思想传诸后世，但孟子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孟子》 一书在12 世纪时成为仅次于《 沦语》 的儒家经典。该书篇幅很长，极富文学价值，其中不乏对人类心理的深刻认识。《 孟子》 一书对东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约公元前372 一公元前289 年）生于鲁国附近的邹县如孔子一样，他也曾周游列国谋求在政治上一显身手，但是未能获得成功，尽管孟子及其门徒先后受到许多国君的礼遇和款待，但他却对此不屑

一顾。孟子自视为从上古圣贤到孔子之道统的继承人，但事实上他做了不少新的重要发挥；"性善说"就是其中一项、孟子指出"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中，皆有休惕侧隐之心"（这种类比是孟子及当时大多数哲学家的典型思维方式），这种天生之"善"可以通过修身和教育而得到堵养，并且有意识将仁爱扩大到家庭之外。

在政治方面，孟子甚至比孔子更为强调统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他认为墨子的实用理沦是一种机会主义思想，指出统治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义"而不是"利"。孟子认为只要统治者具有完善的道德，他自然会"王天下"，即拥有全部的土地。这就是真正的"王 道"。孟子认为对百姓仁慈是王道的特点、即教化百姓并使之生活富裕，他还盛赞土地公有的井田制他断言要成为合格的君主，就必须关心百姓的福祉，以此来获取民心；事实上"天命"还是通过民心而得到体现的，如果，百姓诛杀或罢黜了国君，这表明国君失去了上天的支持。因此，孟子得出结沦说，武王伐纠，"闻诛一夫封矣，未闻拭君也"。

孟子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贡献仅次于孔子其人性善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人在道德上是天生平等的，这对后世中国社会中的平等思想很有影响。孟子还坚持认为政府必须代表民意并获取人民的支持，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高度政治化的理想在历史上竟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荀子（约公元前313 一公元前238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重要儒家代表，尽管后世有些人认为他并非"醉儒"。不过在当时，他作为政治家和学者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荀子》 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还被选入了《 礼记》 之中。

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认为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性来自于非人、非道德的"天"；人的感情、欲望相互冲突，因此是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教育来使人向善。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此外应该受到尊敬学习的进程始于诵读儒经而终于习礼。、荀子认为"经"与"礼"是一切智慧的源泉，教育和教师十分重要，此外他也相信鬼神。这些观点都成为儒家主流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教育、礼仪、上下尊卑之序、兼行教化和刑罚的严厉统治等方面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后世专制思想的发展。

法家

荀子思想中的专制倾向和性恶说在法家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法家大盛于秦国，其代表人物有韩非（约公元前28 任一公元前233年）和李斯（卒于公元前208) , 两人均为荀子的学生。墨家的功利思想和绝对服从的观念以及道家鼓吹的非道德的自然秩序、对传统道德和知识的蔑视，对法家思想也有相当的影响。《韩非子》 一书是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其中收录一了当时的一些法家文章。

法家认为，百姓所憎恶的严刑峻法乃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惟一方法，而百姓就像是在挑破脓疮时号哭的婴儿一样不省利害。法家对先王之道也不抱迷信，认为时代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跟着改变。百姓都是愚蠢的自私自利者，而官吏则各谋私利而难以信赖，因此统治者不能依靠人的道德，而是必须通过奖惩（换言之，即严峻的刑罚）来进行统治。对人的评价不能看他的动机，而是要看其行为的最终结果。失职者必须惩办，须对百姓实施"连坐"之法，对谋逆行为知情不报者以同罪处罚。如果实行严刑峻法，百姓自会安分守己，而刑罚最终也就会消失了。

法家认为，权利仅仅存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尽管法家反对君主世袭以外的任何世袭制度，他们却认为宗族承袭和法家思想一样，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而统治者的目的，白然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为此商人、儒士等"五蠹"必须驱除。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尽可能地以富国强兵为旨归。

近来常常有人把法家称为极权主义者。这个说法并不一定确切，因为他们并不具备20 世纪极权主义者所具有的舆沦工具与控制大众的技术手段。照当时情况来说，他们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因为他们无条件地赞成君主专制制度及先前的农业社会制度。同时，他们强调建立一套普通适用的法律体系及政府与人民间带有感情色彩的固定关系，这无疑是后世专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适应了当时对更大、更复杂的政治制度之需求的产物。

法律是西方文明的骄傲，而法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来却一直名声不佳。这是因为法家的法律观念远未达到古罗马时代的成熟程度。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儿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则惟恐避之不及。西方崇尚

法制，认为这样才能更稳妥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大约是信奉孟子"人性善"的缘故罢，宁可采取人治的方式，认为由高尚的官员来进行统治比冷冰冰的（或照他们看来，是独断随意的）法律来得更稳妥些。

尽管受到后世的指责，法家思想对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的建立及其一首创的帝国体制，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后世出现的大一统制度与严苛独断的统治也能从中找到部分原因。在秦国于公元前3 世纪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的中国政治大转型的过程中，法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04章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

一、秦帝国的建立

秦国国都位处渭河流域，该地易守难攻，并为秦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不过这一地区地处边缘，西北部有游牧民族，西南部各族农业也很落后、公元前318 年秦国吞并了地处四川盆地的两个半开化"蛮"国。与"蛮夷"的交往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公元前4 世纪秦国出现了骑兵即为一例。在治水方面，地处渭河流域的秦国也无须应付黄河流域各诸侯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在公元前3 世纪，秦国修建了一条灌溉．运输两用的水渠，这大大促进了渭河流域的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而秦国的工程师也因在四川成都平原修建了宏伟的灌溉工程而名垂青史。

秦国强大的另一原因，是秦国大力贯彻了法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新法秦国的第一次全面改革是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的，以致后来往往认为他就是公元前3 世纪《商君书》 的作者。商鞍本系卫国人，自公元前361 年起在秦国主政，直到公元前338 年才失势被杀、据说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赏罚制度，强迫所有的人都从事生产性的职业，推行"连坐"和监视制度，并试图完全按照军功大小赏赐爵禄以代替以往的世袭贵族制度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将全国土地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秦国和其余一些国家开始在新夺来的土地上设立郡县。这些郡县大概就是以前的城邑，一般有重兵镇守四境。公元前350 年商鞅首次将秦国全境划为31 郡。上述增强政治集权、扩大军事力量的各项措施，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击败了中原诸国的"连横"，并于公元前256 年灭掉了东周。

秦始皇统一六国

统一中国的伟业是由幼年登基（公元前246 年）的秦王嬴政完成的。他先后受到大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和荀子的学生李斯的辅佐，以惊人的速度统一了六国。从公元前230 年到公元前221 年，他迅速灭掉韩、赵、魏、楚、燕、齐等国，并于公元前221 年建立起自以为是万世不替的大帝国，并夸张地将"三皇"、"五帝"合为"皇帝"一词，自称为始皇帝。

本来这位始皇帝打算分封宗室与诸将，就像新崛起的印度、西亚帝国一样。但在李斯的建议下，他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 郡（后又增至42 郡），郡下又设了县，并且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法律和税收制度。此外，他又收缴各国兵器，将各国富户迁至国都咸阳。他在咸阳大兴宫室，并在人工建起的山上修筑了宏伟的陵墓。今天在始皇陵附近我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兵马俑，陵墓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不满足，又派兵南征今天的华南地区，甚至挺进到今天广东沿海和越南北部等地区。在西北边疆，秦国部队击退了宿敌胡人，而与此同时后者也首次形成了一个大型政治集团。为防御北部游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大征民夫，将以前六国的长城连接成为西起甘肃、东达蒙古和满洲南部的万里长城。他指望万里长城能永远将北地"蛮夷"与农业文明的中原地区分隔开来。如果辅以足够的兵力，长城确实能够抵挡胡骑南下直到晚近如明朝，仍在原址北南各处修建新的城墙，早期秦长城的土制建筑也被后世的砖石结构所代替，其作为防御体系的功能始终如一。

为巩固统治，秦始皇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网状驟道系统，统一了度量衡、货币甚至车轨的宽度。"车同轨"对于华北黄土高原上的交通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说李斯还统一了六国的文字。在大一统集权和李斯的影响下，在公元前2 世纪时汉字一与中国文章得到了统一定型，成为今天汉字与中国文章的雏型。

秦朝统治者认为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原先六国的史书不利于秦朝统治，于是力图销毁这些著作。李斯在公元前213 年，发动了"焚书"运动，除了有关农业、医药、占卜与国家藏书外，所有书籍均被烧毁，不肯服从的学者不是遭贬就是被处死，据说有数百名学者竟被活埋。因为这一破坏文化的举动，李斯招致了后世的唾骂：他的政策确实促使中国思想黄金时代的终结，但其中有更重要的原囚，如秦朝短短几十年中经历的狂暴战争和大一统的帝国本身也都束缚了多元文化的发展。秦时中国哲学出现了断层，而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的力度和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几乎成为绝响了。

秦朝的灭亡

尽管秦始皇梦想他的王朝可以万世不替，但在他死后（公元前210年）次年秦王朝就覆灭了。秦二世十分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如修建宫室、释道、水渠和万里长城）的沉重负担。奉行法家思想的秦王朝倒是从反面证明孟子关于"民心"的说法是正确的：战无不胜的秦王朝失去了民心，于是便分崩离析了。

秦朝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这就连锁引发了统治的全面失调。秦始皇不失为一杰出的实干家和不知疲倦的旅行家，但他似乎有种自大狂的倾向，一举一动都故弄神秘。另外，他还一心修仙幻想长生不老。修仙以求长生是当时道家的一种时髦思想。秦始皇曾东巡山东沿海地区，并派遣船队到东海去寻访不死之岛。在他死后，李斯和赵高等人逼死了太子，拥立幼子胡亥，是为秦二世。但李斯本人很快也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秦二世也随即一命呜呼，到了公元前209年秦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秦始皇建立万世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不过他创建的帝国制度却保存了下来并延续2000多年，从而成为世界历史上保持时间最长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后代史书，秦始皇多以暴君的面目出现，但今天的中国学者却公正地认为他是统一中国的功臣。如今天西方语言中的"china"即来源于"秦"这个词的读音。

二、汉承天命

汉朝的建立

秦始皇死后，公元前209 年楚地爆发了起义，随之各地也纷纷效仿，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帝国起义的将领绝大多数是忠于原先六国王室的士兵或盗匪，如项羽即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在公元前209 年消火秦帝国后把一名楚国皇室后代认为皇帝，重新恢复了六国，他本人则自立为西楚霸王。至于周朝，是没有可能复兴了。另一名起义首领刘帮于公元前207 年占领了渭河流域，其国号为汉，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而得名。

刘邦完成了秦始皇意欲建立一个万世帝国的未竟事业。刘邦死后，他的帝国又存在了200多年，除去王莽新朝（公元8 一25 年）的一段插曲，东汉又持续了近200 年（公元25 一220 年）。 这400多年的时

间，与罗马帝国大致相当，而两汉皇帝手中掌握的权力、其影响及历史地位，亦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差相仿佛。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都自称为"汉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也把中国的文字称为"汉字"。

刘邦和后世的大多数皇帝一样，其庙号"高祖"更为世人所熟悉。他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秦帝国已为他打下了基础，席卷全国的战争使百姓对周朝的记忆进一步淡化，而他本人即为时代转型期的典型代表。高祖出身平民，不像秦始皇或项羽那样出身王室或贵族。尤其重要的是，他很明智地一步步巩固其统治，对百姓也比较宽厚，如他曾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减轻了秦朝统治时的刑罚与赋税。结果他获得了民心，换言之，汉获得了孟子所说的"天命"。

汉朝初期的统治者绝大多数都沿袭了秦朝的统治制度，不过高祖在集权统治问题上却进行了一项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十分必要的改革：他把一些亲属与部将封为王或是侯。不过他后来又铲除了那些异姓王，并在临死前的公元前195 年立下非刘姓不得封王的法律、其继任者通过削藩、准许王国和侯国分封子孙的政策消灭了残留诸王的势力，最终干脆直接委派官吏来管理各国事务。公元前154 年平定七国之乱后，更完全扫清了诸王对中央构成的威胁。终西汉200 余年，诸国仍有遗存，但数量甚微，如西汉末年仅有20 个王国，侯国亦不过241 个，而全国却有103 郡及1314 个县。

外戚专权是汉朝统治的第二个隐患。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有许多妃嫔，她们当中有谁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母以子贵，她本人往往就成为皇后，太子继位后则以太后的身份左右朝政。高祖死后，其妻吕后专权，几乎取代汉朝登基称制，吕氏也一度把持了国政。但公元前180 年吕后死后，吕氏就被忠于刘汉的大臣夷灭了。

另一个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公元前3 世纪末时，这个大概操突厥语的民族成立了部落联盟，其势力东至满洲西部、蒙古和西伯利亚南部，西至帕米尔高原，其骑兵部队经常南下劫掠华北一带。高祖在白登之役后，不得不采取和亲、输币的政策以维持和平，但匈奴仍然南下不断进行侵扰。

政府与社会

尽管有上述种种困难，汉朝统治者还是逐步建立起稳固的大一统政权，国家也在数百年来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大大发展起来。到了公元前1 世纪末，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官吏已达130285 人。官吏和其他一些有爵号的人共分18 级，犯罪后可以减刑，官位高的还可以免交赋税。这是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但与其所治理的人数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公元2 世纪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当时人口已达5959 万多人之众。中国古代的人口数字极其不可靠，要么低于实际人口以逃避赋税，要么就高于实际人口来吹嘘政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汉朝的人口超过了同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

汉朝并不具备现代政府的各种功能，其统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供养皇亲贵戚及确保朝廷的安全。政府并不关心百姓，除非把他们当作纳税人和民夫时或有例外。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民夫比赋税更为重要。朝廷往往要求每个农民每年抽出1 个月的时间来修建道路和水渠、兴建宫室和皇陵，间或还要服兵役，戍边或守世京师。 农民在完成各项任务后只要安分守己，就可自由地从事农作或自行处理纠纷事宜。这样，政府实为居于半隔绝状态各乡村之上的一个相当小但是高度集权的机构，而朝廷与乡村的中介则是城镇，由地方一长官与当地豪门地主及里长、汽老类打交道以进行统治

统治精英绝非是周时那样的世袭贵族。不用说贵族，连各王国与侯国的宗室都是朝不保夕，因此官僚阶层与上层社会山有才'之卜组成，他们一般家境富裕，知书达礼，足以在朝廷中古据一席之地。不过商人是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的二汉朝和秦朝与大多数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专制国家一样，对商人抱有强烈的偏见，因此，朝廷中人主要都属于地主官僚阶层。

汉代社会除了皇族与少量奴隶之外，主要山两部分人构成：交纳赋税的农民和富有的地主。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纳赋税的特权，大多数官吏即来自这个阶级，并且他们作为地方［的首脑，亦为联结朝廷与乡村的纽带。这也是以后20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这两种阶级的划分不同于印度的种姓，亦非中世纪欧洲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中国，高官厚禄之人也许会沦为奴隶，而平头百姓（像刘邦）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南面为尊。

汉朝国力的极盛时期

汉初60余年政府"休养生息"以巩固政权，在此之后国力大张，就像秦始皇时期和后世某些朝代一样。这一个盛局而产生于汉武帝统治时期，即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 年、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不是英主在位一人专制，便是由上层官员主持政府工作。在前一种情况下，政策能够得到贯彻，但由于皇帝本人是神圣不可批评的，他若犯了错误也无法阻止。汉武帝并不例外，他重新兴建水利工程，将京师直接与黄河连接起来，大大方便了运输粮食的工程，另外他还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待下刻薄寡恩，并且在晚年时还沉溺于神仙方术。

汉武帝在位时的汉帝国版图之大．几与近代中华帝国相仿，他征服了现浙江及福建境内的沿海地区，并将人口迁往内地公元前111年，他吞并了现广东、广西境内的南越，又占领了越南北部的地区。当时在今河内附近设立的治所延续了千年之久：公元前108 年，他灭掉了现北朝鲜境内的肃慎国，在今天平壤这个地方设众了治所，

汉武帝最伟大的业绩是抗击西北边境的匈奴。这也是出于防御的考虑，因为这些来去不定的好战民族时常侵扰中国的北部地区。汉武帝还想控制中国与西亚的商业贸易，在中亚河西走廊地区开创了丝绸之路汉武帝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野心勃勃地频频发动远征。在公元前129 年至公元前119 年的10 年中，他连续派遣大军（有时多达15 万之众）抗击匈奴，捣毁了他们在戈壁以南的巢穴。

汉武帝对匈奴并非一味进攻，同时他也力图找到一些盟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旱在公元前139 年，他就派张骞出使西域与月氏国联系。月氏人可能属于印欧民族，被匈奴赶出了甘肃的老家，在武帝时已迁到今天阿富汗一带，正欲进攻印度，后来便建立了贵霜帝国。张骞一度为匈奴人所俘虏，但他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月氏国。不过后者此时已无兴趣重新卷人中亚的战事。张骞于公元前126 年返回中国，不过公元前1 巧年时他又再度出使西域以联系居于中亚伊犁河谷的少数民族。尽管这次出使仍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这几次出使大大增进了中国人对西域地区的了解与兴趣。

武帝还曾设想从两翼夹攻匈奴。他在今甘肃地区设置了两个都护府，并从内地移民70 万人充实边疆。为保护这些移民，他将长城延伸至玉门一带。这样汉朝的势力就扩展到了以中亚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

绿洲农业地区。这些绿洲是古代东亚、西亚之间通商的重要中转站。汉朝的军队甚至分别于公元前104 年、公元前102 年两次越过广阔的帕米尔地区进入现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境内追击匈奴人。

武帝死后，汉朝继续征伐匈奴，最后在公元前52 年南匈奴的单于不得不向汉朝俯首称臣。公元前42 年汉朝军队再次越过帕米尔，深入前希腊栗特王国，在那里打了胜仗并俘虏回一些罗马士兵。这样汉军深入不毛，将势力扩张到离首都2000多英里之外的地区，而罗马帝国虽然地处海上交通便利的地中海地区，即使在极盛时也未能做到这一步。

三、西汉思想与学术

先秦诸子的思想在西汉时已是万马齐暗，不复当年百家争鸣的盛况了。这足以说明秦汉两代对过去的传统产生了多么大的破坏。不过前代的思想仍有零星流传，如"阴阳"二元论、"五行"思想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天象示警观念，也还都保留了下来。

武帝时创用的年号纪年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天下太平无事，年号就会一直使用下去，如果有什么天灾人祸发生，几个月内就会改元易号。其结果便造成了中国历史纪年的混乱，使中国人更加倾向于以朝代计年。尽管缺点不少，这种制度仍然在东亚得到普遍采用，后来中国在1368 年、日本在1868 年才开始采用年号与年代对应的办法来纪年。

道家思想也保留下来不少，但《 道德经》 与《 庄子》 在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之后面目全非，几乎被各种原始迷信尤其是修炼长生不老的兴趣所掩没了。时人一心修习长生之术、炼制点石成金的仙丹，这无疑是世界上炼金术的最早实践。此外还流行辟谷之术，如通过绝粒、吐纳以求长生不老。各种古代迷信也保留了下来，从中发展出庞杂的神话系统，并很快与道家混作一谈。古代统治阶级的迷信消失了，但对这些迷信的记忆却保存了下来。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经人建议，重新恢复古代的祭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泰山封禅祭天、梁父祭祀后土的活动。

再看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学者们致力于搜寻古代的著作。秦灭之后的哲学、历史著作在公元前191 年又都得到官方的推崇，有些老学者通过记忆日述了一部分经文，有些则来自于墙壁中夹藏的经书。

其结果，往往一种经书，如《尚书》，有古文、今文两种版本同时流传于世。

汉代学者没有多少学术眼光，对古朽一概全盘接受。不过池们试图给古籍分类，如《五经》，同时为之大量作注作疏、西汉学者的注疏开创了后世学术研究的一个摇要领域、第一部有系统的字典《说文解字》也于公元100年问世。该书共收入9000多字，分列为540部。

汉代哲学著作多为集体编著二如《淮南子》一书，由高祖的一个孙子主持编写。其中权合了宇宙论、道家思想和其他古代坤话传说。尽管汉代著作多为学术著作或说教，但同时也发展起一种重要的诗体文类— 赋。赋与屈原的《离骚》风格相近，往往极尽铺陈之能事，亦富意象与夸饰，其描写对象大多为帝都景象或白然风光。

史书

西汉最伟大的文学成就是史书。对于一个格外重视厉史的文明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中国人将文学分为四部，"史"即为其中一大类，其余三项分别是经（包括其注疏）、子（诸子著作）、集（纯文学作品）。

司马迁（卒于公元85年）所著之《史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一大气跃。据说他继承父志，独立完成了这部著作，但这有可能是为修史这一孔子开创之伟大事业所作的一个虔诚托辞。司马迁显然具有态肆不羁的学识与魄力。）公元前99年他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结果触怒汉武帝而系狱受了腐刑。

司马迁不但为后世史书的体例，而且为史书的风格与学术思路创立了典范。他直笔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史记》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代文献中的原文。《史记》成为后世中国史书的典范，西方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达到这个水平。

司马迁试图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史记》一书分130卷，共70余万字。由于文言以简洁见长，所以《史记》的容量差不多是原书的10倍。头12卷为"本纪"，记叙上古至汉武帝历代帝王，接下来是10卷记叙12诸侯、六国及汉代将相名臣的"表"。其次是专论八卷，如《礼书》、《乐书》、《历书》、《天官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再次30卷为周代诸侯世家，最后70卷为人物列传。

后世的许多史家都沿袭了司马迁的体例。班固（公元犯一92 年）与其父妹协力完成的《 汉书》 ，共100 篇，体例稍异，主要因为这是一部断代史，故不设"世家"。另外班固还增加了不少有关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 汉书》 成为后代断代史写作的典范。中国的官修正史卷性浩繁，在中华民国的总统于1924 年接受了《 新元史》 后，共有25 部之多。

儒家思想的胜利

汉武帝几乎和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思想，不过据说在其统治时期他实行了"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不过，尽管汉代的学术风气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学者还是渐渐自动阪依了儒家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文人士大夫哲学的缘故吧。"儒"的意义正是"习文"或"柔顺"。一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同时，这些皈依了儒家的学者却逐渐被吸收进了汉初的法家政权。汉高祖本人不学无术，但他发现"治天下"必须依靠文人，他的继任者甚至还通过考核来遴选合格的知识分子人才为政府服务。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在朝中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促使武帝罢斥法家学者了。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弘（公元前200一121 年）及稍后的董仲舒。两人都以卜兆、解释微言大义的《 春秋》 而有名于世。至于董氏创立的天人感应及俄纬之学，离孔孟之道已经很远了。

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在朝中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 年又指派了50 名官宦子弟向他们求学，从而开创了"太学"。据说到了公元前1 世纪下半叶，在太学学习的人数有3000人之众。到公元1 世纪，每年有100 人通过官方举行的考试后到政府各部门工作。这样，从武帝之时起国家按照儒家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中下级官吏。

儒家的礼仪教条逐渐成为官方的法律，这与原始儒家鼓吹的以礼仪代替法律的初衷颇有不同。儒家思想也渐渐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公元前51 年皇帝亲自主持了几次大型儒家学术讨论。公元79 年又举行了白虎观会议以校定《 五经》 真义。公元175 年政府将钦定的《 五经》 勒石立于都门。在稍早的公元58 年朝廷还规定库序祭祀孔子。

以法家政权而尊崇儒术，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过这却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的皇权能比其他国家维持得更久。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信奉法家的开国之君治国时需要文人来辅佐，与之确认，朝廷也为之建立了集责任与荣誉于一身的职位：.结果，士人成为国家的支柱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科举制度的产生。简言之，当时中国已开始形成一套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近代公务员制度。西方采取这种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但时间却比中国晚了2000年左右。

很幸运，儒家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精神力量。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尤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在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

四、王朝的循环

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必须承认，中国人对王朝循环的看法自然有其道理，这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至少能与不少基本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致契合。西汉与东汉分别都延续了200 年的光景；后世历代在更为先进的历史条件下，亦往往享国300 年左右，而且历代的赋税、行政和军事制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个人因素

中国的历史学家，由于受到儒家以德治人思想的影响，在解释王朝的循环往复时总是强调个人的因素。像汉高祖那样的开国之君，因为是"天命"所归，无不被描述成超凡的神人而非强少、，而失去"天命"的亡国之君，则被认为可怜、黯弱不说，更往往被指为邪恶、淫荡

的莱纷之君。其实，任何朝代的皇族总是毫无例外要逐渐退化的。开国之君必然是雄才大略的强者，而后继者，生长于安乐淫佚、勾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往往会成为屏弱者或低能儿。每一朝代往往会出现至少一位中兴之君（如汉武帝），但总体而言，皇室子孙通常总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在史学家看来，凯觑皇位者倒是往往比皇帝本人还更重要。不过夺权内幕往往更加扑朔迷离。夺嗣争统、种种宫闹阴谋和朋党之争儿乎贯穿了所有王朝的历史。但中国历史上近古几朝的朋党之争有时是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的，大多数的朋党之争都不过是为了争名夺利。在一朝陵替之时，朋党之争和宫廷政变自然比在国力强盛之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外戚是造成朋党的最大隐患。如吕后就几乎篡夺了刘氏天下。卿相巨族亦每每利用当朝的黯弱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最终割据一方成立自己的小朝廷。党争还表现为官员与宦官们的斗争。这在每个朝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宦官在宫内司守卫、管理之职，但往往逐步攫取了兵权等权力。他们出身寒微，但他们却是惟一能与外戚势力相抗衡的人，因此皇帝往往倚重他们来钳制外戚的势力。权监大阉一般没有文化，他们与士大夫的出身不同，但在朝中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很受百官的忌恨。秦朝相国李斯即于公元前208 年命丧宦者赵高之手，公元前47 年又有一名权监除掉了与他作对的大臣。由于撰写史书的权力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中，所以我们发现史书中的太监无一不被描绘成胡作非为、结党弄权的小人。

经济与政治的因素

尽管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人格，但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日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饿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骡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洒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交纳钱粮的人

数则越来越少、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 年内就会遇到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日日益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灾、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政府无力救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主要朝代中均不难发现这种螺旋式下降趋势：这在西汉一朝尤其明显。汉武帝在位时兴修水利、穷兵默武，使汉朝国力达到最高点，但同时也引发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新增的大批政府开支哑需新的收入，而终武帝一朝，为寻求收支平衡的努力就一直未曾停止过。

汉武帝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措施是恢复国家专卖制度。将几项高利润的商品的生产、销售控制在朝廷手中、他恢复了国家对铸钱的垄断，在公元前119 年更恢复了秦时的盐铁专卖制度，稍后又增加了酒类专卖一项。这此专卖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虽非鲜见，人们对此却始终有很大的争论。在公元前81 年汉武帝就曾举行朝议讨沦专卖制度是否以可行，结果人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盐铁论》 一书即载人此事。

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开始推行所谓的"均平制", 即实行政府丰年买进、荒年卖出的政策。这有助于稳定物价，但其动机却是为了充实国库：武帝还对某些商品加征进口税，但其余诸项措施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他准许犯人纳币赎罪，公然卖官卖爵，并且，降低铸钱的成色，或以小钱抵大钱流通，甚至一度还曾以鹿皮代替货币使用。

王莽篡位

武帝的财政改革总体上还是成功的，这使得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大致还能保持收支平衡。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

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 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在此时，王莽作为当朝皇后的侄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通过剧烈的改革，用尽一切办法来稳定局势。最后于公元8 年他篡汉自立，公元9 年1 月10日，改国号为"新"。王莽似乎是一个认真的儒家信徒，认为自己的新政是恢复了周公的古制。在儒家学者的协助下，他集中精力研究鲜为人知的古籍，这大大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最终胜利，不过他的新政主要还是沿袭了前朝的法家传统，大部分是对武帝时期政策的恢复与发展，如他推行专卖制度，重新启用"均平制"，并且降低了铸币的成色，另外同样施行了由国家向农民进行贷助的政策。

王莽新政中最为大胆的一着是对当时主要经济问题的正面出击。由于当时托籍的农民过多，朝廷的收入受到影响，于是王莽在公元9 年下令废止土地私有制，私人土地一律转为"国有"并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还废除了奴脾制度。如此极端的措施即使在武帝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100 年后再来推行就完全超出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尽管王莽因其篡位一向受到正统史家的指责，但其土地收归"国有"、释放奴婢的做法，却为他赢得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推崇。

王莽为力挽朝代循环的狂澜、恢复开国之初的局面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可能反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新朝本来就苦于经济、政治的衰退，如今王莽的"国有政策"又使他失去了豪门贵族的支持。连年歉收再加上水利工程也出现了问题，最终酿成了连年的饥荒。公元18 年在山东爆发了赤眉军起义并且很快席卷了全国、赤们军染红眉毛以便在作战时分清敌我，其前身为秘密社会中的某种迷信组织。正如近古以来各朝末叶爆发的全国性起义一样，经济因素是催化剂，但将起义者凝聚在一起的却是民间宗教信仰。同时，新朝的边防亦告崩馈，四境邻国重新宣告独立。北为一游牧部落也纷纷入侵边疆地区，国都遭到洗劫，在公元23 年王莽本人最终也为起义者所杀：高祖缔造的大一统国家最终土崩瓦解了。

五、东汉

帝国的重建

尽管赤眉军已攻占了大部分地区，但他们和其他农民起义者一样，缺少统治经验，也不懂得推翻旧政权后应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许多汉室后裔（也是豪强地主）亦加人了起义，其中刘秀在这场混战中取得了胜利，于公元25 年继位，称光武帝，重新建立了汉朝。不过由于他建都在长安以东的洛阳，所以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

刘秀于公元37 年统一全国后效仿西汉建众起大一统的政府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毋须对付王莽新朝时期所肉临的经济困境。战争已经消灭了西汉的贵族和一部分豪强地主。而新的政权还没有产生太多的皇亲国戚这些寄生虫、

光武帝再次征服了华南和越北地区，其后继者明帝（公元58 一75 年）亦坚定不移地重新控制了中亚和北方的胡人、公元73 年班超（《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奉命出使中亚诸国，最终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自公元91 年起一直担任"西域都护"的职务直到公元102 年病逝；在此期间，他曾率领军队穿越帕米尔山区，井派了一名副使经安息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这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业已归顺了东汉。公元89 年，汉朝军队越过蒙古的戈壁滩击溃北匈奴，这可能促使后者于4 世纪晚期西迁至俄罗斯南部，半个世纪后又迁到了中欧地区。

文化的发展

两汉对中亚的控制使得中原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大大发展起来。其间海上交通和与印度、罗马的海上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公元120 年汉朝宫廷中出现了据说是来自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公元166 年还来了一批冒充罗马皇帝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使节的商人。通过与西域的通商，中国人获得了良马，各种奇珍异玩也从南亚、西亚流入中国，其中地中海地区所生产的玻璃制品格外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同时，中国的丝绸更受罗马帝国的欢迎，甚至还导致了罗马帝国的金银外流。所以，中亚的这条商道亦被称为"丝绸之路"。直至19 世纪，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供大于求，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大多时候中国的技术较为领先，因而不需要外来的"洋货"。

与西域通商对中国的音乐、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产品。汉代的天文、数学均有很高的水平，可能也有受到印度、西亚影响的因素在内。但汉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国文化的

输出。汉代的纺织技术在几个世纪内一直领先于西亚与欧洲；东汉时发明了水磨；马辘亦于此时出现，这大大提高了马的劳动效率；几乎就在同时，铸铁技术也开始从中国传到了西域。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和烧瓷技术也是在汉时发展起来的。在中亚地区的汉代卫所遗址中已发现了公元100 年左右纯粹由布头制成的纸。自然，纸很快就代替了竹木简和昂贵的丝帛。不过造纸技术直到1000年后才传入欧洲。上釉陶器在汉时已很常见，在汉末则产生了一种原始的瓷器，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不断发展，乃至成为近代世界各国大量进口并纷纷效仿的精美瓷器。当时的长安和洛阳无疑是与罗马比肩的大都市，但今天已无从查考它们当年的风貌了。木结构建筑易于损坏，过多的居住人口也不利于古迹的保存。不过我们在汉墓中仍可见到丰富的汉代遗物。如在朝鲜境内曾为汉代治所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产于四川的精美漆器。

王朝的衰败

尽管东汉时期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国力财力却不逮西汉。公元前1 世纪的大量私有财产在东汉建立时都保存了下来，从而使这个新政权像高祖及其继任者当年一样，在政治、经济丘都焕发着万象更新的气象。豪强地主的地位非常巩固。汉时土地税往往是收成的上/ 30 ，但地租却高达50 ％左右。因此这些豪强地主只需交纳微不足道的土地税，并能通过在朝中任职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尽管政府一再努力通过政绩评估以确保官僚机构的效率，大多数官员还是通过门第出身、世袭甚至公开行贿考官来谋求官职。

东汉财政和统治的衰弱表现在政府登录的纳税人口上。在全盛时期的公元105 年，东汉的在籍人日亦未达到西汉时的水平，而纳税、服谣役的农民在最需人力的华北及北部边境地区却流失得最为严重。朝廷为了维持自身运转不得不向华北日益减少的农业纳税人口征收越来越多的赋税。农民最终不堪重负，不少人逃到税收较轻的南方，或托籍豪门大族，以这种方法来少交一些赋税。其结果是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之被迫落草为寇或揭竿而起，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东汉财政状况的恶化。这一螺旋式下降过程，一经重新启动，就很难再停止下来了。

东汉一如西汉，最大的隐患来自外戚，但皇帝倚仗宦官遏制了前者的势力。公元89 年外戚窦氏被斥，100年外戚梁氏被满门抄斩。当时受到3 万太学生拥戴的朝中大臣试图阻止得势的宦官们专权，但他们遭到后者的报复，166 年时数百官员与太学生被收系下狱，在169 年又有数千人遭到杀害和逮捕。

宦官们的清洗活动表明，当时的政权已病入膏肓，离最终崩溃的日子不远了。184 年在华东和四川分别爆发了太平道（即黄巾军）起义和五斗米教起义。这两处带有道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持续了30 年之久，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动荡。

六、中国第一帝国的灭亡

三国鼎立

一如后世，汉朝朝中的将军们发动了政变。赋税制度的崩溃引发了徭役制度的崩溃，也破坏了与之相关的军役制度。代之而起的职业军队日益成为各镇将军的私家队伍。全国性的起义爆发后，这些将军实际上成为独立的军阀，很快就完全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各方势力在混战过程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北方控制在曹操（其父为太监养子）手中，刘备占领了四川，孙权则盘踞在长江下游和华南一带。〕这种政治分立恰与地理吻合，该格局在后世也一再频繁出现。

曹操于220 年死后，其子篡汉称帝，国号为"魏"、，在此之前的30 年中，东汉已是名存实亡，此时终于寿终正寝了。次年刘备亦在四川称帝，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因为刘备乃是汉室的后裔。222 年孙权依样画葫芦，建立了吴国。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史称"三国"。

三国的结束

按照朝代循环的理论，三国中应该有一国或有其他势力兴起并很快重新统一全国，从而又出现持续200 年左右的大一统政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此时正经历着一场远比政治崩溃更为深刻的危机。汉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差不多与罗马帝国同时，其方式也几乎是如出一辙。两国都处于相类似的技术发展水平，都未能协调好人口、财富和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导致了最终的覆灭。

中国第一帝国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财政问题。到了公元前1 世纪，由于豪门巨族牢牢控制了大量的

财产，这一隐患变得非常突出。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后，不得不向他们做出更大的让步。从那时起，帝国的衰退过程便加快了，而东汉政府也始终未曾拿出有效的措施来阻止这一颓势。事实上，专制统治正是它本身最大的敌人。皇帝把大量的田地及农民永久性地赐给皇亲国戚、宠臣奸按和将相高官，而后者往往贪得无厌，又进一步导致了统治的恶化。

到了公元2 世纪晚期，豪门巨族势力之大，连朝廷都奈何他们不得了；事实上，倒是朝廷操纵在他们手中。220 年后形成的二国分立局面，不过是将这种情形公开化罢了。魏蜀吴三国也非统一稳定的帝国，国家政权亦或多或少地掌握在各国巨族与诸将的手中。三国及后继的各个朝代均欲重振汉朝当年的制度，但至多不过是某种不到家的摹仿罢了。这些国家大都只传了一世，某一军事强人建立了政权，但传到下一代或第三代时就灭亡了。

三国时战事连绵不断，在后人看来，这倒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263 年，魏吞并了蜀汉，但两年后，司马炎篡夺了曹家天下，建立了晋朝。晋武帝于277 年灭掉吴国后，暂时统一了全国，并努力恢复汉朝的制度。但历史的潮流无人能够抗拒。当时登记的人口只有1616 万多人，这显然表明当时有大量人口不归政府控制或不交纳赋税。晋武帝并未真正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晋朝也是一世而亡，晋武帝死后不久的290 年，国家便又立刻陷人了内战之中。

异族的入侵

导致帝国体制分崩离析的一个新的因素此时得到了凸显。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从未放松过戒备。不过如今形势逆转，儿百年来的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这种180 度的角色转换可以从对立统一的"阴阳"二元论中找到部分答案。汉时对胡人的征服其实已埋下了此时胡人征服中原的种子。归降汉朝的匈奴部落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半农业社会。胡人以其娴熟的弓马作战技术，亦成为中原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中国边疆及防御体系沿线就聚集了大量半汉化的胡人。这与晚期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因为后者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和防御部队这时也同样落到了日耳曼"蛮夷"的手中。

中国第一帝国解体之后，准农业区的胡人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费吹灰之力就突人了中原，他们在此寻找更好的牧场或抢劫杀掠。3 以

年，匈奴中的一族宣布独立，306 年又洗劫了当时的国都洛阳，屠杀一了当地的30 万名居民。在此之后的100 多年中，中国北方连续被不同的胡族所争夺和占领。只有四川凭其蜀道天险、长江流域和华南有江河天堑得以躲过异族的蹂箱二大批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逃往蜀中或江南。结果，中国南方的人口比3 至5 世纪时陡然增长了好几倍，同时该地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也随之加快了步伐口

南朝诸国

洛阳失陷的次年（317 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南京）称帝，史称东晋。建康很快变成与洛阳相坍的大都市，汉朝的豪华生活方式在那里又得到了继承。不过东晋政权仍然很虚弱，一直受制于朝中的大将军，而后者亦每打算篡位自立。东晋一心想收复北地，但每次北伐均未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成果，而且在本国国内还时时面临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威胁。

最后，东晋大将刘裕于420年篡位称帝，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以区别后世的赵宋。接下来的150 年间，这种篡位的活剧又一再搬演：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失败，一次又一次大将军从幼主那里夺来皇位… … 齐于479 年灭宋，梁于502 年灭齐，而陈于557 年灭梁，其速度之快，令后人叹为观止。

300 多年来，各朝的开国之君均想重建汉时的大一统政权，但他们都遭到了失败。每一朝代都是前一帝国的翻版，无一例外都是朝廷黯弱而完全受制于门阀士族，一如两汉当年。汉朝的遗绪也许能苟延一时（正如在拜古廷衰微的东罗马比西罗马多延续了不少时光）, 但汉朝本身却一去不复返了— 至少汉人只凭一己之力是无法重振这一帝国了。正如拉丁人与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欧洲后世的历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是由"蛮夷"与中原汉族共同谱写的。

第05章 帝国的再生

一、中原文明所面临的挑战

六朝时期

东汉覆灭后为六朝时期，因为自222 年至589 年先后有六个王朝建都在南京。这360 余年通常被视作反朝代循环而动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这是一个由治（统一）到乱，又从乱到治的一个过程。其间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其激烈程度也许只有19 世纪时期的中西文化碰撞方能与之比拟。最终中国通过将挑战者融入本土文明而克服了这一危机，并且，在这种融合中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丰富的新型中国文化和傲视两汉的强盛帝国。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诸胡和西域地区。胡人纵横华北，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造成了威胁。不过挑战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当时之所以产生五胡乱华的局面，正是因为汉朝的政治制度因其内部矛盾不可调和而导致崩溃之故。正是因为汉时杂蹂儒佛家思想、谶纬之学及法家的做法，无法满足人们精神__上的需要，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因此便转向了佛学。实际上，当时有头脑的人在转向佛学之前，已经屏弃儒家思想而转向了道家思想。

东汉末年和汉魏六朝时期整个社会秩序都崩溃了，其情形与稍后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之处，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封建社会。其时王纲毁弃，大部分土地和农民流人大地主的手中，也有不少人托籍豪门大族门下以寻求保护。而后者也随之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于是佃农地位不断下降而沦为事实上的农奴。赤贫的农民为躲避朝廷的赋税和异族的统治，纷纷托籍豪门巨族以换取经济安全和保护，但同时成为后者的家奴或客民，其中有的人甚至成为豪族的家丁（私人武装）。这样，家丁便代替了农村征兵的制度。各豪门巨族都有自己武装的庄园和角楼。异族的入侵、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篡位禅代，举族南迁并成为有组织的军事或经济集团，这些因素都促进厂社会军事化的进程。

自给自足的大型庄园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单位，而商品贸易却因此而逐渐萎缩了。朝廷控制的辖地越来越少，商业城市也一蹶不振。某些地区实际上已停止使用铜钱，一度限于农业地区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则在全国普遍得到采用。

道家思想的流行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儒家士大夫的地位不断下降，其复古的热情和繁琐的礼仪讲究，面对当时的各种问题也常常是一筹莫展。东汉时儒学的地位一度空前高涨，但王纲解纽之后，有思想的人纷纷抛弃了儒家的道德说教而转向了自我。由于社会与政权已然腐败得无以复加，人们对道家鼓吹的天人关系和自我完善或日超脱重新发生了兴趣。无疑，长久以来社会上（尤其在下层社会中）就存在着这一道家思潮，但此时它开始公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王充（卒于公元100年）可能是东汉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在其充满反对权威和怀疑精神的《论衡》一书中，他曾预言士大夫将厌弃孔学。早慧的王弼（226 一249 年）是当时最有天才的人，他在评注《老子》和《周易》时对道家思想也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研究兴趣。

公元3 世纪时的这种道家思潮有一突出特点，即崇尚"清谈"。清谈家们远离政事俗务，面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种种幻灭，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发掘自身的美感，对每一生命冲动均做出充满个性的表达。"竹林七贤"即为其中翘楚，他们出身士族，性情乖僻，隐居在山阳一带，倾心于清谈、作诗、弹琴、欣赏大自然并且纵酒无度。另外还有更为放纵不羁的所谓"八达"。他们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尽管他们中也许正有社会所需要的领袖人才，因而最终也促进了社会的总崩溃。道家思潮的另一体现是时人对炼丹长生之术的兴趣不断高涨。讲述神仙丹药的《抱朴子》即成书于4 世纪前期。为求长生，不少人大吃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这也许促成了中国人来者不拒的胃口和他们丰富多彩的烹调艺术。另外，通过发现许多养身的药品，医学知识（甚至在更广的意义上，原始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后世中国哲人之所以厌恶科学实验，原因之一就是它往往引起诸如"方士"、"炼丹"等等不妙的联想。另一种广泛流行的道家长生术讲求人体内部的卫生，即通过戒酒、断荤、辟谷、吐纳，以清洁上中下三丹田，营卫体内的神，杀死造成老、病、死的"三尸虫"。这种迷信在3

至6 世纪时风行一时，最后演化为吐纳之术和一般性的保健措施，直至今天在中国仍很流行。

民间道教

此时道家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民间道教的发展。道教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了此时东传的佛教中集体礼拜和寺院僧团组织的影响。后来卷性繁浩的道藏究其初也不过是对佛经的摹仿罢了。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首次向世人表明，道家思想中已然孕育出有组织的民间宗教。信仰疗法是上述宗教运动的核心。随着时间发展，民间道教炮制出一套庞杂的神系，其首为三清，以下为各路神灵和古人。它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遭到朝廷的镇压后，道教从此不再具有统一的组织，不过各地的"教区"仍然保留了下来，而道家思潮就在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风行一时。各地道长靠做法事或教徒的捐献（如五斗米教）来维持生活。道观无疑也是对佛寺的效仿，但道教通常可以结婚，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往往低得可怜。道教也有不少宗派，这显然同样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果。

历史上多次有人想统一道教，但收效甚微。北魏的鲜卑族皇帝经人劝说，于444年宣布道教为国教，后世各代统治者亦不乏仿效者。1019年，自称是张陵（五斗米教创始人）后代的道教太一教派掌门被封为"天师"，以江西龙虎山为其封所。13 世纪晚期，张氏家族被封为道教领袖，14 世纪又得到授权管理全国的道士。这一所谓"天师"的头衔及其某些特权一直持续到1927年

二、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

道家思想在王纲瓦解时期重新崛起是很好理解的，但随后佛教在中国风行于世却令人感到惊讶了。这种源于印度的宗教与中国人所最尊奉的理念简直是格格不入，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甚至比19 世纪的西风东渐还要猛烈。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吸收。佛教是东亚和南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但它在印度

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却鲜明地体现了这两大民族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差异而不是相同之处。

佛教之所以在印度产生有其特殊的背景，对此中国古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而生命通过"业"（原指行为，后指因果）而生生不息，并由于各种因果而充满了生、老、病、死等痛苦，而这正是世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和世上有各种不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印度佛教徒与中国儒家不同，他们对矫除世弊、改善社会秩序没有兴趣，而是致力于逃避痛苦的生命"轮回"。

佛陀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即为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出生于今尼泊尔的南部地区，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 年左右。释迦看到人世充满了痛苦，于是出家修道，但他通过苦修一无所得，终于有一天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找到厂放纵与苦修之间"中庸之道"，于是他立地成佛并开始向世人们传道。

佛教的要义为四圣谛，即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的原因）、火谛（苦的消灭）和道谛（灭苦的方法）为了灭苦就要行八正道（即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苦行的生活方式。苦行的最终目的是涅磐，这并不是指得到善果，或按照西方人的说法，灵魂得到拯救，而是指消除欲念，超越因果轮回后所达到的境界。尽管这个词按字面解释为"空"或是"灭"，但实际上意义不止于此，更确切地讲，是指像一滴水珠融入大海那样圆满具足和永恒的境界。

佛教很旱就发展出了僧伽组织，其口传经文约在公员前上世纪左右以两种印欧语言记录成文，其中巴利文佛经保存在锡兰，以梵文写成则主要通过汉译和藏译佛经保存下来。佛经一般分为经、律、论三藏（Tripitaka ），卷帙繁浩。以汉泽三藏为例，全部加起来有1600 多部，共计5000多卷。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是一种普世宗教，信佛的人在佛法上一律平等。正如地中海地区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佛教也传播得很广。印度旅行者和商人通过海路将佛教带到了东南亚和华南地区。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次大陆的西北地区时，佛教也随之传入了希腊诸邦。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干达拉（Candhara ）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当时大月

氏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迎王（约公元100 年前后在位）也大力弘扬佛教，在中亚广泛传播佛教教义，像华北的佛教就是从这里经西域传入的。佛教的第三次传入，是几百年后从西藏向北传入蒙古地区，这已是揉合了大量印度教教义的佛教末流，并且很快又吸收了西藏神魔崇拜中的一些成分。由之产生的喇嘛教和神权社会与原始的佛教教义已经很少有相似之处了。但即便是原始佛教也很早就分裂为大乘与小乘两种教派。小乘佛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教义，现流传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译者注）、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而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则属于大乘佛教。

大乘之"大"在于它的兼容并蓄。由于它区分了"真谛"（绝对真理）与"世俗谛"（相对真理），因而能涵括各种适用于不同程度之信仰者的"中道实相"。后来从大乘佛教中又衍生出大量玄学思辨体系和庞杂的神系。与原始的无神论佛教不同，大乘佛教鼓吹万劫万世中有恒河沙数的佛，而且还创造出"菩萨"的概念，据说后者宁可暂不成佛以便解救沉沦的世人。

因为菩萨以解救众生为己任，所以大乘佛教教义的重心从"自度"转向了"度他"。虔诚的信奉是最重要的。一部广为流传的大乘佛经《妙法莲华经》预言说将来众生（佛教认为人和动物都是众生）都会得到超度。自然，菩萨也成了大乘佛教中受人欢迎的神祇。如阿弥陀佛，本来只是一名菩萨，后来却成了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救世主。再如观音菩萨，原系男性，后逐渐转变为女神，以大慈大悲而著称于世。这样，大乘佛教便提供了各种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神抵以满足世人的需要。

涅磐的意义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至少对一般的大乘佛教徒而言，其意义特指人在死后超生到极乐世界。佛教对这种极乐世界的描述可谓详尽之至，而对阴司地狱的渲染更是绘声绘色。菩萨普度众生的理想导致了大乘佛教对"善果"即行善以求好报的强调。这样，佛教就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它避世静修的本义。"善果"的观念使社会工作变得很重要；世人通过信仰便可以得到超度，这样僧院制度、禁欲和苦行便成为可有可无之事了。

佛教传入中国

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但早期大乘佛教能容忍其他信仰的态度及兼容的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比原始教义更加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佛教甫入中国时曾被视作道教的流亚，对"胡化"的华北和萎靡的江南均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对于迷信者而言，它是一种有灵验的新法术，对于士大夫来说，它又是新观念的催化剂。总之，佛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普世信仰，而佛教教义所蕴含的则是另一大文明的精华：印度的玄学与原始科学、高雅的文学、优美的宗教艺术、充满美感的仪式、对乱世充满吸引力的宁静的寺院生活，在人们无路可走时给予的解脱承诺… …

据史书记载，佛教东传是公元64 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结果。这个故事颇有神示天启的味道，不过当时楚王已经在宫中供养了一批和尚，而到了公元2 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现越南北部地区。在中国各地的信徒们很快建起了佛塔（supa ）。这些塔吸收了中国建筑的特色，逐渐演化为今天东亚十分常见的木头或砖石结构建筑。

起初可能是那些西域商人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但不久西域僧人也纷纷来华传教，如安息王安世高就曾于2 世纪末在洛阳传教并翻译了一些佛经。另一位大翻译家即是大家所熟悉的鸠摩罗什，他原籍印度，出生于中亚（今新疆库车）, 382 年被前秦符坚用武力请回中国后，主持了一项巨大的佛经翻译工程。他译的98 卷经书中，至少还有52 卷流传至今。

渐渐地中国佛教徒成了传教的主力。在3 至9 世纪之间去印度取经的僧人中，有名可查的就有二百来位（其中还有九名朝鲜人）。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留学"活动。如法显和尚于399 年取道中亚到印度取经，414 年泛海返国。由于印度人对历史缺乏兴趣，他们的纪年极为混乱不清，所以法显等人的游记对于确定印度和中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当属玄奘法师，他于629 年至645 年之间取道中亚赴印度取经，他撰写的《 大唐西域记》 是求法游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还有一位义净法师，他曾于671 年至695 年之间途经南亚到印度取经，他编著的《 佛国记》 收录了50 多种求法僧人所写的游记。

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不同，佛经在中国首先受到了上层人士的欢迎，其后才传播到了下层民众当中。起初佛教在胡人政权地区传播较

快，大约是因为这些异族统治者对这种外来宗教不存偏见之故吧。鲜卑族的北魏(386一534 年）皇帝虔心向佛，当时开凿的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保留下具有早期东传佛教风格的精美佛像。不过到了6 世纪，佛教不仅在北方盛行，在南方也大大流行开来。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容忍儒道二氏，认为道教这种信仰虽然落后，也自有其道理；而儒学则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学说，与其基本教义并不冲突。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一直致力于整合"三教"或使之并行不悖、各行其事。不过，这时佛教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时许多士大夫和艺术天才都倾力于译经、讲法和兴建装修寺庙。

从4 世纪到9 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和东亚的佛教化时期。在此期间，佛教传遍了除去西伯利亚和西亚之外的整个亚洲大陆，使该地区获得某种空前绝后的文化凝聚力。印度本土的佛教早在6世纪就开始衰落，到了15世纪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中亚地区的佛教也因9 世纪伊斯兰民族的入侵而消灭，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与东亚的大乘佛教开始分裂，而此时汉传佛教也开始严重地衰败下去。

三、"胡人"重建帝国

强大的帝国传统

观察4 世纪的世界历史，人们也许会认为罗马帝国国柞正长，而中华帝国则已然日暮途穷矣。中国北部的中原地区己经完全被胡人占领，南朝诸国显然无力统一全国，而此时全国又受到一种外来宗教的侵袭，并且这种宗教所鼓吹的禁欲思想、出世主义还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及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

不过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而罗马帝国却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入侵中原的胡人希望能代替汉人统治他们已经征服了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并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终于达到了目标，在5 吐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一汉帝国，并最终在7 世纪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大唐帝国。这与罗马帝国渐渐消亡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成为亚欧两大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

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撅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古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

古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承"天命"的中闰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拉丁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 "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混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必决、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

五胡十六国

中国人传统上把4 世纪的异族入侵者称为"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5 个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早在281 年就侵入了中原，氐族亦于296 年发难造反，至于异族的大举入侵则发生在304 年匈奴人造反之后。

从304年到309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国"时期。匈奴人于316 年攻陷洛阳后建立了赵国，亦称"前赵"，以区别于"赵"将石勒于329 年所建立的"后赵"。石勒试图建立一种更为严格的部落统治，因而对待汉人十分残暴，于是国人最终在349 年发动起义诛杀了石勒的继任者。

同时，一名汉族将军在甘肃建立了前凉，鲜卑族在今北京地区建立了前燕，而氐族首领符坚则于370 年在旧都长安建立了前秦。前秦于370 年灭掉前燕之后暂时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

384 年一位氐族大将在长安发动政变灭掉了前秦，建立了后秦，紧接着鲜卑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后燕，在山西建立了西燕，而氐族人则在甘肃建立了后凉，在西部边疆建立了西秦。这几个王朝大都是昙花一现，后来继起的6 个"王朝"也是如此。

北魏

最后，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并统一了华北地区。拓跋氏在匈奴南下时迁到了山西北部，于386 年建立了魏国（北魏），并打败北方草原上新崛起的几个游牧民族。公元439 年，北魏在灭掉了其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统一了北方地区。

北魏占领了人烟稠密的华北平原农业区后，这个胡人政权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曾经统一华北的前秦一样，北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半汉化的国家，而现在文化同化的进程更是加快了步伐。农田并没有分给拓跋氏贵族，而是按照汉人政权的传统方式分配给了农民。至于拓跋氏贵族自己则等于降到了一介武夫的地位。5 世纪晚期，民族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北魏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推行汉化政策。从493 年到494 年，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山西大同迁到了曾为东汉和西晋首都的洛阳，与此同时他还规定汉语为惟一的宫方语言，命令拓跋氏贵族采用汉人的服装、风俗、姓名并鼓励他们与当地汉人通婚。

这种全盘汉化的政策在524 年终于引发了一部分氐族军队的造反。从此北魏政权逐渐为国中几大家族所把持。从534 年到535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皇帝只不过是手下权臣的傀儡罢了。后来这些权臣干脆篡位自立，分别于550 年和557 年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北周建都长安，以渭河流域为根据地，于557 年灭掉北齐后乃成为北方第一号军事强国。

四、隋唐

大一统隋帝国的建立

581 年，有鲜卑族血统的北周大将杨坚篡位建立了隋朝。这时，少数民族已基本溶入华北地区，所谓"华夷之辨"不过是理论上的区别罢了。这位混血儿将军在589 年灭掉陈国后又一次统一了全国，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隋与800 年前的秦朝很是相似。开国之君重新统一了全国，但传到继任者手中时又失去了江山。隋朝皇帝和秦始皇、秦二世一样野心勃勃和急功近利，这就超过了归顺不久之臣民的承受力和忠诚度。隋场帝（604—618 年在位）即是如此。不过，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室，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此时，胜利的指针再次指向了中原。胡人政权好比"阴"，为中国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建功立业的热情，而这最终又导致了"阳"— 中原大帝国的重新崛起。中国重新控制了越南北部地区，并发动了对南越

和台湾的远征。在北方，突厥（即后世之土耳其）推翻了氐族首领的统治后，于581 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归顺了中国，而隋朝在609年更又征服了藏北的吐谷浑。

不过，隋炀帝一再发动征伐并大耗民力修建运河、长城和宫室使自己失去了民心。612 年场帝东征高句丽失败后，朝廷的声誉大受打击，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炀帝被迫草草收兵结束了他的东征。615年炀帝大败于以前一直归顺的东突厥，这时帝国开始四分五裂。炀帝匆匆逃往江南后，于618 年为手下的臣子所弑，隋朝乃告灭亡。

唐：世界性的大帝国

在隋亡以后的群雄逐鹿中，李世民成为最后的赢家。他身上具有晋北胡人的血统，极具雄才大略。他于617 年攻陷长安，次年建立了唐朝，立其父李渊为皇帝。李世民除掉他的兄弟后，李渊退位，他登基称制一直到649 年去世。李世民的庙号为唐太宗，他在位的23 年（626—649 年）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期。唐和汉朝一样，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的黄金时代。

630 年唐太宗征服了东突厥，之后又在639 一—640 年、647 —648年发动一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从西突厥手中夺回了塔里木盆地。在这场战役中他得到了回鹘部落的帮助，后者亦从此脱离了西突厥帝国，成为唐朝的忠实盟友和它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军事支柱。渐渐地，帕米尔以西奥克苏（Oxus ）流域诸国也纷纷归顺了唐朝。657 年，西突厥帝国终于土崩瓦解，在唐朝的压力下，突厥各部被迫南迁印度或西迁西亚及欧洲等地区。西藏吐蕃各部于607 年统一后也归顺了唐朝，唐朝在西藏派驻使节，唐朝的军队中专门有吐蕃人的队伍。后唐军深入今印度北部地区，平定了那里的叛乱，还在648年把一名印度的邦主俘回了长安。这是近代以前中印两国惟一的一次交锋，这说明两大民族间的地理障碍是多么不利于两者的交往。唐太宗曾两征高句丽，都遭到了失败，但他的继任者唐高宗（649—683 年在位）在朝鲜东南部新罗国的帮助下击溃了高句丽以及百济和日本的联军。于是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全部朝鲜半岛。

唐朝的势力范围，北起南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西达西藏、中亚及里海一带，在本土之外还设置了6 大都护府控制着周围的附庸国，如塔里木盆地的安西、朝鲜半岛的安东、安南（即越南的中文名

称"Annam "一词的来源）等地均设置了都护府。此外尚有日本、南亚、东南亚乃至西亚的一些国家，亦遣使进贡。这样，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唐朝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唐朝和汉朝一样也几乎断送在女主之手。武则天在高宗在位晚期控制了朝政，高宗死后她通过傀儡皇帝又统治了一个时期，最终于690 年自称皇帝（她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易国号为周。由于她是一名篡位者，而且又是一个女人，因此一直受到后世历史学家的抨击，但实际上她是一名强有力的统治者，并且大大完善了科举制度。武则天80 岁时，臣下于705 年发动宫廷政变恢复了唐朝。几年后唐玄宗（又称唐明皇，712 一756 年在位）登基执政，从而开创了唐朝的第二个高峰期。

这时唐朝的人口、国力已超过贞观时期，但同时也出现了若干衰退的迹象。财政问题缠夹不清，异族入侵又占了上风。747 年，高丽人高仙芝率部越过帕米尔和印度库什地区，试图打通西藏与阿拉伯地区，但于751 年在费尔于纳（Ferghana ）以北的塔拉斯（Talas ）地区被阿拉伯人击溃，其后没有几年玄宗的统治就在安史之乱中结束了。唐军在胡兵的帮助下平定了这场叛乱，此后唐朝又维持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光景，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与锐气了。

五、中央集权的复兴

土地兼并与藩镇割据

中国在6 世纪通过武力得到统一，又在7 世纪时征服了一个遥远的帝国，这些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究其实则是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重建。几百年来的南北朝对峙和五胡16 国的混战，已使集权统治变得似乎遥不可及。况且，佛教东传又给经济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僧人们往往拥有大量田产，与豪门士族一道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从而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北魏、隋、唐最大的成就便是摸索出一套经济制度从而克服了以上弊端。

北魏在5 世纪时开始尝试解决导致汉朝覆火的一些根本症结。在某种程度上北魏采用了王莽的土地国有政策。由于土地税较轻而个人担负的徭役过重，因此政府为求发展，就必须控制尽可能多的纳税农民并尽量减少豪门巨族所控制的服役人数485 年北魏实行了一种"均田"制度，规定每个成年劳动力都可分到一定面积的土地，其中只有少量桑田可以永久保留，其余土地在农民超过年龄期限或者死后要交还

国家。尽管均田制并非针对豪门挂族，但它确实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劳动力流向私人，同时也稳定了朝廷的财政基础。

另外北魏还实施了一种户口制度，他们将百姓编组，同组人相互负责彼此的行为与赋税。这种联保制度自古有之，并且一直保留到近代（即维持地方和平的"保甲制"），这项制度使人们习惯于在邻里之间互相进行监视，因为他们必须彼此为对方的行为负责。另外北魏还在北部边境实行了军事屯田制度。汉朝时也曾建立屯田，自六朝以后这已成为各个朝代经常采用的一种边防措施。西魏（535 一556 年）和北周(557 一581 年）还相继采取了民兵制度，即政府训练壮年农民并以宗族为单位把他们编为常规部队。到了唐朝时这又进一步发展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男丁在交纳赋税的同时还必须服兵役。

均田制度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隋曾在全国推行这一制度，勒令权贵富户必须按品级占有田产，一般最多也不超过1370 英亩。唐朝袭用了这种做法，此外还按官位品级的大小将面积不等的"职份田"分给官员及豪门望族。地方政府则以"公解田"为其经济来源。不过大部分土地都平均分给了农民。每个18 到59 岁之间的壮年男子按照法令都可分到80 亩的土地，其中只有1 / 5 是可以永久占有的"永业田"， 而反过来他亦必须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丝或麻（后者视该地条件而定）；待年需抽出20 天为朝廷服徭役及为地方政府服天数不等的劳役：本人若不想服役，也可以用桑麻或钱来代替，此外，一些免去其他税、役的壮丁还必须定期服兵役，这通常没有报酬，反而还得自己掏钱。

为实行这套复杂的土地制度，政府必须仔细清点全国的人口和土地：现存的当年统计簿册表明，每块土地确实都按照不同的等级分给了个人这大约是19 世纪之前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土地制度了，不过在唐开国后的100 年间，这种制度确实很见成效，有力促进了唐朝的盛世局面。

唐朝的繁荣

初唐时朝廷收入之丰，只有后来承平已久的皇室和政府机构的奢靡花销可以与之比拟。这时中国人凭其特有的管理才能，发展出一套计算各大经济产品的度量单位，如一"贯"铜钱、一"两"纹银、一"石"谷

子、一"匹"绢等等，彼此大抵等值。以此推算，当时朝廷的岁收入约为5200万个单位，另外朝廷还享有免费的劳役和军役服务。

这时的政府自然远比汉朝时更为富庶了。技术和管理的进步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汉唐之间的数百年里，长江流域的人口有了飞速的发展。尽管国都定在西安，政权也把持在关中军事集团手中，但唐时全国经济重心已从生产小麦、小米的渭河流域和华北平原转移到了产稻的长江下游地区。

这种转移即是隋朝兴建大运河的原因。帝国需要一条便利的运输系统将南方边疆与首都连接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南方产粮区的优势。隋炀帝在610年开凿的大运河，从长江以南的杭州直到黄河，向西连通长安，又往西北通向北京，今天的大运河只保留了从杭州到北京的这一段。

在理论土，均田制以定期向农民分配土地为基础，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却很难说。国家太平，于是人日激增，这样农业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就失去了平衡，结果农民从父亲手中继承到的土地就达不到应有的份额，而且大部分都成了永业田。同时，皇帝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这种情形与汉朝如出一辙。到了8 世纪上半叶，均田制显然已是名存实亡。这也是唐玄宗时国力盛极而衰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这时统治者废弃了均田制，此后也再未如此大规模地推行过这项制度。

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

一套稳妥可靠的官僚制度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汉代以降，太学与考核制度逐渐衰亡，到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力图通过地方政府举荐贤才和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但豪门士族的子弟把持了重要的官职，并最终形成了"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门阀制度。

直到隋唐时期，统治者们才摸索出一套防止富室贵族垄断权力的官僚制度。隋文帝重新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政权之意识形态基础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完善了汉朝的官吏考核选拔制度，并再次强调州、郡长官必须由朝廷委任而地方望族不得担任这一职务。

唐承袭并进一步发展。隋朝时的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同时亦在各地开设学堂以供当地学子求学之用，国子监的学生和地方举荐的人才

则由礼部负责进行考核。科举分好几级，如"秀才科"考策论、"进士科"考文学及其他明经、明法、书法、明算诸科。不过后三种专业技术型考试只是用来选拔低级官员，而进士科则逐渐成为通向仕途的最佳也是最主要的途径。考中进士者在授职之前还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在文章之外还要考察其外表及言谈举止。另外，对于在职官员也进行类似公务员评审制的政绩考验。

这种繁复的科举制度发展得相当缓慢，直到8 世纪才完全成熟。但即使在这时，富贵子弟仍然比一般人更有希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为考试需要经年累月地攻读经书，这只有富贵之家才负担得起。国子监的学生主要也是贵族子弟，地方举荐的贤才亦大多出身上层。此外，高官大员们往往享有举荐子弟、门生做官的特权，而这时后者根本无需参加不什么考试、

不过，唐朝的科举制度还是培养出一批汉朝从未有过的能吏贤臣：除了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功臣以及末期的一些将相大臣，唐朝的中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

公务员考稽制度是中国文明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真正建立起来的。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接受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由此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近代大英帝国培养统治阶层的经典式教育。由于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儒家思想，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充斥了各种伦理道德、忠孝观念和对礼仪的重视。在这种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独厚，往往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这与其他国家中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往往是政府的批评者大为不同。而平民百姓，因为有可能通过科举而同样步入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们对现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拥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当然，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政府的一贯敬一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政府的构成

隋废郡置县，县上设州。唐时又在州之上设置了10 道（后增至15道）。

为巩固帝国统治，唐朝还在水陆交通路线上设置了驿馆，这些驿馆10 英里为一站，官员凭符信在此打尖下榻，并可使用驿站的舟船马匹。此后驿馆也一直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唐时还在主要商道上设置关卡，并对市集进行严格管理以从中征税并控制商业贸易。

唐代最高行政机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负责制订国是，发布浩令，中书省是百官权力的中心，它对尚书省发来的浩令进行审核，因此对皇权具有牵制作用，门下省为执行机关。这种三省分权制度确保了宰相等大臣的权力能够互相制衡并协同工作、尚书省又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官制一改延续到了20世纪才退出中闰历史的舞台。

其中的御史制度值得一提、御史们负责监察百官的谋逆或失职行为并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弹劾。他们也有权（尽管不无风险）弹劾皇帝。御史台一直是后世帝国统治的重要机构。

长安不仅是大一统唐帝国的中枢，也是它的象征、长安位处西域商道的东端，也是当时世界头号大帝国的首都。当时长安市郊人日总数已达l96万人，长安城的城墙周长有38 公里左右，城市呈棋盘状布局，宽阔笔直的大街将全城分为110 个"坊"(小区），坊间有巷道可通，而日各坊均有专司管理。市中心为500 英尺宽的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的正南门一直通到皇城（即政府总部）和皇城以北的宫城。朱雀大街将个城分为东西两个区，每区均有政府开办的大型集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 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l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六、佛教的汉化

教派的发展

正当中国人同化"蛮夷"从而形成更大的中华帝国时，他们也逐步改造了佛教，不但从中汲取文化营养，同时也中和了它对中国传统价

值观的冲击。佛教教义和寺院经济在北魏和唐初皇帝的保护下盛极一时，大概在武则天（女皇本人一度曾是尼姑）执政时（700 年前后）达到顶点，但就在这日渐兴盛的三四百年中，佛教逐步被中国文化同化并形成了与原始佛教面目迥异的观念和制度。

印度人热爱哲学思辨，结果导致各派思想的林立；中国人则崇尚经典，结果使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如玄奘于645年从印度引进的法相宗，是在印度本土产生的，但最有影响的几个教派，却是中国本土思想的结晶。如智频（538 一597 年）在浙江天台山所创的天台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这一教派以中国人典型的折中主义、兼容并蓄思想和体系的营造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天台宗发挥了"三谛圆融"的大乘教义，将佛法中互相矛盾的教义整合为精密的"圆教"理论。天台宗在八九世纪时成为最有影响的教派，并使《妙法莲华经》成为东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同时兴起的另一个教派是真言宗（密宗）。密宗与印度教中的密教思想渊源极深，认为通过手结契印、口诵真言能更好地征得佛法。至于密宗所强调的转世投胎和修习仪轨，由于中国人对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儒家的礼仪思想均不陌生，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特别是追荐亡灵的密宗佛事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与祖先崇拜的传统又接上了桦。密宗的宇宙图示，即"曼荼罗"(mandala，义为坛场）对于后世中国的佛教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

认为凭藉信仰可得超度的大乘教义亦成为净上宗的宗旨要义。此宗认为，人们只需一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西天极乐世界）。这种观点于5 世纪时在中国落地生根，而隋唐以后的民间起义则往往从中获取启示。净土宗对于普通百姓极有号召力，因而在人数上成为东亚佛教的第一大宗派。

最后出现的一个教派是禅宗，其影响也最为深远。禅宗出现于唐初，但直到9 世纪才成为显学。禅宗强调打坐、静虑，这与原始佛教较为相近，但更多地是吸收了道家"虚静"、"心斋"的一些思想。禅宗认为佛即本自心性。虽然它从印度佛学中吸收了彼岸思想和不可知论的倾向，但最初还是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应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禅宗反对苦修，而其"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主张显然是纯粹的道家思想。禅宗强调日传，即通过提问一些看似无意义的问题破坏日常逻辑来启发参禅者的"自性"。禅宗崇尚自然与简

单的生活，故实质上不过是经过改头换面的道家思想，并巨因此很自然地成为诗人、艺术家灵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禅宗在中国从未形成自己的"教会"，但它对于静修、自性的强调使它成为最有影响的一支教派。禅宗是唐朝以后唯一保持学术生机的教派，其他教派则逐渐为禅宗和净土宗所吸收、同化，后来甚至连禅、净土宗亦逐渐没落，沦为揉合了方术迷信的汉传佛教末流。

佛教的社会功能

中国在修正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对其制度进行了改造，以使它与中国社会更相吻合。寺庙开始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如充当旅店、公共澡堂甚至原始银行等等。另外厅院直到近代都是停灵下葬的场所：在中国人看来是佛教中最反人伦的禁欲制度也逐渐松懈，后来和尚们也逐渐可以像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

佛寺拥有的大量田产是惟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宗教问题。权贵或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并大量施舍财物，再加上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还发放高利贷或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寺院就成了威胁朝廷收入的一大隐患，进而认为有必要限制寺庙、僧众的人数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且统治者还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对社会有利，那么不仅政府应该控制寺院僧众，而且佛教也应该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精神力量。这种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经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南朝的佛寺和士族一样都不受朝廷的控制，但在北朝却发展出一套管理寺院的制度。到4 世纪时，朝廷开始委任类似"主教"的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北魏时政府还对佛寺的数鼠及其田产进行了限制。唐朝时政府规定各道均设立一包括30 名僧众（在内）的佛教管理机构，到了, 29 年还下令每3 年清点一次僧众来贯彻这一政策。747 年朝廷开始采用度碟制度来限制僧人人数。不过限制僧众的政策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效力。信佛的皇帝和大臣们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令，而私白剃度的现象更是所在皆有、

限制逐渐升级为残酷的迫害，当时不少人都攻击佛教为异族邪教，对佛教徒自残肢体、死后火化和禁欲等做法也大为不满，因为这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古训以及儒家的家庭观念。妒忌的道士们也跟着推波助澜。不过政府打击佛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

的考虑。通过灭佛，政府可从寺院里夺回土地、劳动力、铸铜及其他财物。信徒个人倒未碰到多么大的麻烦。

北魏于446 年发动了排佛运动，北周也曾在574 年打击佛道，但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 年至845 年间。当时在位的唐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据官方记载，在"会吕之难"中，共有4600座佛寺及4万座佛堂被毁，约26 万僧尼及其所控制的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这对佛教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击，因为这一印度传来的宗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内在生机了。科考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五经和儒家思想。而上层社会因此就渐渐对佛教失去了兴趣。禅宗倒是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他佛教宗派则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幸运的是，佛教在告别它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之前，在甘肃西端的敦煌为后世留下一了一座永久性的艺术宝库。在敦煌千佛洞有一处藏经室，为防当时吐蕃人的侵扰，曾于1035 年封了起来，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里保存了成千上万卷的佛经抄本，有些还是用各种中亚语言攥写而成的，不愧是唐时佛教全盛期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尽管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而言它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少恒久的影响。它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补充，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何根本的修正。佛教是平民百姓各种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源泉，为中国的思想提供了某种思辨玄学的色彩并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简言之，佛教装饰了中国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欧洲那样在整体上重塑了中国文化。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外交流

六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异族入侵中原时带来了种种异域文化；佛教则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与中介；地区间的海陆商业贸易亦大大超过了汉朝；而唐初则与印度和西亚开始直接进行交流往来。总之，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 世纪以前的最高峰。

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农具和一些发明。像茶叶就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起初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促进思考的药材，到了晚唐茶成为一种普通饮品，并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最流行的饮料。再如椅子是从西

域传入的，数百年后逐渐代替了中土的坐垫与席子。不过大多数技术上的进展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二纸和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唐朝有了巨大的飞跃，并且人们也发明了火药以用于制作烟花爆竹。手推车也是这时出现的，后来成为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但好几百年后它才传入西亚。华北地区早在公元4 世纪就开始用煤，但晚至13 世纪马可o 波罗来华时，仍对此惊叹不迭。

长安城中云集了各国的商人和使节，他们也把各种宗教带到了中国。像波斯的拜火教，即祆教（一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或Mazdaism ），已于公元6 世纪传入中国；另外一种综合了祆教和基督教某些特点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亦于同时传入。当时长安城中的景教大秦寺曾立有叙述三教来华始末的石碑，但久被湮没，直到17 世纪时才重见天日。以上三种宗教已在841 一845 年间的灭佛运动中消声匿迹，但有两种外来宗教仍然幸存了下来。犹太教仍在小范围内活动并一直持续到9 世纪，伊斯兰教则一直稳步发展，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今新疆）及西北、西南边陲发展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

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帝国，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均成为邻国狂热效仿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以及云南的傣族国家南诏，也是在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下，分别于7 世纪和74O 年前后建立起来的。东方一些国家几乎全盘搬用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如朝鲜半岛各国几百年间均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再如锡兰于668 年建国后几乎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唐朝。713 年至926 年崛起于东北的渤海国，也亦步亦趋地效仿唐朝的一些制度。至于日本在七八世纪间对唐朝的学习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艺术

梵乐对中国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此时中亚的音乐和乐器也成为唐朝乐坛的主流。佛教对雕塑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佛教徒对宗教形象的需求使李唐一代成为中国塑像艺术的全盛期。这种先前一直不那么重要的艺术类型在这儿百年间大放异彩，而唐朝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这种艺术也就衰落下去了。

云冈、龙门、敦煌等处的佛像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可以见到直接来自印度的影响，但在六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造像艺术主要却受到中亚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到具有浓郁希腊风味的键陀罗文化及现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中国早期的佛教数的绘画天才都倾心于宗教题材，但表现世俗的绘画也很发达，而且在南方还出现了晚唐以后绘画风格的萌芽不过，这些绘画作品〔如与"书圣"王羲之(321 一379 年）齐名的"画圣"顾恺之的作品〕也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庸和唐以前的建筑，除了砖石结构的佛塔外也极少有保存到今天的。不过，日本在7 至8 世纪仿照唐代风格建造的一些佛寺至今完好，还能使我们对当时讲求简洁、均衡的建筑风格多少有些认识。

文学与学木

在这个佛教化时代，大部分第一流的文学天才和学者都致力于佛学著作，对于这一点后世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未曾注意到：不过也有遵循传统路数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人。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属于贵族文学一类：讲求对仗、骄四俪六的赋在六朝盛极一时，东汉时出现的五言诗亦大兴于六朝时期，其内容大多哀叹世风浇漓或表现个性的独立，具有典型的道家思想。五言诗人中成就最大的陶渊明（名潜，376 一427 年）是南朝人，他纵情诗酒，具有突出的道家思想。

文艺理论著作早在3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而在六世纪时梁太子萧统（501 一531 年）所编的《昭明文选》则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文学选集。此外，官史、经书注疏等传统研究项目亦照常得到发展。大约在500 年左右，出现了一本后来用作启蒙读本的奇书—《千字文》。这部书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概括了中国的历史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流行。这些朽的类型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地方志，其中记载了该地（如一府一县）的历史、风土、政治社会制度等情况。现存最旱的地方志可上溯到公元4 世纪公所有这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从前代一脉相承而来并在唐朝发扬光大的从高雅文化的角度来看，六朝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这大约是因为这一时期新旧交替的过程比较长，因而能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南朝所继承的汉代文化与北朝带有蛮族色彩的文化及佛教文化曾经长期共存乃至最终融合。尽管有蛮族文化和

佛教文化的入侵，但汉唐之间同罗马和中世纪欧洲之间相比，前者还是更多保持了文化连续性。

第06章 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

一、从古典时期到前近代时期

将一个朝代分为两大时期是有违中国历史循环理论的。如果被分为两截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持循环论的学者们恐怕更要大光其火了。不过，仔细分析一些历史循环之下的深层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一般总认为大的文化、社会变更是与军事溃败或改朝换代同时发生的，而人口、生产、商业、文化、制度的发展则主要产生在升平时期。唐朝即是如此。隋及初唐时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并且使之更为完善，接下来100 年间的和平与繁荣使唐时国力大大超过了汉朝，同时制度和文化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一进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国家的全面发展。

六朝与初唐在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和宋（960- 1279 年）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近100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至少在晚唐就已经萌芽，到了宋朝则初步的成熟。

晚唐和宋时达到的文化和制度发展水平在其后几百年中变动无多。这是一个"高原"式的时代：中国初期远远超过欧洲，但到后来则在技术上落到了下风。宋朝以后中国发展趋缓，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 世纪左右，此时唐朝盛极而衰，胡人再次进犯中原，这完全符合朝代循环的规律。不过其中亦有一些更为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后来重塑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例如，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为是"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中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退败，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唐朝在8 世纪时实行两税法，这与当时国内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一道给唐朝带来不同于前代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而这些经济变化也促成了社会的剧烈转型。直到初唐时期，统治阶级一向由强有力的贵族（主要是开国功臣）构成，但渐渐地，政权转人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这些人往往都具有商业背景，一般被称为"缙绅"。

士族的没落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全面胜利，换句话说，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在世袭贵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组织一直到7 世纪都是当时军事化、贵族化帝国的柱石。到了晚唐以后，无论汉胡政权都不乏"马上得天下"的例子，但大多数政权依靠的都是通过个人才干而非凭借门第步入仕途的官吏。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获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愈来愈不受到重视。

另外一大变化是中国重心的转移。尽管国都出于边防的考虑往往设在北方，但国家经济的中心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日益把持了文化与政权。同时，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乡村转到城市新兴士绅阶级不一定靠田产为生，他们往往在都市中生活并经常与都市或城镇中的官员、商贾交游往来、至于乡间的田产则交给他人去管理。

高雅文化自然也受到这些潮流的影响。这时的学术、文学和艺术更趋成熟、精致，视野大开，作品数量激增。这时的创作和研究大多数仍承袭了前代的传统，但极富创新精神，当时创作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直到今天都代表了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格。事实上，在晚唐和宋代定型的艺术、文学类型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影响着此后1000年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8 世纪到13 世纪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二、晚唐

制度的退化

自然，上述变化是缓慢发生的，有些在晚唐时还只是刚刚起步。玄宗年间（712 一756 年）是中国从古代转向前现代的关键时期，而且显然也是唐由盛到衰这一历史循环的转披点。

玄宗时期唐朝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无论在财富、声誉和文化上都超过了100 年前的"贞观之治"。不过，皇室和政府的开支也随之扩大了好几倍，而收入却未曾跟上。整个统治机器开始失灵，就象汉朝一样在赋税和戍防等重大问题上造成混乱。均田制只是延缓了这一衰败过程，然而却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人口也加快了增长，而皇帝则常常把大量土地和人民赏给臣下（有时一赏就是1500户），这就使得均田制难以维持下去。赋税、徭役和兵役落在数量不断减少的农民头上，而农民的田产则越来越少。当农民实在难堪重负时，他们或者逃离农庄，或者将土地认在一些豪族权贵名下，这样他们只需交纳占收成一半的地租，与朝廷的赋税相比要轻一些。这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加深了其余农民的负担。

随着均田制的破产，朝廷无法像以前一样收取赋税，因而不得不寻找替代的方法来确保收人，例如大幅度提高地租、加收贸易税、将各家按贫富分为9 等征税等等。不过，这几项措施挽救不了徭役和兵役制度的崩溃。大运河上的谣役人数越来越少；到了723 年，戍卫京师的任务由大约12 万名雇佣兵所接管，戍边的民兵也逐渐转变为职业军人。尽管谣役与兵役以其他各种形式一直沿袭到近代，但其地位却远远不再如7 世纪时那么重要了。

尽管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货币经济下制度的发展，但它们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雇工和雇佣兵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而职业军人大多为地痞流氓或胡人，他们未必会热忱地保卫国家，而且由于长期服役，他们往往只效忠于部队的领将而将朝廷置于脑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将军实际上就成了不受朝廷约束的军阀。

751 年，高仙芝在帕米尔以西的塔拉斯被大食人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 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它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文明开始渗入中亚。几乎在同时，突厥（土耳其）语也开始取代了塔里木盆地上绿洲国家所使用的印欧语言。

塔拉斯之败后不久唐朝内部就崩溃了。藩镇节度使在玄宗时期控制了10大藩镇的军、民政务。其中有突厥血统的安禄山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通过取悦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她甚至认安禄山为义子）在朝中获得很大的权力。在争夺朝中大权时安禄山与杨贵

妃的堂兄杨国忠产生了冲突，于是在755 年起兵造反。他攻陷了长安，玄宗仓惶入蜀，途中不满的士兵发生哗变，玄宗不得不处死了杨国忠和杨贵妃。这一凄惋的情变成为后世诗人、作家笔下常见的主题。安禄山于757 年被其子所拭，而安禄山之子又被另一名胡人将领杀死。玄宗退位称太上皇，但忠于李唐的军队的在回鹘兵的协助下，终于在762 年平定了叛乱。不过，大唐的全盛时期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藩镇割据和财政改革

安禄山的叛乱对朝廷是个严重的打击，叛乱前754 年官方登记的人口为5288 万人，平叛后764年人口只剩下1690 万人，另外，这时唐朝完全依靠外族军队，势力开始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回鹘人控制着中亚地区，不过约在840 年时为吉尔吉斯人所取代。唐朝开始在全国设置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们则把自己的藩镇变成独立的小王国。节度使一职实际上成为世袭，有时甚至还公开反抗朝廷的命令。

朝廷内部也是一团糟。在玄宗时就有唐室贵族与新兴官僚的争权夺利。100 年来的科举制度，加上武则天的大力奖掖，官僚阶层越来越庞大，足以与先前的权贵们一争高下了。安史之乱后，官僚阶级内部亦出现了朋党之争，而宦官也像在东汉一样开始弄权，他们与百官争夺权利，并左右了9 世纪时的大多数皇帝。尽管如此，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是维持了150 年左右，在此期间朝廷并不十分暗弱，局势亦非像人所想的那样糟糕。曾在中国居留了10 年（838 一847）的一名日僧圆宁，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唐朝社会，其富庶安定、百官的烙奉职守和朝廷的大一统权威，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罕逢其匹的。

之所以产生此局面，是因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采取了新的财政制度。从长江流域输粮人京的任务由专职的人员负责，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国家专卖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像盐、茶、酒类的专卖为朝廷开辟了新的重要财源。唐朝于780 年开始实行两税法，即将各种赋税折合起来，按土地而非按人头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是100 多年来税法改革的最终成果。自此农业税就按土地而非人头征收，手续也大大得到简化。朝廷可以对私人财产松口气了，因为它不再对朝廷的财政构成威胁。事实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豪强地主不必为了保护其荫庇的免税农民而扩张势力，他们只需雇佣农

民、上交赋税就可以了。换言之，这一转变的结果奠定了其后1200 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

总崩溃：五代时期

与两汉不同，唐及唐以后的各朝大约都经历了300 年一周期的历史循环，这是因为它们实施了较为简单的土地与赋税制度，开辟了更为多样化的政府财源，另外，科举制度也带来了更有效的统治。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积重难返，全面崩溃只是迟早之事。874 年北方农民的起义拉开了总崩溃的序幕。这次起义的首领黄巢是一名落第秀才，曾经在长安犯事系狱，起义最终为一有突厥血流的大将所镇压下去。朝廷对藩镇名存实亡的控制也保不住了，907 年原为黄巢义军将领的朱晃篡夺了皇位，唐朝就此灭亡。

其后的混乱局面与东汉末年有些相似，尽管为时较短，但动荡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原、南方和北方一些地区的节度使们纷纷拥兵自立，总共建立了14 个王国，历史上称之"十国"，同时北方先后出现了5 个政权，称之"五代"(907 一960年）。这些朝代大多昙花一现，最长的也不过16 年。像最后一个朝代后周(951 一960年），留在后人记忆中的不过是它为巩固财政地位而发动的灭佛运动。

"五代"的皇帝都是篡位的将领，其中3 位有胡人血统，两人有突厥血统，一人也许有伊朗的血统，于是，中华帝国再次将"蛮族"士兵纳入其中心地区。，同时边境各"蛮族"也再次入侵造成边患。契丹人因为出兵援助后晋（936 一946 年），统治了今北京附近的"燕云十六州"。尽管后来契丹人灭了后晋并占领了中原，但最终未能站稳脚跟，他们建立的辽国只是因为"燕云十六州"之故才在中国官史上提了一笔。有趣的是，契丹和以前的震旦一样，亦成为欧洲（如俄国，" Khitai ") 对中国的一种叫法。

三、宋朝

宋朝的建立

"五代"时的混乱时期只持续50 年左右，这与六朝时长达350 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能到了10 世纪，大一统的观念与制度已经深人人心，因此国家的棍乱分裂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后世的割据纷争局面再末有超过50 年以上。后来异族的入侵曾在中国造成南（汉）北（蛮族）对峙的政治格局，但帝国

完全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到了20 世纪初才又重新产生的。换言之，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

唐灭亡后仅53 年，另一员大将赵匡胤于960 年篡位称帝。这是北方半个世纪以来的第六次篡逆。不过这次与前几次不同，宋太祖建立的宋朝一直持续到1279 年：在他死前的976 年，除了两个国家外中国已基本上得到统一。这两个国家后来也分别于978 年、979 年为太祖之弟太宗所灭。

太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成功地剪除了节度使们的兵权。他设法降低这些人的职务或干脆赐以高官厚禄让他们赋闲养老，从而将军队直接置于朝廷控制之下。通过这些措施，宋太祖消除了使唐朝灭亡、造成五代十国那种混乱局面的藩镇割据制度。

不过，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亦造成后世宋兵面对外侵积弱不振的局面。宋一代的武功远远不及汉、唐两朝。宋朝既未能重新控制北越（安南）地区，亦未能将势力扩展到中亚或塞北一带，甚至连收复辽国在926 年吞并的燕云十六州也遭到了失败，因而不得不向辽进贡30 万两白银、丝帛的岁币。在西北，宋朝亦受到党固族的威胁。党固人在甘肃及河套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并于1038 年定国号为"夏"，史书中亦称之为"西夏"。在一次对西夏的用兵失利后，宋朝亦于1044年开始向西夏输贡。这样，辽、宋、夏三国在军事与外交上就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政府与文官制度

太祖及其继任者在首都设置了一批行政机关，与唐相比，这些部门更为直接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例如，唐朝后期出现的两种机构在此时成为重要的机构，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其一为翰林院，原先是为皇帝起草诏浩的机构，在宋朝成为向皇帝提供咨询的主要机关。其二为兵部。唐时三省中有两省的名称沿袭了下来，其下设六部及其他行政机构，其功能同唐门下省同。另外还有两个重要机构，一为御史台，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整套监察百宫的体系，另一个是三司，负责管理诸如国库、赋税、专卖等财政事务。与唐代不同，宋代牢牢控制了帝国赋税的收入。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总体的经济发展）, 11 世纪早期的政府收人是有唐一代历史最高记录的二倍，开国不久便积累了巨大的收支盈余。

宋时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史无前例的加强。国都开封曾是五代的国都，位处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尽管属于中原腹地，但与长江下游产稻区的距离比长安近了六百来里。宋朝在行政区划方面仍袭唐制，但增加了"道"（后改称"路"）的数目，与唐相比，"道"对州、县的权力也增大了，而且为了避免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道"的管辖面积、行政功能与相应的军事机构与唐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

太祖及其继任者致力于将统治权力控制在皇帝手中并扩大朝廷的权威，这使得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也更趋专制了。因此，中国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常常被称为是"专制的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不过这一说法不尽符实。尽管所谓"天命"理论中蕴含了造反的根据，中华帝国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政权，在实践上当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位时更是十足的专制。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统治。宋朝的主干力量来自于当时发达的文官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日趋完善的科举制度。宦官及百官之外的人员被成功地挡在了政治权力之外。当时规定，高官大员之间不得联姻或同宗任职，并且禁止外戚、妃殡和皇族成员干政，可见当时政府的统治是何等公正廉明。

行政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政府从下层官员中选拨人才并准许高官委任亲属甚至卖官誊爵，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科举制度。从997 年到1124 年，平均每年有200多人通过科举步人仕途，当时1 . 2万名甚至更多的高级官僚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皆来自于科举。此外，获得功名的人实际上也古据了朝中的显要位置。科举分好几种，其中进士一级最受尊崇。进士考试以策论取士，注重推理与创意，在11 世纪晚期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他考试。当时的考卷以数码代替人名，并且誊抄出来以防因笔迹泄露而发生舞弊现象。

1065 年之后，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分三等，首先是各省举行的乡试，中举者（概率一般为上％一10 % ）可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者（大约是10 % ）参加殿试，通过者获得进士出身，即可任职为官。落第者往往一试再试，结果新科进士往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七十儿岁的老翁都有，尽管其平均年龄一般为35 岁左右。官员的升迁依赖如下儿个因素：任职的时间、政绩及考锉、科举时取得的功名以及上司的

提携等等。按制度，某些高级官员有举荐下级官员的责任。被举荐者不得是举荐者的亲属，但举荐者必须对被举荐者的行为负责，有时甚至会连坐治罪。

文官制度成功地将大量人才收罗进了政府，同时通过诱人的仕途消除了才俊之士图谋不轨的威胁。1148 年至1256 年间的进士中，有一半以上三代均为布衣，可见科举制度网罗人才之力了。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文官制度的成功，后世再未发生陈桥兵变那样的篡位事件。宋以前常有大将、后妃或重臣夺权篡位的事情发生，但9 印年以后的王朝或为异族所灭，或皇室内部争夺王位，但再无臣下篡权并获得成功的事例发生。

经济问题

虽然宋朝比前代繁荣，但在开国100 年后也遇到了历史循环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政府收入在前60 年一直很高，如1021 年甚至高达1 . 5 亿贯，但在此之后便逐渐减少，到了1065 年政府收人只有全盛期的3 / 4 。

人口增长是造成这种衰退的一个原因。在农业国家里，人口增长可以增加赋税，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与粮食生产失去平衡，结果要养活的人口越多，赋税的盈余也就越少。土地兼并也是一个原因，虽然北宋中期以后主要按土地面积征收赋税，但最重的负担还是落在最乏经济来源的小农生产者头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农庄缩小和上地的过度耕种，结果小农纷纷破产或者沦为地主的雇农。地主虽然在理论上亦和农民交纳同样的赋税，但他们常常可以通过与官府的关系免交或少交赋税，这样地主手中的财产越积越多，而国库收人却越来越少。J

但朝廷的开支并未因此而减少。宋朝一如前代，朝廷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奢靡铺张，机构人员越来越臃肿，开支也随之越来越庞大，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宋向辽、夏输送岁币之故，但这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当时岁币虽然高达1500 万两白银，但这还不到政府预算的2 ％。其实更多的钱是花在军队上了。宋朝时职业军队代替了唐时的民兵制度，花费既多，也未产生什么成效。宋军弓马装配差劲，士兵多为破落户子弟，与北方蛮族人精马壮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产生财政危机的原因大约只能是过于庞大的军队了— 截至

1041 年，宋朝军队的编制已达125 . 9 万人之多，他们消耗了政府将近80％的开支。

王安石变法

由于财政困难，朝廷无法正常支付官员的薪俸，这挫伤了百官的工作热情，导致了官员的循私舞弊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不过，朋党之争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官员们取代贵族、女主或宦官控制了朝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和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对此官员们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但由于缺乏适当的机制来解决这些分歧，因而往往引起党争或皇帝的干预。1069 年，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神宗（1067 一1085 年在位）委任王安石（1021 一1086 年）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其人很有才能，但性格比较固执，是当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与支持既定体制的守旧派人物针锋相对。王安石一上台便施行了一系列整顿财政、加强边防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一反数百年来的经济管理方法，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诸法。政府在某地买进农产品，又在别地卖出，这样既稳定了物价又可从中得利。王安石规定政府可以贷款给农民，利息为当时很低的20 ％一30 % ，这样就打击了与国争利的高利贷者。他还派人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分级征收赋税。此外他还推行了将徭役折为银钱，按贫富征收赋税，通过官办当铺向业主发放低息贷款等项措施。

军事方面，王安石推行了六朝时的保甲法，规定每一保甲须负责一些民兵的训练与装备，并将官马分派民户牧养，每户各出一人充任骑兵。

王安石还增加官学的数量以与私人的"书院"竞争。当时书院是教育的主要机构。此外他还强调科考要注重选拨具有处理实际事物能力的行政干才。类似王莽，他也援引经书来为自己的改革寻找理论基础。在历史上，王安石也同王莽一样被视为"社会主义者"而毁誉参半，但他并不象王莽那么关注社会平等的问题。他的某些改革，如分级征收土地税、降息贷款和免役诸法，在经济、政治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其他一些措施，如政府控制物价和保甲制度不过是袭用前代的做法，他的变法自然引起了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由于大部分官僚也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他们同样反

对王安石的变法。当时大多数的学者型政治家，如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人都站在反对者的一边，而王安石也一直受到正统派史学家的严厉指责。

不过，官员和学者们的反对并不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原因，而是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这个官僚化国家的统治惰性。这种制度的僵化也是后世各朝的通病。同时变法也在既定体制内部产生了混乱和失衡。因此，尽管王安石的变法并未触动当时的根本制度，不过是对已往做法的反拨，但还是引发了尖锐的朋党斗争，并且在后来几十年中愈演愈烈。1085 年神宗去世，守旧派上台后立刻废除了新法。新旧两派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转变，在党争中新法带来的经济、军事利益于是付诸东流，而党争双方后来也均为一场更大的政治灾难所吞没。

南宋

徽宗（1100-1125 年在位）天性雅好艺术，本人亦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他在位期间文化繁荣，但纸醉金迷的生活也进一步淘空了国库。在其统治后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帝国统治已是外强中千。不过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外部。这时辽国以东的女真部落在满洲东北已经逐渐强大起来，后于1114 年起兵叛辽并于次年建立了金国。宋朝急于收回200 年前被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于是很不明智地与金结盟合攻辽国。不过宋军方面连吃败仗，而女真人则愈战愈勇并于1125 年灭掉了辽国。宋朝因所得无多而向金国表示不满，于是女真人于脆在1126 年攻陷了开封，将宋朝部队赶过了长江。河湖密布的南方不利于金兵的骑射作战方式，金国这才撤离南方，但他们仍然控制了中原的绝大部分地区。徽宗之子高宗（1127 一1162 年在位）在南方重新建立了宋朝，于1138 年定都临安（今杭州）。自此，宋朝的疆域局限于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故史称"南宋"(1127 一1279)，以与先前的北宋相区别。

南宋部队一度在名将岳飞的率领下力图收复失地，因而岳飞被后世爱国者视为民族英雄。然而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最终占了上风并于1141 年与金国媾和。和议规定宋向金主称臣，岁贡50 万两白银与丝帛。金国本想一举灭掉南宋，但遭到了失败，于是在1165 年岁贡减至4O 万两，宋国不再向金称臣，但在1028 年宋北伐失败后，岁贡又增到60 万，同时还交纳了300 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尽管南宋在地理上偏安一隅，朝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亦争论不休，但总的来说比北宋时期更为繁荣。它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南宋大大缩减了兵费开支，同时扩大了官僚队伍，临安亦远比开封繁华富庶，甚至在它沦陷后，马可o 波罗仍然认为它"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华丽高贵的城市"。

南宋150 年间同样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循环。南宋政权始终积弱难振，但凭其坚实的财政基础与强大的官僚机器，并未因内部的压力而立呈败相。和北宋一样，南宋多年后亡于强大的异族入侵者（蒙古人）之手。

四、商业革命

中国的军事力量在8 世纪的高峰过后就不断衰退下去，直到13 世纪最终为蒙古人所灭，但该时期内制度和文化也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一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商业的飞跃，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飞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诸前代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很多方面一直完整地袭用到了19 世纪。

当时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似可归结为人口的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人口数字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员统计，它还可以说明当时国家的发展状况。事实上，南方的人口从8 世纪到11 世纪增长了一倍半，而北宋时全国人口恐怕已经超过了上亿人。

技术的进步

宋朝时农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例如，中国在n 世纪早期从南越引进了一种能快速成熟的双季稻种，这就大大提高了南方地区的农业产量。另外，宋时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这大大有利于提高水稻种植面积。在山坡上种茶的技术也得到了推广，而棉花在12 世纪左右亦成为常见的作物，从而扩充了国内纺织原料的种类。

农业之外各领域内的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像纺织、漆器制作及烧瓷技术都愈趋完善。算盘于宋代晚期出现并成为后世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爆炸技术亦得到发展，到11 世纪早期先后出现了手铳等投弹武器，大大弥补了中国骑兵作战能力的不足。印刷术是当时最大的一项技术成就，虽说它并未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项伟大发明的初衷是为了刊印、传播一些重要的善本书籍。这项发明可能是

受了拓写碑刻的启发，即将一张弄湿的薄纸紧紧蒙在石面上，然后用油烟打拓，这样就出现了一张黑底白文的原始印刷品。不过真正的印刷技术大约是从大型公章发展而来的。中国在7 世纪时已经出现了雕版印刷技术，通常两版合为一副，所以这样印出的中国古书每张的两面通常总是连在一起。

中国在868 年曾印刷了一整部佛经，10世纪中期时四川和南方的一些割据国家亦印刷了全部的儒家经典和佛经三藏。宋朝时印刷术广为流行，各类书籍都大量印行问世。

由于汉字字数众多，中国人通常雕刻整版印刷书籍。当这一技术在巧世纪经中亚、中东传入西方后，由于字母文字的特点，欧洲人改进了这一技术，采用活字印刷。但中国人早在1030 年就开始采用木版、陶版和铜版活字印刷技术了，另外朝鲜人在巧世纪上半叶亦广泛使用了这一技术。

贸易的发展

8 至13 世纪经济大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唐初人们尚轻视商业并试图限制其发展，但到了晚唐和宋朝时这种束缚就被打破了。原先的官市之外也出现了集市，而且到了宋朝，通衙大道上的店铺鳞次栉比。中国首次出现了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商业大都市，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都市是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

以前地区间的交易是由政府通过税收、专卖及其他手段来操纵的，私人业主主要从事的是古董珍玩行业。但到了晚唐和宋朝时，私有经济大步发展并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的规模。批发商或编客云集某一产地，将当地盛产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转卖给行销商。后者包括大专卖商及游商小贩，通常以各地的网络状客栈为中转处行销各地。大行销商则往往通过地方上的中介将货物发卖给当地的众多商家或商贩二

随着商业的发展，行会产生了。行会原为唐初在商业区按街区（"行"）划分的商人组织'比较重要的行会通常从事谷物、盐、茶叶、丝等基本商品的买卖活动或开办钱庄。这些行会的业务规模往往很大，如11 世纪时一个行会在京城就有100 名谷物行销商，据说他们的收人每年高达l000万两白银之多。

外贸

外贸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而且它也是推动当时商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汉时的丝绸之路早已废弃，这时中国主要是一与辽和西夏进行交易。这些地方的人对中原的产品如丝和茶情有独钟，而且辽、金、西夏境内的几百万汉人也促进了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宋朝从这些出口贸易中赚得的钱不但足以偿付岁贡，另外还可以从北国购进马匹以备边防之用。

海外贸易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大约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东汉以来即与印度、中东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但直到8世纪时中外贸易才得到飞速发展，从而迎来世界历史［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至于欧洲人在16 世纪早期到达亚洲南部沿海通商，则标志着西方历史上跨洋交往阶段的开始。

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宋时已出现靠桨和帆航行的大型船只，密封的横舱壁亦已开始使用，这就大大减轻了漏水沉船的危险。中国人至晚在3 世纪就已经知道了磁极，有一本古书亦清楚记载，中国人在1119 年之前已在海船上使用罗盘了，而之后数十年罗盘才经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当时西亚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势力大张，这大约也促进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大部分海外贸易起初即控制在伊朗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手中。不过促进贸易发展的最大因素还是由于中国唐宋时期的空前繁荣吸引了大量外商，当时中国的商品从日本到东非一向都是畅销海外的。

海外贸易的繁荣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原先偏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而一度为中国门户的西北诸省则渐渐沦为边远的内地。宋时外贸活动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几大港口城市，并由市舶使统一管理。8 世纪时政府为了征税方便，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几个官方指定的港日城市进行，而外贸税在宋时成为政府的一大财政进项。晚唐和北宋时的外贸业务主要以广州为中心，但到了南宋时，位居福建产茶、产瓷中心的泉州（马可o 波罗称为zayton,）后来居上，取代广州成为当时的外贸中心。

9 世纪时朝鲜人控制了中国与朝鲜、日本的贸易，而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则控制了中国与南亚、西亚的绝大部分生意：这些外国人住在

各港口城市的指定地区并按照各自的风俗、法律行事，享有与现代治外法权相类似的权利，但其中并无文化优越论的意味在内。西亚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并在中国建立起清真寺。外国商团往往规模庞大，据记载，8 世纪时广州和扬州的外商人数已高达好几千。宋朝时中国商人渐渐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到了宋代晚期就控制了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贸易业务。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性民族的特征，中国的商船开始远赴重洋进行商业冒险，后来甚至一路开到非洲。

当时中国外贸的状况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的进口商品，除了精美的棉纺织品外，大多是马匹、皮革、珠宝、香料、象牙和热带地区的奇珍异玩另一方而，中国的出口商品，除去一些矿产，大多为加工产品，像书籍、绘画和工艺品畅销朝鲜和日本（这些国家的高雅文化也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的铜钱通行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而丝织品和瓷器则在各地都亦受到欢迎：今天远至桑给巴尔都发现了宋瓷的碎片，波斯湾和埃及的一些中世纪商业城市遗址中也发现一了大量宋代瓷器的残片。

发达的货币经济

晚唐和宋时经济非常发达，从当时发达的货币制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铜钱早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后世一直得到广泛的使用，到了晚唐至宋代不但铸币数量大增，货币制度亦趋向复杂，货币在贸易和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了。

749 年政府的现金收入不过200 万贯，但到1065 年，宋朝一年赋税的现金收人已高达3700 万贯，而到了南宋，现金收人在政府收人中的比重更全面超过了谷物和纺织品，唐初政府收人同前代一样主要依赖农业赋税，但到了北宋，政府专卖收人和各项商业税收开始超过农业收入，到了南宋时国家收入就大部分是从商业中获得的。尽管后世政权更为依赖农业收人，但宋朝以后商业收入亦成为政府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这些政权的财政状况较前代更为稳定。

晚唐和宋代货币的广泛使用给国家的币源带来了压力。宋时平均每年的铸币数量为13 万一31 万贯，10世纪晚期达到88 万贯，到了11世纪更高达183 万贯，但即便如此仍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需

要，政府有时限止铸币之外的用铜，或减少每贯钱的枚数，同时禁止铜币外流，并且在这一政策证明无效时，对铸币征收高达50％的出口税。政府甚至在四川、陕西等地试行铸用铁钱以在汉人与胡人之间设一道"铁幕"，但未能取得成功。金银的使用（如金沙、银锭）一度解决了铸铜不足的危机，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些贵重金属货币。

这时出现了一种最有趣的解决办法，即发行纸币，这就足以证明当时的货币经济是何等发达。当时政府和商人都面临着如何长途运送大量货币的问题。铜钱由于体积过于笨重而不合要求，于是各种纸币和票据应运而生。早在811 年，唐朝已开始发行所谓的"飞钱"来支付外地购买的货物。这种票据可以在京城兑换成货币。这种做法在宋代广为使用，当时曾制造出大量的此类票据。由于使用方便，商人们经常在同行之间用它来转账、划汇。

同时，在私人钱庄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纸币。这种纸币类似存折，异地承兑时加收3 ％的服务费。这种票据因其使用方便，起初以与其面值等值的货币流通。四川成都发行的"交子"是最著名的一种钞票，当政府于1024 年开始发行"交子"时，"交子"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面额为整数．从200 到1000 （即一贯）不等，承兑时例收3 分利钱，而且每三年"一界"，发行新交子以淘汰贬值的旧交子

成都的交子起初发行了125 . 6 万千贯，后来又明智地缩减为36 万贯：另外其他地方也发行各种纸币。不过，政府一到财政困难时，就象后世各国政府一样，开始超额发行纸币直至纸币贬值。从货币的发展及其他经济特征来看，宋朝的商品经济代表了中国在19 世纪前的最高发展水平。

五、社会与文化

缙绅阶级

中国的商业革命对社会、政府的触动并不像西方那么巨大，其原因是，这场革命是在一个高度组织化、官僚化的帝国里发生的，这一帝国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与之不同，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面对经济的变革束手无策而因此崩溃，并且导致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8 至13 世纪的经济发展确实也推动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社会类型蕴含了许

多现代都市文明的特点并且一直持续到19 世纪，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社会。不管怎样，12 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只是19 世纪西方文化的远祖，但当西方人19 世纪来到中国时，他们发现700 年前12 世纪的中国却更为年轻而富有朝气。从六朝和唐初的贵族社会到宋朝时基本上是平民性的、更为平等的社会，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的变化。在此之前，绝大部分土地有部分分给了农民，他们的劳动所得（农产品、劳动力）为政府古有，另一部分土地则掌握在豪门巨族手中，他们可以免交赋税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控制荫庇其下的农民，并且凭着他们的财富与独立的权力基础左右朝廷。社会转型之后，政府与土地私有不再对立，而私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再与权力或政治影响挂钩。其结果就是大批中小型地主的出现，同时，简便易行的新型赋税制度出现后，也使得先前的贵族很难再保持其不纳钱粮的特权并因此而逐渐没落下去。

商业和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亦打破了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方式，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士子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权力渐渐集中在皇帝及百官手中，豪门巨族的政治影响也就日益黯淡下去了；同时，旧式贵族亦渐渐融人了缙绅阶级或地主阶级，分散的小块土地代替了大批集中的田产而成为常见的土地所有形式，替地主耕种谋生的农民亦从隶农转变成为佃农。

与旧式贵族相比，新的缙绅阶级对农业财富的依赖程度大大减轻了。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由于在中国拥有土地是件荣耀之事；而且土地相对可以避免政府的兼并，因此剩余资本总是用来购置田产，但缙绅阶级的财产常常更多的是源于商业活动，而且朝廷也常常百般庇护他们的这类财产。缙绅阶级之所以并非是纯粹的地主阶级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财富只有通过科举入仕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权力。缙绅阶级是直接通过知识而获得全国性的政治影响的，财富、田产不过是间接因素罢了。此外，世袭的爵位到了宋代已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变动的频繁，使得当时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局面，平等思想亦深人人心，这样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并进一步影响了高雅文化的内在特性。

社会的都市化

都市化是当时社会的又一特点。8 世纪中期有26 个超过10 万户的大城市，到了12 世纪初就发展到52 个。不过自此之后，中国文化的都市化主要不是体现为人口的增长，而是体现在城市与市民对社会所起的主导作用上。新的缙绅阶级与旧式贵族不同，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更像寓居的地主而不是农村里的乡绅。由于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中就聚集了社会的领导阶层，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

这种新型城市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平民思想的胜利。尽管中国直到初唐时期和其他强大的民族一样富于尚武精神，但从宋朝开始中国文明的特点发生变化，和西方现代都市化社会一样，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人们觉得当兵只是适合社会渣滓做的事，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中，开疆拓边的只有元、清这两个"蛮族"政权，这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在都市化的背景下，高雅文化与前代和比更为精致、多元，参与者也大大增加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自然也兴盛起来。尽管在西方，打猎和赛马等乡村娱乐方式在某些圈子中一直持续到今天，但高度文明的中国人早在1000年前就摒弃了这类活动。同时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人亦和西方进入都市化时的欧洲人一样，开始对自然景色产生了迷恋。

宋时的都市生活是自由而奢华的，城市已非朝廷控制下的几个城池的联合，也不再执行政治中心的功能。相反，娱乐场所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当时的城市中有无数各具特色的茶馆、酒肆和饭庄，并有和后世日本艺妓相似的专业歌伎伺候的娱乐场所。这些场所和酒楼常常也是寻花问柳之处。此外，像戏曲、傀儡戏、杂耍、说书等娱乐形式一也是应有尽有。

都市化社会所固有的阴暗现象亦于此时出现了。寓居城市之中的地主和佃户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并且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贫穷现象亦在城市无产者中蔓延开来。晚唐出现了收养弃婴、孤老、收埋死尸的私家慈善机关。这些机构在12 世纪初改由国家开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像宋朝的军队就是解决无业人员的一个主要手段，此外政府亦提供救济或开仓放粮来帮助穷人。

文化的都市化发展亦带来了妇女地位的变化。在此之前，妇女本来就一直依附于男子，但由于上流社会的女子无须像农妇一样劳动，宋代之后的几百年中进一步造成了妇女地位的低下。这种低下地位具体表现为：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女子在幼年时就开始缠足，其足弓渐渐弯曲，除大拇指之外的4 个脚趾全部折回足底，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三寸金莲"，致使女子终生残疾并成为男子的玩物，而男子的经济地位亦得到了加强。在外国人看来，小脚是令人生厌的，但它往往极大地触发了中国男子的色情联想。后来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社会并一直延续到20 世纪。

艺术思潮

尽管唐朝对外武功赫赫，宋时外贸事业亦欣欣向荣，但中国8 至13 世纪的文化却并未显示出多少新的外来影响。恰恰相反，中国文化倒是表现为本土传统的丰富与成熟。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均是如此。如建筑，尽管多层建筑已非鲜见，檐角也日趋上翘，仍旧保持了原先以梁柱为主体的风格。在佛教影响下兴盛起来的造像艺术，在宋时达到新的写实主义高峰，但随之很快就又衰落下去了。各种工艺技术均得到飞速发展，宋期的青花瓷和其他瓷器开始名扬四海。不过，发展最大的是绘画艺术。宋代以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美术领域中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类型，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中国绘画艺术的技法与风格在汉代已大致出现，经过不断的丰富发展而大成于宋代，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后世中国画虽然更为丰富多样，表现技法更具活力。但从宏观角度玩味，就会发现后世中国画的各种题材在宋时就已经无一不备了。以造像为主的佛教题材绘画作品在宋代一直很流行，但世俗题材的绘画作品逐渐后来居上成为主流。后者不再以人像或先朝事迹为中心，而是着力于表现山水风光（人物不过是种点缀罢了）或自然景色（如一丛竹林）。这已不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作品，而是具有印象主义的风格了。色彩变得尤足轻重，水墨画成中国画的主流。画家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并致力于表现他心中认为是真实的事物。一山一水便可表现整个自然，一丛竹林即是宇宙的缩影。这显然溶人了道家或禅宗的竹学思想。

宋代绘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绘画相比，它有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宋时对艺术的整体态度基本上也是

现代主义的。在宋代艺术不一再是宗教的婢女；绘画也不仅仅是造像或建筑上的装饰，而是因其本身的美感特质而为人所欣赏。画家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而是成为人人敬仰的艺术家— 一他们往往同时也是文人士大夫。

晚唐与两宋时画坛名家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玄宗时期的吴道子，北宋的米芾（1051 一1107 年）和南宋时的山水名家马远、夏圭等人。中国人对流派的尊崇也应用到了艺术领域，当时出现了许多论述"南宗"与"北宗"画派的文章。另外在艺术与考占领域也出现了好古的思潮。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收藏了大量作品，著名的收藏家还在藏品L上加印迹来表示该作是真品或为本人所拥有，这往往更加提升了藏品的价值。当时还出现了详细的藏品目录与高深的鉴赏文章。同时古董业的兴盛也刺激了造伪业的发展，后者本身亦成为了一种艺术。

文学

尽管绘画艺术对于中国精英阶层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漂亮的书法和文学技能（尤其是诗才）却是他们的必备才能。文字向来是备受尊崇，而作为获求功名之主要途径的科举制度更是抬高了它的地位。10世纪时私学与书院的数量大增，加上印刷术的发明，自然也推动了各种书写用具的发展，而文学、学术亦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六朝以来盛行不衰的诗歌艺术在唐朝达到了高峰，同时在形式上也更为自由挥洒了。诗歌到了李白(701 一762 年）、杜甫（7 12 一770 年）手中可说发展到了极致。李白是个道家信徒，他喜好醇酒，常常自感怀才不遇，一生浪迹四海。据说他在船中饮酒醉后因捞月堕水而亡，这个传说恰合诗人之精神。杜甫则是一严肃的儒家信徒，他忧国忧民，感时讥世二唐宋时有名的诗人无虑数千，像以通俗语言人诗的白居易（772 一846年）在整个东亚地区都享有盛名。到了宋朝，由于题材渐渐用尽，诗日渐失去了活力，但还是出现了不少大诗人，如苏东坡（1036 一1 101 年），他不但是大书法家、一代文宗，亦是大思想家。

诗歌衰落了，而脱胎于唱曲的词却兴盛了起来。词的格式多变，语言通俗，起初只是不登大雅的小道，但到了宋朝，所有的大诗人

（如苏东坡）都对填词乐此不疲。词到了后来亦日益僵化，而散曲则代之而起，成为元明两代最为风行的诗歌体裁。

晚唐和宋也是古文的黄金时代。韩愈（768 一824 年）一扫六朝以来讲求对偶、以浮华为能事的骄文风气，复兴了简洁质朴的古文。不过，此时古文已略显过时，又因为它以古代作品为范本，因此加大了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异。但是反对僵化写作的斗争继续了下去。作为一代史家、思想家和词宗的欧阳修认为，作家应不拘一格地采用各种文体来自由抒发思想。这一观念无疑是受了禅宗语录和哲学著作口语化影响的结果。这一时期亦出现了两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戏曲与传奇（小说）：，这两种素来不人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在后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逐渐发展为高度成熟的杂剧与小说。当时这种大众文艺的兴起，显然与教育程度和中国文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唐与宋代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大多数的诗人、词家与学者都属于士大夫阶层（尽管有些人怀才不遇，如李白和杜甫）。反过来，大多数大政治家亦是杰出的文人，像政坛强人王安石就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先前诗人、学者、官员这三种身份是径渭分明的，但宋代儒学发展出的理想人格却是身兼学者、诗人、政治家甚至哲学家与画家的全才型人物：

学术研究

晚唐和宋代的学术研究也有巨大的发展。此时编撰了更为严整、完备的官史，另外还出现了新式的史学作品。当时文献之充足翔实，完全有可能撰写一部新的通史。司马光（1018 一1086 年）不仅是以反对王安石新政而著名的守旧派政治家，他主持编写的《 资治通鉴》 亦成为司马迁的《 史记》 之后又一部伟大的通史。该书分294 卷，按照编年顺序讲述了上至公元前403 年下迄公元959 年间1362 年间的史事。"资治通鉴"这部书名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所有理想，即"以史为镜来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之意。

12 世纪时，在朱熹的指导下，人们对这部大书的文献材料进行了删节与加工，编成《 通鉴纲目》 一书，其中对史实进行了分类，着重强调历史的道德教育意义。袁枢（1131 一1205 年）亦在《 资治通鉴》 的基础上，分事立目，钞辑了《 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这3 部书成为后世中国学者了解中国历史的必读书目。

类书编撰亦于此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像801 年成书的《 通典》96上年成书的《 唐会要》 均成为后世新型百科全书的雏型。后者作为提供前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主要信息源，逐渐替代了官史在这方面的作用。

六、新儒学（理学）

新思潮的兴起

晚唐和宋代兴起的文化心态与正统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 世纪。在这一思想动荡的时期里产生的理学（西方称为"新儒学")，成为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直到19 世纪西方思想涌入以及20 世纪政治、社会革命的进一步冲击下才告崩溃。

理学之所以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在外族侵略下产生的"内转"。唐朝时国力强盛，人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也能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如713 年一位伊斯兰大使因为宗教的原因，拒绝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中国人也就放弃了这项礼仪要求，这与清朝对待欧洲使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到了晚唐，汉人对"蛮夷"的恐惧与憎恶增加了。如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向受到攻击，此时排佛的活动也愈演愈烈，像韩愈在819 年为反对皇帝迎佛骨而写的一篇奏章即是其标志，在此20 年后就发生了"会昌佛难"(841 一846年）。

儒学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六朝时的混乱政局已成为遥远的记忆，重建的官僚国家对文人官吏的需求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经典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儒家思想在佛法最盛之时亦未销声匿迹，并且在帝国重新统一后稳步发展起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到了9 世纪，儒家的文人士大夫渐渐摒弃了道家反对政府统治的思想，对佛教反对社会的思想同样也大加挞伐。

不过，理学并不仅仅是前秦和两汉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部分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部分是全新的创造、在学者们看来，当时的社会与经典中所描述的社会显然颇有不同。理学家们希望能够重续先圣的道统（即恢复他们心目中的上古理想社会），但他们是按照新的思路，出于维护当时社会利益的考虑来完成这个工作的理学家们深受佛学的影响，许多人在早年曾是佛道信徒，有些甚至还在禅院里修行过。佛

教使人能够进行一些形而「的思考，而理学的一个新贡献就是援佛道术语入儒发展出一套形而上的儒学体系。

因此，理学就和汉代儒学一样，是融汇了当时各种思潮的产物。不过理学基本上摒弃了道家追求长生不死和佛教注重神性与来世的思想。它与中国古代思想一脉相承，重视的是世俗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事务，特别是伦理直德问题，另外也同样具有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倾向。

新儒家及其思想

以辟佛而闻名的古文大师韩愈可称得上是第一位伟大的新儒家。11 及12 世纪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时出现了许多思想和学派。像陆九渊（号象山，1139一1192 年）创立了一种类似禅宗的注重个人体悟的思想，其思想于明时大行于世。11 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则代表了儒家中务实、入世的一派，而同时代的欧阳修、苏东坡亦领导了另外几派重要的哲学思潮。

在王安石的反对派中，有几位成为后世理学的创始人。第一位是周敦颐（1017 一1073 年），他从《易经》中拈取"太极"一词，演绎出一套阴阳五行所组成的宇宙构成论。这一思想在"二程"即程颢（1031 一1085 年）、程颐（1032 一1107 年）手中更趋完善。程颐还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一章，连同《孟子》、《中庸》、《论语》放在一起称为《四书》。《四书》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教材。

朱熹（1130一1200 年）是集理学之大成者，其地位类似基督教中的阿奎那（Aquinas）。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一名完美的儒家信徒。我们上面曾介绍过，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曾一度人仕，但他首先是儒家经典的大评注家和古典时期之后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对理学贡献之大，以致于理学在东亚常常又被称为"朱子学"。

按照朱熹创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万物以"理"（先天的模式）为本，以"气"("以太"或物质）为源。如房屋的范式为"理"，砖木则由"气"发展而来。一物各有一"理", "众理"之全则为"太极"，理之与太极，是"月印万川"的分享关系。

这种思想显然是受了佛学的影响，同样，宋代理学家借用佛教思想的概念，发展出一套用太极、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的万物

演化循环的理论。但理学思想的核心一如一旱期儒学，强调将其思想应用于伦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实践之中。后世之人往往不加思索地信奉理学，对他们而言，理学中的伦理和社会思想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宋代，孟子的"性善"、"修身"学说与荀子的"性恶"、"化性起伪"学说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朱熹一派肯定了孟子的观点，认为人性的"天理"自然是纯洁、善良的，它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的根本。不过，"天命之性"总是受到"气"的遮蔽而不尽完善，故而需要放弃"私欲"服从"天理"。这样，教育就变得就一十分重要，"修身"更是必不可少。儒学在宋代理学思潮中发展到了极致，其核心内容融汇了孟子和宋代士大夫的思想。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该词首见于《孟子》）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之外都是权威或服从的关系。其次，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是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像孟子所强调的，他必须具有完关的道德。最后是在百官体系和科举考试中得以制度化的士大夫理想，即循规蹈矩的德才兼备者应成为社会的表率与大公无私的统治者，并且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

文化发展的停滞

朱熹死后，他的理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正统思想：1313 年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作为答题的依据。结果，朱熹的学术和哲学就束缚了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理学因此推动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独特的稳定、因循守旧型社会的形成。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与欧洲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与制度发展滞缓，使得中国在19 世纪时积弱不振，面对同一时期强大起来的西方文明几无还手之力。中国的这种惰性常常被看成是历史的悲剧，亦成为后世民族耻辱的根源。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而言，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稳定，总归要比同时期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思想动荡更为可取些罢。文化迅速变化的西方社会中孕育了当今世界上高度不稳定的文明类型，生活在这种文明中的人，可能也会羡慕中国在13 至19 世纪所享有的和平与稳定呢。

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获得长达800 余年的稳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在13 世纪形成了一种平衡，并且在当时的思想、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这种完美的平衡到了19、20 世纪，在经受了外界的剧烈破坏和撞击仍未完全打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为他们辉煌的过去而感到骄傲，大约也是很有道理的。

第07章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13 世纪到19 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间先后出现了元（1271 一1368 年）、明(1368 一l644 年）、清（1616 一1911 年）3 个朝代，其中社会动荡主要出现在王朝统治的末期，即14 、17 、19 世纪。

不过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中华帝国不仅包括长城以内的农业地区，亦包括位处亚洲腹地（特别是蒙古与满洲）的边缘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像汉、唐、明3 朝，往往控制了这些地方，但在国力衰败之时则往往受到该地少数民族的入侵，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会占领并统治帝国的部分地区。不过他们常常借用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来巩固大一统的统治。中国政治秩序之所以格外地稳定，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能够容忍异族（尤其在外族势力强大的时候）的统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变。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北疆草原曾经出现过的主要"蛮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

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曾不断被汉人或继起的少数民族向西驱赶。早期各蛮族多属土耳其（突厥）语系，后起的各蛮族多属蒙古语系。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从而形成有规律的政权循环现象。中国的政治生活无时不受到这些"蛮族"的影响，这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耕地与草原相毗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亚洲大陆腹地气候干燥，只有内陆河，因而无法大面积发展农业。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由于水资源缺乏而人口稀少。"蛮族"地区几乎是汉人区的两倍，但人口只是汉人的1 / 4 。因此"蛮族"的力量从何而来便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当"蛮族"进入长城以南时，常常具有军事上的优势，那么这些人的晓勇善战又是从柯而来的呢?

一、草原社会

草原居民主要靠畜牧为生。纯粹的游牧民族中，羊和马就构成了他们全部的经济生活。羊皮可制衣，羊毛可制毡，人们吃的是羊肉，并用马奶、羊奶制取奶酪与奶油。女人们收集畜粪做为燃料使用，男人们以马代步，照看羊群、马群，骑射作战或狩猎。另外有时也靠骆驼来穿越沙漠、用牛来驾车。只要能通过定点市集换取来粮食、织物、菜及其他"奢侈品"和制造武器的铜铁金属，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农业。，在短期内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但长远来看也并未完全割断与商业地区的关系。由于城市不可能在草原上获得发展，草原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就受到很大的局限。居民的财富主要用在了妇女们的首饰上，他们主要的艺术形式是称之为镰饰的金属动物造型。（这种艺术广泛分布于从伏尔加河下游、里海到阿穆尔河的广大亚欧草原）他们的语言文学非常落后。其宗教为原始的萨满教，由巫医请神驱鬼，与通古斯族、美洲印第安人不无相似之处，"苍天"则是他们共奉的尊神。

牧民们的迁徙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随着季节变化进行，如人冬前将畜群迁移到避风的山谷地带，次年开春时再迁回到平原上来。寻找牧场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迁徙并不是为了开展农业生产而争夺耕地。部落酋长随季节变化选择不同的草场并有规律地组织部落的迁徙，对定居生活，如犁地、收割、盖房、修路可说毫无兴趣。牧人完全靠天吃饭，因为一场大风就有可能摧毁掉畜群。居住在农业区边缘的半游牧民族，也同样过着这种不稳定的经济生活。他们无法积累财富，这就促使他们一再扩大与中原的贸易或进行军事扩张。游牧民族是没有什么财产的，与人烟稠密的农业区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总是相对贫穷一些。

草原上的牧人、猎户与农民不同，不必担心因为四处漂流而影响收获。他们从小到大在马鞍上度过一生，平时用来照料畜群和捕猎上的精力，战争时可以立刻用来摧毁敌人：积极主动的户外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为独立、自信、无所不能的个体（这与美洲牛仔不无相似之处）。身兼牧人、猎手和战士的草原人民不得不准备好应付一切事情：由于妇女们分担了帐篷内的事务和政治、战争之外的一切生活问题，男子们的战斗力大大得到了加强。

草原上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部族首领一般由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当他们年老体衰时就会被新的领袖所代替。大

小酋长和战士相互之间保持一种效忠和保护的关系，而一个强人也往往可以很快地奋斗到人际关系金字塔的顶端。

游牧民族的强大战斗力来自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是铁制马橙的作用，它于公元初传入草原地区，为骑射作战提供了很大方便。骑手身骑训练有素的战马，并使用一种精巧的弓箭，这样他的战斗力就超过那些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从取400年到1400年，在火器诞生之前，他们的军事技术在亚洲一直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长城已不能隔断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往。这一地区降雨很少，周期性发作的天灾也给农业生产造成厂危害，汉人以谷物、丝绸及茶叶换取胡人的马匹，这种贸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牵涉在一起长城沿线的半游牧民族有时亦会归顺中原甚至汉化，但当中原政权暗弱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会归附反叛的"蛮族"领袖。反叛的领袖如果有魄力效法中原的政治制度，这样他就能够建众起一种以对商人、农民和卜兵进行统治为基础的混合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往往不可避免地也充当俩某种角色。在这种貌合神离的政权中，外族领袖往往身兼战将与统治者两种角色以维持其统治：

契丹帝国

契丹人建守的辽国（947 一1125 年）具有典型的三元国家特征」辽国横跨蒙古、满洲和中原的东北地区，像华北和满洲南部为农业区，满洲西部和蒙古为草原、满洲的东部和北部则为林区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满洲东部的通古斯人（即满洲人的祖先），他们以狩猎、耕种和牧猪为生；蒙一古草原的突厥各部，他们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完全以牧羊、牧马为生；两者之间是半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他们既种庄稼、养猪，也牧马、牧牛、养骆驼，属于混合型经济：契丹最初有18 部，后发展为54 部，在此基础上最终便形成了契丹帝国。

契丹社会以某一族为中心，分为8 大支脉，各支之间互相通婚。契丹社会也包括契丹人以外的游牧民族和在农村、城镇定居的汉人（契丹境内的汉人地位不等，或为奴隶、或为半自由人、或完全具有人身自由）。原先满洲东部渤海国的百姓则处在这一社会的最底层。

与中国嫡系继承的社会不同，契丹各部大部分都没有姓氏，往往几代之后其身份就辨别不清了。他们的祭祖活动仿效汉人由统治者所属一族掌管。他们的婚姻仍按照民族的风俗，与汉人的做法大相径

庭：契丹男子往往可以娶其姨、姑为妻或在兄弟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孀。

907年，契丹各部像先前匈奴人一样形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同年他们的首领自称为契丹国皇帝。其后战事不断，甚至他的兄弟也加人了反对者的一方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大，统治者终于建立起牢固的像汉人那样的世袭君主制度。

契丹人不仅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而且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契丹皇帝大帐的护卫由骑兵射手担任，这就是后世西方人称为"游牧部落"(horde ）的雏型。早在922 年，契丹皇帝就从各部抽调精兵组成一支2000人的类似西方"近卫军"的骑兵部队，后来人数又增加到了5万至7 万人。

在作战时，契丹骑兵可人可以拥有3 匹战马（其中两2 为备用）；他的装束包括1套铠甲、2 张弓、上把斧子、1口刀、绳索以及干粮：平时狩猎就是他们的军事训练，一般分为5 人一组或1O 人一组，对首领保持绝对服从在开阔的平原上作战时，几十名、几百名或几千名契丹士兵组成整齐的方阵，由前锋、两翼、中军和皇家卫队构成。交战之前，他们会派出1 万人左右的侦察部队侦察敌情，晚间有夜哨，并通过烽火、锣鼓号角、旗子、口令乃至学鸟叫来传递信息。他们避免与优势兵力正面交锋，而且采取断绝敌军供给、设置伏兵或避实就虚等战术来取胜。在攻城时他们命令汉族百姓填平护城河，并用汉人的弩弓轰击城墙。在屠城时他们惯常驱使汉人俘虏为前锋来杀戮自己的同胞。

辽国

到了947 年，契丹势力已向南扩张到了燕云十六州，并接二连三地攻陷了中原的城镇。同年契丹易国号－为"辽"。利用唐朝崩溃后形成的时机，契丹人建立了一个包括"蛮族"和汉人在内的二元国家。其间他们得到一些汉人归顺者的帮助，汉人的城市文明与统治制度也随之带到了辽国。

辽国有5 个国都，其中上京位于关外，每一个国都各为一部分国土的中心，其下设有各级行政区划并各有守将、堡垒加以守护。辽国两北两院均设宰相、枢密使及各部尚书，并在北京朝会办公。南院效仿唐代的六部及谏官等制度，自988 年起亦推行科举以选拔汉人官

员。为了促进统治制度的汉化，契丹人亦开始建年号、立太子、尊孔子、效仿儒家的祭祖活动、学讲汉语并以汉语为官力一语言，南院治下的辽国人甚至还穿用汉服。为了防止汉化，契丹人保留了原先的部落组织、仪式和大部分饮食、服装习惯。。与前代"蛮族"入侵者不同，他们避免将汉语作为母语来使用，并为自己的语言发展出两套文字系统（字母文字与汉字）。这两种文字用于诏诰公文，但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辽国人口一直未超过400万，与北宋人口相比少得可怜。事实上，辽国契丹人的人口只有75 万左右，仅占全国人口的1 / 5 。这样契丹统治者就必须想尽办法来加强统治。不过，最后导致他们灭亡的不是汉人，而是后方的另外一个少数民族。

西夏

党固人此时在今甘肃地区建立了"夏"或"西夏"; 宋能够在辽国的进攻下苟延残喘，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一种力量的制衡。西夏定都于黄河边上的银川，正好处在蒙古与中亚商路的交汇处。西夏为半绿洲式经济，既有灌溉农业，也有畜牧业和商业，党固人先前向宋朝输贡纳币，后来元昊于1038 年宣布独立，自称为大夏国皇帝。在他统治时期发明了一种西夏文字，用汉字来记录党固语，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直到今天都无法解读。党固人仿效汉人的统治制度与教育教度，同时奉佛教为其国教。

女真人与金国

女真人生活在满洲东北一带，原先归附辽国，但由于契丹人不准他们向南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冲突：1115年他们在一位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统一了各部，势力大张。同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并很快攻陷了上京。辽国灭亡后，余部西逃并重新建立了另外一个政权，即所谓西辽（1124 一1211 年），又名黑契丹，西辽控制了帕米尔以西及以东的绿洲地区，与西夏和阿姆河地区（即当时的楚河南岸）接壤，后于1211 年终为蒙古所灭。

与辽国不同的是，女真人积极南下，占领了大部分中原地区，甚至于1126 年攻陷了宋都开封。金兵一直打到长江流域，最终以淮河（其南为中国的产稻区）一带为界与南宋划江而治。

金国（1122 一1234 年，其名源自女真部落发祥地一条河水的名称）的人口比辽国还要少。他们承袭了契丹人的二元统治和混合文化，而且汉化的程度更深。金国定都燕京（现北京地区），效仿中原建立了百官制度，和宋朝一样将全国划分为19 个省，下设州县，又仿唐制设立了六部，到后来汉族官员的人数比非汉族官员人数还多出一半。

像契丹人一样，女真人面对发达的汉族文化，不得不在统治大量汉族人的同时也设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这方面，唐以来的"蛮族"很像入侵罗马帝国的欧洲游牧民族，后者亦为反抗罗马文化而打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这样的旗号。女真人在契丹字母的基础上也创立了两套女真文字，一套为字母文字，一套是从汉字脱胎而来的方块字。

女真人、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起初都十分晓勇善战，但他们在中原农业区定居下来后就渐渐失去了战斗力。在与中国人的经济交往中，他们逐渐沦为佃户甚至变得一贫如洗。后来他们也可以与汉族通婚了。1141 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这大大促进了两国之间贸易的发展。当金国皇帝内部为争夺皇位大打出手时，他们治下的汉人却富有创造力地发展了各项和平的艺术，如刊印图书、学术研究、文学和戏曲等等。金国统治者也转向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开始学习五经、写作汉诗。1189 年后，金国同时与蒙古人和南宋作战，国力逐渐空虚。他们曾效仿北宋印行纸币，由于发行过多，引起了通货膨胀等恶性后果。1215 年，在蒙古的军事武力下金人将国都从北京迁到了开封，到了1234 年最终为蒙古人所灭。

二、蒙古帝国

历史上的异族政权，如北魏、辽、金，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到了蒙古人和满族人建立政权时就看得更明显了。这些特点是：(上) "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的时候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2 ）这些"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的指点和效忠；(3) "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时的战斗力；(4 ）在异族政权的容忍或安抚政策下，归顺的汉人傀儡政府中任命了大量汉族税吏和官员；(5 ）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的政治制度并允许传统统治制度和汉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继续发展；(6 ）但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之

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来维护本民族的自觉存在而不为汉人所同化；(7 ）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一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大部分是汉人；(8 ）其他少数民族也往往加人政府；(9 ）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以维护统治，包括戍卫边境（亦有汉族士兵）、派亲兵防卫国都和其他一些重要地区；(10 ）对于中亚其他各少数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11 ）由于汉人人数众多，异族入授者渐渐吸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饮食、服装、姓名乃至语言等等；(12 ）异族或者最终为汉族所同化，或者被汉人驱逐出中原。上述这些特点在蒙古统治中国时都得到了体现。蒙古人往往每家住一个帐篷（即蒙古包），几家人一组生活在一起。每逢迁徒之时，各家聚在一起，往往有数百家一起行动公父系氏族是蒙古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又寸氏族的忠诚体现为灶神崇拜，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有血亲关系的氏族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部落，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同氏族的首领常常成为,"结拜兄弟"，蒙古人实行多妻制，这样男人们可以从本族以外娶回很多妻子，不过常常须诉诸武力来抢亲，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世仇、美击报复和小规模的战斗。渐渐地，某些部落在战斗中古了上风，吞并了其他部落，势力逐步强大起来，而类似欧洲"老爷"、"骑士"、"平民"、奴隶"之间的那种"归顺— 保护"金字塔式封建关系，也在蒙古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一位强人可以迅速奋斗到领袖的地位。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生于1167 年，当时蒙古各部仍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正是成吉思汗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本人出身贵族，幼年时父亲就被人杀死，他历尽艰辛，一心想为父亲报仇。渐渐地他赢得族人的忠心支持，当上了首领。在与最高首领的反抗斗争中，他率领族人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部落。最后，1206 年蒙古各部在克鲁伦河召开大会，授予铁木真"成吉思汗"（意为"宇宙之王"）的称号。从后世保存无多的波斯文、汉文和阿拉伯文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很高超的。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持，他宣称自己的事业是上天授予他的神圣使命。铁木真的政权结构是按家庭原则从家庭到氏族、从氏族到部落以此类推建立起来的。为了维护统治，他在12 肠年颁布了一套帝国法律（后在他死前的1227 年又加以

修改完善），规定这套法律是高于大汗本人的。从今天保存的片断来看，这是一套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铁木真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铁木真在他的政府里任用了很多回人，后者是一商业型民族，许多人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主要生活在吐鲁番绿洲地区一带。蒙古人即是按照回文字母的形式来记录他们的语言的。

成吉思汗的卫兵由氏族领袖的子侄、手下的大将及其亲属组成，后逐渐发展为一支1 万人的精锐部队。成吉思汗即从这些人中挑选他的大将和高级官员。这支队伍的编制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人员来自各个部落，在1227 年时兵力一度达到12 . 9 万人，虽然与宋朝军队的人数相比还是很少，但按游牧民族的标准来看已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了。蒙古骑兵部队的将领为世袭的贵族，他们身穿皮裘，行军时配有后备马匹，有时十天十夜不下马鞍，行动迅捷（如远征匈牙利时3 天内走了270 英里）。骑兵主要靠劫掠为生，因此前方潜在的征服对象就不断地刺激他们投人战斗。

在交战时，蒙古人用骑兵包围敌军后再予以迎头痛击，这和他们狩猎时采取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们用的长弓比英国人所用的大弓威力更大，射程可达以600英尺。蒙古人也善于运用计谋，他们往往佯败引来追兵，然后反戈一击消灭敌人。马可o 波罗曾讲过："在这种战争中，蒙古人的对手往往在自以为获胜之时打输了这场战争。"蒙古人的另外一种战术，是埋伏重兵诱敌深人，然而聚而歼灭之。他们作战灵活，配合默契，常常以优势军力打击敌军的薄弱环节，可以说，在火器发明之前，他们把作战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另外，他们还善于使用间谍和心理战术。如他们通过商人刺探敌情，或在攻城前事先制造恐怖气氛，同时许诺只要敌人及早归降便不干涉他们的信仰并保证商人的自由等等，往往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成吉思汗在1205 至1209 年间发兵征服了西夏，并于1227 年灭掉了这个国家。他在1211 年至1215 年间发动了对金国的第一次战役，攻陷了金人的国都，其间还获得汉人的指点，其中最有名的是契丹皇帝的后裔耶律楚材（ll90- 1244 年），他劝谏新主不要把中原荡为牧场，并教蒙古人如何征收赋税、如何开矿和发展工业。1219 年至1221 年成吉思汗又征服了现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境内的突厥族帝国，不仅控制了

许多丰饶的绿洲城市、手工业中心和商队，同时也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并赢得了穆斯林商贾的拥戴。另外，突厥各部也渐渐融人了蒙古民族。

这样，成吉思汗在他逝世（1227 年）以前已然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之大帝国的雏型。许多人都对这位"一代天骄"的性格产生了兴趣。他建立了傲人的勋业，但其动机却很简单．。他曾多次说起："男人最大的乐趣在于征服他的敌人，追击敌人，把他们的财产统统夺过来，让他们的亲人哭泣，古有他们的马匹，把他们的女人搂抱到怀里。"在亚欧人民的记忆中，蒙古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而这正是成吉思汗的性格特征。

四大汗国

按照部落惯例，成吉思汗将帝国分给他的四个嫡子。他的孙子亦继承祖志，将蒙古帝国扩张为拥有四大汗国的庞大帝国：

1．东亚的大汗国：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夕，1229 一1241 年在位；蒙哥（成吉思汗的孙子）, 1251 一1259 年在位，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子孙）, 12 以卜一1294 年在位（1279 年后统治着全中国）, 1368 年为明所灭。

2．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察哈台汗国：察哈台（成吉思汗二子，1227 一1242 年在位；1370 年后国上西部被帖木儿（1336 一1405 年）吞并。

3．伊利汗国：旭烈兀于1258 年攻入巴格达后所建，1335 年后逐渐瓦解。

4．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拔都（1227 一1255 年在位），一度控制了俄罗斯，后为帖木儿征服，于15世纪时解体。

这支包括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大军横扫了当时世界的主要地区，1231 年扫荡了波斯，1258 年攻破了巴格达。在东亚，蒙古军队于1241 年征服了中国的整个中原地区，1258 年灭掉了朝鲜。同时驱兵西进，拔都焚毁了莫斯科，攻破了基辅，并侵人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多瑙河流域（1241 年），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但在他听说大汗窝阔台去世（1241 年）的消息后便收兵回国以争夺汗位。这样，四分五裂、并未做好应战准备的欧洲基督教国家才得以躲过一劫。

拔都的继任者在南俄罗斯统治了200年。伊利汗（意为小汗，下属之汗）在波斯统治了100 年。南俄罗斯、波斯和中国是蒙古国的3 大农业区，但处于蒙古和土耳其斯坦绿洲地区这一核心地带的边缘。这样，察哈台汗国就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重心。：在这一地区，蒙古通往中亚的道路上驿站密布，可以提供住宿、补给供养和躲避盗匪。商人和旅行家在这些骤道上络绎不绝，同时经过的还有运送政府物资的官员，他们在办理公事的同时也为统治者搜集情报。蒙古的骤马耐于奔跑并采用接力方式，邮件一天可走200英里。起初，四大汗国均属于同一帝国，但在成吉思汗死后渐渐就各自为政了。西亚的蒙古大汗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中国地区的大汗则皈依了佛教并且按照儒家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人、波斯人和俄罗斯人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官制、朝政管理方式，各地的实际需求亦千差万别，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蒙古帝国的分裂。各国统治不断"向内转"，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内政事务上。统一的蒙古大帝国仅仅存在了一个世纪就四分五裂了。

征服南宋

蒙古人直到1279 年才征服了全中国，这对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曾助金攻辽，这回重蹈覆辙又帮助蒙古人攻打金国，其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不过在此几十年后蒙古人才得以灭掉南宋，这清楚地表明南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至少比征服西亚要困难得多。

蒙古人采取了从西路包抄南宋的战略。1253 年他们征服了南诏，攻克了大理城，使得这一地区首次纳人了中国的版图。征服南宋的大业，是由成吉思汗的诸孙中最具雄才大略的忽必烈（1215一1294 年）完成的。忽必烈于1260 年登大汗位，在位共34 年。忽必烈在北京建立了冬都，然后挥师南渡长江攻古了南宋的国都临安。之后再取广州，摧毁了南宋在广州西南海面上的庞大舰队（大部分已归降了蒙古人），于1279 年彻底消灭了南宋。忽必烈在1271 年建立了元朝（"元"意为"起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以"龙兴之地"命名的朝代名称。

对于蒙古人而言，征服异域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使节和军队不断伸向东亚的边缘地区，同时和用宋朝的海军力量征伐

东亚诸国。忽必烈曾于1274 年、1281 年两次派出数千只海船攻打日本，并至少四次出兵入侵越南，五度入侵缅甸。元朝使节还从海路到达过锡兰和印度南部：13 世纪80 年代南亚有十国上表输贡。1292 年蒙古船队进攻爪哇，但胜果无多。蒙古人一心想征服全世界，忽必烈多年来数次征伐叛乱的皇族西支就尤其说明问题。他的竞争对手、同是成吉思汗孙辈的窝阔台，在1268 年发动叛乱并夺取了察哈台汗国，在他1301 年去世以前对中国的大汗一直是个威胁。

三、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蒙古人很晚才发现被征服的汉人，无论是村民、商人还是艺术家，并未融入他们的氏族社会。耶律楚材自1230 年后负责管理中原事务，他兴建学堂、恢复科举并任用汉人知识分子。但蒙古人和女真人一样，无法继续推行辽国那种简单的二元统治，于是仿照唐、宋制度建立起各个政权机构，尤其是在首都设立了六部。此外，元朝还将中央的权力分为行政、军事和监察三大部分。省级机构的变动更大，他们仿照金人的做法由枢密院直接主管各省，这一措施大大完善了中国的帝国结构。

蒙古统治者也遇到了如何按照汉人方式进行统治而同时不失掉权力这个老问题。首先，必须让汉人承认异族的统治，为此，异族王朝就必须维护地方秩序，让汉族精英有参政的机会，同时扶植儒家思想和文化来领导士大夫阶层。蒙古的官兵显然难以负此重任，因此，元初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忽必烈的领袖才能及他所推行的儒家政策及其合作者的才智。

除了语言和社会地位之外，蒙古人和他们的臣民还有很大的不同。服装方面，他们偏爱牧人的皮衣装束；饮食方面，他们喜欢马奶和奶酪。由于草原严重缺水，蒙古人没有洗浴的习惯。他们甚至没有姓氏。他们的道德准则与汉族不同— 在汉人看来，几乎是不道德的，因此蒙古妇女便享有更多的自由。蒙古人的这些异族特性，在他们与中国之外的民族和地区的接触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他们是唯一建立了王朝的纯粹游牧民族。可以说，蒙古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差异极大，在政治上更是相差很大。此外，南宋知识分子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憎恨，往往拒绝入仕，这就更进一步拉大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距

离。后世的中国史官大都把以前的蒙古征服者描绘成只知烧杀掠劫和淫逸放荡的原始野蛮人，甚至说他们体臭逼人、以尿浴身等等。

由于受到汉人的敌视，元朝的蒙古人大量任用外国人，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马可o 波罗写道："你会发现大汗并不是通过和平方式继承震旦的王位的，他通过武力征服才获得了这一地位，这样，他就难以信任汉人，而是将一切权力交给了鞑靼人、撒拉逊人或基督教徒，后者亦作为外国人而向元朝皇帝效忠，为大汗服务、"蒙古人建立了社会地位由高到低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民制度，地位最低的"南人"人数最多。同时蒙古统治者对蒙汉人民推行不同的法律，从而把他们的生活与汉人生活隔绝开来。大汗本人夏季驻哗上都（柯勒律治称之为"Xanadu ") ，其统治又在中华帝国的传统中增加厂高度专制集权的色彩。

元朝的社会生活

忽必烈上台伊始即下令保护孔庙，并很快恢复了儒家在前代的崇高地位，稍后他又免去了儒生的赋税。但在关键的开科取士问题上，忽必烈未能获得"南人"的响应。在北方，科举制度于1237 年后废行，南方亦于1274 年后废止，后来直到1315年才又重新得到恢复。元朝的官府中自然有不少汉人官吏，但身为儒生而升至高位者则寥寥无几。

由于蒙古人对外来宗教进行保护，这也引起了知识阶级的敌视和反对，在波斯的许多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中亚的蒙古人则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在中国，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和孔庙都是不纳税的。金元时期在中原还曾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教教派。这种宗教的多元发展显然是对程朱理学的一个反驳。

原先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此时又纷纷改信一种末流佛教，即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喇嘛教。据说西藏的佛教是在8 世纪时从印度西北部传入的，传入西藏后又受到当地宗教信仰苯教（Bon ）的影响，结果便产生了喇嘛教〔 "喇嘛"(lama）意为"上人"〕 。13 世纪时喇嘛教迅速传入了蒙古和中原地区，并且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扶植。

忽必烈被中国的佛教僧众视为理想的护法君主。在他的提倡下，全国的佛寺（包括著名的五台山佛地）总数达到4 . 2 万座，僧尼人数有21 . 3 万人（其中许多是喇嘛）。在儒家学者看来，尽管忽必烈推行儒家的礼仪制度，但他扶植异端外教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忽必烈

未能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相反，不同于前代的精英统治，在蒙古人建立起的世界性政权中，汉族士大夫儿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忽必烈亦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他废除了南宋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又进一步完善了赋税、徭役和政府专卖等各项制度，另外贸易也大大得到了发展。像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贾常常由海路来到广州和泉州做生意，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则经陆路到中国来开展商业活动。他们的商团不仅扩大了元朝皇帝的海外贸易联系，也给后者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人。这些内部成员相互具保的商团，在转销元朝的剩余谷物、扩大元朝的商业资本方面发挥看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在贪污腐化的元朝政权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后来元朝在全国发行纸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欧洲在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纸币的使用还大大让马可o 波罗惊叹了一番。

忽必烈将外蒙古的大汗国都迁到了北京（大都）；这里是从长城南下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蒙语称为"汗八里克"（即马可o 波罗所说的"Cambaluc ") ，土耳其语意为"大汗之城"。大都的城墙为双层建筑，城内宫室壮伟，皇城内花园遍布，有山有湖（见第208 页图）。为解决新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统治者又拓展了大运河以将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运到大都。运河沿岸以石铺地，成为从杭州到北京的骤道。骤道全长达1100 英里，走完全程需要4O 天。

忽必烈于1294 年去世后，其孙铁穆耳继位，推行强有力的大一统统治，但当他于1307 年去世之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很快就削弱了下去。元朝在接下来的26 年中换了7 位皇帝，1328 年更爆发了争夺皇位的内战。同时，由于无节制地发行纸币，纸币已不能抵作赋税并渐渐贬值。黄河又连年发大水，冲毁了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的大量良田。元朝在财政上、道德上、政治土的统治一起都破产了。

与西方的首次直接接触

蒙古帝国控制了从欧洲到中国的中亚商道，欧洲人得以直接从"震旦"〔 Cathay ，源出契丹（khitai ）一词，尤指中国北方〕 获得第一手信息，马可o 波罗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从1240年到1340 年的这100年间，是中国人和欧洲人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

一土耳其人都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元时欧洲的旅行者大多从以下几条路线到达中国：上）取道南俄罗斯、伊犁，这条路非常难走；2 ）从黑海出发，经中亚绿洲地区（即古丝绸之路），意大利商人像马可o 波罗一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3 ）从海路到叙利亚和十字军东征时创建的拉丁族国家，然后取道巴格达和中亚；4 ）从海路经印度洋绕东亚到中国南方港口，由于阿拉伯人的作梗，这条路也不好走。按照这儿条路线，不少欧洲人到达了中国，有些人还留下了旅行日记和游记。在这些书中他们都提到大汗的宫廷里有许多希腊正教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被俘的俄罗斯艺人或士兵。

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宗（即景教）在此之前已从波斯传入了中国，这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与东亚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景教在中国已经消亡，但在契丹人和女真人那里获得重兴并广泛传入回鹘土耳其人和一些蒙古部落。忽必烈的生母即是一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聂斯脱利宗在全世界有25 个主教教区，1275 年该派驻巴格达的教主在北京也设立了主教教区。聂斯脱利派虽有异端之日，它的教会却与罗马保持着联系。

同时，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正进行着狂热的十字军东征。这样，西方基督教国家、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联系。撒拉逊人为遏制蒙古人在近东地区的扩张，曾派遣使节到法国和英国寻求援助；在蒙古人灭掉帕息亚和巴格达后，他们的伊利汗曾在1267 年至1291 年之间不下7 次向西方派遣使节以求共同对付穆斯林的入侵。尽管未能达成协议，教皇的使团却终于在遥远的中国建立起以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 ，旧译孟高维奴）为首的大主教区。在大汗的保护下，他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又在一名意大利商人的捐助下修建了一所教堂，并且还培养了150 名唱诗班男童（据说大汗很喜欢听他们唱诗）。1304 年北京地区发展了以6000名天主教徒并且为他们施了洗，其中很多人都不是汉族人。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在元末继续不遗余力地来华传教，但后来却被拒于国门之外。当时来华的商人肯定远远多于传教士，但留下文字材料的只有马可o 波罗一人，他在1271 年随父亲与叔叔（两者均为意大利商人）第二次入华，到达上都和北京后，他在中国留居了17 年（1275 一1292 年）之久，在宫庭中为忽必烈做事，后于1295 年返回威尼斯。在热那亚的监狱中

他撰写了一部《马可o 波罗游记》 并献给当时的一位罗马史作家。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而是一篇有体系的科学论文，材料丰富不说。而且持论公允。（此书原搞已失，但尚存120 本意大利语、拉丁语、法语和其他语种的手抄本，各本文字颇有出入。）没有其他旅行者能像马可o 波罗那样讲述如此奇妙的一个故事；这本游记首次将中国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情况呈现在欧洲公众的面前。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因为这本书竟然说13 世纪晚期的中国不仅面积大于欧洲，而且在文化和技术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因此，"马可o 波罗"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成了"难以置信"的代名词。但他的影响一直未曾消逝。哥伦比亚就有这本书，并且还在上边做了批注。时间为这位威尼斯人做出了证明。例如，他所讲的可以燃烧的"黑石"其实就是煤炭。到了19 世纪，这本游记中记载的路线细节也得到了证实。

东亚也有一位马可o 波罗式的人物，他叫拉本o 索马(Rabban Saurna）是一名出生干北京的聂斯脱利派教士。他于1278 年穿越中亚抵达伊儿汗的宫廷，之后又被派往欧洲联络基督教徒共同对付穆斯林。1287 年索马经康斯坦丁堡抵达那不勒斯、罗马和巴黎。他见到了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并在红衣主教学院宣讲聂斯脱利派的教义，还在教皇御前主持了祝圣仪式，以此向后者表明语言虽然有异，仪式却是一样的。

元时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远远不及与西亚接触之频繁。蒙古人征服亚洲为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阿拉伯人的商队从巴格达经陆路到达北京，或走海路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达泉州等中国南方的港口。尽管大多数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人不为欧洲人所知晓，他们实际上与东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蒙古时代最为详细的游记是由伊本o 拔图塔（Ibn Batuta）所撰写的，他在1325 年至1355 年之间漫游南亚地区，在阿拉伯人的商道上旅行时，曾多次在当地娶妻成家。他自称在中国遇到了一个阿拉伯人，并几在撒哈拉沙漠上还遇到过后者的弟弟。

在蒙古的强盛时期，俄罗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l000年后，此时中国的文化开始涌人西方，如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纺织品、纸牌、医药

和艺术题材等等。波斯和阿拉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经过他们之手中国文化又辗转传入了西方。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阿拉伯、土耳其文化的很大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了根，而基督教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伊斯兰教在甘肃和云南一直都有很大影响。在泉州和广州等地阿拉伯人并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并在其首领领导下在中国生活。

元代的中国文化

尽管元时中国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和蒙古人的统治一样仅仅触及到中国的表层，像科考等传统制度未能全面发挥其作用，可是也没有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制度。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中亚人，像党固人、回人、聂斯脱利派僧侣和穆斯林，后来都成了儒家学者或完全汉化的书法家和画家。在蒙古人的主持下，元代史官编撰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此时中国学术并未取得多么辉煌的发展，但也没有衰落下去。另外，元代山水画的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随着白话的兴起，元代产生了两种新的文学样式：杂剧和小说。这两类文学作品为了接近当时的都市观众或读者，均采用了门语体的创作方式。元朝政府的浩令亦使用类似口语的文体，以便于没有文化的官员能理解浩令的意思。汉族官员由于仕途渺茫，其文学修养无有用武之地，于是他们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来、金时的北京和南宋时的杭州在12 世纪时都是戏剧创作的中心，当时创作的剧本流传至今的犹有近l000部之多。元代以后的许多杂剧都印刷成了剧本。杂剧的主题均为典型的中国风格，大都涉及感情与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的冲突。

中国的戏剧类似歌剧，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进行表演。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一样，杂剧的布景和道具十分简单，为弥补这种不足，杂剧演员创造了大量程式，通过手、眼、衣袖来表示登山、下楼或上一马等动作。剧中女角多由男演员饰演，他们的假嗓演唱，妙曼的舞姿和优雅的手势格外受到观众的欢迎。浪漫的情节，出众的演技，幽默的对活，华美的行头，再加上激烈的打斗，便形成了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都市艺术形式。

杂剧是大都市的产物，而小说却是由说书人向下里巴人讲述的故事。唐代的宝卷、传奇渐渐演化为历史故事或纯系想像的爱情、惊险故事，在说书先生那里又发展为长篇大沦、结构松散的"萨伽"(saga ）式故事。这些游方说书人的提词本便是这些章回小说的最早成文形式，后经不断加工逐渐成为早期的小说。这些话本小说多为鸿篇巨制，主人公往往为下层百姓或军人，其语方通俗易懂，' J 当时的自话f一分接近）后期的话本小说大多为文人的个体创作，不过他们往往用化名的方式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儿部成熟的重要作品大多出现于明清，但其雏型却可上溯到元朝或更早的时代。小说后来成为中国有阅读能力者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尽管正统学者对此不屑一顾，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其中蕴含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杂剧和小说在元代的兴起，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何等强大，同时也反映了在蒙古人统治下上大大阶层的没落。

第08章 明代的国家和社会

一、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明朝（1368 一1644 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这时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生活着大约1 亿人民。由明人清后产生的种种变化亦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如何大的波动。满洲人在1644 年人关攻破北京城后征服整个中国。不过这场战争及其造成的破坏，与欧洲30 年战争（1618 一1648 年）那种有组织的烧杀劫掠相比，只是小巫而已。不管怎么说，明朝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极为稳定，以至于在清兵人关后的267 年（1644一1911 年）间几无大的变更。可以说，中国在满清两三百年间是循着传统格局向前发展的。

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历史事实。此时的欧洲风起云涌，正席卷整个世界，而中国对此却茫然无知而完全置身局外，乃至进入19 世纪时，不仅在物质文明和工艺技术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都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亚长期稳定的局面带来的只是落后与贫穷，与欧洲相比不免相形见细。不过这并不表明明清两代便是历史的倒退，此间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否认。如果能更好地了解这几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应能发现不少的革新和发展。中国社会远非停滞不前，不过与西方相比其步伐较慢，程度较浅罢了。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造成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西方人自19 世纪起信奉的是进步的理想，而明清时的中国人却唯恐越过古人的雷池一步。

对汉、唐、宋的推崇同时也加剧了汉人对蒙古人的深恶痛绝。而这种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这种心态到后来逐渐发展为对中国以外任何事物的漠然态度。在逃避外界的同时，中国人日益"内转"，本国事务成了他们注意力的焦点。宋时好古的艺术风气和史学研究的兴起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从此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

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心态操纵了中国与外界交往时的做法，使之面对外界的刺激时，无论在思想上或心理上都无动于衷。这种心态与现代民族主义颇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宣扬本民族的特色与优越，是因为他们碑醉怕受到别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故而民族主义是竞争精神和危机感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思想通常由是同一文化圈子内的亚文化集团（尤其是某一方言集团）提出并以此来与其他亚文化集团相抗衡。像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各民族国家的兴起便是一个例子。与之相反，中国从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他们也许担心被异族征服，但从未想到过他们的文化会被外族文化所同化。因此，中国的仇外思想是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它在军事上弱于那些"化外之民", 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朝上国"而非亚文化集团做出回应。基于这些异同之处，我们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为"文化中心主义"，以此说明在中国人看来，构成"我"与"他者"之区别单位的是文化而非一种文化之下的国家。

造成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一直都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之下：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具有一种惊人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并非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中国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东、云南、中亚或西北地区，快马也要走一个月，其幅员之广超过了欧洲。所以，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方面人手，从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来加以解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如果罗马帝国未曾灭亡而各民族国家亦未在欧洲出现，大致便是中国这种情形。总而言之，明清两代时的中国文化与政治结为了一体，这使得中国统治者对外来事物抱有一种冷漠、有时甚至是憎恶的态度，而"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二、明代的统治

明朝的建立

元朝皇族内部的争权夺位进一步加速了元朝的衰亡：1333 年后北方连续15年发生饥荒，紧接着黄河又泛滥成灾，饥荒和水灾耗尽了国库的储粮。到了14 世纪4O 年代，几乎各省都爆发了起义。1351 年至1353 年，几大起义领袖开始为争夺"天命"的归属而一争雌雄。有的人自称为宋室后裔，有的人则利用宗教预言自称为弥勒（未来佛）转

世，其余人也利用秘密会社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该组织源出12 世纪早期的天台宗佛教。白莲教和其他反杭朝廷的组织一样，不得不秘密进行活动。

朱元璋（1328 一1398 年）是最后的胜利者。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他出身平民，但"时势造英雄", 最终成为了"天子"。朱元璋祖籍安徽凤阳，幼年失估，曾人佛寺做和尚，这给了他一个识字的机会。他曾一度靠乞讨为生，但在25 岁（1352 年）时他加人了义军。（他可能也加人过白莲教，但他上台后否认了这一点，这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明智的先例。）

朱元璋率领军队越过长江并于1356 年攻下了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附近的战略要地— 南京。在击败了长江上游和下游的其他政权后，他于1367 年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地区二而此时蒙古将领们却忙着自相残杀。1368 年朱元璋攻古了北京，但仍将国都定在南京。他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后来也一直沿用这个年号。自此以后明清两朝的皇帝均只使用一个年号，故年号往往可以代表某一皇帝（如朱元璋又称为"洪武帝"）。

其后的永乐帝（l403 一1424 年在位）也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他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早年封为燕王，后起兵推翻了其侄建文帝的统治。他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并在43 岁时攻下南京登基称制，史称"永乐帝"。

南京是太祖、建文帝两朝时的国都，城高60 英尺，周长有20 多英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永乐帝于1421 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永乐帝兴建的北京城比元朝的大都还要宏伟，主城有4O 英尺高，周长超过14 英里，沿城设有9 处重兵保守的城门。京城中央为皇城，周长约有5 英里。皇城之内是红墙高耸的紫禁城（即宫城），四周围绕着约2 英里长的护城河。紫禁城内的皇宫位处京城南北中轴线上，以白色大理石铺地，上覆黄色的琉璃瓦。当年的这些雄伟建筑，大多至今仍完好无损，成为昔日帝国留给后世的最好见证。

明代的专制统治

明朝十七帝的统治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上) 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 一1398 年）; (2 ）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 一1424 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3 ）历时100 年

的衰败时期；(4) 16 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5) 17 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二

这是明清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在明亡国后总结出的看法。他们在入清后对明朝的灭亡做了伦理道德上的解释，分析了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斗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个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个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

朱元璋在位30 年，他的统治对明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他的个性尤其值得我们研究。从画像上看，洪武帝相貌丑陋，脸长得像猪。他少年时生活很艰辛，做了皇帝以后性格孤僻而严厉。他节俭成癖，经常处于恐惧和怀疑之中，有时'还会疑神疑鬼、大发雷霆。他变得冷酷无情，常常为些细微过错而大开杀戒；〕 他在遗沼中写道："联登基三十一年来，战战兢兢代行天意，无日或怠"；这种妄想狂症状应该能够解释明朝时集权统治发展的原因吧。洪武帝是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一代雄主，所以他将大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个人作用制度化了。

洪武帝在1380 年击败了针对首相的一场大阴谋后，废除了前代的中央统治机构中书省。自此皇帝可以完全为所欲为了。制度上的变化使明清两朝的统治更趋专制独裁。洪武废除宰相一职而代之以"大学士"，后者处理每日的奏章、公文（往往一日上百）并代草御批。"大学士"一职渐渐形成制度，地位在六部之上而类似一种皇帝的内阁，但他们只能奉皇命行事，自己手中并无实权。

后来另外有种人攫取了极大的权力，这就是宦官。洪武帝曾严禁宦官干政，并在宫里立了一块3 英尺高的铁牌，上书："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他对宫里宦官的人数、品级、职务、衣服式样都作出了规定，不许他们处理奏折，有言及朝政者一律斥退，并且规定宦官都必须由不识字者担任。不过，宦官终究是所谓"内朝"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皇帝以此来防止后宫出现丑闻，但在宜官呵护、教育下长大的幼主经常会宠爱、信任身边的宦官，这样宦官在宫中的职权便有扩大之势，其影响也渐渐渗透到了整个朝廷。1420 年宫中为宦宫建了一所学校。

此时宦官的人数已有数千之众。他们成立了"东厂"，只向皇帝负责，主要负责搜集政府官员的秘密档案。事实上，他们成为朝廷之外的又一秘密机构，与今天的情报特务机关不无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宦官是宫中之人，不大可能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党营私，而且他们完全依赖他们的主子，比百官更有接近至尊的机会，因此深受皇帝的依赖，常常出任钦差甚至监军，或出京督察各省政务。有明一代，宦官与大学士之间的权力斗争（即所谓"内朝"与"外朝"之争）经常发生。

皇帝之乾纲独断还体现在"廷杖"制度上。洪武帝曾效仿元朝的做法，当众用竹杖责打犯过失的官员。在太祖在位时曾有12 位官员因被怀疑在贺表里用双关语诽谤当朝而遭此羞辱。这种做法违背了孔子"刑不上大夫"的古训，故有明一代虽然大捧四书五经，实际上却违背了经书的精神。

朋党之争是明朝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皇帝的最高权威和官员的党争主要发生在朝中，在地方各级政府，社会秩序稳定之时，皇帝的最高权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行使。

政府的结构

明代统治者承袭了前代的政府结构：首先是六部等部门主管下的民政官僚机构（布政使司）；其次为中央领导下的各级军事机关（都指挥使司）；再次为独立的各级监察机关（提刑按察使司）。在西方人看来，都察院也许是二者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部门。京城的都察院有110 名御史，此外，各部也都设有相应的监察机构。御史们往往由较为年轻而且品行端方的下级官员充任。通常侮年一次派他们到各省督查司法和礼仪、钱粮与库校并受理官员们的报呈和百姓的申诉。他们有权面见皇帝，弹劾其他官员或指责皇帝本人（这往往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权力很大，但任满九年后大多调职外任，所以他们也与普通官员一样要看皇帝的喜怒行事。"御史"一职既非终身职务，又有"批逆鳞"的危险，这些"皇帝的耳目"实际上与普通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关心头顶上的乌纱，同样依赖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价，有时也不免收取贿赂或受到其他官员的威逼利诱。明清两代的这种三分结构与近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颇有相类之处。自1928 年以来，

中国的统治机构一直是由党、政、军这3 部分组成，执政党好比当年的皇帝，与军政各级机构平行的党的各级机构则起着类似古代都察院或御史台的作用。这种中国式的"二三头政治"并非美国式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我们不妨称之为"统治的平衡"：军队保证了政权，民政部门开展政府工作，而纪检部门（还有宦官）则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明朝时全国分为巧个省，后来到清朝时发展为18 个省。省下设了159 个府、234 个州及1 171 个县（清朝时发展到283 个州及1470 个县）。根据回避制度，地方各级长官均不得由本省人担任，以防询私舞弊等事件发生。地方官员由下而上分别为知县、知州和知府。再往上为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这样各省和京师一样分别由行政、军事、监察三大机构组成，而各省的总督或巡抚则作高级地方长官而总揽协成一省的事务。另外，省级政府亦受到巡按（由监察御史出任）的监督。

明朝军队是从太祖时期的"卫"发展而来的。每卫5600人，下分5部，由职业军人组成。1393 年，兵部下设493 卫，隶属五军都督府，分驻中亚边疆、沿海、大运河洽线及京师等战略重地：这样，"卫"成了独众于地方政府的戍军。在役军人的职位是叶袭的，并目．分配有田地，士兵可以自耕自食：但在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社会中，这支空前庞大的军队也象辽、金、元时的军队一样，渐渐失去了战斗力：。

各省的行政机关和朝廷一样在草创之后渐渐定型。如"道台"衙门即是一例。道台起初只是分管地方食盐专卖、治安、风俗、治水等事务的官职，但到后来便成为省以下、府或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道"也成了一种介乎"省"、．'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巡按制度也是这样。当初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到某一地区检查当地的行政情况，以此来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明代中叶以后，便产生了"巡按"一职，其权与总督相体，通常负责管理两省的事务。

土地、人民与税收

明朝对土地和人民加强了控制，将全国土地和人口情况都详细地登记在册。根据1393 年的户簿档案，当时人口已达1000万户，计6000万人。这一数字与汉朝人口大致持平。由于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计，1393 年时的中国人口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393 年的土地档案

表明当时有耕地1 . 29 亿英亩，还不到近代土地使用面积的一半。各处土地均按土质、肥力分类，并以此收取不同的赋税。

明代赋税制度袭用8 世纪时的两税法，分夏秋二次(8 月与9 月）收取去冬早夏及夏秋收割的粮食（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水稻）二另外政府也垄断了茶叶和食盐的买卖。明代继续发行纸币，但同时规定纸币不能兑换成铜钱或银锭，因此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而不得不于1450 年废止使用。

明朝将各户分为3 、5 、9 个不等的档次，规定每户必须按登记在册的16 至60岁男丁的人数服各项劳役，其中一种为负责当地的赋税及公共建设，即所谓里甲制。理论上，每l00户为一"里"（村），各里中的10 户大族监督其余百户的年度劳役（"甲"）。一般每户大族负责10户人家，以10 年为一周期。因此，"里甲"制度便与"保甲"制度有些不尽相同的地方。另外一种需要男子的制度是到衙门应差办事。其他类型的劳役，如戍卫边镇、保卫地方等等，亦不在少数。

明代的法律制度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并于1397 年首次公布了行政法与刑法。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明初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当时统治者自诩有权组织、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对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各省总共大约只有2000个主要机关。把一些青吏也算上的话，清朝直到1800年也总共才有两万来名政府官员。如果说这么少的"满大人"（欧洲人对中国官员的称呼）竟能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阶级）的辅助之功功不可没。

三、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科举制度

在明代汉人结束了异族统治之后，又恢复了唐、宋时期的衣冠制度。这就大大提高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三个级别进行：首先在县里举行童子试，考中者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府试，考中者为"秀才"，算是已经取得功名，可以免交赋税、免服徭役、不受体罚。秀才们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例行考试斥去一些不合格者。再上一级考试为各府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考生们在科场号棚里挥毫作文，考中者为举人，中举率大约为1 ％—2 ％。中举者可

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师举行的会试，考中者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后即获进士或同进士出身，这时就可以担任官职了。

朝廷也允许某些人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进入仕途。如高官的子孙可以享受父祖的余荫而世袭功名甚至官职。另一个途径就是用钱捐买功名。在这一点__仁明清两朝和前代做法一样，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增加朝廷的收人。通常捐官者只能得一虚衔，并不担任实职，这样他虽身列缙绅，却未步人仕途。因此，尽管一些有钱人（主要是大商人和大地主）可以通过捐官进入士大夫阶层，"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仍然受到最高的尊敬。捐官因此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使得一些并非文人的热衷功名者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另外也为政府（尤其是国格匾乏之时）提供了财政收人。19 世纪时，获得举人以下功名者有上/ 3 都是用钱捐买来的。

一般来说，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大部分的官员人选，亦成功地网罗了国内的精英来为国家服务。各县、各省的中榜人数都有限制，这样可以保证各地的均衡。考生的试卷有时请抄手另行誊写并隐去姓名，这样在阅卷时就可以防止循私舞弊的现象发生。在省一级的乡试中由朝廷派人监考。科举是由礼部而非户部负责的，后者负责为进士授职委任等事。；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遴选程序的普遍性与公正性。

科举考试有个缺点，即只限在经过宋儒（如朱熹）评注的四书五经之内出题。出于对经典的热情，明朝在1487 年规定了以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 个字，骄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明朝为考生设立了"官学"，各县、府也都奉旨设立一了该类学习机构。其主要功能并非是教学或寄宿之用，而是招收学生并定期举行考试。真正的求学生涯始于家塾，在官宦人家尤其如此这样学生不仅叮以直接向父辈请教，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动力与榜样二明清两代的启蒙读物是《 三字经》 ，该书产生于13 世纪，通过合辙押韵的三字句，将一些最纂本的知识与教诲浓缩在365 句话中。其中开篇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概括了孟子厂'为后人接受的"性善"说（这种观点对于信奉原罪说的四方传教士而言，曾是一道严重的理解障碍），因此，童蒙在识字之初也就被灌输以儒家的思想。

学术

明代的最高学术机关为翰林院，其中各位翰林都是进士出身的百里挑一的大学者，并常常担任应制草浩的重大任务。明代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即主要在这一儒学堡垒中得到体现。此外，全国还有三百来处私人书院，均仿宋制建造，是学术研究和论辩以及编撰图书的中心，通常由高官巨贾襄助举办，有些甚至还得到朝廷的提倡和扶植。书院中有不少享受免费待遇的学者和儒生，并且形成了一些图书馆。翰林院有时亦刊行学术著作并保藏印刷著作的雕版。

皇帝对文学艺术的奖掖和提倡，是他巩固自身作为国家和儒家文化领袖之地位的重要手段。这种风气始于1407 年，这年《 永乐大典》成书二《 永乐大典》 共有11095 册，囊括了前代关于历史、政治、伦理、地理等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该书由2000余名学者编辑而成，由于卷帙繁浩因而无法刻印。今天保留下来的不到400册均系手工抄写而成在此之后的200年中，在朝廷、官员和学上及家族的襄助鼓励「，刊行了大量了书籍，J 铆手，包括玄篇巨制的类书、卷帐繁浩的专一著文章及各式各样的纯文学创作，这一盛况足以与同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学相配。如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费时26 年编撰而成的《 本草纲目》，其中收录了近2000种动植物和矿物药材，列举出8000多个药方。这本医典成书于1578 年，但已经谈到接种疫苗以防治天花及今天仍在应用的一些医药用品，如水银（汞）、碘酒、大风子油及麻黄等物。

另外一种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开工开物》 亦于1637 年成书。该书作者为宋应堪，书中介绍了种稻、制丝、煮盐、制陶、开矿一、用煤、造纸、铸造兵器及其他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井且辅以大量的图解。学术的繁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明朝建国以来，两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社会物质经济的繁荣：农业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贸易与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亦随之而繁荣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书籍的刊行问世，更为普及的教育和更为精致也更为民主的都市文化，从这种文化中又涌现出更多的学者和官僚。不过，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亦日趋严重；为了维持统一的社会意识并确定学者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儒家学者们想出相应的对策。

明代哲学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阳明(1472 一1529 年），其思想甚至在日本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仕途得意，提倡一套"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而与程朱学说相对抗。他创立的"心学"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学说，认为"心明便是天理"，"心"与"理"为同一实体。这种思想与禅学颇有相类之处，可以说"心学"是王阳明在禅学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叛，因为他将重点放在了冥想与直觉认识之上。这样，朱熹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就得加以修改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的论点，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而"致良知"就需要静思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二但儒家所云的"修身"并不是像佛家一样要去除一切人欲，而仅仅是去除人欲中的"私欲"，而后发挥人本身具有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将之发挥为"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点。这种观点一直被后世的中国和日本奉为圭桌，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缙绅阶级

有明一代共产生了2 . 5 万名进士，获得进士以下功名的人则大约有50 万名之众。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绅士"，大约与英文中的"gentry"一词同义，但后者内涵更为宽泛。"gentry" （绅士）一词既可指一名绅士，也可指整个绅士阶层，并且有时带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内涵，因而词义比较模糊。严格说来，中国的绅士多指获得功名的个体。不过，由于在中国家族优先于个人，的确也存在着所谓的缙绅门庭（如该家族中有些人获取了功名）。而个人则在获得功名后方可列身缙绅。不过，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里，土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经济支柱，地主兼绅士的家族比比皆是。获得功名者与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又重叠在一起的。

儒家政府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因为在地方上缙绅义务履行了许多公众职能。他们通常居住在城镇中的深宅大院里，但与地方政府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大的势力。作为地方上的要人，他们须负责许多在今天是由官员来办的事务，如筹款、监工等等。另外他们还负有维护道德、修缮当地孔庙和演习儒家礼仪的责任或兴建学堂、书院、编撰地方志，荒年时他们还得开仓贩灾，政局混乱时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训练兵丁。在这些事务上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认可，但并不能担任实职或收取报酬。这与其他类型社会中的某些

阶级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古罗马的骑士阶级，现代美国的商人阶级，他们都是作为非官方的集团而发挥着地方领袖的作用：

与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为此目的，儒家的教条在孔庙仪式上一再宣讲，天子本人也一再发布道德训令。明太祖御制的六条训诫在1397 年颁布到了每一个村庄，其中讲到百姓应该孝敬父兄祖先、教导子孙、安居乐业云云。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尽管缙绅不等于世袭的门阀，但他们确实形成了一种精英集团，因为获得功名者及其家属不到总人1% 的2 %，但他们却拥有下级官员都不具备的最高社会权威作用。

四、对外关系

外邦进贡制度

明太祖登基后立即着手重建帝国与外邦的联系。他向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真腊、西藏等地都派去了使节通告中国皇帝的登基。这些国家很快也遣使进贡，另外一百来年以前蒙古曾征伐过的一些国家也从海上商道遣使来朝。

这种"天朝"与"外邦"君主之间的宗主一臣属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即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国家，而且也是别国的父执、外邦文明的母源。贡使们不单单要叩头称臣（"三跪九拜")，这种进贡制度亦包含了国家关系的另外一些方面，如互遣使节、不断往来、归化或"引渡"、管理中外贸易，尤其是在中国方面，通过威胁、利诱或怀柔外邦及其统治者来达到自卫的效果。简言之，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纳人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国内的儒家社会秩序扩大后照搬到外界中去罢了。外邦君主们通常在中国朝中获得一个职衔，中国方面还会赐给他符印在该国公文中使用，而这些公文自然都奉了中国朝廷的正朔。中国的"天子"对外邦的统治则饱着一种父亲般的关怀态度，确认该国的新主，有时也会发兵帮助外邦抵御外敌，还常常在两国交易中做出让步，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向"番邦"提供教诲与训诫。这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做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措施：外国君主如果想与中华帝国保持联系，他们就必须接受后者的条件并承认中国天子

的普世权威。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进贡则是为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制度和其他宏伟的设想一样，其实际执行状况并不理想，但中国的史书（至少在记载中）对外邦进贡往往还特意提到一笔，使之显得格外重要。但进贡者自身往往却并不作如是观。

进贡制度具有多种功用。为了使'日本国主"约束本国海贼不再骚扰中国沿海港口，明太祖在1369 年至1372 年间曾3 次遣使到日本，百般劝导（像许诺发还被俘楼寇或下旨威胁日本国主），也曾派遣僧人出使日本，但最终毫无结果。日本海贼继续侵扰东南沿海。尽管日本也遣使进贡，但他们并下打算臣服或放弃本国的主权。洪武帝曾下旨责骂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大将军，中有"蠢尔东夷，僻处海隅… …不服王化，任尔下民胡作非为"等语。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天地恢恢，不为一人而设"。

在进贡活动达到极盛的永乐年间，日本曾在短时期内表示臣服；但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却认为这不过是垄断对华贸易的一个手段罢了。1403 年永乐帝在沿海城市重新设置了曾于1374 年废止的市舶使一职，并修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释。日本一度每年都遣使来朝。明朝和前代一样，将编号的关书发送给各进贡国的国王。外邦使团来华进贡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上岸，其船只、货物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现定，上岸后则凭其关书进行验证，以防止冒名顶替者混入。从1433 年到1549 年，日本曾11 次大举遣使来华，每次都有儿一百人之多，均从宁波验证关书后进京朝贡，这样日本的幕府将军垄断了本国商品的专卖权利，中国方面则可以防止海盗混入使团：但是问题亦随之而起：日本国内的商业竞争者亦希望获得正式的关书，大量日本浪人也流人了中国，而在北京，关于商品（包括数百吨的铜、硫磺和数以千计的楼刀）价格的谈判也是旷日持久，难以达成一致。使团成员往往还自带商品来华进行私人性质的贸易，此外，似门同幕府大将军一样，还能得到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海上远征

永乐帝有一宏伟计划，即将南亚与东南亚诸国都纳人朝贡的体系之中。不管其动机到底为何，他曾于1405 年至1433 年7 次遣使出海远征。这7 次海上远征都是在一名同族太监郑和的率领下进行的。郑和原籍云南，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是与南亚穆斯林统治者打交道的合适

人选。郑和首次"下西洋"(1405 一1407 年）时出动了62 艘大"宝船"，随行人员达2 . 8 万人，最远时曾抵达印度。第二次和第三次出海也到达了印度，第四次（1413 一1415年）曾抵达亚丁湾及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第五次也到达了亚丁湾。第七次航海（1431 一1433 年）时随行人员有275 的人，再次到达霍尔木兹海峡。郑和的船队曾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地区，中国的瓷器和钱币在此儿百年后尤可见到。另外有7 名中国人还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的破天荒头一次。明朝的船队在葡萄牙人于1498 年到达印度的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到达了印度洋地区，比西班牙的无敌船队于1588 年进攻英格兰亦早了150 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映了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下西洋的"宝船"体积十分庞大，有的长度超过400英尺，船身上下有4 层甲板，内有12 个防水密封舱。他们在航海中使用罗盘和详细的航海图。通过7 次下西洋，中国海上贸易的势力不仅渗透到东南亚沿海地区，也扩大到锡兰、印度南部沿海地区以西亚、东非等国：除了越南、逞罗等属国外，郑和一行还访问了约50 个国家和地区，将其他一并纳人了朝贡者的行列。霍尔木兹和非洲沿海国家的使节曾4 次来华，孟加拉人有11 次来华朝贡，苏门答腊和锡兰的国王则被解送入华。郑和一行还将鸵鸟、长颈鹿（中国人认为这就是麒麟）带回了中国。

这些航海成就反映了一个王朝强盛时期的活力与朝气。对于郑和及其同事而言，航海带来了冒险、名声可能还有利益。谋求商业利益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中国人在此之前就开辟了海上商道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区。另外一个原因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力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中华帝国的朝贡附庸。为什么不与之进行海上贸易呢？元朝皇帝其实已经有过这样的设想，而中国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也正蕴含了这一观念。

但"郑和下西洋"很快就戛然而止且再无下文，这使后人对明朝航海活动的动机产生了种种猜测。航海耗资巨大可能是一个原因，尤其在当时明朝正与瓦刺人交战，营建北京城同样也急需用钱。郑和的出海确实是种奢侈的冒险，除了声势浩荡并带回些奇谈异闻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商业利益。另外，由于这项活动是由宦官主持的，因而受到士大夫官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永乐帝的这次伟绩在史书中也只是

轻轻一笔带过而已。由于中国的统治理念和官方政策与海上扩张素来无缘，因此明初的航海活动就显得格外具有戏剧性的色彩。其扩张能力与实际成果，以今天的世界贸易与海外扩张实践来看，中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建立在广州、厦门、泉州和宁波的渔船和商船基础之上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一直保持着稳步的发展。当时的中国几乎可以成为称霸东亚的海上强国了，如明朝舰队的航海技术与后勤服务水平已足以将大量的军队或货物运往东亚海域的任何一个地区。但1433 年之后，这一发展的萌芽就被扼杀了。永乐帝之后的明朝皇帝无一人是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式的航海爱好者，而明朝也与当时的葡萄牙不同，对航海缺乏持久的兴趣不说，也未能抓住发展海上力量的机会。郑和的航海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仅仅只是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冒险壮举。

明代的反商业思潮

中西航海的这种差异有助于说明中国社会的特征。郑和的生活时代和航海壮举比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航海家，如德雷克船长（Sir Frallcis Drrake ），要早150 年，而当时中国统治面积和商业水平也都超过了整个欧洲。，然而，中国并未发展为一个海上强国，东亚海域乃至中国沿海的一些港口反而先后受到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美人的控制，而从中崛起的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最终更是迫使中华帝国割地赔款乃至最后土崩瓦解。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和显贵，也缺乏后世欧洲商人航海家的冒险动力，甚至在横穿印度洋之时，他的权力和进程都受到皇帝的遥控。郑和可说是一名组织者、一位领袖、一位外交官和能干的朝臣，但他不是一名商人。从他的航海活动中并未产生出像弗吉尼亚公司或东印度公司那样的组织来开拓殖民地或创建海外殖民政府。当时已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地区，当地的中国人人数也会超过该地的欧洲人，但中国政府对海外商机和建立殖民地竟然毫无兴趣。明清两代的收人主要来自土地赋税而非商业税收。对于当时方兴未艾、即将席卷全球的商业革命，他们可说是一无所知。若想了解这种反商业思想，须从制度、经济、意识形态和战略几个方面来入手。制度方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当时中国的势力局限于内陆地区，官僚阶级最初是从

征收赋税者发展而来的，他们扶植农业，并依靠农产品来维持个人及国家的生活。在这种农业官僚社会里，商人的地位低于官吏并且为后者所利用。〕由于中国一向自给自足，故经济方面的重点也是放在国内而非国外的商业发展上。）但是，为什么在经过唐、宋、元时期的商业发展后，明清两代却退回到古代的重农传统思想中去了呢？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理学思想（如继承古代轻视商业的传统）更是束缚了商业的发展。外贸方面的事务由大太监来经管，这就使得士大夫们更为憎恶商业。另外，明代政府致力于防止蒙古人复辟，可能也牵制了商业的发展。

蒙古问题

明太祖推翻元朝政权后，肃清蒙古势力一直是明初对外关系中的重头戏。明太祖并不想征服蒙古各族，只是想瓦解蒙古各部后削弱其军事威胁。甚至在明朝统一中国之前，明军就越过大漠追击那里的蒙古军队，并两次攻古喀拉昆仑。蒙古酋长战败后向明军求和，获准留在北疆并接受了明政权的封号，获得一与明朝发展边贸等一系列好处。通过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中国终于与内蒙古的半游牧民族结为盟友以共同对付外蒙古的游牧部落。

在中亚的察哈台，成吉思汗最后一个伟大的继承人，征服者帖木儿（欧洲人称之为Tamerlane , 1 336es 一1405 年）于1369 年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以首都撒马尔汗（Samarkand ）为据点，向四处疯狂发动战争，入侵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击败了南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甚至一度入侵印度北部地区。帖木儿与中国朝廷有些往来，一度还野心勃勃地想征服中国，曾率兵20 万东征，于途中病死后（1405 年）才罢兵。他的去世标志着蒙古时代的结束，自此蒙古人失去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对附近各农业文明也不再构成威胁。统一的中亚终结后，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亦随之而告终了。明清两代时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完全被隔断，而蒙古各部则越来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蒙古于15世纪早期分裂为东西两部：鞑靼人和瓦剌人：中国的战略是挑拨他们内部发生争斗，然后坐收渔利。永乐帝就是靠着当年北上追击蒙古人并且在他们内部获得盟友而登上权力舞台的，他于1403年篡位登基后，又5 次御驾亲征，越过大漠追击蒙古各部。1410年，

永乐帝发动一了一支10 万人的大军，包括3 万辆粮草轴重，在气势上震慑住瓦刺人之后，又以卑词厚币买通后者越过克鲁伦河击溃了醚栩人的军队。而瓦刺人于l414 年向东打一张时，永乐帝又挥师越过克鲁伦河击溃了瓦刺人的军队。在这两次战争中明朝军队都使用了火炮。不久鞑靼人又冒险南下，水乐帝征兵23．5 万人，粮草轴重11．7 万车，毛驴34 万迎战入侵者，但鞑靼人不等交战使向西逃窜而去，后来明朝于1423 年、1424 年两次发动的征伐也是追赶不及，无功而返。永乐帝迁都北京，这已经说明明朝政府对抵抗蒙古人的入侵是何等重视了。边防问题是明帝国的战略重点，而北京正处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咽喉要道，与长城相距还不足40 英里。这个地方曾被辽、元、明、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作通向中亚的根据地，而定都南方的政权或是偏安一隅，或是出于发展海外贸易的考虑，像南宋时的杭州，明初及太平大国（1853 一1864 ）、1927 年后国民党的一首都南京。北京远离中国人「！和生产的中心地区，易受游牧民族的侵害，而且严重依赖长江下游地区的产粮，但它却成为中国好儿个政权的首都，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这绝不可能是巧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首都必须同时也是亚洲腹地非汉族地区的首都。"蛮夷"们始终是中华帝国军事和政治的有机组成，结果中国的首都自然就要向边境移动了。

明军远征蒙古各部，也是为了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消除其对中原的威胁，）例如，瓦刺人于1408 年起开始向明遣使进贡，这实际上是明朝花钱买来的和平。他们儿乎每年都遣使来京，每次人数高达二三千人，其中包括数百名来自中亚的商人。就像今天到北京的文化代表团一样，他们从大同进入中原后，地方官员必须为之提供住宿，因为朝贡使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瓦刺人向朝廷进贡土特产和马匹，而他们又从皇帝那里获得绩罗绸缎等赏赐。京城朝贡事毕之后，市场上会举行儿天的自由贸易。在这种有利的交换条件下，"蛮夷"仁往往也就默认了"三跪九拜"这种传统的朝仪。在中国方面，尽管有游牧民族的归化来朝，同时却也不得不忍受他们在沿途时的胡作非为以及在京期间的酗酒闹事。对于蒙古人而言，进京朝贡充满了魅力，意味着发财（如随团人京的穆斯林商人须向他们交纳费用）有许多进贡者自称来自远方的属国，但实际只是些商人。《 明会典》 中列出38 个西方属国，他们一般取道哈密进京朝贡，其中如小亚细亚的拉姆国

晚至1618 年还曾向明廷进京朝贡。在明朝看来，进贡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因为这就意味着边界上的相安无事。

到了15世纪30 年代晚期，正当明朝的航海活动进入尾声之时，亚洲腹地的边境上又重新出现了蒙古人的势力。瓦剌人的一名新领袖占领了哈密后又将势力东扩到朝鲜，l449 年还在长城沿线制造事端，并且不再遣使来朝，还率兵进犯大同。此时在位的明英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太监之手，在心腹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明军为瓦剌人所败，本人也被敌军俘虏而去。瓦剌人进而逼犯北京，但发现明朝大臣已拥立了新君并且严阵以待，于是围攻几天之后便撤去了。次年他们送还了被俘的明英宗，同时也恢复了先前获利甚丰的朝贡活动。

在此之后100 年中，中蒙之间边境纷争与遣使进贡一直交替进行。1550 年，东蒙古人的首领阿勒坦汗(Altan ）纠集了一支大军，从东北部跨过长城，在京师附近烧杀抢掠了几天后才撤军离去。明朝的边防设施，如长城、烽火台、屯田部队，由于受到边境上敌军奸细的破坏，简直不堪一击。那些内奸还帮助阿勒坦汗建立了定居性的统治制度。阿勒坦汗在长城以外、大同西北的归化建立了国都，但最终于1570 年接受了明朝政府授予的"顺义王"封号，边境上暂得相安无事。不过，在满洲帝国崛起之前，蒙古的游兵散勇一直侵扰着中国的北疆地区。

与日本的冲突

为了维持蒙古和日本等国的朝贡，明政府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在15世纪中期以后就渐渐放松了这一要求。外邦来朝时贸易收人远不足以抵销接待、赏赐外国使臣及商人的支出费用。东南亚的朝贡次数越来越少了，只有琉球国的使节还每两年从海上来朝一次，实际上是充当了中日贸易的二传手。在这种国势渐衰、边界纷争不断的情况下，葡萄牙人于1514 年首次人华，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又一起升级了的海寇入侵或强行攀扯关系的一宗外患罢了。

早在英国绅士们于伊丽莎自一世时的海上冒险前一个世纪，日本人已经凭其海上军事力量而大肆进行海外冒险了。日本人正像英国的德雷克或霍金斯一样，同时使用贸易和抢劫这两手政策。日本人的大海船可容纳300 人，登陆后这些"屡寇"就出其不意地抢劫财物、人

质，洗劫一空后又乘退潮时撤走。不过，这些"楼寇"中也有不少中国人。但与为蒙古人效忠的汉人谋仁不同，这些人本身就是海贼和强盗）到了明代晚期，入侵的"楼寇"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是中国人了、〕对此明朝采取了"禁海"的政策，这反映了具有农本主义思想的明朝政权对于海外贸易的淡漠态度。禁海令一下，水军官兵为谋生计不得不进行走私或海卜抢劫等活动。海盗的骚扰在1550 年后实际上演变成为侵略战争，他们以舟山群岛为根据地（l840年后该地又成为英国军队的基地），于1552 年入侵浙江，有时甚至还顺长江而上侵入内地。为了自卫，明朝政府派出军队去围剿、招安据守舟山老巢的海盗。但海患仍是有增无减。日本只是在16 世纪末本国政权重新统一后才渐渐放松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不过，日本统一之后却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军事威胁。

明政府通过朝鲜和本国间谍得知了日本意欲侵略中国的意图。当日本于1592 年入侵朝鲜时，明廷发动朝议，讨论到底是从南方省份派出船队攻打日本，还是出兵朝鲜，或是与日本进行和谈。最后朝议决定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同时也是为了保卫满洲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出兵朝鲜。但中国军队直到朝鲜半岛全部沦陷后才跨过鸭绿扛，并于1592 年夏攻打平壤，战败后又与日军进行谈判以赢得转机。1593 年明军偷袭了日军，将他们赶出了平壤后又进军汉城，但明军在那里中了日军的埋伏再次败绩。明军骑兵的短刀不是日本步军的倭刀、长矛及火炮的对手。接下来又是谈判和没完没了的小规模战斗，直到日军1598 年（日本在此前一年发动了第二次侵朝战争）撤出朝鲜才告结束。明政府为援朝花去了1000多万两白银，第二次援朝也用去了与之大致相当的费用。朝廷为了对付蒙古人和重建北京城，财力已趋枯竭，两次入朝作战更是雪上加霜，奄奄待毙了。当时有一支"蛮夷"崛起于东北，他们马上就要取代明朝的位置了。

五、明代的经济

经济的发展

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时，我们必须时时区分中国的帝国制度以及中国这个国家本身。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明代的反商业思想及国力衰竭的原因，但当我们把晚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我们却发现明代社会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口、耕地面积、外

贸总量、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乃至纸币的使用等等。明政府必须把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西方人称之为"贡粮"）运到北京。山东一带的海上运输受到楼寇的阻隔，而且运输成本也太高了。于是永乐帝又扩建了忽必烈时代开凿的大运河副线，即山东西部的济宁段运河，并设置了15道河闸。运河上常年运行着3000余艘浅底的运粮船，至于海运粮道自1415年后就完全废置不用了。但是在运河粮道上运粮的沉重劳役负担还是落在了农民肩上，因此永乐帝的继任者就将运粮的任务分派给各地的驻军，这样驻军的人数也从12 万人增到了16万人。从1430 年起，每年通过运河北运的粮食达300 万石以上（约20万吨），有时甚至高达500 万石。

南北间的商业贸易也在京师和大运河的发展下带动起来了〕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商业同样获得了发展。例如，当时徽商遍布天下，所谓"新安贾"即是。他们从事各种生意，如贩卖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各地的茶叶和丝绸、食盐、木材以及食品等等。他们亦顺理成章地与当地官府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需要获得官方的保护：

随着市场的扩大，手工艺制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时甚至达到大批量生产的水平。景德镇的官窑为皇宫及官府烧制了大量瓷器，有的还专供出口。这种瓷器的原料是高岭土，在l400℃ 高温的烧制下就变成洁白、透明、高硬度的瓷器。景德镇的瓷器在当时制瓷工艺尚不发达的欧洲，确实是无上的珍品，因而被欧洲人尊称为"中国器皿"(Chinaware)。同时，苏州亦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附近的松江地区则是晚明时期棉纺织业的中心，当地人利用外地原料进行加工后，再将成品返销各地。广州的铁锅亦畅销内地、海外以及中亚地区。

国内商业的发展促进了16 世纪众多行会的产生。各业行会在北京等都市中均设有会馆，主要用于招待同乡的官员或商人，这样人们在外地（尤其在京师）也能很方便地进行交流或者得到帮助。

同时，晚明时政府与朝贡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也稳定地发展了贸易。东亚和东南亚诸国进贡的次数越来越少，但赴海外经商的中国人却多了起来。简言之，此时的中外贸易不再由阿拉伯人来中介操纵，而是由中国商人直接将货物销往海外或从海外夏回商品行销国内。政

府对此并未采取什么鼓励措施，相反有时还明令禁止，但这种海外经商仍是有增无减。

一条鞭法

传统的土地赋税制度和劳役制度在16 世纪逐步得到改革，一般折成银钱计算，并将众多赋税合并起来一总交纳。这就是所谓的"一条鞭法"。

当时由于地方上的弄虚作假，土地、劳役制度已是弊端丛生。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谈到的，明初时曾将上地、门第分为若干等级并且根据情况每年都要重新评定。每个人应交的赋税则首先按其等级分摊。不过，负责这一工作的豪门富户却乘机窜改簿册以逃避赋税和各项徭役。他们通过勾结或贿赂官府，降低自己的税等，从而将负担转嫁到当地的穷人头上。作弊的方法多种多样，如隐瞒族中男丁的人数、抹去官府账册中的土地记录、将土地记在本人的奴仆或佃户名下，或以私田冒充公田、平民充作官衙中人等等。由于豪门富户享有种种特权，有些人家常常寻求富户的保护，将自己的田产转到富户名下，交纳一些"保护费"以逃避沉重的赋税。结果，官方的账册在几十年后变得毫无实际意义，赋税制度则由于以强凌弱而变得混乱不堪。税收不足，朝廷蒙受了损失，而下层的农民则受到更为残酷的剥削，但豪门富户及经手官吏却因串通一气而中饱私囊。由于这些乡村的中坚阶层中产生了不少有科举功名的人，因此他们就越发成为"地主加绅士"的统治阶级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使这种局面更趋恶化。土地古有的方式十分复杂，如某甲拥有土地，但其使用权却可能属于某乙，而某乙可能又将使用权转包给某丙，以此类推，不一而足。佃农制度也是五花八门，而劳役费用更是千变万化。劳役主要视男丁人数多少来分摊，各地因需求多寡及大户的操纵又各不相同。制度越来越腐败，而农民的劳役负担却越来越重；于是往往有整户、整甲乃至整里逃亡的情况发生，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其他农民的负担。最后，由于越来越多的赋税都折成银钱交纳，征税人便想尽一切方法征收额外的苛捐杂税，包括免役钱在内。其结果，农民在无法无天的税吏催逼下，每个季节都须交纳多如牛毛的赋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赋税制度的正常运行，各地一筹莫展的官员逐渐采用了"一条鞭法"。（此时为1522年至1619 年，即明政府陷

于瘫痪的前一阶段。）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折合各种赋税一总交纳，二是赋税都折成现银。其根本性的措施是简化土地的等级，先前上百种等级只剩下了二三种。另一项措施是将三五十项土地税种折合为二三项，劳役也是照此办理。其次，这二三项赋税、劳役又再汇总成一项，最后，交税的日期和管理机关也统一了起来，这样基本上就防止了各种弊端的发生。

实施一条鞭法后，朝廷的财政状况有所改观。但这种改革只是通向现代税收制度的一小步。在此之后，明朝政府开始向民夫支付现银，各地政府亦无需将贡粮运往指定的官仓了。此外，一条鞭法还废除了先前由乡长、里长代收赋税的做法，改由衙门税吏直接征收税银并发放回执。

晚明一变前代以实物代租、代役的做法，改而征收现银，这种货币化方式与上文提到的经济强劲发展和海外自银的流人是密不可分的。

六、明代统治的结束

即便我们能够体谅历史学家们身上的人性弱点（他们总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出为己所用的证据），我们仍然发现晚明具有一切前代衰亡时的主要症候：无能的统治者、宠臣弄权、党争、国库枯竭、大灾频繁、起义连绵不断，最后是外族的入侵。这些症状在明末显得尤其突出，因为它们是在万历朝的大学士张居正（1473 一1582 年）实施变法后出现的。张居正与外朝关系不错，对年轻的万历皇帝也很有影响。他曾清查土地以增加土地赋税的收人，又下令限制皇亲国戚和官员们的特权。但他费尽心机，还是难以满足皇帝的贪欲。张居正于1582 年死后，万历皇帝又统治了38 年（1582 一1620 年），其间完全蜕化为一个不思进取的昏君。他终年不见朝臣，也不履行皇帝的职责，对民情不闻不问，并大肆挥霍国努民财。之后的天启皇帝（明熹宗）登基时才15岁，除了对木匠活有兴趣外一无所知，将大权统统都交给了贴身太监魏忠贤（1568 一1627 年）。魏氏原为天启皇帝之母的御膳房太监，受到天启皇帝的宠幸后逐渐权倾朝野，达到历代宦官弄权的最高峰。通过东厂的军队和特务组织，他在朝中收罗了一大批效忠者，对不与他合作的官员则进行打击排斥，另外还在各省征收各种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

党争：东林党

与阉宦正面产生冲突的是一群儒生士大夫，即"东林党人"，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后最终被阉党镇压了下去，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东林"这个名字来自无锡的"东林书院"，其首领为10 余名革职还乡的学者型官员，他们在附近各书院讲学，在各地的官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代表儒家道德的一股力量。他们谴责王阳明以来思想界鼓吹三教合一的折衷态度，强调完善道德是人生第一等大事，并且抨击当时的大学士和宦官等当权者，

自然东林党人并不能完全代表正义的一方。1610 年，他们被指为"朋党"，意即对朝廷权威和统治秩序产生颠覆性作用的一帮人。党争与今天的政党斗争不同，一般是在道德层面展开的。东林党人指责、攻击他人，同时也受到他人的指责和攻击。他们在魏忠贤上台前一度得势，1624 年东林党人杨继盛上疏弹劾魏忠贤的24 款大罪，其中包括谋害皇后、造成皇后流产等劣迹。魏氏纠集了东林党的对立派官员进行残忍的反攻，他们拟定了约700 名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黑名单，对首脑人物进行诬蔑、谴责、罢斥、羞辱、监禁、拷打乃至刑讯至死。当魏忠贤于1627 年倒台时，东林党实际上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阉宦弄权标志着晚明政权的腐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农民起义

但真正导致明朝崩溃的，不是管理不善或宦官专权，而是政府根本不进行管理，因而政权中存在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问题的核心不是赋税太重，而是税收人不敷出。明末君主并不像前代那么残暴，但其统治却趋于瘫痪失灵。

1628 年陕西发生了大饥荒，由于政府裁员，释卒李自成失业了。于是他加入了其叔父所在的盗贼团体，并在陕南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后来日军侵华时也在此地遭到中国游击队的重创）。李自成后来又向河南、四川进军，队伍不断壮大，李氏遂自称闯王。当时至少有两名学者投奔他的队伍，并为闯王出谋划策以赢得百姓的支持。他们编写了歌谣宣传闯王的英雄事迹，并且辅佐他开仓放粮、委任官吏、建立大顺政权、拟定封号甚至发行大顺朝的钱币。到了1643 年，李自成已占领了湖北、河南和陕西的大部分地区，1644年起义军从西北路攻人了北京，而崇祯皇帝则自溢于景山，明朝遂告灭亡。

这时，另一位起义首领张献忠欲与闯王争夺天下。张氏杀人如麻，没有什么组织能力。1630 年前后他曾率部采取游击战术大肆劫掠华北一带，后来于1644 年人川建立了大西政权，亦设置了六部与大学士，均由前明进士担任，并且举行科举、发行钱币。但张献忠最关心的是用恐怖手段剪除异己，尤其是缙绅阶级。结果他失去了缙绅的支持，最终于1647 年被满洲人所杀。这样，明政府在外族入侵之前已经被农民起义倾覆了。不过继起的满清政府承袭了明代主要的政治制度。因此，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制度出现问题，而是因为该制度无力挽救明代末季照例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压力所致。

第09章 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

一、满洲政权的兴起

清朝建立于17 世纪早期，恰与欧洲人建立北美殖民地同时，直到1911 年才告灭亡。因此，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8 世纪时中国的人口与疆域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统治的精细与稳定也达到了巅峰，但在19 世纪却遭到了无法逆转的重创。

我们先来看在19 世纪以前满洲人是如何统一中原并进行统治的。不过，在研究他们的早期辉煌时，我们不禁想问，他们维护传统秩序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全盘崩溃。中国的传统力量太强大了，任何彻底的制度改革都是不可想象的。满洲人是成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拙劣的革新者，他们显然承担不起塑造中国现代格局的历史重任。

满洲人早年的成功史恰似成吉思汗时的蒙古：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应时而动统一各部建立了国号，然后经过几代努力统一了全中国。满洲这个军事化民族是金人（女真族）的一支后裔，他们地处中原文化的边缘，因而在学习蒙古人长处的同时也能有选择地向汉族学习而避免汉化，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大起来的原因。满洲最南端的辽东地区自古便是中国的一部分，汉代曾在此处设郡。辽东地区农业也很发达，与华北地区一样属于深耕细作型农业。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明时同属山东省管辖。但它的地形易攻难守，常为兵家用武之地。其北缺少屏障，而且同满洲一样，被山海关扼住了进出中原的咽喉。因此，辽东地区属于汉族地区与"蛮族"地区交界的地方，剽悍的蛮族人与此处的汉族农业人口相比古有绝对优势，而且对当时的政权也构成了威胁。

明朝政府采取拉拢、收买等方法来维持和平。明太祖曾派兵驻守中蒙边界，后来明成祖在满洲也采用了这一做法，设置了178 个卫所，实行中国人惯用的"分而治之"政策。这些卫所的首领均由蛮族人担任，下面的士兵则是该首领的族人。这些蛮族首领接受明朝政府的

封号、印信并有义务逐年进贡。一族首领也许会被赐以汉姓，其女亦有可能选入皇帝的后宫。姓氏自然有利于编修家谱、培养嫡庶长幼的观念和继承制度。同时，皇帝的封赏（正如今天英联邦的做法一样）也有助于安抚这些蛮族人不生异心。另外，明政府还允许各部首领在中原甚至在京师居住从而同化为汉人。

第一个女真卫所于1403 年在辽东半岛东北成立。随着满洲各部的壮大，每年都有200 人或600人的队伍同时晋京，沿途自然免不了骚扰百姓。明朝在现沈阳附近开设了马市转移满人进关引起的麻烦，就是在这里明军与满洲军队此消彼长，战斗力拉开了距离。中国要汉化或"怀柔"蛮族，但蛮族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中原制度并巩固、壮大了本身的战斗力。结果，在满洲出现了一个制度完备的新兴异族政权。

汉化满族政权的创立

满族政权的创立者努尔哈赤（1559—1626 年）是成吉思汗一流的人物，他借口为先人报仇而起兵造反，头号目标便是曾合攻其祖其父的辽东经略及叶赫那拉部。尽管努尔哈赤接受明朝任命承袭了父职，据说他还是发动全族人马于1586 年消灭了叶赫部落。他分别娶了另外两大部落头领的女儿和孙女，巩固了家族的势力，又因镇压辽东盗匪而获得明朝政府的褒奖。经过30 年的谈判以及联姻、联盟战争等策略，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四部，足以与明朝分庭抗礼了。同时，他亦与明廷进行马匹、人参（据说此物有返老还童的药效，因而大受中国人的欢迎）的交易。在辽东的东北边境，努尔哈赤建立了有三四道城门的城堡，他本人及其家人居于最中，其外为手下重臣大将的300 户住宅，外城则是数千名驻军及其家属。努尔哈赤还任用了不少汉人工匠和谋士，其中一位曾跟随他达30 年之久。

起初，努尔哈赤避免了与明朝和蒙古各部进行正面交锋，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统一内部的工作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八旗"制度。起初只有黄、自、蓝、红4 旗，每旗下设"甲喇"、"牛录"若干。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4 旗。通过八旗制度，满洲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制度逐渐成形〕所有的满洲人，包括他们俘虏的汉人奴隶，统统都编人各旗，平时生产纳税，战时上马打仗。各旗旗主由旗众推举，职位并不世袭，负责旗中事务的

官吏亦然。 随着满洲人势力的不断扩张，又增加了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军，共有24 旗。到了16 以年，八旗共有满洲军队278 "牛录"，汉军165 "牛录"，蒙军120 "牛录", 军队总数达16 . 9 万人（其中满洲人不到总数的一半）。

战争时各旗分别派出一定比例的兵力参战。如满洲人于1634 年攻打内蒙古时，每一"牛录"派出20 名骑兵、8 名卫兵参战，军队总人数大约有11000人。八旗军队与明朝的卫戍部队不同，他们在各地都有自己的田产，往往与旗外人员的田产混杂在一起，因此旗人并不束缚在某一固定的地方。

努尔哈赤的另一项成就是发展了一套办公用的满洲文字。他让手下的通事用蒙古字母记录女真文字，并增加了某些变音符号。满文版的《 孟子》 很快就问世了。这样，满文就为他们快速汲取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方便。

1616 年努尔哈赤自称后金国皇帝，意为金国的后继政权。自1618 年起，他开始正面进攻明朝，占领了辽东的部分地区，并且在汉人的帮助下完善了国内的文官制度。1625 年，努尔哈赤将国都迁到沈阳后于次年去世，后被追尊为清太祖，其14 皇子多尔衰（1612 一1650 年）先是支持其八兄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死后又出任摄政王辅佐其兄的6 岁幼子顺治。顺治之后康熙又统治了中国长达61 年（1661 一1722 年）的时间，这样，清王朝就全面建立起来了。

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早期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将当年的旗主议政制度改为新的君主专政制度。最后，爱新觉罗家族除皇帝一人外都不再参予政事，但皇室宗亲都集中在北京。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强有力的统治者人选并避免女主或宦官干政。

在这方面，满族统治者比前代的蒙古统治者更好地借鉴了儒家的统治方式。他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学习了汉人的政权组织方式并在朝中任用汉人为官。他们从辽东地区的汉人中挑选文职官员和书生，从而渐渐以百官制度代替了氏族的统治方式。这时的官吏总数已达300 万，是当时满族人数的10 倍，这些人都为一个强有力的儒家政府这一前景而大受鼓舞，因此纷纷投靠满洲政权。1631 年，后金效仿明朝设立了六部、都察院及其他机构。

早期满洲政权中的半汉半"蛮"性质，表现在参政的辽东汉人人数上。例如，1633 年就有3 名明朝官员投靠了满洲政权，之后他们还带兵南下为其主子征服了华南地区。这3 位后来都封了王爵，其中一位的23 个儿子中有11 人成为大清国的将军，有3 位还成为朝阁重臣。

满人入关

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羽翼丰满之后，早期的满洲统治者开始凯觎北京的皇位。皇太极曾于1627 年和1636 年至1637 年两次入侵朝鲜，将其纳为自己的属国。他又率兵于1629 年、1632 年、1634 年3 次入关袭击华北地区。同时他还征服了内蒙古。通过4 次出征，他又将阿穆尔河流域纳人了自己的版图。在此疯狂的军事扩张期间，皇太极于1636 年始改国号为"清"。

明朝降将吴三桂（1612 一1678 年）在满洲人征服中原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吴三桂是辽东人，当李白成进犯北京时，崇祯帝曾命他进京勤王。但救兵未到，京城已被李自成攻古，于是吴三桂投降了驻扎在山海关以东的多尔衰的部队，并配合满洲兵把李自成赶出了北京。这时满洲人亦大举入关，消灭了国内其他反对力量，其速度之快连满洲人都感到吃惊。满洲人原想在关外建立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权，但乘国内农民起义和明朝降将的帮助，竟然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

吴三桂在引清兵人关后的30 年中为满清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也登上了权力的高峰。他盘踞在云贵一带，境内实行贸易专卖，同时仍向清廷领取军炯。他与另外2 名辽东籍降将（后者分别统治广东和福建两省）合称"三藩"，儿乎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后来吴三桂于1673 年起兵造反，其他2 人也随即响应，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乱"。这场内战使得19 岁的康熙帝措手不及，直到1681 年才平定下去。

台湾是最后被清军攻占的一块汉人土地。尽管当时很多商人和海贼都频频光顾台湾，但台湾始终"不归王化"，类似明朝的一块海外殖民地。从l642 一1662 年，设在现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荷兰人称之为Formosa ，意为"美丽"）设置了几处驿站。抗清名将郑成功（1624 一1662 年）及其家人就是以台湾为根据地开展反清复明的军事活动的。郑父曾是海贼，后受到明廷的招安。他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后者曾为他施洗）、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其妻即为日本人）均有些交往。郑成功深得南明小朝廷的赏识，曾被赐以"朱"姓，

故又称"国姓爷"，荷兰人又讹传为"Koxinga "。自1646 年至1658 年，他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大部分地区。

清政府还是按照以住的陆战经验来对付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仿照明时防御楼寇的方法，他们实行封海禁运。郑成功奋起反抗，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后于1661 年退守台湾，以900艘战船的兵力赶走了盘踞在那里的荷兰人。郑成功死后其子继续统治台湾。此时清政府下令将沿海居民一律撤后200 里，空出的地带由清兵把守，这样就切断了台湾岛内人力、粮草和丝帛的供应。这一政策对台湾并未造成多大的损害，但郑氏政权却因支持三藩的叛乱而被清廷视为心腹之患。清廷最终在平定三藩后于1683 年攻古了台湾。这样，清兵自人关以来，经过两代的努力才真正统一了全中国。

直到现在，若非先控制了亚洲腹地，是很难轻松维持对中国的统治的。满清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内蒙古地区并入新朝的版图，继而又在17 世纪晚期征服了外蒙古，到了18 世纪更攻占了现新疆地区并成为西藏的保护国。满洲人占领内蒙古后将蒙古人编为八旗，其身份介乎臣属与盟友之间：清朝为蒙古人提供了发挥能力的机会，同时也加强了明代遏制蒙古的措施，如限定其活动范围，确立世袭的首领制度并加以封号爵位，设立蒙古衙门，开设蜂站和定期定点的互市，并不时赏赐晋见的蒙古使者等等。总之，清朝继续将万乘之尊的"天子"视为各种荣誉和恩泽的源泉、并将中原的文化、商业和各种典章制度都继承了下来他们川分而治之的办法依靠内蒙古人来对杭外蒙古人，少子嫡长原则来防止谋逆现象的发生，采用结盟的方法来打击叛乱分子，同时也很小心地不讨任何一个蒙古首领总揽大权。为了实现这一点，满族统治者特别设立了"理藩院"，与六部同级。

为了实行这一制度就必须时时留心，有时还需诉诸武力。17 世纪末，盘踞在阿尔泰山及伊犁河流域一带的西蒙古支脉— 准噶尔部一首领噶尔丹发动了叛乱。噶尔丹幼年曾在拉萨做过喇嘛，因此他起兵造反得到了西藏的支持。1670 年他入侵新疆至哈密一带，后来还跨过外蒙，到克鲁伦河一带骚扰抢劫。康熙帝兴兵应战，像永乐帝一样于1696 年率领8 万大军御驾亲征。清兵动用了火炮等武器，最终在库伦（现乌兰巴托）以南一役击败了叛军。

但最终全面平定叛乱是在18世纪50 年代。经过一系列蒙古各部的叛乱、谋杀、篡逆入侵和迁徙之后，清兵于1755 年至1757 年分3 次入驻伊犁，完全消灭了准噶尔部的叛军力量，并于1758 年至1759 年又成功地镇压了新疆回部的叛乱，从而牢牢掌握了阿克苏、雅尔罕、喀什等绿洲地区。这是继汉、唐、元之后中国天子第四次统治远达帕米尔地区的塔里木盆地：

进驻西藏

为了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清朝必须控制西藏，因为拉萨的喇嘛寺院不但对藏人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还远及蒙古。好儿个世纪以来，藏人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仄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唐朝时他们已经颇为强大，足以直捣印度或远征长安。元时喇嘛教的势力已经开始在蒙古各部迅速传播开来二明初时西藏与中原保持着定期的朝贡关系，永乐帝还亲自接见过藏使，赏赐封号并委任官员：不过，明朝时藏传佛教内部进行广一场改革。黄教领袖宗喀巴提倡禁欲、完善宗教会议、忏悔、静修等制度而与以前的红教相决裂少晚明时期，黄教的势力传入蒙古，与红教一道成为支配蒙古人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两大力量。

根据喇嘛教的灵魂转世信仰，宗喀巴的传入（即黄教的领袖）从所谓"转世灵童"中寻找。当他的第三代传入去蒙古弘法时，士蒙特蒙古俺答汗上尊号为"达赖"（大海之意），是为达赖三世。当他于1588年去世之后，一名蒙古族转世灵童继任为四世达赖。这样，蒙古各部与红教、黄教依靠这种宗教性的政治权力形成了一股力量。与达赖喇嘛并称的红教领袖是"班禅喇嘛") 继而又于l600年左右在现乌兰巴托地区出现了类似大主教的"活佛"。

后来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世俗政权领袖，名义上归顺中央并接受清政府的册封，这样，亚洲腹地的宗教一政治秩序就建立起来了。不过，达赖喇嘛是在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支持下才逐步在西藏确立起世俗政权领袖这一地位的。甚至一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之前，青海蒙古固始汗就于1641 年进兵拉萨，一举消灭了那里的红教势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蒙古政权，尊奉五世达赖为精神领袖，并重修了达赖的驻地布达拉宫。

当康熙征伐噶尔丹时，很自然地将达赖喇嘛视为一张王牌，因为当时的喇嘛寺庙中聚集了大量的青年壮士。结果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蒙古人于1750 年进驻了拉萨：这引起了准噶尔部的不满，但结果却是导致清政府于1 720 年直接用武力接管了西藏的事务。不久西藏爆发了内战（1727 一1728 年），清政府再次派军1 . 5 万人进驻西藏。此时达赖的权力受到清政府正副两名驻藏大臣及驻军的牵制。准噶尔部于1750 年再次起兵叛乱并｝J ．滥杀无辜，清政府又第三次用兵西藏。最后形成的局面是，达赖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必须经过中央册封方才有效，其统治机构由藏人主持日常事务，但必须在清朝驻藏大臣和1500 名驻军的监控下进行。这样，经过无数艰难挫折后，西藏的政权终于牢牢控制在了清帝国的手中。

二、清代的统治

满人势力的巩固

满人人关以后面临的最大间题，就是如何将权力掌握在满人手中二山于满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 %，这个任务不可不谓艰巨。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权利，力图不被汉人同化，以此来维护其民族意识与民族特征。

维护皇族权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打好自身的物质基础，他们圈古了大片土地，并通过征收各类专门的赋税积累了大量独立于国库收入之外的财富，同时建立了内务府来管理这些财富。这些钱不仅供给宫中的花销，另外也是皇亲贵族（他们从亲王到贝子共有12 个等级）的经济支出。这些人的爵位父子相及，但通常要例减一等，这样贵族子弟们就有了上进的动力。另外还有上下31 级满洲贵族，他们亦从清帝那用接受封赏与俸禄。

其余满人都编入旗籍，即是所谓"旗人"，他们都分得一片土地及一份俸禄，不受地方官府管辖，但他们亦不得经商、从事体力职业或与汉人通婚、采用汉俗。旗人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氏族制度，另外他们还必须学习满文．另一方面，大清国的国民都必须留起辫子，以此表示臣服。

八旗部队在军事上控制了全中国。1644 年登记在册的八旗士兵有16 . 9 万人，到了18 世纪则增至35 万人— 尽管实际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各地的八旗驻军均由"大将军"（西方人称之为"鞑靼将军"）统

领，主要驻扎在北京（25 营）、西北及各大城市，如成都、南京、杭州、福州、广州等地，另外南方一些战略要地也都有八旗军队驻守。八旗驻军一般为4000人左右，与其家属居住在城内的某一地区，而不是像13 世纪的元朝军队那样驻扎在城外。

清代的另外一个军种是"绿营兵"，系仿明代军制而建，在17 世纪末有59 . 4 万人，至19 世纪早期发展至64 万人，共1202 个营，其下分设标、协不等。绿营乒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驻军比较分散，其战斗力亦逊于八旗部队。总之，全国的军事指挥一分为二，一部分由满人掌握，一部分由汉人掌握，一部分控制在兵部及京师戍卫部队手中，一部分则控制在各省驻军手中。另外文臣和武将也都分掌了兵权并且互相制衡，再加上微薄的军铜，这样朝廷就把军队牢牢控制在了手中。

另外，满洲人出于长远考虑还不断经营满洲老家，使之成为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根据地。满人入主中原后汉化的步伐加快了：中原的满人开始学习汉语，而辽东的汉人则不断迁入满洲。为了阻止汉人的流入，清政府于1668 年下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的中部和北部，还将明时的"柳营"从山海关延伸到沈阳以北，继而又向南延伸到鸭绿江，以此阻止汉人北迁。这样，满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猎场、森林、河流，便成为满人的"保留地"。另外，关闭这一地区也有利于政府的人参专卖事业。这种理论上有很大药效的植物根茎主要产于乌苏里等河流沿岸的山脉，每年由政府向约上万参客销售特许状，其情形与食盐专卖制度差不多。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十倍的汉族人口呢？今天的汉人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都感到很羞愧。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首先，异族如满人同汉人一样，同为中华大帝国的一份子。其中亚洲腹地的"蛮族"人数不多，但挠勇善战，如满族人口正好足够提供一个皇族统治集团、一批上层监控者以及足以控制整个帝国的驻军（正像欧洲人在19 世纪的殖民做法一样，满人统治着亚洲腹地，但这也增加了满清政府的负担）。有些人也指出，清朝的政府官员中有九成都是汉人，满清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满一汉联合政权，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维持其统治是因为他们已经汉化云云。

这两种观点并不冲突，但都只触及到表面。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

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

清代统治

满清人关后基本上承袭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只不过是把最高决策层换成了满人而已。满清统治有三大要素：武备、"天子"的最高权力及满人对汉族官员的监控。满洲统治者从一开始就与缙绅地主、地方士绅和前明官员达成了妥协。地方豪族一与官员只要归顺朝廷，大可自行其事。满洲人未曾提出任何社会或农业改革的主张，相反，他们礼葬了崇祯帝，自称为明复仇消灭了盗匪并给中国重新带来了和平在于秩序。这一套说教对大多数的北方官员产生了效果，他们纷纷归顺了新朝。代表人物如洪承畴（1593 一1665 年），其人系前明进士出身，后出任兵部尚书，总督豫、山、陕、川、湖5 省，松山战役失败后于1639 年降清。入清后他被封为大学士, 从1645 年至1659 年为清兵镇压江南杭清义军和农民起义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1644年清建都北京后任用了大批汉族官员，实际上成为满汉合作的政权。如当时的大学学士，满汉各占3 人六部也都各设满、汉尚书1 名，4 名侍郎也是2 名满人、2 名汉人。这种二元式结构在西方被称为是"六人策事会"（Six Boards）。地方上，各省总督也是满、蒙、汉各族分任。清初统治者主要依赖的是汉籍旗人或汉籍旗奴在都察院中的御史人选也是满汉各十的，而各省的56 名御史则分管15个巡区，满汉御史并力合作。总之，清政府任用了大量汉籍旗人，从而形成两头政治的体制。

清时在关内设置了18 个省，除了直隶省与四川省以外，各省均设巡抚上名，其下还有州县郡道及分管全省行政、民政、司法、科举及食盐专卖的各级官员。每两省设一总督〔 近似欧洲人称为"副王"(viceroy)〕，各省重要事务均由总督和巡抚联名报呈皇上，各省内部事务则多由汉人巡抚及满人总督协同办理。他们均有各自的部队，但各省的主要武装通常是满人总督摩下的八旗军队。

这种满汉合作制度起初带来不少翻译上的问题。清初政权实行满汉双语制，满族官员均配有通常为身在旗籍的汉人通事。直到清末，清廷还要形式上将政府文告译成满语后颁行大下，但这种做法早在清初就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满人都学会了说写汉话。康熙时编撰的满文字典在后世子孙那里几乎成为天书。清时各地政府办公语言都是汉语，省级以下的官员也几乎都是汉人。

清代的专制主义

权力逐渐集中于皇帝之手，这是元、明、清三代共有的一个趋势。清代政务，如行政、立法、审判，事无巨细，均须皇帝本人钦定。雍正帝（1723 一1736 年在位）更是大大提高了集权的程度，这与他继位的经过恐怕不无关系。康熙自13 岁大婚后，生下儿女无数，35 个儿子中也有20 个存活了下来。当太子精神错乱后，诸阿哥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而明争暗斗。在康照死后雍正得到京师军队的支持，得以继位为帝。他的政敌曾谣传他篡改遗诏，甚至拭父继位。不管事实到底如何，雍正为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可谓费尽心机。他的兄弟中有5 名后来都死于狱中，他们的支持者也都受到迫害。继而雍正又取消了皇族诸王对八旗军队的统率权，并且规定不再宣布太子人选，而是由皇帝于生前写好诏书，埃驾崩后再行公布。另外他还在统治中使用了大量间谍做法，并设立尚书房密奏制度，以便能直接从亲信那里迅速获得全国各地的消息情报。

清代在明代国家机器上新增加了一个机构，即雍正于1729 年设立的国家最高决策部门— 军机处。内阁仍照常处理日常事务，但军机处则与皇帝一道处理各项紧急重大事件，也较少官场上的繁文缚节。军机处大臣通常有五六名，其中二三人常常同时兼任大学士之职，因而军机处与内阁颇有重合之处。皇帝每天傍晚都要召见军机处大臣共商国是二．其制定的方针一则由特选的32 名章京（通常满汉参半）具体执行。

雍正帝勤于政事，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乾隆在位时（1736 一1795 年）亦大抵如此。当时有位大学士曾在日记中写道："内阁中的十多余同事，每五六天值一同早班都感到劳累不堪，而皇帝竟天天如此！"

国家与文化的统一

承袭前代的统治机制，同时屏入满人统治的因素，这只是满清维持其统治的基本条件，维持其统治还须通过利一举吸收汉族知识分子的统治人才。这种层层遴选的制度淘汰去不合格或非正统的人员一清代县一级的考试每3 年举行两次，每次录取人约2 . 5 万名秀才。省一级的乡试悔3 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l400名左右的举人，而参加京城一级的会试和殿试并得中进士者不过200 多人二这时他们大多已经年过30 ，均为各地的精英，往往派到各县做官而步人仕途。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他通过这一仪式扮演了一种"圣人一教师"的角色而获得众多"天子门生"的效忠。士子一旦入仕，就会视皇帝为道德的楷模、学术和艺术的恩主，所以对于满清最高统治者而言，真正的考验为他们是否能胜任这一角色，从而使国家和文化在"天子"的统治下保持统一。统治中国不仅需要政治和军事上的手腕，同样还需要文化上的领导能力。

康熙（l661-1722年在位）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7 岁继位，13 岁时亲政。他27 岁时平定了三藩的叛乱。他曾亲征蒙古，并大力发扬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在热河修建了行宫。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曾6 次巡幸汉族士大夫的根据地— 江南一带。在这几次南巡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淮河和黄河的水患问题及运河运粮的问题。他在1670 年颁布了16 条道德训教，即所谓《 圣祖圣谕》 ，地方官员及士绅每半月就要宣讲一次以指导百姓的言行举止。

康熙与汉族士大夫阶层关系很好，这有助于他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胜利）康熙本人精通儒家经典，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当时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康熙于1679 年开设了明史馆，网罗了152 名大学者编撰明史。另外他还开设博学鸿词科，在宫中收罗了一大批汉族学者和书画家为皇家服务。康熙在位期间还令人编纂了《 康熙字典》 、《 朱子全书》 、《 古今图书集成》 （后者远比《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更加卷帆浩繁，有5000卷之多）等书。这样，这位满洲皇帝也和明代皇帝一样，成了文化学术的热情赞助者和保护人。管理全国各地的百姓不仅需要刑罚威慑，同时也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清代全国各地都设有官仓以备荒年贩灾之用；国子监和各地学堂则传授儒家经典；年高有德者可以得到官方的族表嘉奖，地方神灵一并得到官方的祭祀，《 圣祖圣谕》 也有专人负责向百姓宣

讲。清代统治是儒法参用的，里甲制即是一例。这项制度草创于秦代，从汉、北魏、唐到宋一直沿用，尽管称法不同，实质则始终如一二如宋代的保甲法，就是与静态的大陆农业社会极为适应的一套政策。明代也袭用了这一做法，并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视和告发。保甲法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当时规定，每100 户为一甲，10 甲为一保。甲长和保长由村民推选，缙绅不得担任此职，而当选者须负责传达公事、登记人口 、核对各家门牌等。这并不是"自治机关"，而是由官方规定的一种非官方机构。通过保甲制度，政府和地方缙绅把家庭变成了警察组织：

三、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学术研究：朴学

17 世纪中国学者所面对的一个重大事实是：明朝汉族统治的灭亡及异族对中原的统治：由明人清的100 年中产生了许多道德问题，像如何依靠儒家信条来防止晚明宦官的专权，明亡后是否应效忠新朝等等。晚明学者大都崇尚唐朝而抵斥蒙元，面对满清统治的现实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坚决认为，"化外之民"不可能胜任中原的统治者。有些则坚决效忠前明誓不仕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异族入侵都是内政不修造成的，于是他们转向研究前明的"德衰"（他们认为这是明之所以灭亡的惟一原因）是如何给"蛮族"入侵者造成可乘之机的。顾炎武（1613一1682 年）即为其中的一名代表。他曾致力于反清事业，数度为仇家逼害，约1650 年后遍游中原名山大川，虽在旅途中亦著书不辍。他在游历华北时亲身目睹了农业、商业、钱庄业乃至工矿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思索的结果，便是《 日知录》 、《 天下郡国利病书》 等著作。 顾炎武誓不为清廷服务，而是将精力放在深入研究明朝灭亡原因的写作上。他对宋明理学提出了批判，同时也抨击王阳明一派的"心学"思想。他正确地指出，王氏的"心学"主张已然背离儒经而渐入禅道。他对八股制艺也大加鞭挞，认为这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使得国人在面对异族的入侵时只知空谈而一筹莫展。顾氏认为"八股"之为烈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之举。

为挽救上林，顾氏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但他对"宋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的经典。相反，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奠基者，主张以宋以前的古籍为标准研究传统文化，认为汉儒去孔孟不远，他

们的著作更近圣人本义而无理学的搀杂。"宋学"则受到顾氏等人的批判，尽管其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清代学界的创新思想却大都是来自朴学（汉学）学者。

朴学学者注重归纳方法的使用及名物的训话考据，主张原典实证。这套方法首先应用于音韵之学，后推广至文字学、词源学及考据学等研究领域。这种"考据之学"大大拓宽了古典学术研究的视野。确实，这种方法有助于辨别古籍的真伪。如一位学者，在精研《尚书》30 年后，通过考据的方法，得出《古文尚书》系伪经的可信结论。这样，汉学经过顾炎武等众多学者之手，在清朝成为批判研究中国古籍的一门显学。

有人认为朴学反映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所谓"科学研究方法"只限于文学研究，并不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中国许多朴素的科技发明和发现大多来自于热爱自然界的道学而非孔门学者。中国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萌芽，从未像西方现代科学那样有意识地予以条理化和制度化。清代学者仍旧只限于书本研究而与实验等实际操作无缘。

清代对理学思想的重新评估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戴震（1723 一1777 年）曾批判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宋儒由于受到释老二氏的影响，将"理"视为先天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超验实体，对此戴震针锋相对地提出，"理"是万物的内在结构，强调"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了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仅仅儿句话无法全面介绍戴氏的思想，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像戴震这样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修正了"宋学"，但他并未推翻"宋学"。朴学家的贡献其实仍未跳出传统的藩篱。

官方对学术的控制

18 世纪时的大多数学术研究是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的。雍正帝曾兴建大量学术机构以吸引学者，乾隆在60 余年的漫长统治生涯中，命人编撰了57 部大型图书，清代的学术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政府、例如，戴震出身布商家庭，本人靠在权门坐馆教书为生。他在1773 年被乾隆任命为《四库全书》的主编之一。该书广收前代书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用1 . 5 万名抄手费近20 年之功才'抄写告成。《四

库全书》 起初以《 永乐大典》 为蓝本，但实际为3 . 6 万余册，远远超过前者的11095 册：全书共缮写了七部，《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 对其中的全部著作做了介绍和评价。

在编撰《 四库全书》 的十多年中，清廷篡改、销毁了反清或诽谤前代异族政权的著作在这场浩劫中，共有2300 部书被列为禁书，还有350 部亦被禁印，这些书的作者也都受到厂迫害，甚至连碑文中的姓名也被挖掉。当时的"检察官"说，书中虽无大逆之言，然多有沽名之谈，焚之可也。又如，当时某人编写词典时不慎犯了孔子和皇帝的圣讳，一家22 日全被押往京师问罪，他本人被斩首，两个儿子及3 个孙子则发卖为奴。

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

为了罗致知识分子，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是缙绅阶层。在文化领域内，平民百姓并无多少露面机会。对他们而言，道教和佛教思想仍是他们对宇宙万物看法的来源，而他们关注的中心仍不外是家长里短一类的事情。我们对"地主"已有不少了解，他们往往出身书香门第，居住在城市中，有办法也有闲暇来赏玩林泉、古董或习字作画。他们还常常阅读小说，或去戏楼观剧。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及清代的斗彩瓷器自然远在风靡欧洲之前就为中国文人雅士所珍玩。这些入侵润在中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无不精于古董的收藏和鉴别。这是他们所受教育的自然结果。他们充满了人文理想，一心沉洒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

这种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商业化城市中，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南宋的风流余绪。如以西湖著称的杭州，以美女著称的苏州均为其中代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即为当时的写真。绘画是文人雅士的一大消遣，文人画在明清时也非常流行。明代画家有姓名可考者逾千人，清代画家自然更多。明代诸帝不少人都喜爱艺术，如宣德皇帝(1426 一1435 年在位）本人即是一名很有天才的画家。南宋马远、夏圭一派的绘法不乏传入，而在苏州则出现了另外一批文人画家，其代表人物董其昌（1555 一1636 年）主张书画同源，强调绘画要有"士气"，推崇"南宗"绘法，主张绘画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7 世纪成书的《 芥子园画谱》 对一些绘法术语通过图示

都做出了解释。董其昌及其同行推崇中国画的传统并赋予其经典的地位。清时皇室都收藏了大量绘画，如乾隆就收藏了约8000 幅之多。

中国画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艺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道、释二家的精神。此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并不能影响全部。圣贤的思想虽控制了公共生活领域，但它控制不了个体的性灵。结果是，上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和他们读来消遣的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便很是相似了。

大学

蒲松龄（1640一1715年）的《 聊斋志异》 成书后不久即风靡于世。这部书继承了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如讲述一名书生独处书房，忽有二妹出现并争相献媚，该书生遂与之缝蜷，疲而将死之时才发现她们乃是女鬼或狐仙。这种故事自然难以见容于儒家思想，但由于作者文笔典雅，该书在文人士大夫中大受欢迎。

当时还出现了不少的白话小说，这些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细节真实生动，因而很受大众的欢迎。其中不少作品来源于宋末和元代的话本，但成就最著者还是明人的小说。如《 水浒传》 ，宋代已有唱本流传，元杂剧也有取材于此者：，该书的雏型是一些自成章节的话本，在这些话本中原先的"盗匪"成了"忠义"的英雄，他们共108人，均是被逼上梁山的良家百姓。《 水浒传》 一书最后由几名文人作者修润定稿，成为一部几个世纪以来始终脍炙人口的"抗议小说"。

由一名作者独力创作的首部现实主义大作，是《 金瓶梅》 。该书产生于晚明，讲的是日常都市生活和寻欢作乐之事，一反鬼神传奇的写法，而且对女性个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写。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尽管其中不无渲染色情的成分，但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家庭生活和世态百相。

曹雪芹著的《 红楼梦》 是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杰作。曹氏先祖为汉军旗人，祖父曾出任江南织造的肥缺，康熙南巡时曾4 次驻胖曹家。曹雪芹的祖父雅好文学，曾出资印行《 全唐诗》 ，无怪乎在他身后负债累累了。雍正帝于1728 年抄没了曹家的财产，其中包括南京的13 处房产及300 英亩的田产。曹氏上下114 口人也陷入了贫穷的境况之中。曹雪芹幼经富贵，此时却穷愁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创作《 红楼梦》 。在书中他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个钟鼎之

家的没落过程。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其中最富悲剧性的一个情节罢了。

当瓦肆中的说书艺人逐渐为白话小说家所取代后，戏剧也渐渐从案头走向了舞台。这种艺术形式综合了唱念做打及插科打浑等表演技术，但在剧本中不过廖寥数语便一笔带过，远不足以成为吸引士大夫的文学样式。今天人们往往将中国在帝国晚期的文化与同时期日本的情况相混淆。但前者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丰富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而非创新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重复和没落的迹象。以建筑为例，明清的宫殿建筑与古代几无二致：汉白玉的基座，红墙绿瓦，雕梁画栋。但这时的建筑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唐宋建筑以复杂的大型斗拱同梁柱一道支撑屋顶，这种集实用、审美于一体的建筑式样今天在日本奈良尚可见到，但到了明清时，斗拱渐小渐繁，已失去了支撑建筑的功能而沦为一种纯为美观考虑的装演。

四、衰落的开端

军事的衰败

清朝在18 世纪显露出的衰败端倪主要体现在八旗部队战斗力的下降、上层官僚的腐败及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生活贫困几个方面。纵横东亚近200 年的八旗部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像官史中大肆渲染的乾隆帝"十大武功"，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代的军事成果。

这"十大武功"中有3 项我们已在前文提到，即对准噶尔部的两次平叛及用兵新疆回部。其余7 次都是在已有疆土边界上的自卫战争：对四川叛乱的两次镇压，对台湾起义（1787 一1788 年）的镇压，4 次征伐缅甸(1766 一1770 年）、越南（1758 一1789 年）及尼泊尔的廓尔喀族（l790一1792 年这次征伐被乾隆算成了两大"武功"）。乾隆手下的将军们（他们多为满洲人）也并不清闲，如福康安（卒于1796 年）曾用兵四川、甘肃、台湾及尼泊尔。为打击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福康安于1792 年率军西进1000 英里，跨过世界屋脊，将入浸者赶回了尼泊尔，后者从此逐年向清廷进贡，一直到1908 年才停止。

这几次军事活动都是在边界进行的，其指挥将领均为满人，耗费了大量钱粮，而且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将军们挥霍掉了。例如，当时川滇山民造反，其人数不足3 万户，他们在山寨附近建造了数千石堡，

后来清军用炮轰为了平地。但第二次人川平叛共费时5 载，消耗了700万两白银，是当时国库收入的两倍。只有仔细研究了清代中期的这些军事活动之后，我们才会对其发动原因有所了解。仗打得越久，朝廷拨给的军晌就会越多。我们知道，福康安不仅在1780 年到1795 年之间做过好几省的总督，他还是权臣和坤（1750 一1799年）的亲信。

和坤是贪官的典型代表，他的发迹史与前代的权阉有些相象，正反映了当权者的年老昏庸。满洲人主曾费尽心机避免前朝的覆辙，如对亲王贵族、封疆重将、新的"蛮族"入侵者、各地豪门巨室、大内宦官、后妃外戚甚至朝中朋党等一切有可能危及帝王集权专制的因素，一律都小心翼翼地予以防范，但惟一不能避免的是皇帝会逐渐变老。乾隆65 岁时璧宠一名25 岁的漂亮的满族侍卫，即和坤，而此公不久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很快从一名五品侍卫升任大学士，贪赃弄权达20 余年之久。他在朝廷的户部、吏部都有亲信，和坤本人则一度身兼20 个官职。和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贪官污吏组成的小集团，在朝中颇有势力。和坤倒台时，抄家官员报告中说他的财产竟达巧亿美元之多。

有和坤带头，我们不难理解武官们是如何搜括民财的了。八旗部队装备越来越差，训练则越来越少，士气也越来越低落。靠炯吃饭的将士们都忍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一贫如洗的旗人们禄米不够吃，不得不从艺、经商、干脆挺而走险或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最后，在清朝承平100 多年以后爆发的农民起义中，满洲军队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无遗。

白莲教起义

1796 年至1505 年在汉水、三峡一带的鄂、川、陕边境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者多为逃亡农民，他们原本开荒自食，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力，这些人不堪忍受税吏的催逼，遂仿照元末明初的"白莲会"揭竿起义。他们宣传说弥勒佛即将出世渡人，标榜要反清复明，并许诺将世人渡出苦海。这次起义的矛头对准了满清统治者，但造反者并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建立政权制定年号，初期大多为散兵游勇的游击作战，与清兵争夺山寨及人马粮食，最后被和坤部下的清兵镇压广F 去。叛乱与平叛双方在交战时都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次平叛与前代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需要整顿八旗军队的纪律，整伤士

气。嘉庆帝于1799 年掌权后起用了一批强有力的满族将军，旗军渐有起色：另外，清政府还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并且在各地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队。由于起义对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一些剩余劳力纷纷加入团练谋食。政府在围剿之外，还采取了招安政策，通过大赦和封官、悬赏的许诺分化义军的力量。这样清军多管齐下，最终产生了效果，yJ上一节败退的八旗军队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满洲军队百战百胜的神话也就此打破。〕清廷之所以能够最终平叛，实际上靠的是地方上的30 万团练武装力量二而平叛以后如何处理这些武装却也成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人口的增长

18 世纪时中国享受着史无前例的承平和繁荣，人日空前增长，但是人日的增长最终却破坏了这种承平和繁荣的局面。官方的人口统计表明，1741 年全国人口为1 . 42 亿，到了1851 年则增至4 . 32 亿。这样的增长速度放在一个不断有移民加人、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倒还可以理解，但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型前现代社会就着实让人感到惊奇了。

不过．照清朝计算人口的方法来看，这个人门数字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1741 年，清政府靠保长或甲长申报的村民情况来统计全国人口。保长除了让每家每户在门牌挂出标明家庭人口情况的号牌以外，还要负责处理地方上的偷盗、赌博、铸私钱、贩私盐种种不法行为以及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等事务。此外，这个统计中涉及的出生、死亡、妇儿、移民及少数民族人口既不一致，也难以可信。总之，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相反，每年的汇报人日成了走过场的例行公事。有些省份汇报的人口逐年按0 . 3 ％或0 . 5 ％的比率增长，连乾隆都认为："每年增衍人口竟皆相同，可笑之极。"

清代这种带有诗意的人口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突然，早期人口可能多于统计的数字，而晚期则叮能过多地统计了人口几如明代人日总数不超过6000万，竟与约1500年前汉代的人日差不多。我们不妨认为明代人口至1600年已增至1 . 5 亿，清初人口亦与之大致相仿。清政府在18 世纪初开始实行"摊丁入苗"政策，从此赋税均按1711 年的人口来征收，这可能导致了虚报人口现象的发生。先前的

地方官们为了减轻赋税负担而隐瞒人口，现在为了取悦皇帝、渲染政绩又纷纷增报人口 。朝廷要求地方详细统计人口，于是人日越统计越多。到了1800 年，中国人口可能为3 亿左右，而非当时奏报皇上的3 . 5 亿。

即使如此，这在一个并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农业国家里也是一个惊人的增长数字。史学家们将之归结为国内承平、开发耕地、种植快熟稻种促进了粮食增产的结果。古代种稻在插秧后150天稻子才会成熟。自从南越引进早熟稻种后，成熟期减到了100 天，之后又从6O 天减到40天，而到了19 世纪只需1 个月即可成熟了。这样就有可能种植双季稻或3 季稻。另外，美洲的玉米、甜薯、烟草和豌豆也于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传入了中国。甜薯成为南方穷困人口的主食，因为它能在无法种稻的沙壤土中种植，而且产量超过任何一种作物。除去以上原因，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外贸和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不管清代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增长并未引起清代统治制度的相应发展。人口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民政、军事却日渐腐败，国内问题也日趋尖锐。这与人口的增长自然不无关系二管理不善，于是问题丛生；问题越多，管理越发腐败。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不过由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势力的侵人，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西方的介入，清王朝的衰落是一种"扭曲"了的复杂过程。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西方的扩张历史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一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欧洲人把他们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中世纪（即中国的盛唐时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并且强调十字军东征、商人阶级的壮大、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业繁荣及意大利一西班牙对印度洋香料生意的控制等因素。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人中国的。

不管怎么看，中国在唐宋乃至马可o 波罗时代的元朝，无论是面积还是发达程度显然都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

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与物质技术相媲美的，是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稽查论核制度二简言之，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落后。

葡萄牙不过是一个人口才150 万的小国，但正是该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定下了基调。他们于1498 年绕道非洲好望角，于15511 年攻占了马六甲，并于1514 年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即原先倭寇、海盗不断侵扰的地方）。葡萄牙人要求取得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但未获准：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乘坐中式平底帆船登陆中国的，当时的欧洲人还未养成每天洗澡的习惯，航海条件又很恶劣，因此他们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种毛发浓重、体臭逼人的形象。首批来华的葡籍探险家们未能证明欧洲文化足以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1517 年，"葡萄牙国工"遣使"中国国王"，使团抵达广州时按照西方惯例鸣炮致敬，这大大触犯了天朝的礼仪，中方官员要求葡方立刻谢罪。就像对付其他国贡使一样，他们把使节关押进市舶司，又按中国惯例将他们解送进京与之同时，其余的葡萄牙人则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在珠江河口外的岛上筑堡架炮准备交战。中方下令停止贸易。按照中国的法律将这些人指为盗贼、绑匪，说他们从中国拐子手里购买幼童云云。1522 年所有在华葡萄牙人都被驱逐出了广州，而来华的首批葡萄牙使节则最终老死于中国狱中。后来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才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将其贸易基地建在了澳门。中国政府在澳门四周筑起栅墙，在1887 年以前一直定期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和关税。晚明时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活动与荷兰人相比，几乎就黯然失色厂：后者于1641 年攻占了马六甲，但在此之后他们主要是在东印度一带扩张势力。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会士由于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最终打进中国宫廷并且还担任了职务。

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 1552 一1610 年）。他于1582 年受教廷派遣入华传教。他是意大利人，身材高大健壮，碧眼长

髯，声音洪亮，个性鲜明利玛窦及其同事入华之前在印度和日本已积累了一些传教经验，入华后同样采取了融通阐发（accomodation ）的汉化方针，他们首先面向上层人士传教，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采用中国的风俗习惯，同时避免与在澳门的葡萄牙籍商人发生干系。他们到中国不久就脱下僧袍，换仁了儒服，也并未直接开展传教，而是通过与儒家学者们谈天、辨论，用三棱镜、自鸣钟和地理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官话讲得十分流利，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利玛窦得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可与儒学相提并论的知识和伦理体系介绍给了中国人。

1601 年，利玛窦像中国的有学之士一样，受到高官的赏识，并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所。他贡上的两座自鸣钟和一架钢琴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于是后者召见他及其同事进宫演示这些机器。利玛窦最终使皇帝明白他并非贡使，并且作为一名学者接受皇家的俸禄。几年之内利玛窦及其同事发展了大约200 名教徒，其中有一些还是政府的官员。

利玛窦的继任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西方天文学的成就来修订中国的历法。在中国，天子必须格外注意历法，以求精确预报天体的运行和四季的变化。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的钦天监分别由汉人与回人历官把持，但无论是夏历还是回历都不够精确，如预报1610 年的一次日食便出了几个时辰的误差。1622 年来华的德籍耶稣会会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上Von Bel上) 精通天文，后来他在满清官廷担任过钦大监监止的职务，并于1632 年在宫廷举行过弥撒。

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连崇祯帝也渐渐转向了基督教。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 世纪时会士与皈依的中国学者合作译出了其中的大约380 种著作这些书多为神学著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气象、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明清易代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皈依者，他们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真正先驱。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徐光启（教名保罗， 1562 一1633 年）。徐氏于1604年得中进士后成为翰林，在此之前他就已经饭依了

基督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徐光启于1632 年入阁成为大学士，此后他将耶稣会士介绍进了上层官员的圈子，并协助他们通过文言著作来宣传基督教义。"徐保罗"和汤若望神父还帮助朝廷搞来一些火炮之类的西方军械。在抗击满洲人的入侵时，汤若望曾于1636 年主持一家军械铸造厂，制造了约20 门大炮。简言之，西方的技术比其宗教更为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满人于1644年人关后，汤若望继续在清朝的钦天监中任职。康熙幼年时经常见到他并称他为"爷爷", 后来他允许传教士在北京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在康熙统治中期，在京耶稣会会士使团发展到了巅峰。他们与最高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私交，甚至天天晋见皇帝。某次康熙染病，他们将金鸡纳霜进上，治愈了皇帝的病，结果更加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后来还奉旨采用西方技术勘测各地以绘制大清帝国的地图。他们的身份等同朝臣，和众臣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与百官礼尚往来，在朝中广泛结交了许多朋友。

中西文化关系

耶稣会会士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他们力图弥合中西，结果却受到双方的一致攻击。不过有意思的是，攻击主要来自欧洲基督教中其他教派的教士。欧洲主动与中国取得了联系，相对中方而言起初却受到更为巨大的文化冲击。通过耶稣会会士的辗转介绍，启蒙时期的欧洲将中国想象为一个具有不受宗教约束之自然伦理观的古老国度。这种观点被伏尔泰及自然神论者、重农主义者一再称引。18 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伦理道德和仁君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演亦风靡一时。

耶稣会会士作为首批入华的西方技术专家，在京城的宫廷里担任着天文学家、翻译官、绘图师、画家、建筑师及工程师等多种职能。他们在圆明园主持修建了巴罗克风格的宫殿、仿凡尔赛宫的西式喷泉，满清宫廷中一时西风大盛：不过耶稣会会士的首要任务终究是传教，为了使从督教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他们采取了将原则与实际相结合的"汉化"传教方针。）这种融通政策正是他们在亚洲传教取得成功的秘诀。正像徐光启所说的，基督教可以"化佛补儒"耶稣会会士将四书五经视为"古人智慧"而接受下来，但将理学家的注释统统删而不

问，同时将道教与佛教视为偶像崇拜而大加抨击这样，基督教就与儒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耶稣会会士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其他教派会上的指责。祭拜祖先到底是一种可为基督教徒接受的日常礼仪，还是一种必须加以禁止的异教崇拜。儒家家并不反对鬼神，如官员在天旱时常常设坛求雨，这又应如何对待？许多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耶稣会会士们的"汉化"政策超过了限度，他们为了使中国大夫接受基督教牺牲了太多的信仰原则。因为中国人说到底并没有"天主"的概念，他们的"天"和"神"都不足以用来描述"God"（上帝）这一精神实体。

17 世纪40 年代，从菲律宾入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和圣方济各会教士将礼仪问题上呈罗马教廷仲裁。他们原先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墨西路及菲律宾传教，由于当地并无强有力的统治力最取阻止教士的渗透，因而这些教士的传教方式与来华耶稣会会士大不相同。他们来华后一反耶稣会会士的成功做法，以下层民众为突破口，走街串巷进行传教活动。1710 年中国共有59 名耶稣会士，29 名圣方济各会教士，18 名多明我会修士，15 名主要来自法国海外传教团的世俗传教士以及6 名奥古斯丁修会会员。单是耶稣会在中国就有70 处传教驻地和208 所教堂。当时天主教共有30 万教士，但罗马教廷内部争权夺位十分严重。"礼仪之争"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约1640年至1742 年），不仅教会内部意见相左，欧洲与在华教士互相辩驳，最终连教皇与满清皇帝也发生了争执。

同时，儒家学者对基督教也心怀敌意，他们对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处女受胎说及耶稣的神性等问题都抱着一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对本国文化中的儒、佛、道三教则采取了一种保护的姿态，对风传的传教士和教徒乱交，拐卖儿童、挖取死人心和死人眼的做法亦深恶痛绝。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杨光先（1597 一1669 年），其人排斥基督教不遗余力，如摘出耶稣会会士记述汉人为希伯莱人之后的文章来挑拨民族感情，还指控南怀仁用符咒镇魔先帝顺治云云。这使得迷信萨满教的清廷大为震动，拟将南怀仁处决，幸而此时发生了地震，清廷认为是天象示警，南怀仁才逃过一死。不过在此之前已有5 名基督徒历官被处决了，而且因为基督教徒们的礼拜仪式大似秘密会社的集会，所以基督教仍旧受到官方的怀疑。

入华耶稣会会士在欧洲也受到了打击。1700 年巴黎会议之后，在京的耶稣会会士为了自卫，请康熙下了一道支持中国传统礼仪的圣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看来，康熙无异于越姐代疤代替教皇裁断神学问题。分别代表葡萄牙、法国和不同教派利益的基督教教士们此时则开始破坏耶稣会会士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取得的成果。在中国皇帝与教皇的争论中，耶稣会会士大多站在中国皇帝的一方。康熙曾派耶稣会会士赴罗马将其69 道圣旨宣示教宗，结果却导致罗马于1715年颁布了否定耶稣会做法的教皇谕旨。

入华耶稣会会士的归化政策在100 多年中得到了满清朝廷的接受，终康熙一朝，他们都被视为有用并且可以信赖的人才。此时颁布的教皇谕旨否定了耶稣会会士的做法，这就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康照曾派一名耶稣会会士绕道俄罗斯赴罗马交涉，但教皇做出的惟一反应却是更为严厉的拒绝。1722 年之后，雍正帝开始驱逐日渐卷人宫廷斗争的耶稣会会士，并大力镇压在华教士的传教活动。许多教堂被充公，除了北京之外的各地教士不得不转人秘密活动。1724 年雍正在《圣祖圣谕》 中加了一条批注，指责基督教为"异端小教"。1742 年罗马颁布的另一份教皇谕旨为此后200年（直到1938 年）的礼仪之争奠定了基调，要求人华教士必须严格宣誓拒绝"中国的礼仪"。乾隆执政时期，京师之外的传教士一直受到官方的打击迫害。他们不得不改装换面，远走穷乡僻壤。教友聚会受到了限制，而对基督教的敌视思想亦开始深入民心。

早期中俄关系

中国与欧洲的海上往来以及在京耶稣会会士发往欧洲的信件，往往使西方人忽略了中俄通过西伯利亚进行的陆上交往。当然，在这条路线上俄国人面临着更大的后勤问题。欧洲人能用船将整支自给的机动部队开到马六甲或广东而并无沿途出入异国国境之累。海上调兵遣将往往也比较便利，而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乘坐的帆船也能比驼队运载更多的货物。

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地区逐步进行殖民扩张，进程缓慢但获得了相对持久的成果。俄国人于1637 年就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岸，几乎与英国人发现美洲新英格兰地区同时，此后在向东亚地区进行渗透时却落在了从海路而来的西欧人之后。如果说英国人的舰队像一阵威力巨大但

难以持久的台风攫取了东亚，那么俄国人则像一条冰川在此进行缓慢的殖民渗透。今天美国人与远东的海上交往也继承了西欧的传统。俄国的做法与西方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

俄国人于1580 年左右开始从奥伯河（Ob River）流域北上，在几条汇入北冰洋的大河沿岸地区进行扩张。那里的气候和地形都极其恶劣，人烟稀少。莫斯科派到此地的官员都是腐朽的寄生虫，他们设立由释道相连的边防站，向当地人民征收动物毛皮。由于粮食供应缺乏保障，俄国的探险家们开始寻找一块产粮区，于是很自然地来到阿穆尔河一带，从这里他们通过驱船或雪撬可到达较为富饶的土地，而__且从这里也可以人海。1643 年以后，雅库茨克的哥萨克部队开始沿阿穆尔河一带与当地部族交战井建立起军事据点。其他几路哥萨克远征部队则经贝加尔湖南下叶尼赛斯克（即雅克萨，Yeni - seisk) ，于1656 年在阿穆尔河主要支流上的涅尔青斯克（旧译尼布楚，Nerchinsk ）建立了据点，后又于1665 年在阿尔巴金（Albazin ）以东修建了永久性的哨所和碉堡。

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修筑哨所与清朝发生了冲突，满洲北部各族纷纷向京师告急求援。不过，清朝在与俄国的对峙中起初并不占据优势，清朝直到1681 年才真正完全统一了中国，但此时又发生了准噶尔部的叛乱，而西蒙古诸部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已有接触往来，东蒙古诸部也在涅尔青斯克与俄人进行贸易活动。因此，康熙皇帝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把俄国人驱逐出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还要防止他们与蒙古人的进一步勾结。中俄双方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早在1619 年就已形成。1654 俄国沙皇遣使致信清朝皇帝，目的是在否认中国为宗主国的条件下发展两国贸易。俄使拒绝向清帝磕头，而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对贸易不感兴趣，俄使坚持按欧洲各国平等交往的惯例行事更触动了"天朝上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未得数见便被遣返出境了，当时来华的另一名俄使即为颇富传奇色彩的N . G ．斯巴塔一麦莱斯库，其人出身于希腊一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康斯坦丁堡接受教育，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地。他于1676 年到达北京，首次带来用拉丁文写的国书，并请耶稣会会士为他做翻译。他在接受清帝赏赐给沙皇的礼物时拒绝下跪，因此也同样遭到遣返出境的命运。

康熙于17世纪80 年代早期巩固了国内统治之后，开始有条不紊地从满洲南部向阿穆尔河流域修筑水陆骤道、哨所、粮库和屯垦驻军，并且建立了一支水军在满洲进行操练。清兵很快就将俄国人赶出了阿穆尔河下游一带。清兵以优势兵力围攻俄军在阿尔巴金的最后一个据点，在这种情况下俄皇决定与清朝进行谈判，并派遣了一名大使赶到涅尔青斯克。这正是谈判的好时机，因为此时清朝正需对付西蒙古各部的内患。仿效斯巴塔一麦尔斯库的先例，康熙指定2 名耶稣会会士担任翻译兼顾问，派他们与俄国人进行谈判。耶稣会会士穿梭往来于双方大营之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和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达成了协议，并由耶稣会会士用拉丁文誊写一份条约，另以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各写一份以存照备考。这是一份平等条约，它将俄国的势力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但允许俄国在此建立稳固的基地并通过商队与北京进行贸易活动。俄国人亦同意拆除阿尔巴金的军事设置并撤出阿穆尔河流域。条约划定了满洲北部的界线，但对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则语焉不详。通过签订《 尼布楚条约》 ，康熙阻止了俄国向东蒙古各部进行援助。在此之后的10 年中，他最终击溃了葛尔丹并巩固了他在西蒙古的统治。此时俄国的商队亦经乌兰巴托从蒙古源源来到北京。这些商队都持有官方护照，随行的使节介于官商之间，统一接受理藩院的管理，与朝贡儿无二致。使团人数通常限定在2000人以下，入华需凭一套编号的符信行事。在北京他们与贡使一样下榻于俄罗斯会馆，四周有卫兵把守，使臣靴见皇帝时照样得叩头如仪。

在当时清朝为控制亚洲腹地而采取的战略中，中俄关系一直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彼得大帝在位时逐步向西进行扩张，与准噶尔部不断进行战争、贸易和谈判。俄国人希望能摆脱耶稣会会士而直接与北京建立永久性的商业和外交关系。结果，一支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以解决在京俄国人的精神需要为借口进入了中国，17 世纪60 年代俄国政府即以此为口实不断随商队向中国派遣传教团。雍正帝为了限制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于1722 年后对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团表示了欢迎。另外他还希望阻止俄罗斯与准噶尔部结盟并消除俄罗斯在东蒙古诸部中的影响。

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满洲人的战略计划相结合，促使两国于1727年达成了另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大使率军1500人及100 名随员到北

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半年的磋商后，他撤回到乌兰巴托以北、蒙古与西伯利亚边界上的加塔（kiakhta)，并在那里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俄国被明确排除在蒙古事务之外，作为回报，俄罗斯在加塔与中国定期进行贸易。俄国人获准每3 年一次向北京派遣商队，并且在北京派驻东正教传教一外交使团。他们可以在北京建造东正教教堂并派遣"留学生"进修汉语。不过，1730 年之前到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有20 个，但在接下来的100 年中只有6 个使团来到中国。清政府对商业不感兴趣，政治的稳定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而最好的对策就是与世隔绝。清政府曾两次向俄派遣使团（分别于1731 年、17 犯年向莫斯科、圣彼得堡派遣使节）以确保俄罗斯不介人西蒙古诸部的事务。清使觑见沙皇时，一如俄使在北京参见清帝，照样一跪三拜行礼如仪。清朝的这种务实性外交取得了成功。到了1760年，清朝已经在西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西蒙古的叛乱亦被扫平，而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往则局限在大清帝国的边境地区。

广州的贸易

清廷的外交政策是通过限制对外交往以维护国内的稳定，但这一政策在处理广州的海外贸易时似乎失去了效力。中国在18 世纪时面临着欧洲新兴的更有力的扩张形式。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一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在北美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的特许公司，为一私营组织并集中控制了大量资本，同时通过皇家颁布的特许状在海外拥有广泛的政府权力，垄断了本国同某些地区的生意。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地均设有军事据点，在当地行使裁判权，同时发展海军力量及商船运输事业，实际上扮演着亦官亦商的角色。东印度公司最终取得了对印度的统治，并且一直维持到1858 年方告结束。英国的对华贸易扩张即以印度为基础，而商业精神在公司各项事务中均古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英国大众对中国茶叶需求的增加，英国、印度和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而英属印度的财政收入亦在某种程度上逐渐依赖于他们在广州的商业业务。

英国人于1699年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工厂（或曰商业据点）。在此之后的60 年中，中英两国的贸易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广州商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渐渐将所有的贸易业务都集中到了广州，而且其出口业务亦逐渐集中在茶叶和丝绸这两项。18 世纪时的茶叶生意成为

一项高利润的业务项目，并巨它还进一步刺激了两国间贸易的发展：英国致力于装断本国国内的茶叶生意，并通过印度将生意扩一大到中国，清朝则努力维持广州的茶叶生意并从中收取厚利。

对于中国而言，清朝时海外贸易发展之快已然突破原有的朝贡概念欧洲人在广一州的贸易活动即促进了这一变化，而另一个因素则来自中国商人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事实卜，正是这些中国商人打破厂朝贡体制，而后来的西方人不过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罢了：中国人在生意中使用帆船，船的体积与外国商船大小相仿，但数量远胜后者。中国帆船最大者载重量可达l000吨，载员180 人。一艘普通的中国帆船载重量为15O 吨，船尾高耸，船帆呈三角形，山木棍支撑以借助风力航行，时速可达6 至8 海里，与东印度公司帆船的速度相差无几二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每年冬季南下，夏季北上，往返于厦门、广州与马六甲海峡之间、他们遵循琐细的航海规则，穿行于各个中途港LI 。由于这类贸易活动是由中国商船开到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因此以往的朝贡制度便不能适用。相反，清朝官员采取了一种传统的做法，即指定商行（英文中讹为"hong ") 充任中间人来负责中国与国外的贸易活动。

同样，在广州主管对欧贸易的中国商人逐渐也形成了西方人称为"公行"(eohong ）的商业行会组织。公行由6 至12 家政府特许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商行组成，并且直接向政府负责，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外贸生意：在广州负责外贸税收的官员由京城内务府特别指定，外国人一般称之为"Hoppo " ，中国商行中人向之交纳巨额税款，并且对来华的洋船和洋商负有责任。抵达广州的每一艘货船均须得到一名公行商人"担保"。在外国人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局负责经管一切来华的英国船只和人员。在1760年以前，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在华贸易是在中方控制下进行的。

当时来华外商受到种种限制，如不得携带家眷、不得乘轿等等。他们的住处被划在广州城外沿河一带的"十三行"地区（即洋商、洋行的聚集区）。洋商的贸易活动也受到公行的种种限制，同时他们还得遵从中国的刑法，其公民权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还有遭受逮捕和拷打的危险。

广州这种独特的生活与贸易方式颇富传奇色彩。对于"十三行"的年轻洋商而言，广州意味着异国情调、与商行领袖的应酬往还以及巨大的商业利润。由于中外商人唯生意是谈，他们发展出一种洋径洪语言，即使用汉语的文法但掺人数量有限的一些外语单词。这种语言在今天的香港尚可听到。只要这些年轻人未得疟疾而一命归乎，他们很快就会发财，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少而又少。广州的中外交往相对说来较为容易，因为它取决于商行而非官府，无需为主权国家间的平等问题而大动干戈。

这样广州等于已经纳入了世界贸易的轨道，但中华帝国对此仍是借懂无知，在政治上也依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东印度公司一向注重眼前利益，在他们看来，打破中国这种对贸易扩张的传统冷漠态度似无必要，倒是英国政府的领导人急于为本国产品找到销售市场。这时东西方都已有人呼吁以自由贸易代替贸易保护主义。1784 年，雄心勃勃的美国商人加人了广州的商业战场，私营业主函欲进入印度市场并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就是1793 年英使马戛尔尼（Macartney）来华的历史背景。

马戛尔尼本人领取东印度公司的薪水，但他这次是奉英王之命乘战舰到达了天津。他请求清政府开放宁波、天津及其他几个近海城市以发展中英贸易。他呈交了一份印制成文的正式税表，但忘了给经手官员送礼。从一开始，这位英使便不得不力使自己同以往的贡使区分开来。他带来的贵重礼品一概被中国官员标为"贡品"，并且他们还敦促马戛尔尼演练三跪九叩的礼节，但遭到了后者的严词拒绝。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还下沼褒奖英王乔治三世的"向化归诚之心"，但同时指出，天朝万物丰庶，不需要什么外贸。通过这次直接接触，英国人对中国开始有所了解，但对广州的情况仍是一无所知。中方的文献一再强调朝贡的礼仪制度，1795 年荷兰使节来华更加深了这种看法。因为当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们在很多场合都同中国人一样叩头行礼。马戛尔尼来华使命的失败是由于他触犯了广州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由于利益极丰，东印度公司在其最后几年中又格外小心，因此广州的商业体制不论西方人做出何种外交努力都是依然故我。英使阿美士德（Amherst) 1816 年来华时受到更为草率的接待，而且不幸的是当时英

国又正与中国的属国尼泊尔交战。阿美上德抵京后又被中方接待官员引见失次，结果未得觑见皇帝便被草草打发走了。

到1825 年为止，正当欧洲准备大规模进行扩张之际，西方与中国的交往还停留在17 世纪的水平，清代统治者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国内统治制度，稳定了中央在伊犁、拉萨、加塔及广州的对外关系之、当时欧洲甚至北美同中国已经有所接触，但在头3 个世纪里，这些接触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

第10章 中国在19 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一、传统中国对变革的反对

19 世纪中叶，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都先后面临西方列强的凌厉攻势而不得不与之打更多的交道。英国历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给东亚带来的只是幻灭与苦难。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当西方列强叩门之时中华帝国已然外强中干、临近历史循环的尾声了。19 世纪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苦难深重。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梳理这时中国国内的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入侵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的。这些内忧外患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并无时不互相产生着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当时日本国内正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后来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其原因至今也仍然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统治阶级及其农业规划

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这种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乃是广大农民阶级同朝廷统治之间的中介。明清两代的统治阶层事实上是由地主、商贾及文人士大夫这儿种类型的人构成，他们一起形成了乡村市镇的精英阶层以及王朝统治在地方上的拥护者。

统治阶级由于垄断了文宇与高雅文化而与农民阶级迥然有别。其力量来自于家族制度，事实上，上层阶级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家巨族构成，它们想尽各种办法来维护自身的地位与利益。族中长老负责管理族中财产、修撰家谱、在宗祠中主持祭祖仪式、救济族中贫困成员及举办家塾，并且有权力惩治族中的不肖子弟以免惊动官府。为了维护本族利益，族人的婚事通常由家族出面撮合包办，当事人反而无权

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当然，有时同族之中富家亦会与贫穷但有才华的人联姻，这有助于下层人士通过努力奋斗到较高地位。但分割家产和田地在人口增长时期也会导致家庭逐渐走向贫困。大体说来，地方精英阶层中存在的种种亲戚关系有助于家族的维系与发展，族内贫穷但才能出众的人亦可获得出人头第的机会。

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而非城市型、扩张型的模式。儒家历来重农抑商，"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按此，一个人理应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

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依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标榜"修身", 尤其强调通过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君子，并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步入仕途。甚至一些有钱人亦可捐买功名，因此科举制度受到广泛的支持，"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深人人心。获得功名但不足以担任官职的低层缙绅阶级包括两类人物，其中大部分为获得秀才功名的真正学者，但也有1/3左右的人是捐班监生。和前代一样，时人通过世袭或赏赐也能获得功名。到了1800 年，这一阶层的人数约有100多万，往往从中产生出上层缙绅或高级官僚。至于上层阶级则由获得举人以上功名者或官员构成，人数约有十二三万，他们往往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样，科举制度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一些富人可以捐钱步入仕途，但主流仍是真正的学子，而且后者往往也古据了高层的职位。这反过来又确保了正统观念的统治地位。

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经济

中西交往最初始于商业，早在中西形成外交关系、西方观念输入中国之前，贸易便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环竹了二但是中国的经济，就像中国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西方的攻势反应不够灵敏。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而民能够自给自足。在旧世纪早期中国约有3 亿农业人日，古当时全国人日的4 / 5 ，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主要是他们的土地，通过祖祖辈辈的劳动，如围田、修堤、打井、挖渠，生产也得到缓慢的发展二这种农庄经济需要先期投人大量的劳动和劳动力来维持其运转。其他类型的生产资料，如牛马等驮兽、劳动工具、住宅、粮仓等等，大都难敷生产之需。由于技术陈旧落后，可以开发的

自然资源也很匿乏。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源却很丰富，18 世纪人口的飞跃发展，大大增加了人口中青壮年的比例，这就导致了劳力甚至是熟练劳力过剩但土地、资本缺乏这一现象的发生。当时既乏节省劳力的技术革新，也缺少这种革新的动力。所谓"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经径渭分明的对垒即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都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却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商业上，各地的贸易活动集中在一些市镇进行，这种市镇每省都有好几十个。市集大约每三、四天举行一次．附近一日路程之内的村庄都用家畜、手推车、扁担．或灿板将货物运到市集。小商小贩亦在此贩卖盐、铁、纸、纺织品、陶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货物。

在这种蛛网状的市集形式上还有一种地区间的贸易集市，主要从事铜、瓷器、皮毛、丝绸和木材的生意。中国的国内贸易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型市场。广洲与西欧的贸易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变种罢了。

地区间的贸易活动主要依靠便利的水利交通。像茶砖即是从长江、汉水运到北方，再经驼队运往蒙古和俄罗斯的。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亦通过大运河或海运互通有无。如福建的茶叶和安徽的丝绸经赣江运往广州，四川的货物沿长江而下，宁波等地的货物可用舶板一直运到满洲，而厦门的货物则运往东南亚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运输网络系统。这也是西方人打进中国市场的一个原因，因为西方人使用的汽轮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的水上交通网络，并很快就使中国的传统货运方式得以改观。

另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并未使中国的国内经济格局迅速得以改观。像茶叶和丝绸等出口商品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易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各地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与发展贸易所需的资本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当时信贷制度尚未出现，商业事务中主要使用铜钱和银锭。商人受制于官府，他们或者寻求官吏的保护，或者自己捐买功名，因而中国的商人更像政府专卖事业的税吏而非具有冒险精神和事业心的投资者。

19 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未起到应有的宏观指导作用。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简言之，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统治者认为每年的贸

易成交额是固定的，对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都征收同样的税款，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同时官方的专卖制度与特许买卖制度也限制了商业竞争的发展。

总之，1800 年前后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比，不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亦有极大的差别。首先，中国自视为（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既未受到官方的鼓励，也未被课以重税。其次，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制度，技术创新一向遭到忽视。第三，中华帝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除非受到官府的庇护，否则资本积累在中国也很难实行，像法制保障、投资市场以及合资企业等西方经济因素在中国亦尽付侧如。最后一点，中国在灌溉、种稻、运输、手工业等所有活动中均使用大量人力，这大大节省了资源，但不利于技术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长则吞食了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总之，生产仅够消费之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人民仅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储蓄或投资。

政府的惰性

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亦未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通常一名县官负责管理方圆300 英里之内的二三十万百姓，即所谓"七品芝麻官"，因此，他根本不敢得罪当地缙绅，也不可能实行改革，而事实上他的为官之道也不允许他如此行事。县官往往由其师爷及随身仆役辅佐并负责后者的薪晌，以此来管理衙门中的青吏、捕快、人犯等各类人员。县官不仅仅是一名行政长官，他对境内之事负有全部责任，必须管理本县行政、司法、钱粮等一应事务。就像皇帝必须是全国的表率一样，县官在一县之内也必须以身作则，并以一种近乎仪式的方式对境内之事作出奖惩。这种官场仪式的宗旨就是用尽一切方法避免事端。为了能在3 年内升迁官职，地方官们并不关心当地的长期发展，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息事宁人，得过且过。如果大力整顿秩序，就等于承认境内不法现象的存在，这反而会妨碍他们的前程。因此，与其兴师动众地剿匪清盗，不如将他们招安收编到地方军队中来。其结果，便是

官府与地方势力的妥协、合作而不是对之进行整顿、改革。所以，中国官场充斥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官员们明知事情会发生，但都希望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才好。

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只不过是陈陈相因、墨守成规而已，即便是皇帝本人的统治也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特点。他所起的作用像是一个情报交流中心，折冲平衡大臣的意见但并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往往是大臣上奏之后由皇帝作出朱批传旨执行。由于事务太多，皇帝只能选择其中重要者做出同意或否决的批示后再交付大臣处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为何中国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显得无能为力的原由了：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__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地方官员若想改革会遇到重重阻力，尽管京城的皇帝整日忙于变革。整个官僚机构管得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远为不足；本为维护皇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失灵。

腐败造成的国力下降

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 世纪中期清朝官场中沉崖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豁民财。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瘤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人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川中国各阶层的复杂人际关系。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收受贿赂亦已然成风，当"外敬"的数口大大超过法定的俸禄时，腐败现象便真正不可收拾了。

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数字只是极为粗略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的。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镰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份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报呈朝廷的表章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

例如，在产稻基地的长江上游地区，土地税主要包括两项。其一为按16 岁至60 岁男丁人口和土地面积征收的固定复合赋税，不过1700年以后则改由各级政府交纳固定份额的赋税。其二为贡粮，亦按一定份额，以钱或实物的形式上交朝廷。负责收税的官员不但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且挖空心思通过收税作弊来中饱私囊，其手法堪称厚颜无耻，如通过"库耗"的名目私扣公粮，或将贡粮折成超过实值的银钱、或提高纹银与铜钱的折兑率来盘剥百姓。苛捐杂税和库耗往往高达原来赋税的10 倍之多，这些民脂民膏大都由地方官府和缙绅及上级政府三者之间分肥，他们狼狈为奸耗尽了农民的"血汗"。至于差役青吏，他们通过征收关税、通报钱或下乡揩油，亦可分得一杯羹。

这些"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的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婿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愈是富有的家族就愈有可能与官府结成良好的关系，而地方上获得功名的人，即便他们本身不是地主，但由于他们在官场中的势力，差官税吏也不得不予以优待。这种劫贫济富式的税收政策在各省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记载。如富户交纳4000文钱可抵4 斗粮食，那么一般农户就需交纳2 万铜钱。衙门中的差役亦乐于替地主效劳向农民催租收税。结果，农民为了减轻赋税负担纷纷投靠豪门富户，而富户亦乐于将农民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以便剥削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样，地主、缙绅阶层中饱了私囊，但国家税收却遭受了损失，而小民面对地主与官府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我们在上文中总结了19 世纪初中国农民之所以贫困的几条原因：首先，农民缺乏改善生活的经济资源（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其次，劳动成果分配不公，农民饱受地主和官府的盘剥。这几项原因当然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相影响的：

二、学术与思想

"今大学派"与"经世学派"

白莲教起义（17956 一1804 年）之后，王朝的衰落之势也波及到了上大夫阶层。他们熟读经书，深通国家兴亡之道：腐败与农民起义促成了前代各朝的夭折，清朝又怎能例外呢?

这种忧患意识促进了新型学术思想的发展。至19 世纪时"汉学"学派已成为学术正统，不过此时又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一即为"今文学派"。汉学学派正如其名字所显示的，以东汉典籍为研习对象，并将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奉为圭臬。不过，到了17 世纪末期，古文《 尚书》 被证明系后人的伪作或篡改而成，因此又出现"今文"一派，将东汉之前的典籍奉为正宗，认为它们要比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更为古老因而也更为可信。同时，"今文学派"的学者还在"今文"经书中，尤其是在《 公羊传》 一书中，发现不少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简言之，《 公羊传》 一书中的变革思想成为当时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为19 世纪末对传统思想的全面清点和开放国门做好了铺垫。不过，"今文学派"运动直到19 世纪90 年代仍然处于酝酿阶段。

19 世纪出现的另一思潮代表为"经世学派"。这一学派同样为前代思想的复兴，即反对直觉认识、玄学思考和形式主义，主张学以致用。清王朝的衰落，重新引起学者们对统治政策及其施行状况的关注。清代朴学虽然囿于对古代尤其是古代文字的考察，不过也记录了不少前代统治制度的详细情况，诸如祭礼、丧服、交通工具乃至头饰马具的式样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一学派对于如何解决晚清时种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却显得一筹莫展。随着晚清颓势愈显，学者们就像明清之际的学者一样，开始对社会进行反思，同时对学者的皓首穷经却不通世务也大加批判。顾炎武的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经世致用"的口号风行一时。不过，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以维持帝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为己任。魏源即是这一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魏源原籍湖南(1794 一1 857 年），属于思路开阔、讲求实际的新型士大夫。他在北京时曾研习宋代理学及汉学（古文学派）, 他对这些正统学术研究的批判促成了"今文学派"运动的产生。〕 他还主张学者须讲求通经致用，学问要用来解决当代迫切的政治问题。大运河停运后，魏源于1825 年著文主张通过海路将贡粮运至京师。当时的江苏巡抚服膺其说，于1826 年把魏源的主张诉诸实践，将巧。船的贡粮从海上运至天津，但只实行了一年便停止了。在19 世纪30 年代，魏源还曾致力于改革淮北盐务，后又于19 世纪50 年代亲自掌管该地盐务，政绩卓著。可以说，魏源是一名实于型的学者。

1826 年，魏源应邀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其中收录了2000余种有关经济和政治的文章。这成为后世此类丛书的雏型。为了引起士大夫们对时局的关注，随后又出了10 余种续编或补编。魏源在此之后又入两江总督幕，得以接触到诸多珍贵文献，如未经发表的奏章、论著、卜疏及议案等等。在此基础上，他编撰了《圣武记》一书，其中回顾了满清对中原、蒙古、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征服历史，以及清兵与俄罗斯、缅甸、越南及自莲教徒作战的赫赫武功）此书成书于1842年，止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

像魏源这样关注时局的士大夫还有一些，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满清政府一方面网罗文人学者，但同时又排除异己，这就使得清初充满生气的政治思想渐次摧折，沦为摘句寻章的考据之学。学者们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思想仅仅局限在词源或训诂的考据上，学者们的天才都耗在了史传经书文章之中。像阮元（1764—1849 年）就是一名典型代表。：他是一位著名的藏拓家，于1817 年至1826 年曾出任两广总督。他一生多次出任各省总督或巡抚，兴建了多所藏书楼与书院，刊印了至少十几部大型著作，如古玩训录、诗集、十月经注疏、珍稀古籍汇编等等。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期间，与时中英冲突正在酝酿之中，他又兴建了一所书院，并主编了广东省的地方志，印行1366 卷180 种经文注疏汇编，又发表了自己作的约50 卷诗歌、散文及书话，还刻印了江苏诗人的183 卷诗集。另外，他在绘画、算术及金文、石鼓文等方面也有独到的造诣：）做这些事情时，他正在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任上，负责中西的外交往来，因此他在西方咄咄逼人攻势之下一味妥协、避让，也就毫不为奇一了。

西方在中国的形象

有阮元这样的文人士大夫为榜样，一般的正统知识分子就很少有机会和动力对域外国民产生兴趣。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其中不乏谬误和歪曲— 已然深人民心，并且形成了中国人对19 世纪欧洲国家与人民的知识，并且以讹传讹，乃至成为定论。除此之外，惟一的信息来源便是来到广州的西方人，但这些人数量很少，而且多为商界人士。由于缺少准确的认识，19 世纪早期的中国人在打量欧美人时，套用了以往几千年中与亚洲各国往来的模式。如亚洲腹地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兴衰变迁，也一再变换名称与地域，故来华做

生意的西方人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描述成像幽灵般往来飘忽不定的人。中国人还搞混了西方各国的名称。如在阮元主持编写的广东地方志中记载，非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是明时居住在锡兰与马六甲之间的一处蛮夷，葡萄牙位于马六甲附近，英国即是荷兰或为后者的属国，法国人原为佛教徒，后改信基督教＜当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法国即是葡萄牙云云。

看来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了解西方没有什么兴趣。当魏源等杰出之士试图了解西方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西方著作的译本。时人对西方一无所知，当西方开始横行中国时，中国人才发现，中为年来对付外夷行之有效的那套办法突然失灵，丝毫不起作用。

三、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

国家贸易与私营商人

印度的私人企业从一开始便是东印度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它们与当地发展贸易并赚取利润。这种私营企业采取所谓"国家贸易"的方式，即由私人业主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开展贸易活动这种形式首见于印度及邻近地区，英国公司将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均可汇兑的汇票转售给英籍或印籍的"国家贸易"商人，利用后者的利润来发展本公司的汇兑业务二为一了争取更大的商机，"国家贸易"扩展到了东亚。例如，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孟加拉的鸦片供应，然后通过拍卖形式将之转手给"国家贸易"商人，后者再取道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将鸦片转销到国外。英闰人和苏格兰人开设的私家商行为这种"国家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他们组成"销售局"，不仅投资造船业，而且也一手操办了货物、船只、仓库、保险及收取佣金的私人交易等业务：这种方式正好介于英国的商业、财经和工业扩张与现代国际贸易活动之间的分水岭上。

印度的"国家贸易"很快做到了中国。早在18 世纪80 年代，积极进取的英国人为了逃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已然在广州开始充任欧洲各国政府名义上的代表。这在后来成为一项定例，如1823 年，詹姆仁、开弟臣（JameS Matheson ）担任丹麦领事，托马斯o 丹特担任萨一丁岛的领事：担任这一职务获利甚丰，无需多少资本，但需要极大的事业心与创造精神。这样，丹特、升弟臣及其他在广州的英国人很快就有了自已的舰队，成立了保险公司，并开展了银行业务。东印度

公司于! 813 年停止了对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垄断后，原先的业务交由"销售局"办理，而私有业主往往即是这些机构在远东地区的联系人和主顾，反过来这些销售局又成为大英帝国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首选利器。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国家贸易"于1817 年后古据了英国对广州进「份额的3 / 4 ，迅速完成了两项工作：首先，它为印度的产二品找到了销售市场，并将利润源源汇上印度；其次，它继续为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茶叶一提供资金，英国政府在此项生意中通常能获取很大的利润。

中国方面的商业利益也相应地增长起来了。不过，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广东是中国南方手工棉纺织．钻及茶、糖的一个集散地，其中棉纺织品大多为"南京布"，因为当时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主要分布在苏州和松江一带。这些出口商品不包括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内，而国内生产则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大众的消费。直到19 世纪，印度都是从外地进口棉花再转销到中国，这是印度"国家贸易"的主要进口、业务。行会商人就像一个漏斗，他们从华中原产地的游商手中买来茶叶、蔗糖后又转手销往外地。当时从江西到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驳船或苦力搬运，广州的贸易额相对说来虽然不大，但它在积累资本、培养商业精神及商业利益等方面都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广东的商业利益"成为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鸦片生意的繁荣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鸦片，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国在中印鸦片生意的繁荣，由于鸦片属于服用上瘾的毒品，它的社会危害远比今天在英国谈虎色变的杜松子酒要大得多。罂粟在中国一早已有之，其麻醉药效亦为中国人所认识，但直到烟草于17 世纪从美洲经马尼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抽"起鸦片。18 世纪晚期时每年大约有1000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从1800 年到1821 年，这个数字达到每年4500 箱，到了1838 年更增至每年4 万箱（注：每箱大约载重133磅）。当时耽于阿芙蓉癖者逐年增加，这与上文提到的人日压力、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的腐败及民众的不满反抗情绪无疑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当时的中国呈现出民心涣散的时代精神：吸鸦片是当时中国人、尤其是衙门青吏差役这些与大众打交道的官府代表的一个精神表征。

当时英属印度的财政收人中有5％一10％为鸦片生意的利润，这也是中国鸦片成患的一个幕后原因。尽管孟加拉的鸦片种植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并由政府以拍卖的形式销售给加尔各答的私营鸦片商，但西印度的鸦片生意却不归东印度公司管辖，并且一度还对孟加拉的鸦片生意构成竞争威胁。不过到了18 世纪30 年代，东印度公司已控制了印度各船舶港口（如孟买），这就使它通过抽取转口贸易税而大发其财。同时，孟加拉与西印度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推动了鸦片的增产与降价。在华鸦片商通过因供求变化而产生的价格波动，可以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1821 年以前，一箱鸦片可以卖到1000乃至2 000墨西哥银元，便宜时也可卖到700至上1000银元。这种投机生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外商开始使用原始的快船（Clinper ships ）运货，力争赶在竞争对手的前面。他们将运到的鸦片装到"接货船"上，船上往往设有重兵把守的浮动货舱。中国本国的鸦片商人则组成经济人伙房，通常由十几人组成，每人均参股筹集资金。他们使用的走私船往往备有武装，船上的六七十名桨手（中国人称之为"飞龙"或"快蟹")，通常兼任脚夫负责从洋商的运货船上装卸鸦片。到18 世纪30 年代时，广州的海域上大约有25 艘接货船及一两百艘"快蟹船"。起初这些鸦片运往广州以西尤其是广州以北的内地，但后来改由洋商洽海路从广州运往广州东北的内地。

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如此猖撅的鸦片走私生意，竟然采取了装聋作哑甚至暗中推波助澜的政策。早在1729 年清政府就下旨禁止买卖、吸食鸦片，1796年又下令禁止国内生产和进日鸦片，并于1800年后一再重申这些禁令。但随着鸦片生意日趋繁荣，政府干脆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鸦片贩子钱可通神，所以鸦片亦成为当时官场腐败的又一根源。官员们一来贪图厚利，二来又惧怕会惹恼在幕后操纵鸦片生意的黑社会中人，尽管上面三令互申地禁烟，下面却睁只眼闭只眼，或将一部分贿赂转而孝敬__［司乃至朝廷。当政府高层而对曝光、讹许和物议而信誉扫地时，他们感到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不再受理走私鸦片的案件1821 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命令珠江下游的接货船离汗广州，于是外商开始转向广州东北的泉州等地寻找市场，这种"沿海贸易"比在广东三角洲时还要猖撅，很快在18 世纪30 年代就赶上几了广州鸦片生意的规模。

鸦片生意受到中英两国的一致看好，不但英国的商业扩张依赖于鸦片生意，而且随着中国吸食鸦片人数的增加，在中国还形成了势力强大的走私组织，这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一个多世纪以来，清廷例行从广州的贸易中提取利润以补贴国用，但鸦片生意却只是养肥了私人、巩固了"广东的商业利益户'。与之相类似，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所获取的商业利润也增强了英国向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扩张的野心；换言之，鸦片生意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在华利益。

但不幸的是，英国此时又因行会商人财力不足而受到打击。当时行会商人中最著名的首领为怡和商行的伍浩官（伍绍荣），其人靠做生意（他甚至通过北美波士顿旗昌洋行的朋友投资海外）而发了大财。不过，伍浩官只是一个例外。大部分行会商人往往缺少资本，并饱受官府的敲诈勒索，因而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举债，后者则往往追加资本以买断下一季度的茶叶、丝绸生意。不过，当时并无追查债务的法律机构，所以行会商人债台渐高，但公司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官府随意逮捕、拷打人犯亦卜分反感，而由于中英两国对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看法不同，两者的法制传统也因此而大相径庭。出于这个原因，在广州的英国人于1784 年以后拒绝由中国的法律来审判英国的杀人犯，美国人于1821 年亦如法炮制。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等于治外法权，但中国方面对此一汽没有明确表态。

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

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于1834 年成功地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在华贸易的垄断，并派遣一名政府贸易督办到广东代理海外商业事项。这时爆发了危机。这位苏格兰籍的督办纳皮尔勋爵，毫无外交经验，对亚洲事务一也不熟悉：他仓促受命，在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却要完成一件儿乎不可能的任务：建立中英两国间的平等关系，并就此结束以往的朝贡制度。清朝的地方官们白然拒绝了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很快他们就中止了中英两国的贸易往来，这正是他们压制外商的惯用手法、于是纳皮尔便散发中文揭帖谴责中国官员无视两国间的商业往来和商业利益。对此满清官员则切断了英方的所有供给而报以颜色。二．纳皮尔勋爵的两艘战舰冲出珠江主航道口，与岸上的清军进行了交火。这时清朝皇帝下令英军归降，否则即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境、

行会商人和英方的自山贸易者同时呼吁双方让步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几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对峙局势、纳皮尔辞职寓居澳门后一于1834 年10 月因病在当地去世，他的继任者在此后的4 年中推行绥靖政策，但此时英国内部关于对华政策却产生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以查甸o仃弟巨公司为首的大多数英商均要求英国海军为纳皮尔勋爵所受的侮辱而惩罚中国，并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丹特公司为首的对立一方则希望以商业利益为重，主张息事宁人。广东的官员则要求英国政府委派一名官员以负责英国的在华贸易事务。

这样，广州的商业体制到1836 年便土崩瓦解了中外贸易不再局限与广州一地，"公行"又中外贸易尤其是鸦片生意的垄断也被打破了，行会商人时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垄断也被众多相互竞争的私营者所取代，而拒绝听命于行会商人的英国督办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商人的管理。中英贸易成交额增加了，但其中的不法现象也日渐多了起来，

四、鸦片战争

1839 年至1842 年的第一次中英战争是近代史上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是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最终以船坚炮利的英军获胜而告终，其后中国更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无不痛感积弱的中国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是如何不堪一击，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则沦入了"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深渊。

同时，我们在重新审视鸦片战争时，也很有必要将之放入现代历史发展大潮的背境中进行考察。19 世纪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相似，均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因而必然会导致失败。正在进行工业化革命的西方诸国，在工业技术、组织管理及军事力量上迅速发展起来，与18 世纪时的欧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不断拉大，这就势必引起中国与外界关系的重大变化，旧日的宗主一附庸式朝贡关系迟早会被打破。中国不但在军事上积弱不振，而且缺乏诸如科学、个人自由及经济发展等现代观念。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如果中国需要不

断进口印度原棉，或鸦片在晚清时的中国竟毫无市场，那么"鸦片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了。但在当时西方大力扩张、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条件下，一场中外战争大概也势所难免：

禁烟运动

清政府很晚才发现鸦片的巨大危害（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下令禁烟，而这便成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最好借口二禁烟运动在实质卜可以说是一场旨在维护本国实际利益的道义圣战。

直到19 世纪30 年代，衙门及军队中吸食鸦片之风愈演愈烈，几乎与公开的走私活动一样日渐猖撅，而各级官府对此却不闻不间，这时清廷才如梦初醒卜令禁烟。但此时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二鸦片的流入引起中国自银外流，银价飞涨，财政困难，继而这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农民完税时需交纳更多的铜钱，而税吏亦无法从中捞取多少油水。不过，造成这一局面的还有其他儿个潜在的原因：首先，当时铜钱体积、重量都只有以前的1 / 3 ，于是铜钱与白银的比价大跌；其实，清政府的铜钱铸造数量与年俱增，市场上私钱流行，人们纷纷贮银保值；最后一点，中国白1821 年起白银外流加剧，导致了清廷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都是外贸顺差国，它从日本、马尼拉、英国、美国、印度等地吸收了大量白银：但至迟到19 世纪30 年代，这种顺差局面开始逆转，中国的白银主要通过鸦片生意而大量流入印度。早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明显发觉在鸦片进口中白银流失、但在出口茶叶一时却无白银流入的失衡现象。于是清政府仓促间做出了结论。1825 年一位御史上疏，认为进口鸦片是引起白银外流的罪魁祸首，白银外流又进一步造成了国库的空虚。他的意见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成。

当时鸦片为害之烈，已然难以一举根除。有些具有务实思想的人都赞成和议，主张由官员、士大夫、士兵负责禁烟，但同时寓禁于征，并采用物物交易的方式来防止白银外流。1836 年5 月，当时魏源在京师翰林院任职，这一意见得以上奏道光皇帝，并交呈厂'州政府照章办理，而且很快就被有所预感的外商所知晓。广州地方政府于1836 年9 月h 疏表示遵行，但在北京，主战一派逐渐古了上风：清廷在宣布鸦片生意为合法的4 个月后义废止了这一法令，于1837 年至1838 年在广州查禁鸦片生意，但广州的鸦片走私生意禁而不止，反而吏加猖撅

起来。1 838 年下半年关于是否禁烟的朝议也未得出什么结果，但到年底，道光帝最终下定决心全面禁烟，决定凡是种植、买卖、吸食鸦片者，一律格杀勿沦二这项法律于1839 年颁行，其矛头所指，也对准了在华的外国商人。

此时，广州的这场禁烟运动已然捣毁了不少鸦片走私巢穴，也处死了不少鸦片贩子，并于1838 年、1839 年之交的冬季里达到了高潮，使得广州的鸦片生意几乎难以为继。但这一运动反过来又刺激了沿海走私生意的发展，外商的武装走私活动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英国政府认为政府"不应帮助或限制走私者的活动"来进行干预，于是禁烟运动只得由清政府单方面来采取行动了。回顾历史，有一点很清楚，清政府希望通过禁烟运动达到两个目标：根除鸦片之害，维护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地位。广州的官员一再拒绝绕开行会商人直接与英方贸易督办进行联系，并且居高临下地要求后者保证永不从事非法贸易活动。这样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合作便无法维持下去了；东西两个世界相互对峙，而中国人的禁烟运动因之也演变成为一场英国反抗朝贡制度、要求外交平等的斗争。

林则徐在广东

历史选择了林则徐（1785 一1850 年）来领导禁烟运动林则徐主张"通经致用"，为官清廉，政绩出色。他于1839 年3 月10日抵达广州，紧接着便派人翻译外文书报，节译出瓦特尔（Vatte上）的《国际法》一书中有关政府如何管理对外贸易的章节。林则徐还向维多利亚女王致书两封（从未发表过），告诉女王"如果有外国人来到英国贩卖鸦片并引诱英国人购买吸食，女王想必也会对此深恶痛绝…… "

林则徐计划捣毁广州国内鸦片商的运输和销售体系，这个计划成功地得到了实施。以武力镇压外商本非林氏的初衷，更不用说挑起中英两国间的战争了，但他很快发现，要使外商交出库存鸦片非得使用武力才行，于是在3 月24 日上下令封查十三行附近约350 名外商居住的地区。外商雇佣的中国仆役被剥夺，但供应照常，这种情形维持了大约6 个星期二英关烟贩上缴鸦片后，林则徐解除了查封命令，并且将这些鸦片当众销毁。这次共销毁了大约2 万箱英商的鸦片，但是这一胜利很快就化为乌有了：首先，中国的鸦片市场已经崩溃，中国及从印度流人的鸦片每年却达5 万箱之多，使本来就获利无多的鸦片贩

子几乎未受多大损失；其次，英方商业督办接管了这些鸦片，于是虎门销烟成为中国对英国的挑衅行为，正如开弟巨对查甸所云："中国人已落入陷阱，他们必须为此向大英帝国付出代价。"林则徐查办英商自是符合大清帝国作为天朝上国的一贯做法，但从世界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林氏的禁烟举动却正好成为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由于两国司法制度不同，1839 年7 月一名酒后闹事的英国水手杀死了中国的一名村民，中方一要求英方交出凶手，英方则拒绝用中国的刑法来审判英国公民。随着双方分歧的加剧，中西冲突又从鸦片生意蔓延到了外交及司法领域，而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格局因之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动。

在中方的压力下，英国人安全撤离广州到达澳门，于1839 年8 月又迁到了香港。香港与九龙半岛只有一水之隔，面积约有30 平方英里，当时人烟还很稀少。中英双方敌意渐增，谈判期间时有小规模冲突发生。1839 年10 月两国于海上首开战火，但广州的外贸业务仍然照常进行。美国的旗昌洋行与行会商人伍浩官一向往来密切，他们联手控制了在美国旗号下的对英茶叶出「J 生意。同时，鸦片商依仗武装保护，在林则徐难以顾及的广州以外地区照常活动。184D 年夏，英国远征军来华攻古了舟山和天津大沽口并要挟清政府进行谈判，这清楚地表明，林则徐禁烟与维持广州贸易体制的努力都落了空。当年9 月，林则徐被道光帝革职，而英国则准备通过武力进一步在中国建立起殖民地。

战争与和谈

清政府军备陈旧，战斗力落后，因此在仓促应战时节节败退。当时清军的练兵有名无实，只是虚应故事罢了，有时为剿匪或镇压起义，不得不从好几个营团中抽调人马，这就使得军营中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难以具备大规模攻敌制胜的作战能力。由于清兵训练不足，军纪松弛，他们平时对百姓作威作福，但在交战时则胆怯无能，一触即溃。

清朝的海军更是暴露了清政府的屏弱无能。清朝海军向来缺乏海上机动作战的能力。沿海各省的水师只是用来维持沿海某些地区的安全与秩序，而且由于各省制度不同，又缺乏远航及协调作战的能力，清朝的水师不过是一种海事警察部队而已。海盗们往往流窜各省海域

以逃避水师的缉捕，而饱受海盗骚扰之苦的省份亦往往追之不及而徒唤奈何。清朝水师拥有的舰只始终很少，大约只有300 吨的总吨位和100 英尺的总舰长，在役人员不过100 ，大炮只有6 门，而此时商用帆船的承载量已达1000吨之多。这样的水师肯定是抵挡不了19 世纪的西方海军的。

英国为了惩戒清政府，派出一支人员只有几千但武备精良的机动部队。中国的战船还停留在弓箭加陈旧火炮的阶段，沿岸泡台亦装备落后，调拨不灵，面对叮以抗风、抗潮、配有救生筏和堡楼的英国战舰简直是不堪一击。结果英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攻下厂广州至上海各个沿海重镇。英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海军优势建立起中外关系的新秩序。他们想在中国谋求一个商业基地，如香港。

在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林则徐的继任者皇亲琦善，于1841 年7 月与英军签订了和约，允诺割让香港、向英军赔款、重新开放广州。这个和议很快遭到清廷的否决，而中英两国政府态度均很强硬，遂使战事再次升级）1841 年5 月，该季度茶叶装船后，2400名英军袭击了广州，但获得日厌）万元赎城费后即撤去了军队。英军在撤至三元里时受到当地群众的袭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一次胜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标志中国人民现代意义上爱国精神的第一次觉醒。

在鸦片战争第二阶段，英军占领了厦门、舟山、宁波等沿海地区。1842 年春，英军援军到达，攻古了上海、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之后又进逼南京。清兵多方进行反攻，诸如停止中英贸易、调集广州地方团练、封锁河口港日、改造战船并从各省调兵增援，但均为英军所击败。1842 年3 月清军反攻宁波，但由于领导无方、组织不力加之军备落后，仍然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负责守御的满洲八旗部队，尽管勇气可嘉、宁死不屈，但也未能逃脱溃败的命运.

新任英匡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满清政府为求自保不得不向英军求和。清朝的皇帝作为异族征服者的后裔，对"勾结外夷"的汉奸格外敏感。当时走私活动及香港的秘密会社也分外活跃。清政府感到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将会动摇其在中国的统治，因而有必要向英军做出妥协让步，于是道光帝另派一名宗亲省英向英军求和。林则徐的禁烟大业失败了。

《南京条约》

1842 年8 月29 日，看英与璞鼎查签订了《 南京条约》 。条约废除了公行对广州外贸业务的垄断，允诺施行"公正合理"的关税，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另外还向英国赔款2100 万银元。1843 年至1844 年又先后签订了《 虎门条约》 （1843 年10月8 日）、《 中美望厦条约（1844 年7 月3 日）及《 中法黄埔条约》 （1844年10 月24 日）。这几个条约都订有"最惠国"条款，使得英、美、法等国可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由于中方做出了让步，这些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不过，这种不平等的外交体系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实际上经过18 年的贸易活动和外交努力并最终依靠军事手段才得以确立起来。

《 南京条约》 等不平等条约只是中外关系发生逆转的第一步。五口通商后均设有英国领事馆，当地的英国居民均享有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不仅商人、传教士等人员可以享受治外法权，他们的财产、货物乃至其中国仆役也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这样，西方及中国的商业活动就相对逃脱了满清官府的敲诈勒索。条约中规定的关税在原先基础上改为4 ％一10 ％左右。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中方的贸易垄断和行帮制度（如广州的公行）都一并废除。顾盛（caleb cushing ）与首英签订的《 望厦条约》 规定，美国同样可以享受英国种种在华特权，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扩大。

下面为东亚各国于1842 年至1943 年与西方签订的儿项主要不平等条约:

起始 发展 废止

中国 《南京条约》（1842 年）及《虎门条约》 《望厦条约》（1844 年）

《黄埔条约》（1844 年）

《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中美、中俄，1858 年）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

《辛丑条约》（1901年） 德国、奥匈帝国1919 年；苏联1924 年

1922 年《华盛顿协议》 后，

1930 年中国关税自治，中美、中英1943 年签订新的平等条约

日本 日本 日美、日英、日俄《 神奈川条约》 (1854年） 《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1858 年） 1894 年日、英修正原有不平等条约；1899 年，外国领事裁判权结束；1911 年日本关税自治

越南 《 越法西贡条约》 (1862 年、1874 年） 《 顺化条约》（1883 年）越南沦为法附庸国，中国于1885 年承认 1946年建立"法国自由同盟", 1954 年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朝鲜 《朝日江华条约》（1876年） 《 朝美条约》 （1882 年） 1905年沦为日本保护国，1910 年被日本吞并；1948年成立大韩民国

五、通商口岸西风东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风东渐，对中国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而等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过晚。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编译《 四洲志》 ，此书后经魏源增补为《 海国图志》 。该书辑录了不少西方近代史料，并提出"以夷制夷"的主张。魏源的思想新旧参半，他在提出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而所谓夷之"长技"尤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及练兵技术。"自强运动"便脱胎于这种思想，该派中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这实际上是魏源等人"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孙子兵法》 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正好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不幸的是，中国太大了，士大夫们墨守成规、思想闭塞，对外界情况麻木不仁，因而西方的影响主要只是局限于香港等通商口岸地区。

商人与传教士

清政府拒绝了英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但实际上对上海以南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的鸦片生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除去广州等5 个通商口岸之外，当时还有10 个中外鸦片生意的半公开码头。当时中国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19 世纪50 年代，每年流人中国的鸦片高达五六万箱，比20 年前增加了一倍。美国的鸦片商，如旗昌洋行，以前从土耳其将鸦片贩至中国以与东印度公司争夺生意，如今可作为印度在华代办商而直接与怡和洋行或丹特公司一逐高下了。美国也和中国、英国、苏格兰及印度一样，通过鸦片生意而发了大财。中国开始在本国大量种植鸦片，后来便取代了从印度输人的进口鸦片。不过在19 世纪中页，几大洋行因其商船运送迅速且有武力保护，加之资本雄厚、设

施先进，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鸦片生意。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出口每年都超过1 亿磅，但赚得的钱主要都用在支付进口鸦片的费用上了。英国的纺织品等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往往并不富裕，他们自耕自织地生活，没有多少余钱去购买洋货。地处西欧一隅的英国商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坚信，只要每个"中国佬"的衬衣后幅多用1 英寸布，兰克夏郡的工厂就足以忙碌儿十年的。

几个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呈现出一种在有序竞争基础上产生的积极进取、富于活力的气象。上海和广州的商会下属大约有2 仪刃家商行，其中大多数为英美公司，它们在各个贸易领域内进行着优胜劣汰的商业竞争。不过5 个通商口岸与香港有所不同，它们都有英国炮舰把守，居民年龄偏低，人员流动迅速。这些地方也实行有序的商业竞争，加上广大的"异教徒"有待基督拯救的美好前景，便吸引了大批新教徒来华传教。不过中国对此反应冷淡，新教传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耶稣会于1773 年解散后，他们在北京的地位被拉撒路教派的法国神父所取代。在外地，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钳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1801 年到1829 年，只有少数儿个传教团能深入乡村传教。此外便只有新教在华的开拓者马礼逊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自1807 年起便在广州传播新教教义。新教传教团（又称福音教派）是工业革命的精神产物，18 世纪时产生于英国及北美新英格兰地区。马礼逊成功地将《 圣经》 翻译成了中文。为增强与广州市民的亲善，他的同事于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有名的英华书院。

首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系受美国海外布道会(1810 年创立）派遣，于1530 年在广州登陆。他们创办了著名的《 中国丛报》 ，编者之一的威廉姆斯还编写了一本《 中国》 （1848 年），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从此医学传教团亦进入了中国。后来威廉姆斯与伯驾及马礼逊等英国传教士一样先后从政为本国政府服务。不过，他们从政，主要目标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特别是通过梁阿发（1789一1855 年）等皈依者编写的宗教小册子进行传教。为了使福音广为流布，他们试着采用汉字注

音（即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阪依者寥寥无几，不过数十名而已。

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亦卷土重来，在中国各港口城市及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者法国政府从清朝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弛禁的保证（1844 年、1846 年），自此在华天主教士可以公开进行传教并且重建了一些教堂。通过建立在华级差会，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耶稣会于1814 年得以恢复，以上海徐家汇（徐保罗，即徐光启的家乡）为在华传教的中心，在中国教友的帮助下，和拉撒路会、圣多明我会等欧洲教会一样，几乎在中国每个省份都得到了重兴。尽管传教在内地仍属非法，天主教会各派的传教活动仍比新教传教团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不过，前者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冲击也不像后者那么巨大。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身穿汉装，并且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们开办的学堂也不教授欧洲语言，而在华新教传教士则更为强调本身的宗教文化，并且更为直接地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佛教、道教这些"偶像崇拜"。这样，天主教在中国相对深入人心，但对中国社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却是基督教新教。

广州人扮演的历史角色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广州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外国人家中的仆役、律师行中的中国商人、中国的鸦片商及宗教书籍分发者最初都是华南人，尤其是广州人。他们各操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各自有不同的行业规范，为上海、厦门等地的洋商服务，本身具有一种当地人无法比拟的"洋气"。如若他们定居新加坡或香港，他们可能会随身携带英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些人作为通商口岸上洋行"员工"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以申请获得治外法权。他们经常身着西装革履，借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19 世纪40 年代晚期，这些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从事贩卖苦力的罪恶活动，即将壮丁在厦门及澳门等地装船后运往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及马来西亚这些急需劳力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移民东南亚，如今由于几个新的因素，这一迁徙活动的速度加快了。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世界性的废奴运动使合同工的需求增加；其次，国外机帆船和汽轮的传入，使得低成本、大规模

地运载苦力成为可能。中国的人贩子在外国商行的掩护下，一如早期非洲一北美奴隶贩子，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广州的公行制度废止后，一种新型中国商人— 买办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洋行，为外国雇主搜集情报，或负责洋行在中国国内的商业活动。在通商口岸的特殊条件下，这一阶层的人物逐渐成为中国的现代实业家。这样，中国从一开始便加入了现代世界贸易经济的大潮并在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

六、清末农民起义

19 世纪中叶时一系列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大清帝国的18 个省份。鉴于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所以产生这场大动乱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内部。19 世纪奶年代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几乎已是一触即溃。国内人口不断增长，国势危急而官员们却只顾及自身利益，官场遂越发腐败黑暗不堪。例如，清政府在黄河与大运河上修建了不少堤坝，但泥沙淤积仍是有增无减。大运河作为南北粮道的地位逐渐下降，而黄河则于1194 年之后的六七百年中(1852 年）首次在山东境内泛滥改道。人口激增、水涝旱灾、贫穷、腐败再加上政府的无能，遂导致了全国盗匪横行，并不时有暴乱产生。

由于官府无能，秘密会社得以大行其道。这些秘密会社，北方称"教"，南方称"会"。1883 年，白莲教的一支（即1900年义和团的前身）流行于华北地区，不过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南方的颠覆活动，如"天地会"（洪帮），却是屡禁不绝。据说天地会由福州的一名武僧于1674 年因不堪官府欺压而建立，其口号为"反清复明"，入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入会者欲血为盟，立誓反清复明、、不过天地会平时很平和。类似西方的共济会，天地会规定人会者即是兄弟，但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道德准则，会员之间亦须互相帮助二这对商人、船夫、苦力、下级官吏或走私者这些流动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人会者在异国他乡（如新加坡和巴达维亚）通过切日、手势暗号即可得到当地分会成员的保护和照应。

19 世纪40 年代末，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动荡不安，这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在两方面遭到削弱的缘故。首先，华南是当年满洲人最后征服的地方，清政府仅在广州一地驻有八旗部队。其次，这一地区长久以来

深受西方商业及文化的影响，并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峰。事实上，广州正是产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摇篮，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西方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刺激下产生的。1841 年的三元里抗英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义民被清政府遣散后，广州人民对英帝国及求和苟安的清政府都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上海因为地近茶叶、丝绸产地，自1843 年开埠通商以来便杜绝了操纵粮运、潜运的帮会势力。最后一点，英国海军于1849 年开始打击中国的海盗势力并取得成功，这就迫使海盗帮会不得不沿西江迁到内地的广西省。

太平天国

就像以往的大规模起义一样，发生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宗教为号召来组织人马造反的。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1814 一18 必年）及其副手均为客家人。客家人几百年前从北方迁到南方，与本地"土人"并未完全融合，甚至相互仇视争斗。洪秀全本一落魄文人，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而均遭落第。因此，他最终变成一名神秘主义者，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失常。他在病中见到"天父"，于是自认为是新的"弥赛亚"降世。洪秀全于1836 年见到梁阿发编写的传教小册子而若有所悟，后以新教《 圣经》 为依托，创造了一种类乎旁门左道的"拜上帝会"。洪秀全长久以来因病而见神见鬼，他在病中阅读这些小册子后认为，他病中见到的正是天父耶和华、天兄耶稣，而本人则是天父的幼子，为拯救世人而降下儿间。洪秀全与广州的新教牧师曾有短暂交往，但鼓吹武力和复仇的《 旧约》 对他产生的影响更大。他全盘接受了"摩西十诫"的思想，但对"登山宝训"的内容却弃之不顾。

洪秀全及其同事传教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由于官府对盗匪和地方纠纷已经无能为力，地方上经常自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这些"民兵"通常领取报酬，并由当地缙绅指挥领导。他们有时会发展为秘密会社或宗教组织，并向当地勒索保护费或孝敬钱。不过，随着官府势力的衰败，这些会社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争斗。就像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各部一样，这些组织也往往由一铁腕人物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于19 世纪4O 年代末组织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不得志者，如客家人、天地会成员、盗贼及流离失所的农

民等等。他们于1851 年7 月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于1851 年9 月攻克广西永安州后建立起了军政制度。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一词在经书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农民起义即以此为名号，有些朝代亦采用"太平"为年号，而《 圣经》 译人中国后，"太平"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出身烧炭工的杨秀清（约1820 一1856 年）被封为东王，领中军主将。其余人亦封为北王、西王、南王、翼王，皆受东王节制。

清军久攻永安不下。1852 年4 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于缺少火炮，他们未能取下桂林和长沙，但于1853 年初攻克了武昌，继而渡江而下，于1853 年3 月占领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南京。这是太平天国的胜利顶峰，此后便是互有胜败的相持阶段。太平军曾派大军北伐，因失利而西上太行，又东下临铭关，时值冬季，行军艰苦，最终于1853 年年末迫近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从广西北上，并未在沿途建立起政权机构，事实上，他们也缺乏地方官的合格人选。太平军转战中国的16 个省份，攻下大约以刃座城池，但得之而不能治之。攻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并且建立了六部，但在乡村，其政权仍为军事化的统治机构。

太平天国早期的军事化宗教社会中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禁欲制度。太平天国鼓吹男女两性的贞节，主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妇女亦参加劳动和战一斗，也可以担任官职。太平天国的清教徒式狂热使得他们反对蓄奴、通奸、巫术、赌博、酗酒、吸鸦片和抽烟。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混和而成的奇特产物。洪秀全自称为天父次子而被奉为天命在身的新天子；他的追随者向大众布道井向__上帝献祭；他们捣毁偶像及儒、释、道三教的庙宇；他们的首条道德准则即为敬畏上帝、耶稣与天王，第二条便是"孝顺父母"。太平天国标榜平等，但其内部却是尊卑有别、__上下森然。太平天国实际__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于《 圣经》 并未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模式，于是洪秀全与杨秀清像王莽、王安石一样从《 周礼》 中寻求答案。中国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根植于原始经济时期的社会状况，主张每人都为公共财富务尽其能而后各取所需。土地按肥沃程度划分为9 等，农民们按人数分得相等面积的田地，并规定凡居民25 家为一"两"，设两司马负责管理生产、分配、教育、宗教、司法以及地方

武装等工作。理论上每个农民战时都是军人，各级官员的体制、称呼亦与军队相同（均田、编户并耕战合一的制度自然均为中国的传统做法）。由于太平天国并未在占领区设立政府，因此平分土地的规定并未得到真正的执行；他们仅在建都南京的最初几年里试图实施过这一计划。各王均有自己的宫室、行政班子以及军队，因此平等的理想也不免大大打了折扣。

洪秀全强调个人作用及超验的神性，他心目中的国家建立在理性的自然秩序之上，与传统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过，太平天国的狂热实践却使这一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他们反清辟孔，震撼了整个社会秩序，触犯了保守的七大夫阶层，但同时又未能团结天地会形成统一战线。太平军借用了不少天地会的切口，许多天地会成员还加人了太平军，但天地会于1853 年在厦门及上海起事时，太平军却袖手旁观。太平军低估了盘踞在上海的外国势力，也未发展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同时，太平天国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东王杨秀清为马基亚维利式的人物，他自称天主附体，从而攫取了极高的权力。天王还算比较老实，尽管他自称上帝幼子，却对杨秀清一再忍让。到了后来，东王的势力已驳骚然驾乎天王之上，洪秀全乃密诏北王韦昌辉等回京除杨。韦昌辉趁机大开杀戒，残杀东王及其家属、部众2 万余人。于是天王又不得不诛韦平乱。这时洪秀全当年的老部下已所存无多，于是他又封了一些亲戚为王以巩固其统治。大多数新王均腐败无能，唯有忠王李秀成（1859 年受封）为其中佼佼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领导人。由于清政府垄断了管理国家的统治人才，所以能枚平19 世纪50 年代的起义而得以苟延残喘。这些人再次证明了传统文人政府的优点，也可以说是康熙及历任清帝为国家及文化大一统所做努力的遗泽了。士大夫们宁可拥护传统的异族政权，也不愿接受本族"逆贼贰臣"的统治。最后，汉族士大夫领导的"新军"、尤其是湘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

湘军的主将即是曾国藩（1811 一1872 年），他的一生与太平军起义是紧密联密在一起的。曾国藩于1838 考中进士，之后是在京师的10 年宦海沉浮。1853 年初，他受命在家乡湖南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他以儒家伦理训练湘军以维护"名教"。曾氏出入释儒二氏，主张"经世致用"。他并非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但凭其百折不回的精神首先建立了一

支缙绅士大夫队伍，之后又整肃军队，向他们灌输敬上、爱民、立德等道德信条。湘军常常跨省作战，渐渐由防御性组织发展为进攻型队伍。其次，湘军还训练水师，镇守华中一带。第三，曾氏一直盘踞在湖南，于1854 年收复武昌后才离开本省老营。不过，即便是这时，各省依旧是各自为战，各地起义仍然绵延不断。

捻军与回民起义

正当太平军于1853 年崛起于长江流域之时，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地区又爆发了捻军起义。苏、鲁、豫、皖一带原有白莲教的余党，这时发展成为盐枭"捻子"（帮）。他们活动的范围即所谓"九省通衢之地"，虽无名都大邑，但出人方便，不过时有盐枭出没，村民械斗不绝，并且常常还与回民发生冲突，此外水患、饥荒不断，人民颠沛流离。1853 年各地捻党大致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势力之大，许多地区都是只知捻军，不知官府朝廷。捻军不断扩充武备、马匹，并向当地征收赋税，很快发展起骑兵队伍劫掠邻近地区。1855 年，捻军形成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他们使用暗号手势、献血结盟，人伙时还有一套复杂的人会手续，并且效仿太平军蓄留长发。捻军与太平军先后多次合作，但内部一直各自为政，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也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过，捻军首领渐渐建立起晓勇的队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并在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先后牢牢控制了当地的兵勇、平民百姓和粮食供应。到了18 的年，捻军与太平军隐隐然已对清政府形成合围之势。

云南回民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穆斯林自元朝之后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一直很有势力。云南的回民自成团体并时常与外界发生冲突，在争夺铜、锡、铅及金银矿源时尤其如此。当地的清朝官员人数不多，也很难行使政府的权威，如一名从麦加朝圣回国的阿旬，因发现孺家思想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聚众闹事时，官府儿乎无力治理，于1861 年才用招安的方法将之勉强平定下去。不过，云南西部的回民起义在杜文秀的率领下又坚持了十一二年。1856 年杜文秀定都大理，自立为新建伊斯兰国的苏丹。他从缅甸（后者将穆斯林称为Parthay) 获得军火补给，甚至还于1872 年遣使至伦敦谋求合作，但未获得什么结果。同时，1862 年中国西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回民起义，而贵州的苗民自1854 年以来也纷纷生事作乱。

这几场起义虽然规模不及太平天国起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一时岌岌可危。不过，内地的这些起义仍然无法产生足以取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制度，相形之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倒是趁机在沿海地区大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这场起义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成批的城池为之夷灭，与之相比，伤亡仅仅数千人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同样，早期的鸦片生意、传教活动以及第一批通商口岸也未形成多大气候。它们并未直接触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是使人们对旧的生活秩序产生了疑问，并潜移默化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制度。不过短期看来，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相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列强于1860 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的灭亡与中国政治的变革。从1851 年到1860 年，正当中国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西方一列强一反谈判做法，转而向清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之后转而又与清政府合作镇压国内的起义。19 世纪50 年代，清政府对地方（包括诸通商［上岸与内地省份）的统治遭到削弱，地方势力逐渐抬头。但在诸通商日岸，西方各国的领事建立了西式的统治机关。当时上海挤满了躲避太平军的难民。1853 年，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清朝的海关陷于瘫痪，自道台以下的官员尽数被驱逐出上海。上海洋行中的外商为求自保组织了"上海志愿军团"。1854 年7 月，英、美、法3 国领事联名要求上海道台准许他们自治并获得准许，此后在上海便逐渐形成"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各租界均有自己的武装与警察。这样，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在长江流域牢牢地攫取了一席之地，为上海日后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心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未设海关，由英国领事负责租界关税事宜并把持了内地的洋货进「上关税。租界的关税本应一视同仁，但由于中方海关官员的作梗与各国外商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种种规定实际上无法实行。但如果关税不统一，自由贸易及合法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威胁。因此，英、美、法3 国领事于1854 年7 月做出决定，由其向上海道台指派海关税收人员，以此保证各国外商利益一致，同时也确保关税能够交到道台本人手中。这即是中国海关外国监督制度

的滥筋。自1855 年起，中国政府聘用英人李泰国（Horati 。Nelson 场）出任上海的江海关税务司。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几项制度反映了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的本性及中国与列强虚与委蛇的手腕。

中英、中法战争

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与国外的茶叶、丝绸及鸦片生意仍是有增无减，但广州逐渐失去了先前的外贸优势地位，排外情绪不断滋生：英国人仍然无故不得人城，这涉及到中英两国政府的"面子"问题。到了1851 年，英国已打定主意再次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但也认识到外国的侵略也许会加剧国内的动荡局势，于是暂时隐忍不发。看起来太平天国政权不会比清政府提供更好的贸易机会，因此英国在双方对峙交锋时保持了中立。

1854 年，英、美、法3 国在广州、上海与天津3 地召开修约筹备会议。清政府拒绝并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中国人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使修约问题又不得不提上议程。此时西方列强正迫使日本等亚洲国家鉴订一系列通商条约，他们亦欲通过与中国修订条约而进一步控制中国。英国认为有必要修约以扩大原有成果，于是在1856 年借口中国水师在"亚罗"号船上撕毁英国国旗，并于次年与法国（法国以马神父事件为借口）组成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中国"天子"接受西方对全球贸易及外交关系的诸般理念— 他们花费4 年功夫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一番周折，他们于1858 初攻古了广州，两广总督实际上成为联军手下的傀儡。英法联军意在满清皇帝，于是在1858 年5 月攻陷大沽炮台后又逼进天津，并于同年7 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汀《 天津条约》 ，允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二俄美作为中立国向天津派出全权代表，也签订了内容几乎相同的条约。由于各国驻京使团意欲彻底粉碎满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清政府方面的态度乃日趋强硬不肯做出让步，甚至否认条约草案中的内容：英法两国公使抵津一年后，又于1859 年6 月赴北京换约，以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为借口进攻大沽炮台，但遭到重创，有4 艘英国军舰沉没1 之后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其中包括英舰41 艘，运输船143 艘，英军1．05 万人，另有2500 厂一州苦力随军效力．、法国方面则派出军队63 朋人，军舰60 余艘。英法联军击溃僧格

林沁率领的清军后于当年10月进驻北京．而咸丰帝则仓惶逃往热河避难二〕山于法方坐大，同时对中国亦毫无商、〕仁兴趣，致使英法两国在京期间发生鳅龄，另外英方代表额尔金亦不得不设法遏制本国的扩张要求：就在此时英方的谈判困首领在停战状态下被清政府逮捕，其余约20 名成员亦被处死，额尔金为了报复清朝皇帝，下令焚毁了圆明园飞由于缺乏弹药，兼之冬季将临，英法联军不得不做好尽早签约后撤军的打算。他们与咸丰赞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沂签订了新的和约，认可厂1858 年签订的《大津条约》，又增加了租界地与赔款数额。例如，英国获得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法国方面则获得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的特权。

尽管并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进一步使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国门。

俄罗斯在满洲的扩张

俄国凭借最惠国条款，同样也获得了英、美、法诸国的种种特权。不过同时俄国人还别有所图。满清统治者j 通过《雅克萨条约》将俄国人拒于阿穆尔河流域及蒙古之外，俄国人因而曾转向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伯令（Bering）于1741 年发现了阿拉斯加，俄国政府在堪察加半岛设立了卫所，并开始与日本进行接触。1799 年，俄美公司得到政府授权，垄断了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业务，其势力足以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自1812 年至1839 年，俄国甚至还一度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地区，同时，从1727 年到1860 年之后几年还在外蒙古境内的"买卖城"与中国政府定期举行边贸活动。尽管俄国不再向北京派遣商业使团，东正教传教团却源源而至，这些传教团后来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及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事机构。

中国的5 个口岸通商之后，俄罗斯也同时加紧了对后来称为"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的扩张。在整个18 世纪里，俄国人在此地不断推进，并修筑了边防哨所以防御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进攻。这些哨所很快就蔓延到从里海以北到奥伦堡及东伊尔铁什（Irtysh）河沿岸的广大地区。俄国在侵略过程中逐渐将矛头转向了南方，开始逐步与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基辅、布哈拉（Bokhara）及撒马尔罕(Samarkand）发展边贸。1851 年，中俄两国在库尔加签订条约以加强"买卖城"的贸易管理。俄国商团的路线、人华季节及下榻处等方面

都受到中方的严格规定，但同时也受到本国驻库尔加地区领事的保护。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因为中俄两大帝国都是这一地区的征服者，他们在此都需要对抗当地的好战部落以维护本国利益。

受到英国侵华胜利的鼓舞，俄国也再次侵入阿穆尔河流域，其将领即是曾于1847 年担任东西伯利亚总仔的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他于1854 年向阿穆尔河派去舰队并于次年在该河北岸设置哨所，一直延伸到与乌苏里江交汇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IDvsk）。俄军很快就牢牢控制了这一地区。1858 年5 月16 日，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穆拉维约夫已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援挥条约》，中方将阿穆尔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并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原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区。穆拉维约夫占领这一人烟稀少地区的讨一划终于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勉强同意。

《中俄天津条约》使俄国同样获得了西方列强在华的种种权益，但满洲以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1860 年，伊格那提也夫将军（Nikolailgnatiev) 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之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俄国在东亚的胜果（而清廷则于1859 年否认了《中俄媛浑条约》）。在谈判过程中伊格那提也夫费尽心机，使出了浑身解数。清军击退进犯大沽炮台的英军后，他下榻俄东正教驻京传教团，与清政府谈判了数日而未有结果。1860 年他去了上海，凭其对清廷内幕的了解与西方各国代表打得火热。当英法联军攻古北京后，伊格那提也夫作为调停人亦随之进京，趁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 年11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承认《中俄缓浑条约》的内容之外，又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上地（即海参威一带，俄国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割让给俄国。这样，早在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通过商贸与传教活动叩开国门之前，俄罗斯人已然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了蚕食。

八、清室的中兴

为了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最高统治者，而太平天国起义则表明"天命"并不在他们那里。到了1860 年，重建和平的惟一出路看来还得依靠清政府本身。这时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复辟", 一如前代（如东汉、中唐），清朝在农民起义之后又重新建立起了王朝统治。这场复辟恰好发生在当时几场大斗争的关键时期，而首先便是平定太平军及捻军等农民起义。

1860 年，清军江南大营再次被李秀成攻破，迫使清政府任命曾国藩全权负责剿匪事宜。当年8 月，曾氏升任两它上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他提拔了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人才，渐渐对太平军形成合围聚歼之势。另外，英法联军攻古北京后，清廷内部的一批死硬派失势，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出面主政，负责议和善后事宜。显然，清廷只有议和签定城下之盟一法，除此并无他路可走。后来，咸丰帝于1861 年8 月病死于热河，小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一道发动了"祺祥政变"，铲除了仇外的强硬派王公大臣。他们一方面继续议和活动，一方面全力支持曾国藩等汉族大臣镇压农民起义，通过以上措施，清政府得以重新控制了政局。正如恭亲王奕诉所云，外夷不过手足之疾，而太平军起义方是心腹大患。至于新皇的年号"同治", 即为"共同治国"之意。

外国的援助及"太平天国"的覆灭

曾国藩及其学生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于湘军之外又建立了淮军，与湘军乃成相互呼应之势。后湘军因接连失利及军费不足等原因而逐渐衰败，但淮军却不断壮大起来。1862 年李鸿章乘坐外国汽轮率淮军进驻上海，受到当地士绅的欢迎。李鸿章此时出任江苏巡抚总领粮运、海关等事务，逐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培植起了自己的势力。他向国外购买军火，将淮军扩充至7 万人，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他与曾国藩一同创办了几个兵工厂以建造西式枪炮与轮船，并且在镇压起义与第二次"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中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渐渐摧升高位。

制造洋枪洋炮的动力之一来自上海的洋枪队。最初，清政府为阻止太平军进攻七海，委派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ord of Salem ）召募外国人组建了洋枪队。当太平军于1862 年进攻上海近郊时，英法为保卫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而放弃了中立。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大约由4000名中国人组成，先后在不下百次战斗中获得胜利，因此又被称为"常胜军"。华尔于1862 年死后，英军少将戈登（Charles Ceorge Gordon）被抽调来担任这支队伍的"统领"，并协助清兵攻下了苏州。另外，由法国人统领的"常捷军"也协助清兵夺回了杭州。1864 年7 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最终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经过激战攻下了南京。"天京"顿成火海屠场：当西方列强与清朝开战时，太平天国本

来可以联合"洋兄弟"共同反清，但他们未曾这么做而坐失良机。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尽管提出了美好的理想，终因领导不力导致内部倾轧、贪污腐败而终归覆灭。最终平定这场起义主要还是依靠曾国藩创建的军队，因为清政府对于洋枪队也是心怀戒备的，正如1862 年清廷一道圣旨中所云：" 目下之计一，须假洋人之手训我军队，以图自强… … "本着"自强"精神，西方对中国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中国官员利用外资制造洋枪洋炮及训练新军上。烙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终于发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而正是这些汉族士大夫拯救了大清朝。通过洋枪洋炮及西式新军，清政府也成功地扑灭了捻军起义(1853 一1 868 年）、云南回民起义（1855 一18730 年）及西北回民起义（上862 一1873 年）。

中国的门户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成为在华既得利益的拥有者。19 世纪60 年代初期他们准备进一步扩一大成果，又在华北、满洲、台湾、汉口等地增设了11个通商口岸。中国沿海及内陆航道上都可见到外国公司的货轮，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鸦片进口成为合法，但需交纳一定数额的关税；多种洋货只需交纳2 , 5 ％的转口税（这个数字只及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大量涌入内地，这对中国的"国货"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外贸事务由上海的外事监督局负责，这使得清朝海关有名无实，成为由西方人把持的一个机构。外国人凭其护照可在内地通行无阻，于是传教士得以深人民间传教，并且天主教及新教传教组织很快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

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势力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各国驻华公使有坚船利炮为后盾，主要的职责就是确保条约得到执行以及巩固本国政府的在华权益。结果，西方对中国遂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新的"蛮夷"如今确实是纵横于国门之内了。不过，即在此时中国统治者面对这种威胁仍未做出应有的爱国主义反应。朝贡制度废除了，但代之而起的条约体系只是面向现代国际关系格局迈出的一小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与传统的中国政治格局不无相似之处：享受治外法权的西方国家并未取代、而是加入到了满清的统治阶级阵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秩序以往曾成功地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如今依然屹然不动，完好无损。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似乎倒为大清朝提供了操纵

牵制"诸夷"的机会〔：1864 年之后，清政府就依靠这种方法得以苟延残喘，而中国也得以怀着戒备的心情在接受西方帮助的同时艰难地向现代化迈进。

第11章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一、洋务运动

1868 年至1912 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 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国。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正如在西方一样，这一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对编写历史和理解历史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日本史学家怀着一种力求客观的自豪感记录了本国明治维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于许多中国史学家来说却不堪回首，肯于直面史实者少而又少。无疑，中日两国的盛衰差异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偏向胜利的一方。晚清史不够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1912 年以后革命连绵不断，人们无暇顾及当年的那段历史。简言之，日本史学与日本社会一同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的史学却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长期以来仍然羁留在传统之中。出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下文所谈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只不过是一种试验性的摸索。

我们认为，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故我。概而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

中国现代化的滞后发展可以从社会及制度两个方面找到原因。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

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极端看法将一切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未能说明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起初西方对中日两国都只产生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一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 世纪末在华势力大张之时，中国已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即使这样，中国早期做出的现代化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和日本拉开差距是后来的事，19 世纪60 年代的局外人恐怕还是看好中国的二1860 年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首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天子"不得不承认天朝与外邦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这给了中国"大一统"观念以致命的一击；其次，清政府为扑灭太平军起义而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等汉族士大夫，这造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并削弱了满洲人的统治。这些变化其实正是后来日本改革的先声：使中华帝国或日本成为国际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并将汉族百姓或大和百姓视为帝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不过日本很快就实现了这些目标，但中国却一直等到很晚的时候才做到这一点。与明治维新相比，中国在19 世纪60 年代进行的改革只是漫漫征途中步履维艰的第一步。

自强运动及合作政策（洋务运动）

太平军于1860 年至1862 年进攻__上海与宁波时被英法联军击败，这使得当时的清政府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强大，于是准备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制度来解决国内外的问题。曾国藩曾引用孟子的话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恭亲王奕诉建议通过镇压国内起义以获取西方的军火武器。中国自古以来的策略，"以夷制夷"，显然已过时了。相反，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时人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861 年后在外交、财政、教育及军事等领域内发起了"洋务运动"，而这些改革又进一步扫清了朝贡制度的残余。

英、法、美、俄等国的驻华公使对此纷纷表示欢迎，他们不仅相互合作，利益均沾，并且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合作的政策。像阿利国（Butherford Alcock，曾于1865 年至1869 年担任英国内阁部长）等外

交家建构起中外条约体系后，又致力于在中国本身利益和西方在华特权之间寻找平衡，并适当地节制在华英商的非份要求。阿利国承认，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但社会转型只能是循序渐进。19 世纪60 年代时西方奉行"合作政策"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

1861 年3 月，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外交事务）而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由奕折担任总理大臣。这个机构实际上只是附属于军机处的一个涉外机构，直到1901 年成立"外务部"才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对外政策仍需由皇帝木人裁定，而且总理衙门也只负责北京城中的中外交涉事务。至于沿海省份的中外事务，则分别由"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处理，两职一般由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担任，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太平大国起义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而上述下放权力的措施正好适应了这一现实。

海关制度的建立

清朝外交事务新秩序之能够建立，英国人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英人李泰国于1855 年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他熟谙汉语，曾于1858 年参予起草《 中英大津条约》 ，后于1861 年上月被恭亲王兼总理大臣奕诉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不久他受清政府委派赴英购买军舰，后组成舰队开回中国并企图控制这只舰队。当这只舰队于1863 年来到中国时，奕诉与曾国藩都表示拒绝这一安排，付与偿金后将舰队退还给了英国政府。李泰国认为自己是清廷的客卿，不归清政府管辖，如他曾经说过，"一名绅士听命于亚洲的蛮子并为之效劳，这个念头真是太荒谬了。"

赫德（Robert Hart）于1 863 年继李泰国之后担任中国海关特总税务司，制定了由外国人管理海关事务的新制度。赫德为北爱尔兰人，于1854 年来华。他曾对担任海关特派员的外国同事说过，"接受中国政府的薪晌，就得为中国政府效劳"，这个人同时便是中国官员的"同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人民的同胞": 他和一手下的外国同事控制了海关事务大大小小各个方面，但在名义上仍接受各商埠中方海关长官（多由道台兼任）的领导，海关收入最终也交予后者。赫德本人负责管理外方人员，到了1875 年，其中有252 名英国人及156 名来自其余欧美16 个国家的人员。凭其高明的手腕、耐心与预见力，

赫德为大清王朝创建了一支现代行政机构，如他聘用外国人来管理外商的在华活动，为清土朝迈向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赫德的建议下，清政府利用海关的收人，在北京创办了"同文馆"，以便为清朝的外交人员培养翻译人才。正如总理衙门的一道奏呈所云，与外夷交涉，须先知其性情。李鸿章亦说过，办夷务须先规其野心，防其非分之想，识其优劣长短。同时上海、广州及福州也开办了"广方言馆"，但学员多为中年旗人，因而成绩并不理想。

随着船坞及兵工厂的建立，时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渴求亦与日俱增。曾国藩与李鸿章于1865 年在上海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8 年中国人独力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但是轮船马达仍需国外制造。当时翻译西方科技文章亦风行一时。另外在法国的帮助下，清政府于1866 年还在福州创立了"福州船政局"。几乎所有这些西化举措都是由总理衙门负责办理的。中国在19 世纪60 年代奉行的政策兼有新旧两种时代特色。西方侵略者在商贸、外交方面获得利益，中国政府则从他们那里学习军事技术以抵御外侮、镇压国内起义，但同时也致力于振兴旧式的儒家管理方式。相形之下，维护传统与国家的大一统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办洋务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二、儒家统治制度的中兴

上文谈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已达到高度的稳定及自足，即使在衰败阶段外界的影响亦莫奈他何。统治过程中，对秩序的需求、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均水乳交融在一起而相辅相成。其结果，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在19 世纪60 年代做出的回应是重申或重建儒家制度而非使之现代化。于是新生事物一概受到排斥，正如一位保守派领袖所云："何故师法夷人？彼本我中华之大敌："

除去这种制度上和心理上的惰性之外，1860 年后的满清政权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故清在平叛之后的短暂中兴期间志在恢复传统而非开拓创新。不过此时的清王朝已然元气大伤，新继位的同治皇帝尚在冲龄，由其母慈禧太后（1835 一1908 年）垂帘听政。这位了不起的女人聪明过人且意志坚定，但是心胸狭隘，她主政之后，很快就熟谙了险罚减否这一套帝王之术而成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她依靠宫里的太监，牢牢把持了国政，同时也任用了一批大臣，但她丝毫未

曾意识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结果，当时尊孔复辟之风甚嚣尘上，大清王朝一时亦得回光返照，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却遇到了挫折。

平定国内叛乱

1864 年天京陷落，标志着清政府的对手— 太平天国的覆灭，但各地的零星起义仍然接连不断。捻军据守村寨老巢，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切断了清兵人员及粮食的供应补给。同时，捻军的骑兵部队还在北方各省流窜作战，太平军的余部亦有加人，捻军势力一时大张。这一切都促使曾国藩于1865 年率军围剿捻军。曾国藩率领下的清军曾两度攻古捻军老巢，并将其村寨夷为平地，但这并未起到f 十么作用；村寨上上下下仍然支持捻军，他们很快就又重新建立了营寨。于是曾国藩采取传统的策略，即一方面悬赏捻军首领的人头，一方面又招安其部下随从：曾氏在捻军老巢附近建立了4 个据点以及封锁线，在封锁范围内仔细"筛蓖"何个村寨，并将居民按5 人一组编户并指定各村的负责人二另外，清兵还就地开荒屯田似确保人员和粮草的供应，同时也切断了捻军人员和粮草的来源。这样，曾氏便以其人之道还治了其人之身。

1866 年下半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围剿捻军。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后，由于部队经费不足及领导、纪律等问题，正式解散了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代之而起，成为当时中国的一支主要现代化部队。淮军使用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武器，7 万人共拥有3 万多只毛瑟枪及舰炮，此外还有7000骑兵部队。

1866 年之后，捻军被部署在山东西部及西北部、运河与黄河沿岸1000英里的10 万大军封锁线分割为东西两块。其中，东捻军于1868 年上月被清兵消灭，西捻军亦于同年8 月溃败

云南杜文秀率领的回民起义则又坚持几年。杜文秀为穆斯林回人，对汉人号召力不大、清政府一方面加强地方统治，一方面采取政治分化的手法，同时兴办地方团练，由地方缙绅管理指挥当时甚至有不少回民也投向了清政府一方、由于迁徙及死亡等原因，回民人口减少了一半有余。回民起义军所占据的昆明等53 个城池亦久久被围，后逐一为清军攻破，城破之日，不免又成血泊火海。清军于1873 年攻克了大理，杜文秀服毒投清营后自杀身亡。贵州的苗民起义亦于同年被

平定。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回民曾于18 世纪80 年代发动叛乱，到了19 世纪中期，又因不堪官府压榨而兴兵起义。1862 年，西安回民首先发难，并逐渐向西发展、西北为战略要地，但此刻清政府正忙于应付太平军及捻军起义，氏到平定这两大起义后才得暇西顾，派左宗棠前去镇压：左宗棠花了恰好如其所料的5 年时间(1868 一1873 年）收复了陕西和甘肃。他按照先代成例，巩固地方政权，加强粮草供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左氏有计划地层层推进，逢寨必毁，见人（回民）则杀。1871 年时，正如他在致某友人的书信中所云，其妻已段，其鬓已华，齿牙已落，又患痢疾及疟疾，并因进兵缓慢而受到朝廷的斥责。不过到了1873 年，尽管回民人数锐减，西北地区却又重现了升平的局面。清朝在19 世纪60 年代的中兴是传统文治武功的最后辉煌。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堂均为士大夫官僚，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不特因其奋力作战，更是由于他们成功应用了儒家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在恢复经济生产的同时实行有效的赋税制度，并且采用了西方的某些先进技术。但这时的中兴并未将中国恢复到先前的局面，而是使得各省大员增加了手中的权力，与朝廷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格局。清廷依靠这些人得以苟延残喘，但同时又面临着地方主义滋生坐大的威胁。

平乱后的经济状况

就像同时期的美国一样，19 世纪60年代晚期的中国也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巨大任务。太平天国等几场起义不仅比美国的南北内战波及的地域要广，时间也持续得更久，但中国却无现代化的工业力量来抚平战后的创痍。战后的中国，生产资料的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像西北的灌溉工程与华中的桑田（这对丝织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生活饥寒交迫。这些问题主要都是靠了普通百姓的咬牙苦干来解决的二在政府鼓励下，由地方缙绅牵头，"以工代贩"输送发放贩济、舍粥、收容孤儿难民以及修建公共设施等等。政府则主要提供道德训诫与指导，减租降税，有时亦组织移民并提供作物种子与工具。总体说来，这些措施主要是面向地主阶级而非农民，前者减轻了赋税负担，但农民的地租仍须照交不误。

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国库收入很快耗费一空，同时也失去了几个富庶省份的钱粮收人。清廷为了补贴财用，大肆卖官弩爵并发行铁钱纸币，结果官场人满为患，市场物价飞涨。清廷曾于

1712 年宣布"永不加赋"，是以政府无法更改祖制以济一时之需，其财政状况亦因此而元气大伤。

为了应付这一财政危机，江苏省于1853 年实行厘金制，变相向商家抽捐。"厘金"捐有3 大特点：首先，数量不大（多为1 / 100 ），易于征收；其次，它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类似转口税或销售税；第三，这项制度由各省缙绅帮办。这项制度于1857 年又获准在全国推广施行，由婿绅与官府劝输厘金以支付军晌，但平乱之后，清政府仍然实行这项制度并且一直沿用至民国。

1850 年之前的清朝财政收人主要来自农业，但到了19 世纪末，商业财政收入已是1850 年全国总收人的两倍有余。厘金曾是这笔收人的主体部分，但年度海关收人在19 世纪60 年代增至约700 万两白银，并且在此之后与年俱增二这笔钱中即包括鸦片进口税的收入。此时清廷已无法依靠以往大一统农业官僚国家的老一套做法来管理财政了。厘金制与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的兴起，导致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儒家刻意维护的大一统格局已是明日黄花。

"中兴"时期的哲学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思想在这场所谓的"中兴"中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巨"维护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强调以儒学经世致用，其荦荦大端，即：中国社会的和谐秩序有赖于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应遵守"礼"法；身居高位者应以德服人；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等等二他们的哲学是，做乱者必须加以严惩（如改造或肉体消灭），但平叛之后则需公正廉明地实行仁政。只要天下太平，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这种思想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与等级观念，与现代的平等思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发展经济重在"节流"而非"开源"，强调有效利用资源与税收而不是增加赋税或发展生产。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发展，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观念，其实也正是传统的"循环往复"或曰"通变"的思想二这是一种保守的改革做法，它一方面强调发展农业是"民生"大计，一方面又提倡选拔"人才"为治国之本。

19 世纪60 年代，中国满汉统治阶级在利益和观念等方'面渐趋一致，因为双方都致力于维护旧有的传统制度。直到1850 年，京官中约有一半为满人，另外各地总督的2 乃及各省巡抚的1 / 3 亦均为满人、

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提拔仁来的人才几乎全为汉人。）他们以前一直充任下僚，此时相继成为各省的总督与巡抚。同时，到了19 世纪60 年代，满洲祖地也不再禁止汉人迁进，八旗部队战斗力下降，满语几乎废止不用，满汉不得通婚的禁忌也被打破了，满清政权与汉族统治阶级儿乎合二为一，直到19 世纪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满洲政权才被作为"挞虏"而大受抨击。至于现代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汉族"中兴名臣""卖身求荣"，不过是用今天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强求古人罢了。

发掘"中兴"人才的第一步是恢复开科取土，重建书院并刊印经书等钦定书籍。科考题目往往联系实际，如询问考生如何带兵等等，这正体现了"经世"学派讲求实际的精神。实行科考就必须限制捐买功名的做法。捐纳功名可以解决一时财源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将一批富有但学识不足的人收罗进统治阶级队伍，但同时也不影响"正途"出身者的地位。"异途出身"与"正途出身"有着很大的区别。19 世纪上半叶每年的捐纳收入达一至二百万两白银。捐纳出身者（多为监生、举人）古当时士大夫人数的3 / lO ，到了1880 年总数则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人。

"中兴"时期政府颇有成效地扼制了买卖功名和官职的做法，但也未能完全杜绝这一现象。各省进士人数与年逐增，太平天国时期进士中榜比率增至18 % ，一些富庶的省份还要更高些。终有清一朝，长江下游地区考中进士者的人数最多，其中号称鱼米之乡的江苏省（这也是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争夺的焦点）就古了2 / 5 。但同时异途出身者的人数增长更快。19 世纪末中国大约有145 万名缙绅，其中上乃以上是通过捐纳买得功名或官职的，这无疑表明当时不少商人都步人仕途而与十大夫融为了一体。这样，尽管科举制度得到重兴，但已不像以前那样是培养儒家统治人才的惟一途径口最后一点，"中兴"举措丝毫末曾触及基层组织与人员，差役肯吏们照样勒索鱼肉百姓，这里既无法产生统治"人才"，亦难以提供现代政府所需要的专门技术人员。

三、中国的反洋教斗争

此时西方在华传教活动渐人佳境。出于自卫，中国的儒家人上开始发起排教（基督教）运动。罗马大主教与新教传教团在华的传教活动迥然有别。1800 年时天主教在中国各省还拥有大约巧万信徒，两次鸦片战争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870 年，在华的250 名左右耶

稣会会士、圣方济会修士、拉撒路派修士、圣多明我会教士及中国本国的修士总共拥有4O 万名信徒。1860 年的《 中法北京条约》 准许法国在华传教，并归还了先前充公的教会财产，而且法国还私自加上一条："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用地，建造自便"。这样教会就成了地主，不仅雇人租种土地，而且兴办学校、神学院及孤儿院。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已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善男信女们参加教会中的各种宗教仪式，诸如节庆、朝圣、布道、礼拜等等，所有这些曾受到官方禁止的活动如今都融人了中国特有的风俗制度。相形之下，新教的传教活动还只是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1850 年时中国只有大约80 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5 处通商口岸及澳门、香港等地。这些新教传教士及其妻子（她们往往也是传教士）相对缺乏经验，至1870 年时中国虽然已有350 多名新教传教士，但阪依的信徒还不足6 以刃。他们没有罗马布道总会那样的机构，内部也缺乏协调统一，人人各自为政，似乎单干的在华洋商。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团有伦敦传教会及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团，后德国喀尔文派、福音派、卫斯理派等教派的传教团也纷纷来华传教。这些来自北欧、北美的传教士与来白拉丁语系国家的罗马天主教士针锋相对，后者视新教为异端邪教，而新教则视后者为"敌基督"。二者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彼此几无任何合作交流可言。

1866 年，英人戴德生（Hudon Taylor）来华开创"中国内地传教团"，后逐渐发展为最大的在华传教机构。戴氏坚信人类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才可逃脱地狱的烈火而得到拯救，而在他看来，中国实在太成问题："在那里每月有100 万不信上帝的人死后沉沦永劫。"他从各国招募新教各派传教士来华传教，一般没有固定的报酬，认为"上帝会予回报的"．并派他们到中国内地各大城市与中国人一样地生活，通过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戴氏因坚信祈祷的力量而广为人知并获得大量的捐赠物资。这样，在大主教会经营多年的中闰内地也逐步出现了新教的传教点。

缙绅阶级的敌视态度

自晚明以来，护国的儒家士大夫便一直视基督教为迷信或异端邪说，他们质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会允许原罪发生"？天主教于1724 年遭到清政府的禁止，一直到1846 年才有所改观，其间讲求理智的中

国缙绅也一直未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此外，太平天国源自"拜上帝会"，浸华诸"夷"亦信奉基督教，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更加剧了中国缙绅对"洋教"的反感。最后一点，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渐渐担负起某些上大夫阶级特有的社会功能，这也引起了后者的警惕。

首先，传教士们通过传道、兴学而步入原为儒家一统天下的谱绅阶层。为了传教讲道，传教上发现有必要与缙绅所代表的传统社会秩序周旋一番。他们在育孤、济贫、贩灾等实际事务上与当地的婿绅形成竟争并渐有取代后者之势二产生摩擦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传教上天主教孤儿院。一修女（中）正在交接过程中监管婴儿。该照片摄于九江或九江附近，时间约发生在1891 年，正值中国反对洋教的动荡时期。

们享有治外法权而成为中国的特权阶级。中国的缙绅与平民百姓不同，可以免受肉刑之苦并与官府多有往来，而传教士则不但与官府声息相通，还可以在受到官府究查时寻求本国政府的保护。反过来，身列特权阶级的传教士又常常不得不为民请命，特别是在维护中国教民的利益时更是如此。当教民与一般平民发生冲突时，传教士常常干预官府、庇护教民一方，这样，许多穷极无赖之人往往加人教会"吃教"，而基督教便引起了其余中国人的普遍反感。

这些来华传教士语言不同，举止特别，并且显然对中国的传统秩序具有颠覆性作用，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标准来看，这清楚证明了为何中国谱绅对洋教是如此深恶痛绝。传教士所谈的救世主及信徒的得救，无疑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秩序，中国的学者对之深恶痛绝可以说是毫不为奇。从18 印年到1899 年，中国发生了成千上万次与驻华洋人冲突及大约240 起教案。但即使如此，在华传教活动仍是有增无减。

一如前代，各地士绅不时煽动大众的排外情绪，发起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首先，他们印发揭帖攻击基督教，由于文字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有着很高的权威，当地人往往对其中所讲的内容信以为真。他们同以往的反对洋教者一样，攻击基督教不过是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支派流亚，教徒们为非做歹，而传教士则挖取死人眼以炼制丹药等等。在19 世纪60 年代时还出现了描绘教士与教徒混居群交的黄色画册，一度曾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读者。其次，排教者在各省首府（尤其是举行科举

考试时）散发揭帖呼吁百姓行动起来反对洋教。当传教士在出租教产或修建房屋时也常常因为"破坏风水"而与当地人发生冲突。

当时教案不断，谣言四起。当天主教慈善修女会试图收养中国的孤儿、流浪儿时亦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地人怀疑她们为"拐子"（当时一些中国育婴堂中大约确有此类丑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闲汉无赖便借机闹事进行打砸抢，有时甚至酿出了人命案子。在冲突中，中国信徒往往首当其冲，受害尤烈。这样的事件儿十年来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缙绅阶级深感西方威胁其地位，为维护旧秩序而领导进行的自卫活动。

1870 年的天津大屠杀

1870 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深刻揭示了《 中法北京条约》 签订10 年以来中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英国一直希望通过签订条约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和平谈判不能完全代替武力，在保护传教士的权益时尤其如此。如戴德生在扬州开创了中华内地传教会，后于1868 年8 月受到当地群众的围攻，阿利国最后派了四艘战舰到南京而迫使曾国藩将扬州知府革职查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中法两国关系便因为这些教案而不断恶化：法国在中国没有多少商业利益，于是便借口保护法国在华传教士来扩大法国在华的政治影响。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动用战舰，并与各省督抚直接进行谈判。

天津的法国慈善修女会曾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于是谣言纷起，局势渐趋紧张。1870 年6 月21 日，当地群众涌到教堂说理，残暴的法国领事竟向天津知县开枪进行恫吓，未曾击中，但本人却被众人打死，接下来又有20 名外国人（多数为法国人）被群众打死，其中包括10 名修女，事后当地群众又焚毁了教堂二事件发生后，被激怒的英、法、美等七国政府将军舰开到天津、烟台一带进行示威。

清政府派现已年老多病的曾国藩查办此事，而曾氏则再次显露出他的坚强个性与勇气，如实向国人宣布并无真凭实据表明传教士拐卖儿童或将儿童挖眼掏心，同时也拒绝了法国漫天要价的索赔。后因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赔款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李鸿章继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后亦主张避战求和。于是天津教案越发激起了中西之间的相互憎恨与恐惧。

四、条约体制下的经济发展

西方的经济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中国商人之手实现的，因此不像先前西方军事侵略或传教活动那样引起中国人的戒备。不过，中国在效仿西方发展工业化时进程缓慢，个中原因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治外法权与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的土地被英法政府永久性租用，他们每年只付一笔为数不多的租金，这就形成了所谓"租界"。19 世纪60年代，英国在广州、厦门、镇江、九江、汉口、天津、牛庄都建立了租界，法国则在广州、上海、汉口及天津拥有自己的租界区，而且两国在华的租界还不断增加。各国领事向中国政府签定的租借期限为99 年。凭借领事裁判权，他们对本国人实行本国法律并且在租界逐步推行木国的税收和警察制度。这样，中国的主权在租界便名存实亡了。同时，英美两国于1863 年在上海设立了"公共租界"，这里生活着2000多名外国人，其中尤以英美人居多。租借者的代表由一经选举的委员会组成，该委员会直属本国领事馆并享有治外法权。后来该委员会渐渐包办了上海市的所有市政工作，诸如道路、码头、下水道、卫生设施、警察及娱乐设施（如跑马场）等等：这样，__上海虽然仍是中国的领土，但却完全控制在外国领事的手中，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

西方的法律，诸如公司兼并法、合同法等等，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极其适用。在华的外国人只服从本国领事法庭的法令，中国人也只能到领事法庭与之对簿公堂。英国还将负责审理中英、日英案件的最高法院从香港迁到上海，是为各领事法庭的最高机关。不过，法国、西班牙、荷兰及俄罗斯的仲裁法庭则分别设在西贡、马尼拉、巴达维亚及海参威。这使得中方原告很难找到上诉的地方。1864 年，上海成立了混合法院（shanghai Mixed Coult ），由上海知县担任主审，但同时有一名外国领事担任副审列席审判。审判程序亦一如西方；甚至在审理非涉外案件时亦是如此。这样，中外被告均可以在本国法官面前接受本国法律的审判。

上海的商业凭借治外法权得到了发展。随着大量中国人的迁人，上海地价飘升一，外国人通过转租土地而发了大财。当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商埠发展为现代型大城市后，它们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也日益依赖于治外法权。而原本为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治

外法权也成为本国商行、公司的保护伞，通过其免去向中国政府纳税的义务。本国未曾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外国人亦托庇于英法美等国领事的保护之下，从而得以享受同样的治外法权。如法国领事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梅梅尔(Meme上）、摩纳哥、波斯及罗马尼亚的公民行使司法权。另外，最惠国条款亦使西方列强得以"利益均沾"。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五口通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不过350名，到了20 世纪初，就发展为约90 处通商口岸，约25 处中途港，在华外国人也达到了30 余万。这些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发展起各种西方的城市制度，如新闻报纸事业、学校、图书馆、医院、下水管道与供水设施、马路及照明等等。另外，他们也将食肉的习惯、皮鞋、弹簧床及现代水管装置等优裕的生活享受带人了中国。所有这一切使得洋人在中国高人一等，他们与中国上层人物一样享有特权，并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修约的失败

19 世纪60 年代，奉行"合作"政策的中西人士希望中国能平稳地与外部世界接轨，但他们分别都遭到了本国内部的反对。通商口岸的商人要求开放内地通航、通车、开矿、废除厘金及转口税、允许外国人在华随意定居等等；但守旧派却因清廷平定内乱而大受鼓舞，有些死硬派甚至打算利用中国大众的排外情绪用武力将传教士逐出中国。西方的外交官及清廷大员们则力求折中以构筑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关系。

1865 年至1868 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 . Wade ）提出了改革中国以谋富强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几上一年后得到了中国维新派人士的进一步阐发。西风东渐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赫德曾在书中写道："如果改变政策，中国就能成为世界各国的领袖，如果不思变革，她就会受到别国的奴役。"与西方增进交流大概是帮助中国重建文明的最佳办法了。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llle ）一向鼓吹"合作"政策，他于1 565 年作为满清一等使臣出使西方各国，在华盛顿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较为平等的《 中美续增条约》 。蒲安臣擅长演讲，但他预言古老的中华帝国已出现西化与基督教文明的曙光却为时过早，并且具有误导作用。他于1870 年出访俄罗斯时碎死任上，其使命也就有始无终而中途夭折了。

同时，由于条约经过10 年便可加以修改，阿利国在赫德的协助下，与1868 年至1869 年与清政府展开了漫长的谈判，努力在英国商人与中国保守派之间寻求契合点，并最终于1869 年10 月达成协议。这份协议意在为英国日后的对华扩张打下更为稳固的基础，但由于阿利国过于强调通过限制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以稳定中外关系，协议草案刚出台便遭到英国在华既得商贸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英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一协议；中国方面，恭亲王奕i 斤也与朝廷、军机处及各省督抚商量了对策。本来，阿利国的草案对中国颇为有利，并且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故而英国政府的否决对于当时的中西"合作"政策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修约努力的破产，与天津教案一样，深刻地揭示了中外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变化

随着19 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张，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成为促进中外通商、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多功能综合机构。最重要的是，海关不断无条件地为中国提供新的财源，并利用关税制度来打击走私及腐败行为。为了防止香港大规模地走私鸦片及盐等商品进入中国，中国方面必须采取两种措施：首先，于1887 年将澳门正式割让给葡萄牙，使之成为外国领土；其次，海关在九龙及澳门附近建立分部以缉捕海上走私船。同时海关也标明了各近海区域，建立了灯塔、信号台、守望员等现代航海设施，同时发表贸易统计数字及商业、科学的调查报告。各地海关的负责人也和赫德一样具有准外交官的身份，而海关的中方雇员则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务员。1875 年时各地海关共有400名外籍雇员及1400名中方雇员，到了1895 年雇员总数发展到了73500 名，其中一半以上的外籍雇员为英国人。总而言之，赫德主持的中国海关是条约体制中的核心部分，不管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影响，赫德等人的工作均为其中最具建设性的。

随着通商口岸的发展，国外的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了中国。1869 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旅程缩短了一半。1870 年至1871 年，海参威、长崎、上海、香港及新加坡都铺设了电缆，可经伦敦到旧金山与全球进行电话通信。这样中国便与世界经济联成了一体，随全球的物价波动、危机起伏及外国竞争而同步运作。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世界银产量的增加，各国纷纷采取金本位制，受其影响中

国银价亦一再下跌乃至最终废止使用白银。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将关税固定在5％左右，但在物价上涨后关税有所降低，中国的进出日商品从通商口岸进入内地时要多交一半的转口税，但同时也免去了厘金等国内产品须交的税金。同样，外国进口货物时亦可多交一半关税作为"到岸税"，这样就可以免去其他一切税款。这些措施妨碍了中国政府实行保护性关税，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得本国商人在与洋商竞争时处在不利的地位。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并未能为外商提供预想的理想市场，这对做着黄金梦的欧美商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挫折。到了1890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不过50000万英镑，还不如某些小国，并且已经被日本迎头赶上。贫穷、自给自足及封闭保守无疑是中国贸易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但英国的商人却将之归结为满洲官员从中作梗、设置转口税及阻碍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原因。

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贸易均于19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后很快就衰落下去了。从1858 年到1860 年，通商口岸的鸦片生意受到法律保护并向政府交税，1879 年进口量更达到创纪录的8．7 万箱，但此后由于中国国内鸦片产量猛增，市场趋于饱和，鸦片进口也随之锐减。与之类似，出口到英国的茶叶销售量起初由19 世纪30 年代的30 阳万磅增加到80 年代的1．5 万磅，但随后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占领了英国市场，中国的茶叶出口也随之一落千丈。印度采用集中资本大规模庄园种植茶叶的方法，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并且免交出口关税。中国则仍采用小规模的个体种植方式，由于茶叶贩子经常在茶中渗假而难以保证质量，并且还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中国茶叶的竞争因此而大打折扣。就连中国的老牌出口商品— 丝绸，1900年以后也渐渐一撅不振，因为欧洲和日本已采取科学的养蚕方法、机械化的缥丝工艺及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使得本国丝织品质量稳定，产量亦大大得到提高。总而言之，清政府无法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领导并管理本国的商业活动，因而在经济上渐趋没落破产。

中国长江流域等地生产的棉花支撑着当时庞大的手工业生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890年，中国对棉花进口的需求一直不大，远远低于英国所预期的数字。倒是印度从英国进口的绵纱从1872 年到1890年的八年间增长了2O 倍，这是因为机纺棉纱比手纺棉纱产量提高了

80 倍，而机织棉布比手织棉布的速度只快了三倍。这样，国外的廉价棉纱沉重打击了国内的纺织业，但却为当时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外贸对19 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种种意见不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机器化大生产会对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生产造成破坏，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毕竟与完全殖民化的东南亚地区有所不同。而且，茶叶与丝绸出口受到打击后，中国又开始出口植物油、桐油、猪鬃、皮毛及大豆等农产品，这些也都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或小农经济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买办、金融家与实业家

洋教士与中国士绅势不两立，但中外商人彼此却需要对方。先前广州的行会商人原为洋商与国内市场的主要中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买办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不过，行会商人是政府授权的传统型商人，而买办却是受雇于洋行并为之服务的合同雇员。这些人为中西之间存在的文化、语言及制度差异搭起了桥梁。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唐廷枢，他和大多数早期买办一样来白广州，幼年在传教士办的英语学校里受过教育，后在香港政府担任译员，还曾在上海海关任职，1863 年又成为怡和洋行（原查甸o 开弟臣公司）的买办。他曾捐买功名而厕身官场，同时又在通商口岸投资做生意，实为当时买办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

买办商人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另一明显表现则是由宁波及山西钱庄发展而来的私家银行。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各朝的战略重地，位处蒙古与四川商人、华北与中亚贸易及驼帮和嘈帮商人的中转枢纽。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分号，尤以钱庄为多，并首开雇用保镖护送银船的先例。由于盗匪过多，货主开始使用钱庄汇兑钱款：、通常保镖费用为货物价值的2 ％一3 % ，但钱庄汇兑费用一般只需3 厘就够了。

山西钱庄商人的先驱是19 世纪前后的一位洗染业商人。当时他在天津做生意，在重庆设有分号以采买原料，后逐渐转向汇兑业务。晋商钱庄后来在全国发展到二分于个，各大钱庄设在普中的总部逐渐形成三大集团：为获得户部的认可，新开设的钱庄必须有其他钱庄做保，这样晋商便儿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各省官员子i 一了舰也依靠

他们汇兑自己的钱物，如搜括来的民财之类这些钱庄不但负责将其"宦囊"汇往京城，而且还专门负责贿赂沿途地方上及户部的官员。另外，钱庄还贷款给一些希图升迁的官员以为打点之用、）自19 It 七纪卜'上几叶起，他们还帮助）～州商家汇兑资金以购买茶叶、丝绸及进口鸦片等商品少

中国商人凭其对地方情况的熟悉，通过行会将国外进「I 的商品发送到各地销售。洋行本来在各通商口岸都设有分行，但后来逐渐将业务集中在香港、［海等主要航运中心。在各中转港口，中国商人成了国外船运公司的主要客户，因为与国内船运相比，前者更为稳妥可靠。简言之，条约体系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发展，如当时不少买办在通商口岸自办公司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英国等国的洋行于1865 年合并成为汇丰银行，这标志着士．海作为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崛起。汇丰银行与许多外国银行一道为中国商人及银行提供贷款、为转口贸易提供资金、承揽海外汇兑业务，甚至还自己发行钞票。中国的国内资本大多流向各通商口岸，因为在那里投资房地产生意较有保障，也符合当地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加工产品、建设公共措施和居民住房或发展航运事业等等也都需要资金。中国与外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吸引了国内的大量人才和资金。举例来说，旗昌洋行向美国合伙人、在华洋商及中国的商人、买办均摊资金，于1862 年开设了一条从上海到汉口的航线，采用美国的浅底外轮式轮船，每两周一班，业务方面由美国人主管，同时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标志着长江轮船航运时代的到来。

1870 年以后，通商口岸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引进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管理技术。如果条件合适、时间允许，中国可能会因此突破自给白足的发展模式而越过工业化进程中的瓶颈阶段。但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因而难成气候。当时日本的发展表明，工业现代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应与其他领域一道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但中国（除了在通商口岸以外）恰恰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既无明确的国家政治目标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又无稳定的货币操作规范可循，加之政府领导无方，民族企业又先天不足难以自立，实现工业现代化仍然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五、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19 世纪剩下的30 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虽然不慢，但仍然落在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后面。中国的长江航运仿照美国密西西比河航运事业的做法，但并未像欧美国家一样发展起铁路运输事业。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全国实现工业化，但在中国，工业化仅仅是在有数的几个城市中得以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及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政府领导的无能

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当时清政府的手里，只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与政策制订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与调控可言。1890 年左右，清政府列出的年度收人约为8900万两白银，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上交朝廷，大部分都由各省自留自用了。不过，当时实际的赋税收人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至五倍，由此可见，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 年曾氏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的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氏虽大力提倡洋务，但他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无所知。19 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年这些人却因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即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

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是为了维护其在现有体制中的个人政治利益。直到1894 年以前，朝中大权都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满朝官员皆为她的心腹。同治帝对她言听计从。据说他在慈禧纵容下冶游致病，遂于1875 年1 月不治身亡，年仅十几岁。慈禧为了继续掌权而打破了"祖宗家法"，让自己4 岁的亲外甥继位，是为光绪帝（1875一1908 年）, 并在光绪1889 年亲政之前，继续垂帘听政。1884 年慈禧将恭亲王奕诉免职，自此朝野上下无不俯首帖耳以奉其一人之欢。

这位女强人思想保守，善于在中央的大一统统治与新兴地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派大臣的现代化努力（如制造局与军械所）促进了地方主义的发展。慈禧只能采取合作加控制的方法来维持满清的统治，而这些洋务派领袖也依旧听命于朝廷，从未起过拥兵自立的念头。

李鸿章一生宦海沉浮，权力不可谓不大，但同时他又对清王朝忠心耿耿。1870 年之后，他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30 年之久，其掌权时间之长，在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李氏的势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他训练了淮军，这支军队的人数在2 . 5 万至4 万人之间，长期驻扎直隶、山东及江苏，其军械由天津、南京及上海提供；其次，李氏手下大约有2 的名年轻的将领、官员和技术专家，其中许多人都来自李氏的家乡合肥；第三，李氏掌管着各省的财政大权及全国的军费开支（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慈禧之重用李鸿章，表明她希望利用而不是阻碍后者不断上升的影响，从此两人在政治利益上走到了一起。李鸿章就像美国的市长，将私人的资金用于其事业，所以，他领导洋务运动既有为国为民的一面，却也不乏为个人打算的动机。

李鸿章采取"官督商办"的办法来发展民族经济。这与以前的食盐专卖一样，政府通过垄断某种日用必需品以聚敛钱财。但这种方法并不符合现代实业家崇尚动态、冒险的口味，因为它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与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不过是一种新的财富分配形式罢了。李鸿章首先发展了造船业。当时清朝仍需通过运河或山东近海的嘈运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运往北方。1872 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承运槽粮，兼揽商货。李氏起初任用潜帮中人管理招商局，但他很快便改用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改组后的船主大都成为经理人员，同时也接受朝廷的职封和俸禄。这些人又让亲朋好友在公司中担任职

务，因此，轮船招商局既非官办企业，又非现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而是一种官商合办的牟利性四不像机构。在朝廷支助下，轮船招商局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自1877 年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一批船队后，更是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但英国随之扩大经营在华的航运事业，而招商局的经理们却忙于中饱私囊，公司的营业乃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将中国国内航运业的龙头地位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轮船招商局是后来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雏型，这类企业始终未能摆脱旧式官商的习气。首先，在这些企业中，裙带关系、派系斗争、损公肥私及不思进取的风气仍很严重；其次，由于公司受到政府控制，经理者为顾眼前利益，无暇进行扩大再生产；最后，"官督"常常意味着为了与洋商竞争而赋予企业某些垄断专卖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往往会导致管理者的腐败无能。抱着开办各种企业互为保障的想法，李鸿章及唐廷枢于1876 年又开创了开平矿务局，计划为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燃料，而轮船在贡粮北运后还可载煤南返。矿务局使用现代化的水泵、风扇及起重机等设施，从以前经土法开采早已废弃不用的矿区中采煤获利。靠着十几名外国技师及现代化的设备，开平矿务局于1883 年又建立了机器制造局，自己生产马达、矿车、拖船，并自办电话、电报及7 英里长的一段铁路。很快全矿每年产煤量达到25 万吨。不过，1892 年唐廷枢死后矿务局事务交由一名旗人接管，其人只知牟取私利，遂使矿务局负债亏空。19 （刃年，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接管，其总工程师即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1912 年，开平矿务局成为英国资本的企业— 中英开滦矿务局。

这样在华北地区，轮船航运带动了煤矿的发展，而采煤运煤又促进了铁路的出现。晚清官僚为了防止外国的剥削，对办铁路持反对意见，如外商于1876 年建造的吴淞铁路，次年被两江总督购回后随即捣毁。开平矿务局拥有的铁路线也是分段逐步建成的：1888 年南线建至天津，1894 年东北段建到山海关，1896 年又铺到北京近郊，全长大约240 英里。除了台湾的一小段铁路外，这段总长不过240 英里的铁路，便是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30 年后对全球铁路时代做出的惟一回应。中国铁路建设之所以滞后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首先，中国除华北地区外水路交通方便，各内河航运公司之间竞争激烈，通过水路可深入到

中国内地，但铁路由于穿越水渠、稻田甚至坟茔，与中国人的生活直接产生了接触，很快就激起大众的迷信思想和仇外情绪。另外，由于地价高昂，修建铁路耗资巨大，但资金不易筹集，政府也苦于财力不足，而且当时合同及信用贷款制度也很不完善。清政府对修建铁路一事满怀戒备心理，既不许外商在中国建设铁路，同时也不准中国人向外国人借款修造铁路。

在李鸿章的工业帝国中有不少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1844—1916 年）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盛氏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自办"官督民办"式的天津电报总局，尽管招牌堂皇，但其大约200万两白银的本金还是通过盛氏及电报局同仁参股筹集起来的。清政府也提供了贷款，并且派兵护守电话线，以防农民因其"破坏风水"而捣毁设施。电报局每年的收人有1 / 5 流入了股东们的腰包，直到1900年之后，电报局才逐步收归国有。在此之前李鸿章、盛宣怀控制了全国的电报局，不仅人员由其指定，他们对下面人的不法行为还想方设法予以包庇。

许多国家在实行工业化时，首先发展的都是棉纺织机器制造厂，像日本于19 世纪80 年代兴建的织布厂就大大获得成功。早在1878年，李鸿章就着手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与国外进口纺织品相竞争。清政府亦予以免税的优惠，并特许织布局在10 年内垄断全国的棉布、棉纱制造。同时织布局也购买国外机器并聘用国外的技术人员。由于筹组人抽逃资金，兼之认股不足，筹办之事一时搁浅。1887 年盛宣怀清查重办，由直隶省拨款重建开厂。自1890 年起，全厂4000名工人每年均生产出优质的棉布和棉纱。当工厂于1893 年失火被毁时，股本已收回了大约1 / 4 。李鸿章与盛宣怀毫不气馁，计划再建11 个织布局，准备垄断国内的纺织工业并击败国外进口的纺织品，但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只建成了5 家纺织厂，李、盛二人的梦想破灭了。

六、缓慢的现代化进程

通商口岸商业及工业等物质文明的发展自然也带来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革新。但这些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和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显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西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如长辫、马褂、缠足、红白喜事及轿舆仪仗等等，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及

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邮政与报纸

赫德早就设想在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邮政制度，但他花了30 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传邮方式已经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首先，中国以京城为中心，分五路在全国设立了大约1600个驿站以负责接待官府人员和传送官方信函、货物及钱款。其次，"邮行"亦可为普通百姓传递信件（虽然传送地区有限），收费则视道路远近而定。在19 世纪末，全国24 个通商口岸中共有大约300 个邮行，另外在乡村也有不少这样的机构。最后一点，西方国家为方便对华商业起见，在各大城市都开设了邮政业务，并且面向普通外国人服务，后来十几家外国邮政机构在中国也先后开展了业务。

为了发展现代化的国家邮政事业，赫德利用海关以代替以往的邮行等既得利益集团。海关起初只是在冬季将使馆的信函递送到北京，后逐步建立了邮政部，1896年时正式隶属于总税务司，利用外国轮船来传送邮件。邮政部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邮政机构并逐渐取代了国内的邮行。

现代化的另一标志— 新闻事业，在中国亦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史。中国一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了登载朝廷文告的"邸报"，但它并非正式出版物，而且形式单一，一般京师的商家印发这些所谓的报纸有偿向全国的士大夫通报朝廷的动向与文告。在城市里，坊间亦印刷一些附带新闻的商业广告，由小贩沿街兜售。另外，行会规定的价目表及官府捐刻的书籍目录，也是当时传播新闻的一个途径。

真正将新闻报纸带人中国的是新教传教士。新教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未能打人中国内地，于是他们印行用中国方言翻译出的福音书进行传教。伦敦布道会于1815年在马六甲开设了一家报馆并发行一种中文月刊。其他传教机构亦纷纷效仿，除去中文期刊外，当时还创办了China Mail (1 845 年创于香港）、《北华捷报》（又名《 先锋报》，1850 年创于上海）等报纸。这些报纸主要登载时事新闻、商业动态及领事公报，它们便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先驱。

后来不少文人也纷纷投身报界评论时事，中国的报纸遂超越了提供事实的幼稚期。清政府对此十分忌惮，因此该类报纸也只有在通商口岸才可容身。这批报人的先驱王韬，其人本为封建知识分子，19 世纪50 年代曾在上海任职于伦敦布道会所办的墨海书馆，60年代又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 ）翻译儒家的五经，其中有两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1874 年他在香港创办了《 循环日报》 ，以评论时政为主，并时常穿插他游历欧、日的随笔。王韬对清政府常常提出批评，但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名爱国主义者，而王氏的爱国思想与改良思想正是来自于他早年与西方的接触。

派遣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最早留学国外者当推容闳，他出身广东香山一贫苦农家，幼时人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文，后被传教士送往美国学习。他在美国饭依了基督教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于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说，通过在耶鲁的学习，他感到了"无知者永远体会不到的责任感"。他认为，"向西方学习，也许会使中国获得新生，变得文明而强大"。但直到1872 年，容阂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他盼望已久的梦想— 中国向美国派遣教育考察团。通过这项计划，120 名身着长袍马褂的中国男孩（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农家）分为四等被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的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t）学习。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此时容闳己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二他对这一文化同化现象也持赞成态度，这令思想保守的同事大为震惊，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尼福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当这些学生返回上海向道台即头请安时，他们却因对传统科举制度造成冲击而受到八股学者的猜忌。因此，容闲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12 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新教传教团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新教传教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样也是大力耕耘而收获甚微，充满了挫折与失败的经验。1870 年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有250 人，1896 年达到750 人；而同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人数每10 年就增长一倍，他们的传教点也与年俱增，如18 印年有35 个传教点，19 (X 〕年时增加到498 个。不过在1890 年时，尽管在华的新教传教士达到1300 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在华天主教牧师的两倍），坂依的教徒才不过37 仪幻人，而同时阪依天主教者却有50 万之众。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英两国的中产阶级或乡村地区，通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传播福音，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做些慈善工作也许能收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于是他们改变了传教方法。但当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多妻制、童养媳、缠足、赌博、算命、佛道信仰乃至儒家的祖先崇拜以及溺婴、吸鸦片等社会陋习时，却遭到了社会的抵制。他有感到，为了传播福音首先必须办学普及教育，让饭依的中国人向本国同胞传播教义。

1877 年经新教布道总会统计，全中国已设有20 所神学学校，其中有学生231 名。起初办的只是中小学，后逐步发展了公学和大学（c ege) ，如圣约翰大学。这些高等学校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学院为所属或对应的关系。1881 年，由奥伯林（oberlin Colle）学院派出的传道团到达中国，从而揭开了美国高校学生志愿海外布道运动（山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了Foreign Mission ）的序幕。同时来华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队、诊所、医院及卫校等慈善机构。18 卯年第二届新教布道总会召开时，不仅有"中华教育会"(Educa - tiona上Association of China) ，而且还创办了"中华医学布道会"。基督教徒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前景是无比广阔的。

浸礼教牧师李提摩太是威尔士人，他曾于1877 年至1879 年在山西贩济灾民。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认为中国人接受的西方文明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饭依西方文明的动力来源— 基督教。西方式的人类进步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慈善工作，特别是教育，则为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者。李提摩太自1891 年起担任"同文书会"的总干事，致力于向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宣传革新的思想。他的同道有来自美国乔治亚洲的传教土林乐知（Young J . Allen) ，后者曾从事过翻译和编辑工作，白1868 年起在上海开办《 中国教会新报》 ，后来又改称《 万国

公报》。这份杂志聘请了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担任编辑，向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时事消息，对后来19 世纪末的那场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就像王韬、容闳一样，传教士的改革主张也只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不过是通商口岸地区的产物，对广大农民或缙绅阶层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遭到失败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才一逐步从传统的钳制中解放出来。

第12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一、外国侵入中国边境

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凯觑中国边境的领土，出于某些原因，这种敌对势力自1870 年以来大大增强了。在欧洲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英法等民主政体国家走向了殖民扩张。欧洲列强的国民刚刚通过不断发展的城市报业同世界大事联系起来，因而都对国家进行海外掠夺抱有不同程度的热忱。这一切都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导合理化了，即种族和民族必然为了生存而竞争，而且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去。有些行政官员意识到身负"白人的重担"，这种理想与传教士的宗教热情可谓同出一辙。报纸的读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变成了当事者，他们往往因每日新闻或惊或喜，群情激奋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由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断升级，很明显中华帝国的边境变得模糊起来，换句话说，变得不够稳固了。地图通常是不可靠的；历史上对一块领地的归属也常常有不同看的法，并且，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也日渐产生了动摇。不但疆域不再确定，清政府对于朝贡国的宗主地位也变得若有若无。毕竟朝贡体系这种防卫制度，主要是以儒家道德和文化的优越为基础，而不是以条约协定和军事统治为基础的。清政府或是为附庸国的骚乱承扣责任并向激怒了的外国人赔款，或是放弃对这些地区的司法统治权。在面临这一选择时，清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诱责任不肯付出赔款。就这样，琉球群岛、台湾、越南、朝鲜以及亚洲中部地区逐渐成了外国列强殖民扩张的绝佳目标。

沙俄进退中亚细亚

自1870 年中国清政府的最西北边境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中国新疆）受到侵犯以来，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便受到极大的威胁。满清政府有三大战略要地，首先是哈密（喀穆尔）一带的地区，此地为穿过沙漠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进入亚洲腹地的枢纽。哈密地区及以西的其他重要地区曾是满人向西进行军事远征的后勤基地，也是政府行政官员和那些协助清政府征服并统治中亚突厥语系同盟的大本营。

第二个战略地区以位处阿尔泰山山脉之南和天山之北的伊犁河谷大草原为中心。该地曾是西蒙古准噶尔人的故乡，在18 世纪50 年代这

个部落灭绝之后，这地遍布了囚犯隔离区和军事要塞，由军事首脑在主要城市库尔加（Kuldja ）进行统治。在当地及其他边哨上，中国用茶叶、丝绸和棉织品同哈萨克部族及其西北地区交换马匹。

清政府对第三个战略地区的控制最为松散。这一地区由位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河谷上的绿洲城市组成，有时根据其主要绿洲及其在贸易通路上的核心地位被称作喀什。当地居民主要说突厥语，大多是穆斯林，这同西部绿洲贸易城市的情况十分相似。帕米尔地区一东一西这两处中亚地区通过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贸易和政治而紧紧联系起来了：它们都曾相继受到蒙古察哈台汗国的统治；13 和14 世纪都曾受到帕米尔帝国的统治；以后又从14 世纪到17 世纪受到蒙兀尔人的统治— 这个好战民族虽然讲突厥语并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却是蒙古人的后裔。

这一地区的最后统治者是祖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氏族成员，即霍加家族的成员，他们曾在17 世纪末的许多绿洲城市中极有势力。这样，喀什的霍加族统治者就同帕米尔地区西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可从后者那里求得支持。这个家族被清政府迁出这一地区后，其后裔就藏匿在浩罕（Khokand ）以及山左以西地区。浩罕汗国成为商贸发展的中心，并通过向清政府朝贡发展了贸易。这里同时也是反清暴乱的根据地。清政府在喀什的首脑曾赐予当地约270 名首领以"汗"（hun）的称号，分配其土地和农奴，这样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名义上归属清政府的统治阶级。不过由于他们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地区，因而是很难约束他们的。到了1860 年，这时清政府仅仅统治了一个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成为不断扩张的沙俄和大英帝国的侵略目标。特别是沙俄，穿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大草原向南部和西南方向不断进逼，企图兼并西部的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一则为了该地的棉花收成，二则因为该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这个地区可以进入英属印度北部。同时，清政府对喀什和伊犁地区的控制则相当薄弱，两地相隔有3500 英里之遥，靠释站往来消息要用6 个星期。这种措施只是出于传统上对西部蒙古边境的战略考虑，而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1862 年穆斯林在中国西北的叛乱，由于得到了浩罕地区霍加人的支持，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逐渐演变成一场起义。浩罕国的阿古柏汗当即掌握了权力并统治了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在其统治下从

1865 年到1877 年一直是独立的穆斯林领地。为遏制阿古柏和英国在当地的影响，沙俄军队于1871 年进驻伊犁河谷并战领了霍加的商业中心。他们对占领该地蓄谋已久，早在1851 年就同当地有着相当正规的贸易往来。沙俄向清政府保证，一旦后者重新确立在伊犁的统治，他们就会撤离此地。

就这样，清政府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尽管左宗棠在1873 年率兵镇压了西北穆斯林的叛乱，但是他的军队主要是在甘肃省，同阿古柏在喀什的首府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到洛杉矶之间的距离。这其间要穿越数百英里的沙漠，一支商队须走几十天才能到达。同时，中国还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纠纷。

对这场危机清朝有两派不同的战略意见。李鸿章一派主张"自强"并主张沿海岸线防御海上侵略，而左宗棠一派则计划再次征服亚洲腹地的不毛之地，这项计划因耗资太大遭到了李鸿章一派的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朝廷认为左宗棠的意见可行并准予实施。中亚是清政府传统上用来抵御蒙古人的战略要地，为此曾一再拓边西进。为了祖宗先皇就必须重新古有这片地区。左宗棠在上海办起中外信贷来购置西方的大炮，并在兰州建成了军火库和毛纺厂。同时他命令军队在当地屯田，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来满足一部分军队的衣食需求。他在甘肃建立了一块基地，并由此不断向西推进。1876 年，左宗棠的军队穿越沙漠攻取了乌鲁木齐及其他战略要地，并对北部地区讲汉语的穆斯林"反贼"大开杀戒，然后大军驱人塔里木盆地，对待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比对边境叛逆较为宽和。阿古柏于1877 年死去。到1878 年，左宗棠重新占领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

清政府因其辉煌战绩要求沙俄撤出伊犁。第一位满洲使臣在同沙俄的谈判中表现得极为愚蠢，作出了太大的让步，以至于朝廷威胁要砍他的头。这样的外交使双方都极为愤怒，甚至彼此以战争相恐吓。但是危机过去了。1881 年产生的另一条约使沙俄得到了更多的赔款，但是中国也收复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二1884 年中国土耳其斯坦成为一个省，命名为新疆，意为"新的占领地"。这一结局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的自信心再次高扬起来，同时保守派也由此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认定中国能赶走外国侵略者，并且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抵制西化。

滞后的中国外交

清政府为何迟迟不肯派遣可用来观察敌方国内情况并保护本国利益的驻外使节呢？自1861 年以来就有西方官员居留北京，但是直到1877 年中国才派出驻外使节。这种滞后状况有其心理及政治根源。中国派驻使臣的传统是在国力强盛时向外邦遣使以弘扬皇威，国力衰弱时则是遣使向"蛮夷"求和。一旦北京进驻了一批不需叩拜的西方使臣，皇帝的威严就会动摇，外交关系则变得格外屈辱。在政治中这一受了伤的尊严就被利用了。李鸿章等主张西化的人，在同西方的接触中势力增长，而死硬保守派则认为任何同外国人的往来都是反叛行为，他们对主张西化的人进行严厉谴责，后者则不得不对此加以包容，而这恰恰最好地遏制并平衡了西化论者的势力。慈禧太后因此采纳双方意见并在这种相持局面中坐收好处。

外国扩张主义者也从清政府的优柔寡断中得益，如日本处理台湾土著杀死琉球群岛居民的事件就是一例。尽管琉球群岛自1605 年后即处于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但它并非日本的附庸领地，从前一向是附属中国的。然而，总理衙门颟顸之极，竟对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不加置疑，更糟糕的是，反而为了免向日本交付赔款宣称不为台湾土著负责。于是，复仇心切的日本武士便在1874 年攻人台湾；虽然战火未燃，但中国为了让日本撤军，又不得不交付偿金。李鸿章等人指出如果中国在日本派驻使臣的话，或许可以避免这场耗费财力的事件。1875 年，在英国人试图开辟一条陆上贸易通道从缅甸入侵云南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一名英国翻译被当地武装民众杀死。英方要求中方支付赔款并向之道歉、规范中外交往条例，同时在贸易中做出让步。全部这些条件都包括在1876 年《芝罘协定》 的最后议定条款之中。中国第一位驻外官员郭嵩焘于1877 年被派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致歉。他是湖南人，翰林院学士，也是曾国藩的朋友。他在从伦敦送回的报告中盛赞铁路、电报和矿井，并且他发现有200 余名日本人在英国学习技术，他对此极为欣赏。郭嵩焘公然宣扬西化激怒了死硬派，这些人对他大加低毁，这样他不得不于1879 年离任。不过这时中国已向美、德、法、日、俄及英国等国均派遣了公使。

中国不愿向外国派遣使节是因为这无疑承认了外国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使中国政府十分为难。但是，一旦外国列强兼并了中国的附

属领地，再自欺欺人就会导致危机。在越南的情况就格外说明问题。西方的入侵，附庸国的软弱，再加上中国无力行使西式宗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一起摧毁了旧式的朝贡制度。

二、中法战争

以河内附近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北越曾于公元前111 年被中国汉朝兼并，直到公元939 年之前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尽管北越人不讲汉语（越语同泰语相似），而且其主要文化特质也与其他东南亚民族相似，但是中国的文字、儒家经典与家庭教育、考试制度、官僚体制及中央集权制都给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越南统治者自939 年以后就按时向中国朝廷进贡，并继续效仿中国的律法和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是仅次于朝鲜的朝贡国。

19 世纪越南国力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越南国小地狭，北部的河内三角区曾是历史悠久的人口、生产和权力中心。后来西贡南部的泥公河三角区受到了接管，该地相对比较落后，不过是越南扩张国土的前沿。而阮氏王朝新都顺化位于一片狭窄的沿海耕地上，则担负着融合南北、统一全国的任务。从社会环境讲，由于存在着非越南的少数民族，统一受到了阻碍。越南处于印度影响下的东南亚和中国两大文明的夹缝中，很难像中国那样获得民族和社会的一元性，与朝鲜和日本相比也差距极大。儒家政权及其官僚制度模糊了村社之间极大的差距，但是无法依靠一批受到正统思想灌输的乡村精英或绅士阶层在效忠朝廷的同时治理乡间。杂棵性的教派极易兴起并滋生力量，同时地方豪强还拥有私人武装。

法国的入侵

由于越南海岸边境线太长，更是难以控制，在法国传教上的努力下，天主教遂稳步发展起来，对此阮氏王朝的统治者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在外国积极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基督教汉化活动之后，基督教在当地深人人心，其教众超过了在中国的教徒人数，同时，在政治上、村仇械斗等方面也都受到基督教深刻的影响。阮氏王朝是在儒家道德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嫡长制度进行统治的，现在统治者及其保守派支持者都日益感到国外宗教的威胁。他们对此进行了抵制。直到1860年的20余年中，约25 名欧洲传教士和300 名越南传教士，还有大约3 万越南

教众在这场宗教迫害中被杀害。这为法兰西帝国的创建者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侵略机会。

法国一直苦心孤诣地试图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由于对发展外贸缺乏相应的兴趣，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转而大力提倡在东亚传教以扩大影响。法国曾在1857 年至1860 年与英军一同进犯中国，同时还入侵越南，并于1859 年占领西贡，然后又攻下了西贡周围的三个省。随即越南南部发起了抗法起义。越南官员逃走了，这样法国无法通过他们进行统治，因而只能直接进行统治并建立了交趾支那（Cochin China）殖民地。同时，法国看到有可能在泪公河上同中国进行贸易，于是从1863 年到1864 年在柬埔寨附近建立了一个保护领地。法国主要通过法国海军才得以占领南部越南。商人那时几乎还未出现。传教士只起到了辅助作用，从1866 年到1868 年在泥公河一带的地理考察充分激发了法国民众建立印度支那帝国的兴趣，但是考察结果只是表明无法经泥公河进入中国西南进行贸易，这样一来，法国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从东京（北析）走红河一线。在这里，法国侵略者在同英美争夺霸权的同时感到重振了法国的雄风。

中法战争

19 世纪80 年代"安南"（即中国和西方所称的越南）同时接受法国和中国的统治。由法国治理，是奠定在1874 年法越条约的基础上，而由中国治理，则是基于越南统治者自1664 年以来向清政府朝贡约50 次这一事实，（最近两次朝贡分别是在1877 年和1881 年）。但是法国在南部控制着其殖民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在越南首府顺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越南北部中越边境的东京（北析）, 10 余年来陷入混乱之中，中法之间相互产生了敌意。在这里阮氏王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同时中国的非正规军队— 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军队的残余也渗透了进来。随之产生的混乱状况使法国未能得到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如在红河上进行贸易等等。越南统治者支持中国非正规军对抗法军，又请进中国军队来打击法国及中国的非正规军。最终法国于1882 年占领了河内，通过条约在安南建立了一块保护领地，随之法国不得不马上派遣增援军队。中国于1883 年越过边境从云南和广西向东京（北折）派遣了正规军队，同当地严阵以待的法军展开了较量。1883 至1885 年的中法关系是敌意与谈判共存，不仅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后世

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其中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局混乱，同时交战双方的议和人员又都受到自己同胞的挟制，一经战败，败方的战争呼声就更加高涨。在同沙俄的伊犁危机中，清政府内阁中已然出现了主战派。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两次镇压起义之后，中国官员有很多是穿着文官服色的老军人，这些人由于清政府在中亚取得的胜利而信心十足。北京的六七名年轻的学士组成了"清流党"("purification clique")，宣扬在外交上要采取最强硬的政策，以武力对抗武力。一些动辄便上奏折的人为讨好慈禧太后，纷纷攻击洋务派官员，，并且主张对俄法采取战争姿态。1884 年，法军一再击败清军，导致恭亲王被免职，军机处被解散，这样，"清流党"迅速掌握了权力。然而，随着法军的节节胜利，他们只是一再尝到失败和受挫的滋味。张之洞（1837 一1909年）是这个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也是惟一掌有大权的人。张氏于1884 年成为两广总督，他全力主战并于此显示出了他的务实才能。

中法双方几乎在刚刚出现敌意时就开始谈判了。最终1884 年5 月李鸿章同一名法国海军军官达成了《 李福协定》 ，其中规定中国撤军并允许法国通过东京（北沂）进行贸易，而法国则保有安南及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并且不向中国要求赔款。主战派为此上了47 道奏折痛低李鸿章，朝廷也不愿失去宗主国的地位，而在此之后中法之间的敌对状况并没有停止，时有零星战斗发生，伤亡更为惨重，谈判亦往往破裂。罗伯特o 赫德身处清政府内阁之中，却并不为中国服务，而是同法国开始了秘密会谈二1885 年他派遣海关的伦敦特使前往巴黎，并依靠法国朝廷在《 李福协定》 的基础上同中国议定了和约。李鸿章于1885 年6 月在和约。签了字延长了一年的敌对状况使中国耗资巨大。一支法国舰队于1884 年8 月进攻了台湾北部；在福州湾则停泊了另一支舰队，同清朝新建的福建水师舰队的11 艘小型福州造木制蒸汽战舰停泊在一起〕这八艘法国军舰比中国战船大，船上大炮的威力也吏强清政府五周以来犹豫难决，任由法国的最后通碟于8 月23日失效，于是法军在几分钟内摧毁了中国的9 艘战船，其中包括1866 年在法国工程师帮助下建成的船坞。

法军的陆上优势则没有那么明显。骄傲自大的法军经常在东京（北沂）的丛林中受到中国人和越南人的伏击。法军占领了河内一带

的三角区，并往北向广西边境上挺进，最后占领了镇南关以南的谅山。1885 年3 月中国出其不意重新夺回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导致了法国内阁的垮台，这为中国多少挽回了一些面子。反法战争是中国自19 世纪60 年代"自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抗击现代化敌军的自卫战争。它揭示了如下一个重要事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现代武器装备就相对难以发挥作用。如果中国人没有受到一定的训练，不讲战术没有后备，消息闭塞，缺乏战略和统一指挥，那么欧洲最好的大炮到了中国人手里也是没有用的。例如，福州湾距海约20 英里，由一条狭窄的海路与海相通，沿途的炮台配备有克虏伯和阿姆斯特丹最新生产的大炮。然而，由于指挥极为混乱无章且不够果断，不但现代化装备无法发挥效力，就连传统战术也不能起到阻挡和遏制法军的作用。中国在1884 年拥有50 余艘大多数在中国制造的现代化战舰，然而这些战舰却分成了4 支舰队，号令并不统一，如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就分别归南京和天津管辖。这两支舰队比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都大，但只是防守在自家海域上。一则出于谨慎，二则官员各自保存实力并相互倾轧，因而水师未能统一作战而被敌军各个击破。

然而，同法国的战争也导致了另一结果，即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民纷纷起来奋勇抗敌。在广东，即东京（北沂）军队的主要根据地，情况更是如此。广东人民抗击外国侵略的传统由来已久。对法国人进攻的恐慌、中国政府在福州大溃败之后向法国宣战及张之洞按照旧俗用现金悬赏法军的人头— 所有这些都使广东人民的抗敌精神更加高涨。法国侵略者，特别是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甚至还未侵古广东就开始在各地滋事掳掠了。香港的现代化中文报刊媒介面向当时的比文人学者阶层更广泛的社会，进一步向读者报道令国人激奋不已的消息，这似乎也激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民族主义运动。

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0年中相对太平无事。由于俄国、法国和日本在边境地区的侵略，中国相应地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加强军事和海军建设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多方进行努力要使国家防御体系实现现代化，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一改革只能依赖于在位者能继续推行它的改革措施，然而当它触犯了当地官员的既得利益时，其改革亦往往付诸东流。

台湾于1885 年从福建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省。在台湾，这种依靠某个官员来维持发展的状况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以士大夫为核心的保守派的利益相对薄弱，这样台湾的首任总督、李鸿章的一名副官刘铭传，就得以在其六年的任期内取得一些颇有影响的成果：在首府台北建成了一个军火库，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澎湖列岛为核心创建了一支海军，在土地测量和人口登记的基础上改革了土地税，同时建成了其他一些现代化设施。不幸这位总督并非真正的孔门学子出身，而是从办团练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的，保守派对他大加攻汗并导致1891 年刘铭传被调离台湾。

张之洞在地方上推行的改革则更为有力。同法国人交战的惨痛经历使张之洞转而相信有必要进行现代化改革。1885 年以后，就地方影响和官方政治而言，张氏成为李鸿章最主要的对手。尽管张之洞自1885 年至1889 年任两广总督、自1884 年至1896 年任两江总督，他的主要地方根据地是在武汉三镇（即汉江汇人长江之地，武昌、汉阳和汉口的合称）。他分别于1889 - 1 894 年、1896 一1907 年担任湖广总督，前后共巧年时间。这一漫长的任期使他得以完成发展地方力量所需的种种规划。他培养了一批自己的部下，在地方有自己的税收来源，建立起了军队，兴办工厂并获得了政治上的靠上[上。由于张之洞过人的才华及其在抗击外国侵略战争中立下的功劳，他着手现代化改革时不至于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同李鸿章相比，他做地方官长晚了20 年。他不像李鸿章那样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是他更为刚正廉洁，一心希望人们能接受现代化的观念，并使之在理沦卜与'}，国的传统血．脉扶件，

张之洞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机构，但这时他却不得不直面这一事实："自强"不断危害若儒家秩序的根本支柱例如，国家要自卫，就得在军校中培养有文化的军官，即军人须同时又是文人。这就破坏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再者，军队统领须掌握实际作战的技能，这又模糊了上等人（"劳心"的文官）和下等人("劳力"的工匠及其他小民）之间旧有的界限。张之洞为了加强军事防御而不断吸收西方技术，同时他也一直努力试图保存中闰的传统学术和传统价值。张之洞成了通过改良来"自强"救国一一即使用西方技术为中国服务— 最主要的发言人。

加强国防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海军：1885 年法军摧毁了福建水师之后，当局认识到海军必须要有统一的指挥，于是在北京成认了"海军衙门"。然而，实际上分驻沿海4 个地区的4 支舰队依然受到地力一力量的控制。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了海军的主力部队北洋水师。他同外国工厂签订合同，在中国北方修建炮台和基地，其中包括旅顺的海军基地和威海口的兵备库。不同于福州继续修建自己船舰的做法，李鸿章向英、德等国的大军火商购置舰船，一位英国海军官员直到1890 年一直都是他的主要顾问。那时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总共拥有大约25 艘船舰，其中9 艘为现代化的战舰。

然而，这时清政府却打算在北京西北建立一个新的皇家园林为慈禧太后1889 年归政后休憩之用，这就结束了清未建立海军的一切努力。昆明湖上著名的大理石船便是这一情形的缩影、它令人回忆起就在4 个世纪以前因奢糜而使明朝衰落的万历皇帝的奢华排场。宫中大太监和其余朝臣都极力促成此事以便中饱私囊。内务府向各省以"海军费用"的名义征集了大额税款并向怡和洋行举贷这样，在19 世纪9O 年代早期，清廷为修建颐和园花费了上百万两白银，北洋海军却从此再无军费补给，而同时代欧洲海军发展突飞猛进，同时日本海军也新增了9 艘快艇。清朝的某些舰队甚至还在旅（顺）大（连）港（Port Arthur）和芝罘之间开始运送乘客。到了1894 年，李鸿章意识到他的舰队不尽如人意，于是竭尽全力避免同日本海军开战以求保存实力。

三、中日甲午战争

朝鲜北部像越南北部一样，于公元前108 年同属汉朝统治下，在此400年后也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辐射之下。

朝鲜于7 世纪时完成了统一，其文化模式主要仿效中国。越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变体，但其中亦混杂有东南亚文化的因素，而朝鲜却转化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所有主要特点以为己用。这样，尽管朝鲜同中国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历史，朝鲜人民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朝鲜仍是中国的第一号朝贡国、因此朝鲜统治是极为保守的。王氏高丽于935 年重新统一了朝鲜，其统治维持了470 多年，此后李朝（1392一1910 年）继起，其统治持续的时间相当于明朝和清朝两代之和。

越南由于地理条件极为不利，一时沦为欧洲列强进行海外扩张的目标，朝鲜也同样由于地理的关系，正好处于中、日、俄止个帝国交

接和冲突之地。而且，全方位的汉式儒家教育，尤其是朝贡制度，都显然给朝鲜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朝鲜几个世纪以来的外交往来仅限于按时向中国朝贡，有时也向日本进贡．尽管当时朝鲜的国力十分微弱，但朝鲜国主仍对所有同西方的接触抱有极大的敌意。他们顽固地坚持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直到被迫学习外交艺术时已然大势去矣。朝鲜不能当机立断明确目标，因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帝国主义在这里的侵略扩张和在别处一样，尽管后来难以抵御，一开始却似乎只是在外围即从思想上构成一定威胁。

朝鲜的叛乱和复兴运动

朝鲜在19 世纪80 年代遇到了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危机，一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早些年的经历。国内一个宗教组织领导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几百年来破坏性最大的一次。这次起义主要是由于人民的贫困和政府的昏庸，太平军起义失败和外国入侵中国的恶讯也同样激发了朝鲜人民的斗争。然而，朝鲜的国内叛乱及其与国外宗教的关系和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天主教首先由北京的耶稣会会士通过中文传教材料传入朝鲜，后逐渐以"西学"闻名。到了18 世纪末，中国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才进入朝鲜进行传教活动。基督教由于发展了一些教徒，于是马上在1801 年及以后作为异教和国外敌对力量而受到迫害。这样，在朝鲜的基督教只能转入地下，成为秘密团体，早期由中国神父主持圣礼，1836 年以后方由潜入国内的法国传教士接管了这一工作。

19 世纪60 年代，一个综合性的宗教团体即"东学"在朝鲜兴起"东学"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反抗"西学"，但其实它也部分受到了"西学"的影响。"东学"教义棵和儒、释、道三教，其中甚至也包含了天主教的宇宙哲学，同时还夹杂着很强的朝鲜本土宗教萨满教以及神人精神合一信仰的影响。这个新教派很白然对穷苦农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从而迅速传播开来，并促进了朝鲜东部和东南部的起义（1862 一1863 年）。朝鲜统治者一则奉行闭关锁国的反基督教政策，二则试图进行改革以振兴传统机制，这样，朝鲜统治者在19 世纪60 年代在国内遭逢叛乱的同时又受到西方列强的挑衅。。结果东学运动被迫转人地下，朝鲜的摄政工兴宣君（或称大院君）从1864 年到1873 年的10 年中实施了强有力的改革金计划。兴宣君是幼帝高宗（1864 一1907 年在位＞

的生父，他准备对整个既成体制进行改革。在这场国内危机中，他试行改革以重现王朝建立之初的黄金时代。

尽管兴宣君要全力复兴传统，甚至借用现代手段来保卫这一传统，但他却是一名激烈的排外者。他下令处决法国传教士，这使法国于1866 年从海上发起了进攻，而就在这时，他的将官还向入侵者一本正经地宣讲儒家义哩："你们怎能让我们放弃祖宗的训诫，而去接受他人的呢？"法国人离去之后（朝鲜人认为法军败退了），兴宣君继续迫害基督徒，同时根据既成习惯将所有的外事权限都交由清政府掌管。

朝鲜的门户开放

李鸿章在中俄伊犁事件及中法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中，始终注视着日本。后者的崛起对中国北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对朝鲜的影响尤为显著。日本继续在釜山同朝鲜展开有限的贸易往来，这同荷兰在长崎进行贸易不无相似。同时朝鲜也不时从汉城派使团去往江户幕府除此之外，朝鲜始终严密封锁着国家边境。直到19 世纪80 年代，朝鲜惟一的外交活动便是定期向清政府遣使朝贡，

在19 世纪，西方的船只由于天气原因常常在朝鲜的港口停泊。朝鲜政府总是救助遇难乘客，然后再把他们遣送到中国：但是朝鲜仍上日强烈反对与外界通商乃至对话谈判：这就激起了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敌视，大家都拭目以待，看谁能超过海军司令官佩里当年来"打开"朝鲜的国门。1871 年派往中国的美国官员受令率五艘战舰沿海上直接进逼朝鲜首都船上的勘察员继续前进，结果有两名美国人受伤，要求朝方一致歉未果：为了报复，美国舰队摧毁了五个炮台，杀死约250 名朝鲜人，但是最终舰队只能驶走。朝鲜方面十分顽固。坚决拒绝谈判，并且由于这些表面上的胜利而更加信守闭关锁国的旧有政策：

此时邻国的扩张构成了比远道而来的西方人更为严重的威胁。到19 世纪20 年代中期，约有4000朝鲜难民为逃避艰难时世与严酷政治公然反抗闭关锁国的政策，纷纷在北朝鲜以北沙俄新建的靠海省份留居下来。同时，向朝鲜挑起战争也成了急不可耐的日本武士的既定目标。1873 年，日本武士侵略朝鲜的计划未能实施，这是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头脑较清醒的人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但东京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要试着打开朝鲜国门并从中国手中夺走这个国家。

1875 年，一队日本人乘战舰侦察朝鲜海岸，下船后遭到朝方射击。当时日本政府仍旧强烈反对侵略朝鲜，故决定通过炫耀优势兵力适度提出交往要求以期和平"开放"朝鲜。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仍坚持中国陈腐的自命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同时又不积极争取对朝贡国的宗主国地位，认为"尽管朝鲜依附于中国，但它并非中国的领土，因而它有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权利"。最终，他们建议朝鲜同日本谈判。日本停泊在仁川的战舰和货船由此在1876 年2 月按照西方同中国和日本签约的模式，享受到了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权益。日本开辟了三处通商口岸即釜山，仁川（当时名为Chemulpo ）和元山，并宣布朝鲜为"独立的国家"。

中日交恶

同外国增加接触在朝鲜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中国不得不马上要在朝鲜的政府和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尽管中国的介入颇为勉强，但是中国已经决定变法，以同日本更为激进的现代化改革相抗衡。但是，由于兴宣君之流的死硬保守派极力反对中国和日本对朝鲜施加影响，从而使改革变得复杂起来。尽管自1873 年以来兴宣君已经失势下台，他仍煽动并支持了1882 年抗击外国的起义。在这场起义中，暴民攻打了日本公使馆。中国和日本都向朝鲜派遣了军队，但是中国派遣的人数更众，挟持兴宣君之后还将他在中国软禁了三年。日本则在获得赔款后退兵。李鸿章开始试图在朝鲜优先发展贸易，任命顾问，并且左右了朝鲜政治。

自1880 年起，中国同朝鲜的关系不再受礼部控制（传统上一直由礼部负责同朝贡国的往来），而是转由李鸿章负责。李鸿章接受国内和英国的建议，一直致力于制订一项综合政策。首先，李鸿章希望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海军的同时，通过介人朝鲜内政以促进"自强"运动。其次，他希望清政府能够庇护朝鲜，使之不向日本和沙俄靠拢。这些贸易大国通过与朝鲜建立条约关系来拉拢朝鲜，以便从朝鲜的独立中获得商业利益，所以他们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美国海军外交官（海军司令官）Ro W o 舒费尔特继承外交官佩里的传统，起初试图通过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未果，后于1882 年通过李鸿章在天津成功地缔结了条约。这样，李鸿章制定的该项新政策就传承下来：）李鸿章专门为朝鲜同美国进行了谈判，但是他未能在条约中加上"朝鲜

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的词句。而在美国的条约中却承认了朝鲜的独立。此后从1883 年到1886 年，在同其他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中也是照此办理。

19 世纪80 年代早期，朝鲜面临的最大威胁似乎来自沙俄，同时沙俄也是最令英国提心吊胆的国家。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和日本为了争夺朝鲜的统治权而成为最主要的对手。起初中国在英国的支持下似乎古有优势。但在朝鲜国内，更为激进的改革者都被吸引到了日本一方，因为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比中国更为激进。朝鲜国内传统派和激进派的斗争因此也反映出邻近两个大国现代化进程的异同、不过，朝鲜的保守派和各个派别 之间的斗争仍旧是根本问题。中国掳走了兴宣君，导致其政敌上台，即势力极大的阌家族，其在朝廷的代表即是高宗的仁后（常被称为"阌王后") , 阌 后及其家族集团乃与中国合作，废除了兴宣君的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们同样反对那些追随日本模式的人大搞现代化。全国政令难以统一，这在权力集团内部的种种倾轧纷争中即可看出，而朝鲜因此也始终难以实现独立与现代化的目标。

外国的影响势如潮水般猛烈冲击着朝鲜的内政。1881 年朝鲜向中国和日本分别派出了文化使团，尔后朝鲜又于1883 年遣团出使美国，1888 年另一支使团则在华盛顿有了自己的公使馆。美国在19 世纪80 年代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布道牧师和慰问使节也同样波及到了朝鲜。但是，尽管这些人支持朝鲜独立，正如他们后来支持"中国统一"一样，华盛顿方面却从未考虑过动用武力来实现这一想法。

1882 年到1894 年是中国政府在汉城进行统治的时代，然而，颇为矛盾的是，止是这个时期同日本的接触激发厂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众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改革观念。日本的自由派人士，如板桓退助，曾为金玉均和洪英植等年轻改革者出谋划策，并亲眼见到日本在朝鲜开启一了一个新的时代，一如美国曾对日本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些朝鲜的改革者，由于一心要按日本的模式西化，于是将阌氏统治集团和中国的控制影响视为障碍，井于1884 年发动厂政变。他们根据日本提供的情报刺杀了儿名保守派官员并挟持了国君，但是这场政变被中国一位很有气魄的年轻官员哀世凯所阻挠，他击败了日本公使馆的卫兵，救走了国君。这一事件到了1885 年方得以解决。1885 年，李鸿章

同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大津淡判后达成《 天津会议专条》〔 ；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两国约定各自撤回兵力，从朝鲜撤回双方的军事顾问，在危急时刻遣回军队和军事顾问之前也要事先通知对方。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日本方面在东京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此后决定在卷人国外纷争之前首先要进一步增强国力：。伊藤相信时代对日本更为有利，过早为了朝鲜同中国交战只会沙俄从中得利。而李鸿章则感到历史传统和地理都对中国有利。李鸿章继续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强令朝鲜实行英国在20 年前要求中国进行的改革，如建立海关并由中国海关聘用的西方人主持工作，派遣一名美国外交顾问，安装电报电缆，以及汀"练西式新军。作为李鸿章的副手，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从1885 年到1894 年担任清政府驻汉城代表，试图保留中闲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而同时美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却同其他人一起满怀善意要扶助朝鲜走向独立。在1885 年以后的10 年中，日本在朝鲜青年一代爱国者中的影响稳步上升。

中日战争

朝鲜政府的改革优柔寡断，未能改善人民的困苦生活，所以东学运动对被压迫人民仍然极有吸引力。1894 年，东学党融入了某些保守派的特点，并且采用了发动群众的方式在南部朝鲜组织起义，要求改革腐败无能的地方政府机构。这一起义加速了中国和日本对朝鲜内政的介人。中国应朝鲜国王之请派遣了一支小型军队。继而日本派遣了一支人数相对较多的军队，要求朝鲜政府进行改革并最终控制了政府使之向中国宣战。随即日本与中国于8 月1 日开战。

双方这次交战实际上是中国和日本整整一代人军事现代化努力结果的首次真正较量。大部分西方人认为以中国之大自当稳操胜券，然而日本很快就证实了自身的现代化革命更为成功。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朝鲜并且转而进犯满洲。但是，胜利主要还是由海上力量决定的，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海上的力量甚至控制着中国去往朝鲜的通道。中国舰队数量较大，但日本舰队的素质却更高。9 月17 日在鸭绿江河口外，日本采用英式现代海战重创了中国舰队。当时中国舰队一字排开，颇似骑兵战术。随后日本攻古了满洲南部的海军基地旅大港，继而围攻山东北部海岸的威海卫，这里驻留着中国的全部剩余舰只，威海卫失守，中国只好求和。

1885 年4 月17 日，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了《 马关条约》 ，条款相当苛刻。如果当时没有发生日本一名疯子开枪射伤李鸿章的事件，李氏也许不会在上面签字。中国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赔偿2 亿两白银；增开更多口岸以及谈判商业条款二这一条款于1895 年签署，给子日本以西方列强在中国拥有的全部特权，并且进一步增加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同时日本亦可在条约规定的口岸上使用廉价劳动力。

不过一旦日本取得了胜利，西方各国马上开始炫耀武力进行威胁以逼迫日本做出让步：沙俄对满洲和朝鲜都抱有野心，日本的胜利使之感到十分不安，为此，沙俄于1895 年4 月23 日劝说德国、法国联合对日本进行外交于涉，"建议"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迫于强大的压力只得同意，但额外获得3000万两白银作为补偿）

四、对华的强权政策

失败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新建海军于1894 年9 月在鸭绿江边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这就打破了中国国内外力量的平衡。这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纷起、彼此为敌，争相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及工业主义不断上升，已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现代海军和铁路都使用了蒸汽机，成为当时最先进的交战和后勤工具，由此便可以征服世界各地。列强争先恐后地从欧洲向外进行扩张，此时已占领了非洲和近东。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和海军强国突然兴起，让人们看清了清政府的朝贡制度最后必然崩溃，同时英国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上建立起来的非正式商业帝国也显示出其软弱性、这样，东亚的国际关系就完全陷人了动荡之中。

当时英国和俄国从近东和位于印度西北入口的阿富汗边境穿过中亚、西藏和蒙古，最后直抵满洲和朝鲜，在整个亚洲大陆形成了对峙：通过观察这种情况我们可似在19 世纪60年代万花筒般变幻不定的列强政治格局中理出一点头绪。英国盘踞在南亚，统治着印度、马来西亚和缅甸，同时也是泰国、中国和临近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是英国在泰国和缅甸的竞争对手；两国在非洲的冲突则更为严重，1893 年俄法联盟之后，这种状况也趋于复杂化。沙俄作为一支亚洲北

部的陆上力量不断加紧活动，这一举动加深了欧洲各国在远东的敌对局面。

穆拉维约夫在19 世纪中期成功入侵阿穆尔河，并于1860年获取海上省份，此后沙俄的扩张遇到了食物供给和运输的重大困难。哥萨克人居住在沿阿穆尔河流域形成交通网的的个村庄里，但是当地气候恶劣，粮食短缺，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夏天，他们只能艰难地逆水而上运输粮食，到了冬天，他们却征募不到冰上运粮所需的牲日。俄国于1867 年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并且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水獭生意也很不景气，为此沙俄甚至削减了亚洲东北部的警卫部队和海军部队、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最终粉碎了俄国通过阿穆尔河在中国同欧洲俄国领土之间发展贸易的企图。1880 年时俄国在远东的人口仍不足10 万，而中国人以及来自满洲的通古斯人和朝鲜人的移民总数多于俄国移民，这样一来，贸易主要是由非俄罗斯人经手的。远东同沙俄的欧洲领土主要是通过海上而非陆上进行联系的。沙俄处于劣势，其政策也比较消极。在1881 年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清政府在满洲积极进行拓殖，李鸿章也建立起北洋舰队和旅大港海军基地，同时日本舰队的实力亦不断增长，这一切无不使俄国感到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处较为易行，同时还可以得到法国的贷款。1891 年沙俄开始修建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同时从铁路两端启动工程，定于1903 年完工。俄国这项重工业计划的核心工程一启动，当时的理想主义者们就试图证明俄国转向东方是要承担向东方传播西方文化的神圣"历史使命"。由于沙俄的利益和力量由此都有所增长，于是它对东亚的政策开始变得较为积极主动。1895 年日本取得胜利之后，沙俄马上就采取了行动。在联合法德两国迫使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半岛之后，沙俄继续保持着自身的优势地位。1895 年沙俄通过法国和德国银行借贷给中国大约一半赔偿日本所需的资金。1896 年沙俄打算修建穿越满洲直达海参威的中东铁路，因为这条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如果按原计划沿阿穆尔河修建，不但路程要长350 英里，而且沿路还得修建造价高昂的隧道和桥梁。相反，走中东铁路的捷径则可以避免这些不利因素。沙俄的计一划得到了中国的允许。李鸿章于18 96年6 月在圣彼得堡谈判签署了《 中俄密约》 ，约定中俄共同抵制［J 本在亚洲的扩张。通过种种外交手腕，沙俄依约于1897 年12 月向中国旅大港派驻了一支海军部队，同时亦于1898 年3 月获得租用满洲南端辽东半岛25 年的权利，并且沙俄获权修

建南北走向长达650 英里的南满铁路，以此来接通中东铁路和辽东半岛。

在华势力范围之争

沙俄成功地获得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冬季不冻港，并且通过铁路与欧洲联结了起来，这些都是新阶段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的新手段。帝国主义利用贷款、铁路、租借地、减轻地租以及在地方拥有司法、警务和开矿等权利，实际上达到了制造"势力范围"的目的。各国之间互相对峙并各自加速活动，英、法、德、俄、日以及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都通过上述手法彼此挑衅、协助、破坏或合作，以便在中国的分裂中坐收渔利。纷争中的主要事件按先后顺序大致是这样的：由于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土匪杀害，一支德国舰队于1897 年12 月占领了山东胶州湾上的青岛港。几乎就在同时，一支俄国舰队也于12 月占领了前边提到过的旅大港。1898 年4 月，一支法国舰队占领了广东南部、广州。英国马上就此做出反应，租借了香港对面的新界和山东海岸线上旅大港对面威海卫的一个海军基地。列强这些明抢暗夺的行为都通过与中国签订条约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通常以99 年的租借期来制造所谓的"兴趣范围"或"势力范围"。中国的主权和海关进项尚有保障，但同时外国势力也对一些要害部门进行有计划的统治和掠夺。个中详情不仅迷惑了当年的外交官，在今天仍使历史学家们感到扑朔迷离。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仍不乏一定的模式可循。

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行动方针是刻板不变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受制于他国及国内斗争的压力。例如，以上总括的俄国的举动不过是织毯中的一根线而已，并且这些行动部分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活动做出反应的结果口就这样，英国和德国从1895 年到1896 年一直怂恿俄国进逼东亚，以便减轻俄国在其他地区造成的压力；而俄国一则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鼓励，二则鉴于后者于11 月派舰队进驻青岛的先例，马上亦于1897 年12 月古领了旅大港。俄国国内的意见常常不统一，所做的许多努力也都不很成熟，不但总是缺乏预见性，而fI ．行动起来时而莽撞，时而又优柔寡断。其他国家大致也是如此。

其次，欧洲各国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盟。俄法联盟几乎未曾发展海上贸易，此时则从印度支那和俄罗斯远东的陆上基地分别入侵中国。事实上法国首先采取了行动：1895 年6 月，法国在中国西南

强行获得了开矿权，并从东京（北折）将铁路延伸至此。英法计划通过铁路向云南渗透，两国竞争了几十年后法国取得了胜利，从河内沿红河至云南府（昆明）修建窄轨铁路并于1910 年完工。此外，俄法在中国边境上也享有减免关税的权益。他们还通过比利时的一家公司，于1897 年5 月获得了在中国国内修建北京一汉口铁路的特权。另一方面，英德两国虽是贸易和海上大国，但都不与中国接壤，因此在长江流域和山东各自寻找领地。同时他们还有更雄厚的资金，两国银行家借给了中国用于赔偿日本的大多数资金。然而，这两个海上强国之一的英国一直在维护自己的老牌商业大国地位，当初英国古有中国外贸额的4 / 5 ，但德国后来居上，早已成为英国的主要贸易竞争对手，并且还野心勃勃地寻求市场和海军基地。德皇威廉与其亲戚俄国沙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在各处寻找海军基地，此后，在俄皇的默许下，于1897 年11 月占领了胶州湾。这一行动掀起了列强全面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场混战中，英国政府受到来自中华协会等有关中国贸易和帝国主义扩张之代言机构的强大压力，于是它注重实效，转而遵循"补偿"政策。尽管英国仍旧奉行保证中国完整、门户开放、以及贸易机会均等这些传统政策，但还是分割出了自己的"范围"并实际上奉行了两国标准，即英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与任何两个竞争对手的军备之和都要保持均势二结果法国以广东、广西、云南一带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广州湾为海军基地（1898 年4 月）；俄国将满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的"势力范围"则在山东。各个范围都由中立区划分开来，包括租借地和以主要港口为中心而修建的铁路但英国与法国一也竞相打通中国西南门户，以便从了"东沿西江而上进行贸易，同时展开了修建缅甸铁路的竞争（1897 年2 月）。另外，通过一个利益均沽的协定（即中国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割让英国所古地区）, 英国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这是上海的整个腹地，古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英国还获得了修建2800 英里铁路的特权，大致相当于法国（420 英里）、俄国（1530 英里）以及比利时（650 英里）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总长。此外，英国还租借了旅大港对面的的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英国在香港附近大陆上的租借地也扩大了8 倍。英国保留由其发端的条约体系，一方面要保证在西南和东北依照条约开放更多的港口，一方面要求中国承诺：只要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份额最大，海关

总监一职就由英国人但任。但结果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反倒削弱了，这是由于英国拿到了"补偿"，这就等于肯定了其他国家在云南、山东和满洲的特殊地位，而这同英国在那里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

1898 年瓜分狂潮的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政局上。这股浪潮标志着更为险恶的条约制度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划分"势力范围"显系列强为使中国成为各国名正言顺的殖民地所做的铺垫。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各贸易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关税及内河航运。同时，俄国和法国不断挺进，通过新建铁路、矿山、工厂和海港进而控制整个省份。山东和满洲的租借地和铁路沿线由外国人来管理和警卫而因之成为半殖民地，这与旧式条约制度中的租借港口等规定相比，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影响更大，也更具危害性。总之，帝国主义侵略使清政府面临着亡国之祸，这一危局直接引发了改良运动、义和团起义。

五、维新运动

1894 年中国战败后，反对现代化的保守派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这些人未曾亲身参战，对结局甚感诧异，于是猛烈抨击李鸿章卖国，同时也激烈反对议和。当时再战的呼声甚高，20 天之内，朝廷就收到了约有2500 人签名的130 份奏章。这是史无前例的爱国热情大爆发。这些奏章强调指出，赔款是政府收人的三倍，赔款使帝国负债于外强，而其他条件也使国威扫地、削弱国家力量乃至于亡国。当时群情激奋，来自广东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带领1200 余名进京参加会试者于1895 年10 月2 日呈上了"万言书"，这就是"公车上书"，"万言书"中呼吁朝廷拒绝和议继续参战，迁都内地以赢得时间，同时全面进行改革。这宣布了维新运动的开始。此后4 年中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变得日益露骨，因此这场运动吸引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

中国战败后国门大开。外国势力开始"瓜分中国", 大清帝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统治阶级则试图通过一种有别于"自强"的"改制"以挽救传统的国家与文化。维新运动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野的文人士绅也可以议论朝政，这同清朝的祖制是相违背的。早在1652 年，清朝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晚明党祸是怎样削弱了明朝，于是下令禁止获得功名的人议论国政或结党营私。雍正帝和乾隆帝将所有对待政令有欠公允的官员团体都斥为自私自利之"党"，要求每个官员都要忠于王室，以君王的好恶为一己的好恶。尽管在19 世纪

时，议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公车上书这一举动却几乎史无前例。由士子缙绅们组成的政治团体"学会"的兴起，则显示出了更大的革命性。其中最有名者为1895 年8 、9 月间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该学会的分支机构及其他类似社团马上在上海等重要城市纷纷成立。这些社团受到了改革派高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经济资助。士子们一旦涉人政治就马上拿起笔来。学会开始出版报纸和期刊。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于1895 年8 月起为强学会编辑日报，起初借用了一份传教士所办月刊的名字（《万国公报）》 并从中翻译了许多文章。当时尚年轻的梁启超还一度协助过属意革新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运动开始成立小组、举办会议讨论、积极发行报刊，这与传教士的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教育的普及，文人士子阶层之外的大众也加人到政治生活之中来了。

改良思想

士子们自幼接受渗透整个社会的儒家学说的教育和熏陶，对他们而言，要变革，首先要变革思想。改良理沦的发展历经了两代，进展极为缓慢。其先驱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林则徐具有"经世"思想，认为应当从体制_ 上进行管理及制度的改革。他在鸦片战争中首先推行使用西方武器。随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呼声高涨，要求使之合理化的需求也日渐迫切。人们应如何利用西方的东西来走中国的道路呢?

答案一是明确区分所要保卫的和所要采用的，即区分结果和手段。日本改革者曾使用过这样的口号："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在中国，允许"自强"实施的思想最终集中体现于19 世纪90 年代由张之洞首倡而流行的一句口号里，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这在有判断力的人看来却是似是而非并有误导嫌疑的。这句口号借用宋儒的"体""用"之辨，将"体"即"实质"和"用"即"运用"区分开来。这门术语表明任何事物的内在实质同外在功用都是相互依存的。例如，这曾用于君子的"修身"和"治人"以及统治者的内圣外王之道上。所以，张之洞的口号是强攀理学旧论套在西化的新生事物之上，这就遭到批评家们（如严复）的驳斥。严复在19 世纪60年代曾翻译过J o S ． 穆勒、T . H o 赫青黎和赫伯特o 斯宾塞等西方进化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的作品。所以他对中西文化均不乏独到之见。严复指出，中西学术各有其实质

和功用，体用之说只是虚妄之言，因为技术会影响价值，采取的手段也会决定结果。

另一种手段则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内为西化找到立足之地，这其实也是"借古以察今之变"的一个变体。于是19 世纪6O 年代在北京的同文馆就宣称西方科学的祖源是古代中国的数学，并由此承认了西方学术。到了80 年代，为西学所进行的这种有失严谨的辩护即汾此脉络进行，例如，认为化学源自中国古老的五行争说，而使化学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们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到变革的法则，于是泛化"法"这一术语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扩展了传统观念中"变法"的含义。"法"的字面意义是"方法"，但在广义上也意味着"法律"或"体制"。原来的中性的词组"改变方法"就开始具有改革最根本的体制的含义。例如，19 世纪90 年代初期的文人们呼吁建立议会，他们引经据典来使之合理化，大讲"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不过，对于当时西方作品中古主导地位的进步思想，人们却仍无法在中国的传统经典中找到对应之物。

康有为对儒学的重新阐释

康有为曾在1895 年的事件中激烈地上书请愿。此后他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了阐释，这样就可以利用经典准许西化，通过儒学容纳进步思想。康氏出生于广东一家门第显贵的士大夫家庭，从小就熟读经典，但他随即发现这些经典言之无物。。据康有为后来〉外忆，他的老师总是告诫他不要过分自以为是，但他在21 岁的某天冥想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大悟，认为自己就是圣人。尔后康有为即以圣人自命并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传统。首先，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今文运动，对某些"古文"儒家经典的确实性进行质疑。对于就儒家传统大做文章的改革者们而言，"今文"派的解释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理学正统的垄断局面就被打破了。康有为综合了"今文"派做出的各类研究，于1891 年对数种经典大加挞伐，其结论是：古文经典不能作为"汉学"的基础，宋代学者所尊崇和阐述的经典大都是伪托孔子而作的。他的言论并不为广大学者所接受，但是他的学识广博，论证有力，在19 世纪卯年代的学术界极有影响。1894 年一些高官下令烧毁刊行于世的康氏著作，但这却丝毫无碍康有为后来成为进士，并于1895 年成为翰林学士。这时他正达到了成功的顶峰。

康有为横扫了正统的观点，又进一步推出了某些"今文"新释，并于1897 年宣称孔子写了、而非仅仅是编辑了儒家的基本经典，这是孔子借古典改今制的手段。这一观点如果得到承认，那么后人就可以借着圣人的名义开始一场类似的革命。受到基督教的启发，康有为建议尊孔子为中国国教的核心。不仅如此，他还结合两种经典说法，创出一种世界的演进次序，这包括3 个时代，1 、据乱世；2 、升平世（小康）；王太平世（大同世界）。按照这一分析，世界一直处在乱世阶段，经过康有为的革新就会进入升平世。这样，中国的传统学术经过改造已可容纳进化和进步的理论了。

百日维新

尽管康有为已为变法创造了哲学基础，维新运动还是未能立即得势。1895 年战败后的恐慌已经消失；强学会在北京和上海都遭到了封禁，但在某些省份改革活动仍受到官员士绅们的推动。例如湖南，尽管绅士们既反对太平军又反对基督教传教士，但还是进行了某些变革。在总督张之洞的眷顾下，湖南省的官员们在首府长沙进行了一些西化建设，如修路设灯、发展汽轮运输、架设电报线通往外界、建立现代警察组织、创办现代化学校和新式课程、组织学会进行演讲及讨论等等。官员士绅合作的这些成就表明了中国许多地方改良运动的发展壮大。

1897 年末，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康有为的机会来了。坚信正统"自强"观念的温和派把他举荐给了皇帝。到1898 年年中，列强显然准备瓜分中国，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康有为大力献计献策，而当时27 岁、年轻热情的皇帝终于给予康有为充分的信任。康有为提出中国将亡，皇帝则表示那全是保守派的责任，而康有为又进言说如果皇帝要依靠这些人实行改革，将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传统的审议制度、分权和监察制度曾得到大力发展，以便为统治王朝服务、防止国内发生叛乱。康有为的计划就是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现就抵御外侮而论，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不但无用，甚至还起了反作用。康有为提议建立一种内阁式的国内管理制度，聘用12 名受过现代化训练的专家为部员以取代颟顸无用的六部和军机处。康有为像日本人一样对议会的作用深有感触。这些议会不但可以征收税款、防止腐败、提高国民福利，同时还可以

利用儒家学说将统治者和人民联系起来并且加强这种联系。他建议成立国民大会，制订宪法，甚至建议成立地方"民政局"，在士绅的参预下推行改革。他的追随者更怀有各种激进的思想，如讲求民主、简化汉字，甚至主张男女平等、易服西装等等。

从1898 年6 月11 日到9 日21 日的100 天时间里，光绪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他幕后策划者颁发了4O 多道改制诏令，几乎涉及到了各个方面：修建现代学校，改革考试制度，修订法律作为撤销领事裁判权之基础，促进农业、医学、开矿一、商贸、发明、留学等事业的发展，促使陆军、海军、警备和邮政制度走向现代化。除了在湖南，这些诏令几乎均未得到执行二官员们都在观望1889 年归政的皇太后对这一激进的改革制度会做何反应。保守派官员当然都纷纷反对，叫嚣不已。所有的改革者除皇帝外都是汉人，皇帝废除了领皇家俸禄的闲差，这就威胁到了满族官员的利益，有些人还害怕他会罢免全部满人。提议改革寺院为学校的方案又吓坏了寺僧，这些人与宫里的太监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军队改革则威胁到满洲的旗兵和绿营。攻击作为任职资格考试的旧式科举制度更威胁到了所有获得功名的人，这些人本希望借此得到一官半职，打击腐败则几乎影响到了全体官员。总之，皇帝的计划一展开，他就发现整个统治基础都与他为敌，特别是他的"额娘"慈禧太后。后者虽已63 岁，但仍操纵着朝政大权。

维新的关键不在改革与否，而是康有为等激进派和主张"自强"的温和派（当时正是该派缓慢推行西化的第40 个年头）谁占上风的问题。后者的目标在张之洞的著作《 劝学篇》 中得到了总结，该书发行于百日维新期间以表明作者反对激进派的立场。这本有影响的书奉旨颁行各地，主要试图通过复兴儒家社会秩序来维护满清政权，首先是它大力提倡"三纲"（孟子提出之"五伦"中的三种，即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并极力反对平等、民主、君主立宪制、民权、议会、人身自由以及西方的公民自由权。其次，张之洞试图通过教育救国）他建议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各级学校、高校及京师大学堂，教学课程中既强调儒家经典，又重视西方技术。：这一讨一划是仿照日本的模式制定的，故其中还包括出国留学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内容'第三，张之洞希望通过工业救国。他在武汉推行的军队"自强"活动就是一个实例。这一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进仁上钢

材。张之洞在汉阳首建了一家铸铁厂和军火库（1890 年），并在湖北大冶增开铁矿（1894 年）, 此后，他建议由中央铁路管理局在中国腹地修建（北）京一汉（日）一广（东）铁路。

慈禧太后发现，康有为对儒家经典和朝廷上下的腐败进行攻击威胁到了自己的整个统治。看到反对风潮日涨，她静待时机，最终在满人军事首领荣禄的帮助下，于1898 年9 月21 日发动政变，挟持了光绪帝，开始第三次垂帘听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了日本，但也有不少人被杀害，其中包括来自湖南的年轻有为的谭嗣同。皇帝就此被软禁，当慈禧太后于1908 年去世时，他也神秘地于前一天死去。

百日维新的惨烈结局使得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了以前的状况，不过，某些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如废除几项闲职和建立现代新式学堂。1895 年事变的主要意义在于，这是激进派自上而下进行变革的一场试验，它仿照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但以失败而告终。慈禧太后政变之后的10 年中尽管也进行了颇有节制的改革，但这恰恰表明任何真正的革命性变革都必然自下而上地进行，甚至还须借助暴力手段。由此看来，按部就班进行改革则成功之日遥遥无期，相比之下，倒是剧烈的革命也许更有成功的可能。然而革命尚有待时日。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这说明1898 年在整个中国进行革命的时机还未成熟。受到来自西方世界60 年的进攻和刺激之后，中国的传统秩序仍旧十分牢固，足以顽抗西化的进程。

六、义和团起义

义和团运动

1898 年的改革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中国学者在统治最高层对政府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他们面对西方的威胁做出的勇敢回应。维新失败后，主动权转移到一个具有传统形式之神秘社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之中。这个组织的名字被西方人粗略地译为"义和拳"或只是简单地译成"拳民"，表明这个组织在"义"与"和"的名义下，还操练着一种中国"拳术"。这种拳术通过一系列的姿势、练习来协调头脑、肌肉以便参加战斗。这是一种魔幻般的修练方法，通过法术和一种规定的仪式，拳民三颂咒语，紧咬牙关大口呼吸，然后就神灵附体而刀枪不人，甚至不惧外国人的枪弹。拳民在半真半幻的戏剧人物中寻找自己

的英雄，如《 水浒》 和古代群众暴动中的人物：他们在1899 年初自创的口号是"反清灭洋"。

人们对基督教的敌对情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明显起因。由于19 世纪90 年代传教活动日益频繁，因而激化了前几十年间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有些转信基督教的人裹读神圣的家庭关系，拒绝参与地方上庆贺春节和拜祝鬼神的活动，并让传教士介人他们的内部纷争。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天主教教一上甚至能左右中国的地方官。由此，人民中充满了对基督教的恶毒诅咒。义和团运动的勃兴同样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因素。1898 年黄河泛滥在山东引起了大饥荒。中国北部又普遍于旱，一无所有的乡民流离失所。国外进口的棉制品和原油在某种程度__上: . 阻碍了中国本国上二业的发展，同时修建新铁路的计划又威胁到运货工人和摆渡者的生计。事实上，在19 世纪80 年代末，中国到处动荡不安、盗匪横行，18 个省全都爆发了起义，如4O 年代末太平军起义前的情形：总之，全国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而义和团起义就自接反映了这一情形。

义和团运动在1899 年受到满汉官员的支持，于是转而支持政府。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及朝中的亲王都在宫中受教，儿乎没有真正的统治经验，对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人接受了4O 年前日本武士盲从的所谓驱除外夷的口号。为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人，他们在传统思想中找到同西方"民众权力"大致相当的依据，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1899 年8 日，政府军队在山东击败并俘获一些义和团反清拳民之后，仇洋官员和"扶清"的拳民之间开始结成了同盟。义和团的口号从此转变为"扶清灭洋"，同原来秘密组织的抗清战斗口号相比性质大不相同，政府已经认为可以接受

清政府的官员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积极支持义和团，并最终成为主流，另一派人数虽众，但常常举棋不定，他们鄙夷拳民们的迷信狂热，同时又全然理解他们的动机。1900年的前5 个月之中，义和团几百人至几千人的小分队遍布直隶乡间，焚毁教堂建筑，屠杀"二毛子"（中国信徒）。满洲亲王使慈禧太后相信拳民们确有不可思议的刀枪不人本领。这时外交使团一再呈交外交照会，要求政府镇压义和团，于是政府于1900年1月和4 月颁发诏令，但含义十分模糊，将攻击传教士及其教众的组织归为"另外的"组织，要求镇压他们的官员必

须"识别"好坏。外交使团对西方的优势过于自信，迟迟没有意识到由于西方各国几十年来通过不平等条约一再获得特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最终会有备而发地放任这种群众运动以武力向西方挑衅。

围攻北京公使馆及其后果

政府这种绥靖而非镇压义和团恐怖活动的决定，终于激怒了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早已隐忍了60 年，现在爆发了。对此双方都负有责任自1900年6 月义和团包围了北京和天津的使馆区。西方各国集中海上力量派军解围，于是清政府向他们宣战。北京以外的北方地区约有250多名外国人遇难，他们大多是活动于山西一带的传教士。中国信徒被杀者更多。尽管全国教民生活社区曾成功地组织过几次自卫活动，但于全局无补。这一盛夏中的疯狂举动震惊了世界。一个月以来没有外交官、传教领袖、赫德以及其他北京公使馆中被困者的消息，因此外界很有根据地揣测他们都已被害。清政府办事松垮的作风同时也证明还是有些实际用处的。不明所以的满洲举子仍在宫中参加考试，老于世故的封疆大吏们则早就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排解这场灾难。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协同南京的刘坤一、武汉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决心对朝廷的宣战决定置之不理。他们提出，如果洋人不再派遣军舰进入长江地区，该地总督将保证太平无事。结果除了中国北部省份之外，全国都处于中立状态。人们马上开始巧言辩说义和团起义实为"叛乱"，这也是政府一贯的看法，故其活动并未受到政府的支持云云。外国接受了这种说法。

这样，义和团运动这场19 世纪中国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洋运动被局限在华北一带，西北各省的官员都忠心不二，为朝廷的利益而力求和平。他们通过电报与北京往来消息，使慈禧太后得以左右逢源。她同时施行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应朝中满洲大员之请扑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则在驻外使臣和南方官员的强烈要求下，争取和平。清政府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在北京也同样表现得很明显。在围攻公使馆的冲突中有76 名洋人被杀，其他人之所以能够生还，是由于御林军某部的官长尽管领兵叫嚣围攻，却未使用所携大炮，执行任务时打了折扣。外国联军在7 月14 日解了天津租界之围，8 月14 日北京各公使馆也均得以解围。

西方侵略者按照常规在当地人的协助下开始劫掠早已被义和团洗劫过的城市。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乘车逃离了北京。慈禧太后在65 岁的年纪才深深体验到了百姓处境的艰难，人民要安居，要吃饭，要保护自己不受盗匪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侵害。朝廷逃到西安后，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此时李鸿章己经77 岁了，人们像往常一样指望他能力挽狂澜。他巧妙地同洋人周旋，使他们相信义和团之乱根本不是向他们宣战，相反，清政府要同西方列强合力镇压这场叛乱。尽管德国公使是惟一被杀的德国人，威廉二世却要求享有任命联军总司令的权利。此人于10 月份抵北京，后不遗余力地侵人中国北部的几十个城市。这一惩罚性活动延续了6 个月。到1900年末，华北约有外国军队4 . 5 万人，其中沙俄单独通过一次战争早已占领了满洲。

1901 年9 月7 日，一位满洲亲王、李鸿章（他于两个月后去世）和11 国全权大使共同签定了有关义和团的议定书（即《 辛丑条约》）。其中要求处决10 名高官并惩罚另外几百名官员；要求清政府正式道歉；为惩罚士绅阶层，要求在45 个城市中停考，其中山西古了一半；扩大使馆区，在那里修建防卫工程并常设卫戍部队；拆毁炮台，占领铁路沿线各军队驻地以确保外国军队可由海上进入北京；提高进口税5 %，以及数额惊人的赔款等等。

英国试图为贸易和传教活动改善条件，于1902 年签订了商贸条约，但效果并不显著。不过清政府的某些计划也证实了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废除阻碍贸易的厘金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币制、改革某些法律条文以便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采用19 世纪70 年代日本现代化运动中所用的方法等等。

义和团起义和《 辛丑条约》 标志着清政府的对外关系跌至最低谷，此刻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但是，仍未产生能够取而代之的领导核心。

七、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回应

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1901 年以后，新式的帝国主义统治不仅再限于"势力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了清政府的整个财政结构上来。1893 年中国政府代理机构通过国外渠道借到约25 项贷款。但是欠款全部要以海关收人作为担保，其金额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中日战争的赔款（2 . 3 亿两白银）大

约相当于1 . 5 亿美元，1895 年、1896 年和1898 年3 年中清政府从外国银行获得了巨额贷款，但是条件十分苛刻：中国实际得到的贷款会小于面值（例如，是面值的94 %) ，还必须交付很高的利息，为期长达45 年之久，同时还须按照当时的金银比价用黄金支付。义和团事件的赔款为4 . 5 亿两白银（约3 . 33 美元），以黄金支付，年息4 厘，到1940 年本息折合将达9 , 28 亿两白银（7 . 39 亿美元）。

以上两项赔款不同于有偿借贷，对于中国完全是一种损失。这两项赔款消耗掉了清廷海关的外贸税收，而这些钱以前是用来提供军备和现代化所需资金的。由于物价上涨，1858 年制订的关税利率降低，这一本来有限的税收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因此除海关收人之外，还需加上大量各省的税收、厘金税及盐税收人才能勉强偿还赔款。

帝国主义有时确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厉害，这可用义和团事件的赔款来证明：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国和日耳曼帝国衰落，英美等国减少了赔款金额，再加上其他变化，实际上中国最终所付的赔款不到原来的1 / 3 。同样，日本打算通过1898 年4 月签署的利益均沾协定在福建得到一块势力范围，但是协定并未落实。1899 年3 月，中国成功地拒绝了意大利在浙江划取势力范围的要求。外国19 世纪90 年代末获得有关修建铁路的一系列特权，但是从未积极地加以利用。列强未能"分裂中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虽然如此，在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无休止地相互竞赛，另一方面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计划要超越前几十年不够积极有力的商业渗透和经济增长。于是爱国的中国人对整个条约体系恨之入骨，视之为"帝国主义的枷锁"。

美国的扩张和门户开放

19 世纪80 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充满了正义感，为自己的政府感到自豪，认为本国政府与欧洲列强不同，从不寻衅挑战，也未在亚洲攫取过殖民地。实际上，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大部分是在英国海军的庇护下在亚洲享受特殊权益的。但至少在美国人眼中，美国确未染指东亚的"帝国主义"活动，正如它在欧洲没有卷入纷乱的局势一样。借助英国首创的最惠国待遇和机会均等思想，美国从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中获得了利益，同时又不必承担恶名和责任。然而，随着欧洲争夺殖民

地的竞赛不断升级，新的扩张趋势连同某些历史事件使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也出现在了东亚这片土地上。美国人之易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染，实际上超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

美国的扩张同欧洲列强的扩张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美国而言，主要是由于生产廉价外贸商品工厂的兴起、国内边疆荒地的消失以及在国外传教传统的影响。正如大力倡导发展海上力量的海军上校马汉（A , T . Mahan ）所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北欧人种优越说为寻找市场、殖民地和海军基地提供了合理化依据的时代，美国一直在放眼展望未来。马汉寻求海外基地的倡议同议会及美国公众的意见不谋而合。1890 年议会打算建立一支第一流的舰队，美国公众鼓噪不已，要求修建穿过尼加拉瓜的运河，以便舰队在两个大洋上发挥效用。同时，美国长期以来对夏威夷抱有商业兴趣，此地生产白糖的种植园主也一直向美国靠拢，并希望加人合众国。

1898 年关国同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促始美国同时在东亚进行扩张。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o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抽调司令官杜威及其香港的美国亚洲海军部队，进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舰队。杜威于5 月1 日黄昏发动了进攻，次日午时西班牙舰队大败，舰只非沉即焚。看到战局再无反复之虞，美国在1898 年夏天占领了马尼拉，驻军1 . 1 万人。同年12 月与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后得到了菲律宾，并且马上开始镇压菲律宾人酝酿已久的独立斗争。夏威夷通过美国国会于该年7 月被兼并，西太平洋的关岛也从西班牙人手中转给了美国。美国获得的这些领地超过了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所获，从而可以在珍珠港、关岛、马尼拉以及夏威夷群岛和整个菲律宾群岛建立起海军基地。正是在此期间，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 年9 日首次发表了他的"门户开放"论。

海约翰曾任美国驻伦敦公使，英国政府早在1898 年曾向他咨询，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应如何保持贸易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平等的传统。他当时听取了赫德手下一名中方海关官员的意见。事实上，美国的"门户开放"反映出赫德对此的特殊兴趣以及海关维持条约体系最初原则的努力，即在所有条约规定的口岸，不论是否在新"势力范围"之内，一律征收相同的外贸税。"门户开放"首先要求任何国家不得侵犯其"势力范围"之内"条约规定的口岸及

既得利益"；其次，在根据条约规定的税额收税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政府可以在上述口岸征收贸易税；第三，任何具有"势力范围"国家的公民不得享受港口或铁路的付费优惠。总之，美国首次提出门户开放是为了确保在中国进行平等贸易，与政治无关。英、德、法、意、日五国约定，如果各国均如此办理，则同意接受这些条件。只有俄国的反应不够积极，因此海约翰并未取得全面的成功，但他轻描淡写地照会有关各国，他们的一致同意是"最终的"也是"明确的"。

由于义和团起义，1900年夏天华北和满洲进驻了外国军队，中国政府的存活机会较前更为渺茫。由此，海约翰的第二份意见函于1900年7月发行，表示美国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为中国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和行政管理的自主，用条约和国际法保护所有友善国家的法定权益，并为全世界捍卫在整个中华帝国进行公平贸易的原则"。各国一致表示赞成，于是，门户开放就作为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公开得以确立。后其基本思想逐渐演变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不再仅仅为保证外国在华的商业机会。但它最初确实打算拉开距离通过海上力量维持条约体系以反对殖民主义的泛滥。它用文字将原则固定了下来，本身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但未虑及动用武力为其后盾。当时美国仅在菲律宾得到一块殖民地。可以这么说，美国人自己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比外界人要高出许多。

中国的劣势与优势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1900年事件的原因，它似乎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只有支持清朝反动政府的统治才能更好地享受在华特权；实际上他们60年来一直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与当权者进行合作。我们可以拿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外国集团为保护自身在华利益是何等冥顽不灵（如果不是贪得无厌的话）：1869年《阿利国条约》未能发挥效力，1902年英国为中国的利益而修约也是落得同样的结果。在洋人看来，巨大的变革对他们似乎无利，所以他们更愿支持旧有的秩序。

很明显，中国是西方列强的牺牲品。这一主题很自然对中国现代爱国者极富吸引力。然而，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中国为什么不早些起来更有力地抗击外国侵略呢？那些有能力使中国传统政治实现现代化以抵抗外国侵略并赶走帝国主义者的中国革命者又在哪里？

19 世纪发生的起义只是反对满族的统治，所有的民族主义斗争都缺乏现代观念的指导。太平军起义是其中最猛烈有力的一次，但经过10 年发展，只表明自身是因循守旧的争权者，并没有改变传统秩序的能力。此后的"自强"运动是防守性的，缺乏创造性，是回避激进型现代化变革的一种保守妥协做法。1898 年的变法计划尽管不无革命性的因素，但这些人自视为朝廷的忠心臣子，完全依赖"天子"进行改革。满洲王公大臣们所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也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毫无意义。人们最终只能看到大清帝国统治的破产。在上以60年以前，大量的人才其实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以进行真正的革命或改革。无人能对身边的旧秩序进行大的变革。中国的变革力量十分薄弱，这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袤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

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东亚大陆上的这个伟大帝国尽管以人口稠密的汉人地区为中心，但长期以来一直不得不兼顾中亚边远地区的民族，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这些马上民族在中国的内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对重要的力量。尽管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惯于对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原的过程轻描淡写，但这种征服仍然反映了中华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异族通过征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它对种族一民族情绪大力镇压；通过科举制度，它又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官员，这些官员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长官绝对服从，同时，为民请命式的官员也不受欢迎。后来各条约口岸办报兴起，传教士办学兴盛一时，开始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观察，而这时清政府仍实行高度精英化的统治，缺乏有关现代民族主义的象征、语汇以及实践。另外，由于这些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洛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的坚强领导核心。清政府为了淡化政权中异族统治的色彩，曾大力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以稳固其统治，但做得并不成功。

在这种很少为人所理解的特殊政治格局中，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

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务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所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与外国官员各自区分职权范围，正如商人分红一样。中国政府在海关等地方雇用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同时却不改变自身的特性，这样中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立刻就遇到了种种问题。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用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上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19 世纪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在任何时候一样，都深深受到过去的影响。

结果，反对民族主义的清政府就走向了王朝统治的末期而完全处于劣势。它还足够强大，可以固守传统并镇压叛乱，同时它又太虚弱，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变革之路。因此，清朝后期能身处劣势而同帝国主义列强周旋并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功，这样的外交记录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利用自身显而易见的软弱，激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而相互竞争钳制。清朝的谈判者到处散布流言，泄露机密。他们显得饱受惊吓，无助无依。他们一边接受条款，一边收受贿赂。但是中国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有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13章 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

一、晚清的改良

日本早在19 世纪6O 年代就已经历了原始革新过程，而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还是在这一过程中徘徊。旧的秩序在受到中日1894 年至1895 年战争的冲击后开始瓦解，但它的政治结构还继续存在了15年。

清王朝从1901 年到1911 年间的最终衰亡与其说是一个崩溃阶段，不如称之为一系列新开端的显现期。体制与社会的转变早已开始，政治危机只是最后才来到。1911 年前，中国国家事实上已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重建道路在前进，这条路线在19 世纪90 年代曾得到有力的宣传，只是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慈禧太后与她的守旧派支持者们在1898 年软禁光绪帝、逼走康有为后，从1901 年开始继续推行他们积极进取的改良计划。实际上，他们别无选择。义和团战争宣告了绝对排外政策的破产，而反清叛乱又刺激了清政府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以图自救。于是保守派的改良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共和党人的革命努力在边睡地区成长起来，但在1905 年之前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影响不大，此后也一直只是变革洪流中的小股回流而已。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力量最终将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 … 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但即使是在这条导向政治灾难的道路上，晚清的改良并不是不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曾尝试寻求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问题。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 年出现的民族危机中十分练达地处理好了与朝廷和洋人的关系，既表示了对朝廷的忠心，又安抚了洋人。两位于1901 年7 月间向皇太后上书，提出了一个与1898 年百日维新时期相似的宏大改良计划。在上书中他们委婉地陈

述了几个严重的事实："民意和30 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羡慕外洋的富庶而耻于中国的贫穷。"他们羡慕外国军队的纪律，钦佩海关司办事人员的绅士风度，外国租界治理的井然有序也令他们叹为观止。此外"叛党"的势力亦日益嚣张，革命党人开始散布颠覆政府的主张。这两位提出的改良方案条目之多前所未有，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培养新一代精英着眼，教育仍被视为当务之急。

教育：新式学堂和新式学者

这一教育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更为有效地培养和遴选官员。它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惠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普及教育，也不是推行有益于个体中国人发展的开明教育。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安抚那个时代正在任期内的学者型官僚和用传统方式培养的应试举子。这两类人都对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莫大的依恋。解决方案是一种妥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行政建制级别相应的各级学校，分别设在县治、府治、省会和京师，形成四级体系；这一教育体系与传统科举制度并行不悖，学生最终进入科举考试体系以接受国家的选拔。10 年之后，由公众捐款支持的新式学校便被用来取代了科举体制。同时，该计划也希望两种体制能够并行不悖。新式学校的考生与用传统方法在私塾里培养出来的考生将同样能参加定期的考试，而考试内容将会有所更新。八股文将被首先废除，上日式的书院将改建成政府办的学校。

不幸的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传统私塾教育方式准备应试科举、进入仕途会继续保有费用低且更方便的优点，因而比耗资巨大、历时数载的新式学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大多数举子对政府办的新式学校都敬而远之。而另一方面，在活跃的具有近代化思想的年轻人中，新式学校面临着外国基督教传教团在一些重要城市中建立的教会学校的竞争。到1905 年，新教传教团拥有大约389 所"中、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其中有1 , 5 万名学员就读。这些机构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通过扶植基督教、宣传个人主义、推动妇女教育和全面提倡西方生活方式，正在设立一个革命的典范。这些机构拒绝让他们的学生祭孔和参拜皇帝，而新式学校是有这些要求的（清廷的针对性举措是不接纳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仕途）。中国的私立近代化教育也在此时开始。1 例只年，北洋水师学堂一位精干的毕业生张伯菩在天津开办了一所中等学校，后来他取得一块土地扩大校园，到了1 酬为年发展

成南开学校（即现在的南开大学）。面对固守旧式科举制度的保守派和支持教会学校及私人学校的新派人物之间的竞争，张之洞于1903 年得出结论，认为除非旧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通向仕途的选择得到废止，新式学校既不能保证自已的生源，也难以得到民众的经济支持。1905 年，在各省大员的敦促下，废除科举的伤令终于在第二年得以实施。现在，政府教育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新式学堂上了。1906年，政府成立了教育部来监督这些新式学堂。

师法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要求在中学以上的学校里通过专业化教学为政府机构提供专门人员。以日本的学制改革为榜样，1904年制定并颁行的大量细则规定了学生的就学程序，从4 年制的小学开始，经过5 年的中学（初中）, 3 年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可得举人资格）, 一直到太学，即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经过3 年的学习，可得进士资格）。京师大学堂是在1898 年由美国人丁题良创建，他在此之前的1869 年到1895 年间曾任同文馆教习，他当时是西学馆的负责人。京师大学堂于1902 年合并了同文馆。但自京师大学堂以下，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新式学堂普遍缺乏受过新式教育的师资、校舍、设备、基金和开明高效的领导人员。设立大学堂易于设立中学，开办中学易于开办初等学校。整个体制的根基是最薄弱的一环。

地方上的教育主持人同样也从日本那里得到重要的启示。张之洞两次遣使团赴日本考察学制并购买教科书。他开始认识到，要在民间获得人才就必须实行普遍教育。不久，他邀请日本人做教习，这些人至少能与其中国同行、中国学生用文字沟通。他开始视日本为替中国培养新一代教师的理想场所：因为一衣带水的缘故，派遣学生留日比留学西洋耗资要少；又以日本的"文字制度"和中国相近，许多西文典籍已被译成日文，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的计划也较易实行。此外，留学生在日本，中国政府派遣学监监督也相对容易些。

早在1896 年，就已经有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新学于东京。1898 年的维新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留学生于1899 年增加到约200人，19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00人，1904为1300 人，1905 年底差不多有8000人，到了1906年时，已有1 . 3 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在日本求学。但是大量赴日的人数超过了在东流求学的人数，而求学的人数又远大于最终毕业者。事实上，1912 年以前任何一年从日本知名高校毕业的中国留

学生都没有超过700 人。在清朝最后10 年里赴日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大致有一半是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学费，而这笔款子主要是由省级和其他地方政府筹集的。他们通常是在省级新式学堂里读的预科，在此之后随每年一度的使团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们袭用了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立由同省人组成的同乡会。这种同乡会和几个世纪以来由官员、士绅和商人在北京和其他国内主要城市设立的同乡会馆是同一类性质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为新的学制提供了更能激发起团体凝聚力的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式学制将越来越多的青年男性和一部分青年女性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旧的科举制度从未做到过的。正像中国的新式学生生活培养了地方主义和乡土意识一样，这种生活在东京滋养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教育在这种方式下发生着无声的革命。传统经学让位于一种中西结合的学科建制。通过个人准备参加以传统方式命题的3 年一次科举考试让位给全日制的学校生活、更广阔的思想领域和更多的社交与思想接触。新的学制未能造就笃信孔子和听命于皇帝的忠臣孝子，却培养出了革命者。张之洞可以规定学生应当着浅蓝色制服、戴饰有红缨的制帽，并制定一大套繁琐的礼仪要求学生遵守，甚至以此为内容创作了一首校训歌曲。但科举制度的藩篱一经破坏，就再无可能抵御变革的大潮了。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新学的思想内涵至此已包含了许多西学的成分。尽管几十年间中西接触不断加强，中国知识界真正开始吸收西方思想还是1900年以后的事。此前，一位著名的西方小说介绍者林纾已经开始用笔录他人口译的方式创作他改写的狄更斯、大仲马父子、斯各特及巴尔扎克的作品。经他的笔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作品有156 部之多。而这时在渊源已久的文学生活中又加人了严复译注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作品。严复在供职于中国海军时，于19 世纪70 年代遍历各国，对英国尤为熟悉。考察各国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大的秘密在于它的思想。他成了赫青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坚信个人积极的自我实现必须有助于他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生存竞争。严复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更多地需要用来增加中国的财富、增强中国的力量，而不只是促进个人的自由。但建立民主自治政体还为时过早。这位翻译家极力传达那些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思想，他似乎认为这些思想对于晚清的中国社会最具现实意义。由严复作书评的T . H o赫青黎《天演论》 文言中译本于1898 年面世，在这之后的10 年间，

亚当o 斯密、约翰o 穆勒、孟德斯鸿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译本也陆续而出。严复在他的翻译和评论中，通过褒扬、推崇西方的逻辑、法律和科学进化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古圣先贤的精神侄桔。但是他这些批评只影响了很小一批读者，因为译文是用知识阶层才能掌握的汉语文言写成的。

新军：袁世凯的崛起

到1901 年为止，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历史中继承了三种主要军事组织形式。当时，满洲八旗兵已经腐化成了一群只知道在僧多粥少的军晌上谋食的蛀虫，而汉军绿营虽然颇有战斗力，但是由于分受几省长官节制而各自为政，于清廷并无多大意义。1862 年，几千名八旗兵士装备了新式枪械，组成新的京散卫队。此后清政府又从驻北京附近的绿营军队中挑选精壮兵士，为之配备枪械并加以训练。但带兵将领的挑选还是通过一种无益实用的古旧程式进行的。他们必须善于骑射、长于剑术，能够臂开硬弓、力举磐石。1901 年8 月，旧式武举考试被废除，朝廷伤令建立新式军校。

第二种军事组织是由汉族文官指挥的地方团练。它们的原型是1852 年由曾国藩打破旧式军制、招募组建的湘军。湘军的兵源是乡绅提供的农民，这些人被编进500 人一营加180 名军需供应兵的军事组织中；名义上，3 名士兵配备1 名后勤兵。尽管后来曾国藩正式解散了湘军，实际上它一直存在着。与之共存的还有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和左宗裳等人组织的其他一些武装力量。这些武装都是19 世纪中期平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些乡绅指挥、地方自募的军队不是简单的团练武装，而是由职业军人（"勇"）构成的正规军。由于有领导者的个人关系网和地方上的支持，他们成为地方利益的合法捍卫者，逐步取代了八旗兵和常驻地方的绿营兵，因此被称为保安军。淮军驻天津，受李鸿章管辖，湘军驻江宁（今南京），受刘坤一节制，这两支军队一度是这些互相竞争的武装力量中势力最大的派系。这些军队尽管已配置有近代的火枪和火炮，淘汰了旧式的火绳枪与滑膛炮，他们还仍然缺乏标准化军事装备、受过近代化教育的军官和专业参谋人员，更不用说工兵、信号兵、军需兵、近代运输工具或医疗后勤的配备了。

第三种，也是最新型的军事组织，是面对来自日本的侵略应运而生的。李鸿章和张之洞早在19 世纪80 年代就已开设了军事学院，聘请

德国教习训练一支新的军官队伍。张之洞于1895 年在江宁按照德国样式建立了一支"自强军"。这支3000人的军队从农村青年中仔细挑选，择其精锐组建而成；士兵的军晌待遇很高。同时一支更为重要的军队则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发展起来。袁世凯尽管是文官，但他颇具军事才能。他是作为李鸿章的代理领事驻朝鲜时得到耀升的（注：1894 年，袁世凯率领清军击退进攻汉城的日军并夺持了大王公）。1895 年袁世凯受命在德国教习参与下训练一支新式禁军。这一计划由户部出资，他很快就在天津附近开始训练一支70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从几个省募得，朝廷用高铜维持，希望以此杜绝常见的腐败现象。通过领导这支后来被称为"北洋军"的武装，袁世凯奠定了"北洋系"的基础，他本人也成了"军阀之父"。他早年的部下中至少有10人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几个省的军事长官，有5 人（袁世凯本人除外）成为民国时代北京政府的总统或总理。

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 年和1902 年去世；此时40多岁的袁世凯成了满清创建新式军队的主要人物。他继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在任期（1901 年至1907 年）内与满清上层密切合作，其中就有以腐败著名的庆亲王。此人自1884 年恭亲王失势下台后就一直把持着清廷总理衙门的最高职位。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被分为相当于师一级建制的6个'，协"，附属于这6 个协的有6 所各具特色的军校，军队还设有自成系统、具体而微的总参谋部。加之士兵训练有素，军事演习给观者以深刻的印象，各省于是竞起仿效北洋军建立起自身相当不完备、更谈不上有任何实际效用的地方新军。

对于已经被各省与各地方势力之争消耗得筋疲力竭、支离破碎的清王朝而言，政治形势使真正的军事中央集权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上以只年的军制重组使中国军队的主要控制权仍然留在省一级的地方机构中。建设新军的蓝图要求建立36 个协，但已建立的新军缺乏指挥、充分的财政和工业支持这些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这一时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新式军校的创建上，如北京附近的保定军事学堂。这些军校此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学者型军官，他们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军事活动家，既懂近代军事技术，又有学者们重整河山的责任感。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日本教习受聘于军校，以替代先前高薪聘任的德国教习。中国军校学生也被派到日本的军校学习。在日本，中国军校生们

看到邻国的榜样，再一次激起了更大的爱国热情。浙江人蒋介石当时18 岁，他于1 例万年人保定军校，于次年赴日本留学。

计政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平衡

继承明初体制并在此后的4 个多世纪中不断得到完善的清朝政体，到1800 年为止，与中国以农业为本的需求还是相当契合的。但是正像习于骑射的军队突然被铁路和步枪所取代，木桅帆船换成了蒸汽轮船，这个帝国政府同样也已变得过时。此时的中国需要强劲有力的中央机构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速度执行新的职能，实施新式法律和推行财政程序，并且被各省份更充分地承认为它们的宗主和协调者。然而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将打乱长期以来北京与各省之间的平衡。当时各省政府仍属平行于中央政府的部门，它们依然直接向皇帝上书陈事。各行省只是由设在京师的六部提供指导和帮助，而不是接受命令和控制。对北京而言极其不幸的是，随着19 世纪后半期汉族士绅阶层参与平叛运动而产生的地方主义，这时由于各通商口岸工业的发展、地方贸易收人的增长、地方军队的扩大以及私人官僚机器的膨胀，也得到极大的助长。所有这些新情况都加强了一些主要地方省政府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力量，这与加强中央政府权力这个日益紧迫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中央集权过程同时面临着旧利益集团官僚机构的无动于衷和新地方利益集团野心勃勃的凯觑。

在北京推行的改革通常是以建立与旧的政府机构并行且隶属于旧机构或是在旧机构的框架内运作的新的代理机构。在新机构不断成长、日臻完善的同时，旧机构逐步萎缩。按照政府与各国签订的关于义和拳事件善后事务的草约，总理衙门于1901 年改为一个建制完整的外交部，称作"外务部"。19 0 5 年，巡警部成立，即后来的"民政部"。在1000年的官制重建工作中，新设的教育部接管了原属礼部职司的督察纠幼官员的职能，而旧有的兵部，本来由文官任事，现在被扩充成了陆军部，由野心勃勃的满洲将领把持。以沿海省份建立各式各样的"局"为标志的革新举措也渐渐为设在北京的新式政府部门采纳。当各地招商局推动了一些先进省份的商会活动、商务报刊的发展和商务及实业学校的兴盛后，招商部于1903 年在北京建立。它逐渐吸收了旧的工部，最终形成农工商部。它的主要职司是促进铁路建设，举办实业成果展示会，推广标准度量衡，主持各类企业的注册，制订矿务条

例，完善公司法，管理农会和其他一些近代化举措。其中还有一项很别致的举措，即向有突出实业成就者授爵。

仅仅在北京建立一些新式政府机构，相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革新还是较为容易的事。正如列强在对待日本时的态度一样，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取消治外法权的举措都必须以法律上的改革为前提。19 （拜年，在原供职刑部、时年65 岁的元老沈家本的主持下，朝廷设立一个修律局开始制定新式法律。起先，他试图换一种说法来阐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但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最终却促成革命性的变化。沈家本在1907 年推出了一部刑法草案，该草案师法德、日，特点是将法律从道德体系中分离出来而使之独立；这无疑会使儒家有关"礼"的规则（如"孝") ，不能通过法律得到推行。沈家本在草案中又规定，皇室成员之外的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具有平等地位。草案一旦获旨颁行，这部法律将是对建立在地位、年龄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五常"及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的重创。但草案最终未被采纳。不过他同时推出的一个不太激进的《 大清律》 修订版在1910 年得以颁布，这部法律的效力实际上持续到1928 年之后。它对法律的近代化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根据该法典，体罚和刑罚得到减少，黥刑（刺面）、凌迟（剐）、没人官府为奴蟀和弃市（斩决后陈列尸首于街市）的刑罚被废除，此外还取消连坐（一人犯法，殃及他人），区分民法和刑法，并申明了使用"例"这种经验法时应洛守的一些指导性原则。这些律"例"在有清一代积聚到大约19 （刃余条，是一部详实但多有抵悟的案例集成。在使用时，司法者往往不能一以贯之地征用某一条前代律例来裁定类似案件，而遇到新的案件时往往又无例可征。这种针对具体案例的法律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加之在中国社会中法律既不古首要地位，也不普遍地为人们所关注，造成了司法机关执法职能的不良发育。在这种情况下，要讨论法律哲学和法律用语的整个体系与法律职业本身也就毫无可能了。尽管沈家本删减了"例"的数目，但重建律制却无能为力。财政体制的改革更为艰难，这不只是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将会威胁到大量的"饭碗"（个人收入），更是由于承袭沿用已久的财政制度至此已演化得形同虚设，很难找到改革的切入口。全国范围内的赋税状况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征收赋税既无预算，征收部门也毋须向任何上级通报并向其负责。地方上的征税机构和它们的顶头上司各省政府一样，仍然需要依靠就地征敛"衣食租税"以供给日常开

支。除此之外，官方征得的赋税指标并不是集中纳人一个"公共金库"；相反，它们按照各种名目分门别类并依照不同数额、从数不清的固定渠道聚敛得来，紧接着又被分配到为数巨大的专门用途中去。从一个省份聚敛得来的赋税收入被分割成零星小块以填充省内外的各项用度。当时全国的18 个省中，有13 个省份定期上缴一定数额的赋税所得，以供应其他省份的特殊用途。譬如，每年花在护卫京师的八旗兵身上的700 万两白银即从国内52 种不同渠道中聚敛得来。这种"专款专用"的赋税征用方式将国家岁人直接分配到难以计数的利益集团上去，而这一切主要是用于供养官僚机构和维持武备。最后，即便是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单独的财政总署。1 卯5 年的国家岁人如看账面，折合成美元总数约在7 (X 旧万元左右。这个数目对于这样一个涣涣大国而言显然小得不成比例。然而，新的商务税收关税、厘金已被搁置在一边用于支付对外战争赔款，而传统的土地税配额依旧未作任何改变。1 叹巧年户部重组，但清廷依然没有取得对财政的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各部却一如既往地征收和扩大它们的传统赋税项目，有的甚至还自设银行，如19 ( ) 7 年成立的交通银行即是一例。

一项旨在设立全国性预算体系的新措施，随着1 叩8 年推行的全国赋税核查和19ro 年开始的财政预算的编订拉开了帷幕。另外一项举措使中央与各省政府的赋税收入与各项开支从地方赋税与开支中分离出来。预算估测的结果是总赋税收入2 . 97 亿两白银，总支出为，中央与各省份3 . 38 亿两，各地方3700 万两，这预告了一个可观的赤字规模：7800 万两。不幸的是，规划和制定预算、收集统计数据以及确定税率都是在中央各部和各省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省份并不隶属于六部中的任何一部，却被要求向这一部或那一部提供赋税收人。这种根本上缺乏集中规划控制的状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风俗、政治价值和社会结构中。很明显，清政府作为一个虚有其表的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处在被动地位，苟延残喘至此，要想变成一部近代化国家机器，能采取的措施只有大力扩张它的各项政府职能，坚持中央集权的办法。这对于一个处于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时代的外族王朝而言，不舍为天方夜谭。

立宪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

1905 年立宪君主制下的日本击败了沙皇独裁君主制下的俄国，立宪君主制似乎已经证明自身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联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基础。甚至俄国此时也在走向议会政体。人们希望，立宪君主制能在中国使处在勃兴期的地方利益集团获得真正分享国家政权的机会，并以此吸引这些利益集团为国家效力。在1 吠场年和19n 年之间，北京政府积极奉行一项双管齐下的计划，力图将政府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计划和推行立宪君主制的努力合二为一。但是这种变化反而加速了中央政府内部的倾轧以及中央政府与各省份之间的权力之争。在京师，满洲王公成功地维持了、甚至扩大了他们对枢机要位的把持，但真正根本上的改革却没有得到施行。这一亲满排汉的色调使北京成为到处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的国内各省人民的矛头所向。

新兴的民族主义导致了1905 年近代中国首次联合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是针对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待遇、特别是完全排斥中国劳工的事件而发起的。在这场联合抵制运动巾，依旧例由当地商会发起停业抗议，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大多数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和广州两埠。沪、粤两地的学生加人了商人的行列，共同举行群众集会，利用刊物发动群众。几个月里美国的贸易因此受到损失，而北京在压制这一群众性排外运动时有所顾虑，担心举动失当会引发排满危机。

在日渐勃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清廷于19 （巧年上半年派遣两支官方使团出洋考察宪政。其中的一支主要访问了美国和德国；另外一支考察了日本、英国和法国。伊藤博文向来访者作演讲，强调皇帝必须保有至上权力，不可使权柄下失于民。当这一支使团回国后，成员们上书建议采纳日本的观点，认为只有一部由皇帝饰令颁行的宪法以及由皇帝授予臣民的包括舆论批评权在内的公民自由权利方能切实加强皇权；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皇帝才能遥临万民之上。上侧万年9 月，慈禧太后谕称将在准备完善后，实行立宪政体。1908 年8 月，她公布了一系列准则以指导一项为期9 年的计划，为实行立宪政体作准备。省级咨政会定于1 创刃年招开，全国咨政会定于1910 年。即使是这9 年训政期的概念也是取法日本，因为1881 年时日本便定于1890 年召开国会。

满清政权伴随着1908 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的去世而元气大伤。半个世纪以来，太后在民间被称为"老佛爷"，她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其影响之大，至今还未被透彻地研究过。她是光彩多姿的北方"京剧"的保护人，只是她较之先前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缺乏作为一名艺术鉴赏家和文学保护人的能力。她去世的那天同时公布了那位虽然不幸但是身体尚属康健的光绪皇帝的死讯。据说光绪于前一天驾崩。光绪37 岁神秘地死亡毁掉了引导中国转向立宪君主制的良机。皇权于是落入了狂傲无知的满清皇族手中。慈禧太后立了她3 岁的侄孙溥仪做光绪的继承人，年号为宣统。小皇帝的父亲醇亲土做了摄政王。海关总监赫德于1908 年返回英格兰。袁世凯于1 吠为年1 月引退，同年10月，张之洞去世。

清廷的改革努力由于过分地瞻前顾后，步伐过于缓慢，此时面临着解决不完的堆积如山的问题。于1 以为年重新组建为11 个部的中央政府需要有一个内阁来加以协调。但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受内阁首领一人节制势必削夺皇权的执政力量。满清摄政府不敢设立这样一个内阁。

到了1910 年2 月，所有16 个新成立的省级咨政会议代表们云集北京。这些人代表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全国运动的呼声：向清帝请愿要求建立一个国民议会。请愿被拒绝，但代表们并未放弃请愿活动。由1 朋名御定的议员和100 名各省咨政会议推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全国咨政会于1910 年10 月召开之后，人民日益迫切地要求组成一个真正由议会和内阁构成的政府。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摄政王宣布将于1913 年召开议会；但是当摄政王于1911 年4 月最终组建了一个内阁时，人们发现他极不理智地选定了8 位满洲人，一位蒙古旗人，而汉族人却只有4 名。

铁路之争

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利益之争在关于铁路建设的问题上达到了巅峰。19 世纪后期中国力图避免由外国出资建设经营铁路，但是这一政策在1898 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土崩瓦解。外国资本控制下的铁路线，如日本和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建造的铁路线，此时成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铁路建设到哪里，矿山就开发到哪里，当地资源被榨取，市场受到掠夺性开发，而其他线路，尽管名义

上控制权还在清政府手中，实际却依靠与外国财团签订贷款合同借钱维持营运。这些财团通常发行证券以募集资金，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这些财团当时也营建铁路，用它们向外国股东做抵押；一旦有风险，这些股东作为第一债权人有权先行得到赔偿，弥补他们在贷款本金上的损失。于是中国刚步人铁路时代，就已经有外国金融家在跷首待利了。结果，全国大多数的省份里兴起了一场爱国的"复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地方集团要求赎回外国经营的铁路线，并且自己集资兴建中国各省的铁路线。在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首脑的鼓励下，张之洞于1 卯8 得到一笔英国人的贷款，赎回了与美国的中国发展银行在1898 年签订的合同中允许美国人建设从汉口到广州铁路的权力。但各省资金不足以支持铁路建设。尽管受到爱国心和铁路利润的双重驱使，这些由绅商组建的铁路公司发现自己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购买路权、支付铁路沿线土地的地租以及购买有望升值的外国股票。投机者和贪污现象的出现也使他们的努力受到重创，即破坏了铁路系统建设对于中央规划和统一营运的要求。铁路中央管理的主要倡导人是盛宣怀。他是在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任上司的提携下得到升迁的，到1908 年为止控制了"华商"公司的蒸汽轮船运输线和张之洞在汉口附近的工业基地。同年，盛宣怀将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湖北境内，距汉阳约129 公里）和萍乡煤矿（江西境内，距汉口约402 公里）合并起来，组成了汉冶萍煤铁公司。为了支持这一企业，他已经开始依赖日本贷款，而日本八蟠滨的钢铁公司则从1896 年开始就依靠大冶提供的铁矿石进行生产了。盛宣怀在此之前就已经在督办纺织厂、电报局和其他一些产业的过程中中饱私囊，此时又与北京政府的满洲人财政首脑合作，为清廷申请贷款、专供建设汉口到广州和汉口到四川的铁路线使用。这些铁路线被称为"湖广铁路"（从汉口到北京的铁路已于1 叩5 年竣工）。于是铁路的建设成了重要的政治举措。在修建铁路这件事情上，盛宣怀为清廷取得外国贷款、接受清廷的领导的做法一直和他本人的贪污劣迹、挟地方对抗朝廷的行为以及全国人民的反满情绪纠结在一起。

由于铁路贷款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工具，此时美国不切实际地卷人了塔夫脱政府为捍卫"门户开放"政策而推行的自相矛盾的"金元外交"。国务卿菲兰德o 诺克斯在1 例刃年11 月的一项提案中颇为含糊地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但是这一点正好与1 卯7 年之后英

国政府默许俄国与日本在满洲扩张势力的政策相冲突。诺克斯先天不足的提案反而刺激日本与俄国在19ro 年私下重新确认了它们各自在东北划分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塔夫脱总统于19 （珍年7 月对湖广铁路贷款谈判进行了干预。他在致摄政王的一封私人电报中要求"允许美国资本平等参与铁路建设，以便使美国资本能够促进中国的民生福抵及其疆土完整"。这一举措的结果使摩根财团并入由四大国（法、英、德、美）于1910 年组建的财团体系之中。

四大国财团与盛宣怀在1911 年5 月最终签署的财团合同正好与当时一道上谕一同面世。这道上谕是由盛宣怀促成的，它对所有原先由各省份控制的项目实行国有化，买断并置于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一弃置各省利益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在各省爱国人士眼中，满洲人和他们贪赃枉法的爪牙们为了渔利，不惜将中国出卖给外国的银行家。一场"保路运动"由此兴起，尤其在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集会和派代表赴京请愿活动。但是一切归于徒劳，清政府不给任何答复。四川的运动形势渐趋紧张，商店罢市，学校罢课，税款的支付被迫中止，农民也开始动员起来。到了9 月份政府调来了军队，枪杀示威者并逮捕了当地士绅领袖。这些人大多数是家道殷实的举人，有绅商背景，在日本留过学，此时又是省咨政会的要人，在铁路建设项目上做过大量投资。他们的排外口号"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反映了省内实力阶层的利益，表明此时该阶层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反清排满思想。

这样，晚清改革的最后ro 年中人们看到了一场社会和体制转型的开始。义和拳运动失败之后，近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教会学校和美国青年卫理公会的影响进入了社会上层和城市青年中，妇女缠足的陋习受到抨击则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开始。两种传统上被轻视的行业— 商人和军人，也获得了新的特权。19 世纪通商口岸中有不少官员和买办曾与外国人周旋往还，此时他们也开始被在国外受教育归来的官员和有更广阔背景的金融商人实业家所取代。一些拥有地产的士绅不再把自己的出路定在科举人仕和朝廷的荣宠上，他们已经致力于开发当地的商业利益和建设当地的工业基础。这一基本上态度保守的地方精英集团一度支持过宪政运动，希望立宪政体的建立能够使他们通过设在北京的议会与最高统治集团联系起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通过让

整个官僚体制向内阁负责，把中国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和公共事业结构推向近代化。19 （为年之后，各地方的省级咨政会成了新兴的政治机构— 政策探讨和政治组织的中心。

近代出版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大多数是通商口岸，因此成了向这一新型政治生活输送新鲜血液的源泉。中文报刊最早主要由传教士开办，这种状况持续到1895 年；但在总共60 种左右刊物中，大多数是于1911 年之前的巧年间开始出版发行的，其出版商为完全华资的产业，在发展商务新闻业的同时也传播了改良主义思想。在上海，新的日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继《 申报》 于1872 年创办之后，其后继者队伍不断壮大。《 申报》 到1895 年为止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 . 5 万份。另一家创办于1897 年的近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则主要为各所学校提供教科书。到19n 年时，各省咨政会和出版界为维护士绅阶层和新的年轻学生与军官阶层的利益，创办了一个讲坛即《 青年中国》 杂志。立宪君主制依旧是时代的口号，但是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基础已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致命侵蚀。

二、辛亥革命

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新政权经常是从中原以外的地域开始它们的征服，10 世纪到17 世纪之间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征服者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在20 世纪早期的各通商口岸，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以及日木帝国都为中国的反清志士提供过避难所。实际上，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

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承认。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但不管怎样，在1898 年到1914 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 卯7 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 世纪的英国、1915 年至1949 年间的美国，或者50

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啬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 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 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 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 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梁启超一度考虑与孙中山合作，但被康有为及时制止。日本方面联合这两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败。1 义刃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都因为爱国行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缉，两个集团却成

了死敌。在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导人中，有两位最为人熟知，也为人们研究得最深。

两位主角：梁启起和孙中山

梁启超于19 (X ）年至1901 年间游历了檀香山和东京，并于1903 年游历了美国，但20 世纪最初的ro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早已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此时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辩、清晰、有力的文笔在各个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使他成了当时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国学生心中通向世界的窗口。从他先后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变：1898 年创办《 公意》 、1902 年创办《 新民丛报》 ，1910 年以后创办《 国魂》 。1903 年梁启超年仅30 ，但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此时康有为45 岁，已经到了不容易改变思想的年纪。梁启超尊他为"孔教中的马丁o 路德"和"进化论东来"前的伟大思想家。从他在日本吸收新学时起，梁启超就开始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审视。为了给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o 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他倡和日本的福译谕吉等西学人士，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在遣责中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他敦促实行改变现状的政策，认为臣民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负责，人民应当惟法制是从，而不是以孔教伦常为任。他呼吁修宪法，开议会，组织责任政府。他还主持文学杂志的出版，写作小说并翻译各国文学。后者主要是借助日译再转译成中文。但是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不主张把中国的积弊归之于满清王朝。与士绅阶层的所有人及大多数外国旁观者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众此时尚未准备就绪，实行代议民主制度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10 年底，他都是一名反对共和，并不热心革命的渐进改良家和立宪君主制的鼓吹者。他在1 如7 年组织的"政闻社"倡议采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政治过程

来推动改革。他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声名大起。尽管这一运动和一般开明党派一样陷入了清政府和反清革命者的前后夹击。

梁启超出身__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早期职业革命家。两人各自从相反的社会背景出发，带着相反的先人之见，通过各不相同的媒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当梁启超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时，孙中山正在建设早期革命运动的骨于力量。孙中山具有一种适合担当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条件。他来自距澳门咫尺之遥的地区，这里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时间最长、距北京控制也最远的地区，也是许多早期留学生、买办和无数海外华人的故乡。从社会和地理条件来看，孙中山出生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幸运的。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位早年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叔父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王洪秀全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早年就是清王朝的叛逆二他在13 岁时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大哥，在那里住了3 年，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他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接受了基督教。回到故乡后，他因为信仰基督教反对乡人的偶像崇拜，打破了当地供奉的先师牌位，受到地方上的驱逐。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他到香港读书，之后又去了一次檀香山，回国后在广东和香港往了5 年（1886 年到1892 年），学习化学、生理外科和其他一些科目，希望取得一家英国传教士办的医院授予的医学学位。1892 年起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是因为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被迫离开了那里。自从1885 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孙中山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命运；他向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要求实行改良，但未受理睬。这样，孙中山行医受挫，受到权贵的冷遇之后便转而从事一个新的职业。他将成为一个非商、非农、非士、非医的革命者，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愿意与任何阶层合作的人。

孙中山早年就与一个叫作"兄弟会"的传统反清组织有过接触。到1894 年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兴中会"，并且在夏威夷和澳门一香港一广东地区建立了分会。1895 年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冲击广东巡抚衙门的暴动在起义前被官府查获，几名同志被处决。孙中山侥幸逃到日本，除辫蓄须，穿西式服装，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姓"中山"的日本人（"中山"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命名公园、马路和学校，甚至成

了民国时期的一种服装式样）。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取道美国辗转来到伦敦。1896 年他在伦敦的中国使馆附近被人认出而遭人绑架，受到十几天的非法监禁；正当他面临被遣送回北京处决的时候，以前教过他板球的老师詹姆士o 坎特利爵士（J 一）利用了英国舆论的力量，这才使他获释。这样，年仅30 的孙中山就以反清革命领袖的身份闻名世界，成了浪迹天涯的中国命运之子。当他于1897 年回到日本，取得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帮助和建议时，孙中山已经把几种新旧反清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新的力量包括从海外华人集团那里得到的资金支持。这些海外华人集团由于长期处在中国大陆传统社会之外，养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商业价值观。他们极富民族主义情感，但在政治上却为不知应该忠于何方而焦虑。另一股新力量来自一个半西化、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青年爱国者组成的领导集体，边些人同孙中山一样来自中国接受近代化生活边缘的广东地区。旧式力量包括那些可由内地秘密团体召集的武装反清组织。此外，孙中山还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反清暴动夺取某一处地方政权，期待产生连锁反应来颠覆清政府。1 以"年10 月，在兄弟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香港以北的泥州发动了一场暴动。由于从台湾来的日本方面提供的武器和人员接济未能如期兑现，起义者在坚持了两周后撤出了战斗。通过结合传统和近代的组织方式，孙中山于1903 年加入了兄弟会的檀香山分会，并通过它向全美的华人募集资金。

此刻，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与其他革命者竞争，争取更多的新一代中国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康有为在较保守的东南亚华商中仍然拥有很多支持者，而梁启超的文字正造就着新一代学生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人也不断地尝试着发动武装暴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各革命团体、学校和革命刊物争相问世。在上海，以传统学者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一个团体抨击了康、梁的主张。1 卯3 年他们办的煽动排满的报纸《苏报》 被封，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章炳麟被判监禁3 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 年建立了他的华兴会，努力联合军官、学生和秘密会党成员以策动起义。但同大多数起义一样，密谋被政府查出，起义遂告流产。革命活动就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它缺乏很好的协调、专门的思想组织和长远的规划。

面临着这样的竞争和机遇，孙中山此时开始建设他的思想理论。1卯3 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开始撰写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他完成发动旅居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学生团体的工作之后，孙中山于1 卯5 年年中又一次回到东京。如果可以把孙中山的革命手段视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忠于革命目标而又善于变通的人。此时的孙中山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一套理论来证实和指导他创建的共和制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原则：民族主义（一个兼指民族和种族的称谓），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个久已有之的提法，以后有人将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三个含义不定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很多那个时代纷纭多变的思想，在特殊情境下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反满、倾向共和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尽管那些希望取得外国对革命帮助的人士对后一点并不强调。民权主义包含一种与儒家原则相反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宪法（孙中山这里借用了梁启超的名词术语）来保证；这部宪法将由五权—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借用美国体制）加上选举和考试共五种权力— 组成。选举和考试这两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这"五权宪法"明显是孙中山的创造。最后，他的民生主义为了面对工业发展将会带来的新问题，没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而是追随当时风靡一时的亨利o 乔治（He 恻G 加妙）的理论，即用一种单一土地税来调控将来可能得到增长的土地价值，从而限制投机者和垄断资本家攫取暴利。于是这古已有之的"民生"概念在1905 年主要就指这种基于特殊的西方单一税意义上的城市"平均地权"思想，而不再是农业社会的土地再分配。这最后一项主义即便在绅商子弟中也不可能激起太大的热情，尽管他们可能迫切地要求一场政治革命。

同盟会的兴衰

所有这些要素— 海外华人资金、与秘密会党的接触、新式学生构成的领导层和革命的意识形态— 于1 叩5 年在日本同志的撮合下汇合到了一起。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把昔日的竞争者吸引到一起，把黄兴和其他一些湘籍人士介绍给了孙中山。那年8 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同盟会"宣告成立，公推孙中山为主要执行人，黄兴为副执行人，章炳麟和其他人士也担任了要职。设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的海外分会和各省的分会协调行动。在同盟会1 〕 刃名左

右的早期会员中，最大的集团是由湖北和湖南籍人士组成的（近代教育家张之洞曾长期督抚两湖），广东集团次之，四川和下游诸省人士组成的集团分居第三和第四。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39 岁时的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同志中不仅年事最长，而且声誉最大，游历最广，在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最多，尽管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力不是最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中山是一个西化较深的中国人。

他不属于士绅阶层，不以文字知名于世，长期以来以策划亡命行动为世人所知；智识察赋平平，并没有担当起指导他那一代人思想进步的近代哲人角色。然而，处在中国伟大传统和各种外国模式分崩离析的多元格局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会取得可以与孙中山媲美的成就。

新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孙中山的助手们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阐释（《民报》是同盟会机关报）。在抨击梁启超关于渐进改良和立宪君主制的思想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作者阐明了通过一场急进革命中国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获得了中国学生的支持。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精英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的指导下，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干预来推动革命的发展。社会的逐渐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建立近代化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民报》支持孙中山分三个阶段实现革命的思想：第一阶段是为期3 年的军政府时期，以在全国逐县实行地方自治为起点；第二阶段是在一部临时宪法指导下为期6 年的"训政"时期；第三阶段在宪法的基础上，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组成政府。这些乐观的估计和过于简单的保证很快就变得比梁启超冷静的理智更为深人人心，不管怎样，梁启超推行君主制的计划由于1908 年光绪皇帝的驾崩而搁浅了。

尽管组成了新的联盟，革命运动还是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反清活动最活跃的湖南省，1 久巧年10 月反清组织"哥老会"借当年的饥荒单独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得到了附近江西萍乡煤矿工人们的支持和参加，但是由于清政府调集四省兵力，起义在一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19 (j7 年，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了孙中山。他和黄兴辗转来到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并于1 卯7 年到1908 年

间，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发动了6 次暴动。但是这让法国殖民当局注意到中国人的榜样刺激了越南人的不安定情绪。于是法国人也驱逐了同谋举事的同盟会会员。到了1 创刃年，清政府的捕杀加上革命者内部因协调不力所招致的挫折，使海外华人资助革命党人的热情大大降温，革命运动内部也渐渐发生了分歧。此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已经被迫中止，孙中山再度到西方游说寻求资助。其他一些人转向了由一批从巴黎归来的留学生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采用暗杀方式以使他们的行动为更多人所注意。1910 年英俊的汪精卫密谋用炸弹刺杀北京的摄政王，此举失败后注精卫遭到了监禁。反满情绪正在上扬，但是革命运动看起来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黄兴坚持了一条最具希望的策反清政府新军的道路。1901 年2 月在广东发动的一场新军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另外一场海外资金募集活动在东南亚和加拿大华人中间筹得一笔18 . 7 万港元的资金，支持了19n 年4 月向广东地区走私军火和派遣敢死队的活动。和其他早期密谋一样，这次"广东革命"注定会失败。尽管成员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起义始终困难重重：保密不严、政府已有戒备、举事前夕临时改变计划、缺乏协调、处乱即惊。黄兴指挥的起义者照常分成儿组冲击督抚衙门，其中有一组起义者把另一组同志误认作是清军，双方交火。孙中山把这次称为1895 年以来他领导革命党人起义的第十次失败。黄兴总结道，在策动革命时必须采用独裁手段；异议一旦得到容许，革命注定要失败。

所有这些暴动和起义与其说纯粹是军事行动，不如说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即摧毁清王朝的至上特权和地位。所有的暴动和暗杀，在海外募集的资金和武器都用来摧毁人民对于大命皇权的默从。但天命皇权同样也受到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威胁，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1910 年湖南发生的农民抢米风潮和1911 年支持过"保路运动"的四川土绅阶层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两者都加速了清王朝中央权威和满清帝室的衰落。到19n 年，天命看来确实不在满清了；满洲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家机器中大部分人员对他们的信心和曾给予他们的积极支持，这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警察和新军，甚至还有新军统帅。

清王朝的终结

清王朝末日的降临，部分是由于偶然的地方自发因素，因此也可以说是在同盟会意料之外的事件。学生和士兵已经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研究会，以便今后更好地策划起义。1911 年10 月9 日，他们的密谋照旧被发现；驻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士兵为了自救，于10 月ro 日发动了起义。这一天以后被定为"双十节"，每年都受到庆祝。尽管起义的3 （兀旧名士兵只古驻军总数的一小部分，满清派来的巡抚逃到了城外，清军指挥也弃城而走，武昌遂落人了起义军手中。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由于起义发生后没有革命党领导人在场，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领导人。这次反满起义得到当地人民的自发支持。几周之内其他20 余省发布反满独立声明，这些中心城市通常是由同盟会、新军和省级咨政会支持的。到了11 月初，所有华南和华中甚至西北的省份都宣布了独立。这些新独立的省份通常都由易帜的清军军官担任军事领导人，和各省咨政会中宪政运动的领导人共同掌握地方权力。只有6 个地区发生了战斗。此时清廷召回了袁世凯，因为最精锐的军队听命于他。袁世凯同意出山，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由他任新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兼军队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各个已背叛清廷的省份和同盟会革命者们联合起来，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在丹佛出版的一家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继续前往英国寻求贷款支持，并希望得到英国一臂之助，防止日本为清朝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他很及时地赶到上海，以深厚的资历被推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于1912 年1 月1 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同时表示只要满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任何时候易帜支持新的民国，他愿意辞职让贤给袁世凯。尽管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武汉三镇）, 19n 年的革命出奇地温和。它同时也极不彻底，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消极的主要目标，即推翻清朝的统治。但在几个实际问题上革命者和各省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首先，各省必须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遏制来自外国（很可能是日本）的干涉；第三，袁世凯是当时惟一具有足够经验、能力和背景领导一个新政府的人。到12 月底时，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者们达成了共识，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于涉的惟一希望。而袁世凯这方面，在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的支持下，高踞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在各个层面上既明且暗地一边与清廷要价，一边又同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党人谈判，最终达成了总体解决方案：1912 年2 月12 日，极概中的

宣统帝（以后被称为"溥仪") "顺天意，应民心"地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寿终正寝，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它的君主政体亦随之消亡。孙中山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被南京临时政府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但是北京的一场兵变（禄步仓之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而留在故都以免去南下的麻烦。3 月10 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在一部临时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直到议会被选出、一个合于宪法要求的完备政府成立为止。

袁世凯大总统后来"背叛"了选举了他的革命党人，止如他已经背叛了在危难之际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清廷一样。但是1912 年的中国社会群龙无首，全国找不出一位"真命天子"来承担社翟重任。在这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满洲人本来可以拒绝金钱收买而诉诸武力，北方本来可以被用来对抗南京政权，而不久之后就变得默武成性的日本人本来也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机会。但正如后来形势所证明的一样，袁世凯有足够的手段驱逐满洲人、赢得外国的承认并欺骗革命党人，从而在危局中把政府维持下来。日本人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始终无法在采取积极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英国要求中国保持统一。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深知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各种各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出现了。

这样，当从远古就有的中国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拥有实力者的出现为这一剧变提供了缓冲。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一旦失去了天子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已经得不到传统礼教对至高权威持有者的认可了。尽管和西方的神权政治不同，中国统治者历来无庸置疑地高置于万民之上；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这样，一方面失去了传统上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认可方式，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权力认可习惯尚未形成，袁世凯及以后军阀这些古代天子的继承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武力维持其权威。当一些新的认可习惯建立起来后，人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当年革命党人印象中的英美式政府。这样，1911 年的革命标志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国度中一场迟到的中央权力的危机开始了。

中华民国陷入军阔混战

到了1912 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近代化转变，开始将中国文明碾为童粉。那些从当时起经历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的中国人经受了每一个层面上个体或是公众、实践上或是理论上的大混乱。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对一种新秩序、一种民族力量的复兴和国民生活重塑的探索寻求，比在中国受到更长时期的拖延和更多的挫折了。

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管了已经不复存在的清帝主要行政职能后，很快就卷人一场与革命党领导人的权力之争。从1912 年到1916 年，他使用了贿赂、军事力量、暗杀等各种伎俩，胁持国会，肆意篡改宪法，最后用尽心机企图恢复帝制。他所有这些举措都给自己打上了独夫民贼的烙印。

1912 年3 月，袁世凯依照共和政体的要求，任命自己的亲信唐绍仪为总理，责成他组织一个10 人内阁。唐绍仪早先曾留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这个内阁中有4 位同盟会会员，湖南人宋教仁即为其中之一。他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和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部约法划分了总统和议会的各自权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关于应该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权限的争执。唐绍仪总理没有听命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背景和自己的财政预算资金，甚至不能控制内阁中各部的部长。当他看到袁世凯不想让他管理内阁，他和其他4 位同盟会会员在1912 年6 月递交了辞呈。此后的内阁就只向总统一人负责，而不是以前那样向议会负责了。为了避免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就职。黄兴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与两人会面，表示赞同两人的主张，甚至任命孙中山为铁路总长，主持一项规模宏大的全国铁路系统建设。这一切当然只是纸上谈兵。这些年长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权术，甚至没有能力提出实行党派政治的要求。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当模糊，目的不明确且意见相左；而党派政治作为一种政体在中国政坛上仍未经过试验。实际上政治党派此时不过刚从传统中脱胎，开始成形而已。

一种是士大夫阶层的党政传统，如康有为的"自强社"和其他一些1895 年之后形成的政治研究组织。这一度有助于全国范围的宪政运动，在此时的1912 年5 月借"共和党"的名义出现，其成员大多支持袁世凯政府。当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之后，他组建了

一个"民主党"，并于1913 年5 月将所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派别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进步党"。这个党派大体上仍然支持政府。另一个传统来自于秘密会党，革命者曾仿此建立秘密政党。许多政治集团是两种传统兼而有之，而且有些政客同时属于几个党派。没有哪个党派的性质超出了由上层社会出身的个人的杂凑，这些人往往因私人关系或共同的背景拉扯到一起，他们缺乏可靠的选区支持者、政治地位及从政经验。简言之，日本在19 世纪70 年代开始采用的政治联盟和制造舆论争取选民的西方政治方式，此时中国刚刚起步。现在来讨论政党政策的实质性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是政党本身在整个体制中的角色也还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

与西方传统上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以分权政治为治国中心法则不同，中国君主历来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于一身。袁世凯已经取得了对内阁和政府文职机构的控制，又要把触角伸向各省的军事长宫。肩负如许沉重的个人职责，不论从传统上还是经验上来看，他都没有任何准备面对一个忠于中华民国更高利益、但可能攻击他政策并危及其个人权力的"忠实反对党"。然而这却正是西方模式的代议制政府的要求。看起来此时建立一个由反对派主导的议会方案是可行的；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这一个新阶段的权力斗争是由宋教仁领导的。这时的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位居孙中山和黄兴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他于1912 年8 月说服了四个小政治派别和同盟会联合，组成一个公开的党派"国民党"。在一场以各省为基础、对选民限制极严的间接选举导致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到1913 年2 月为止在国会两院取得了压倒性多数。利用这种形势，宋教仁在华中举行了大规模的竞选活动，批评政府并要求由国民党来控制内阁，尽管袁世凯仍应留任总统一职。

这是中国议会民主制发展的一个高潮，但是宋教仁宣布参加竞选的结局极大地挫败了这一很有前途的发展。根据上海混合法庭事后作的详细纪录，袁世凯雇用刺客于1913 年3 月加日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未满31 岁的宋教仁。袁世凯事后暂时用编造的谎言混淆视听，指责黄兴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此前暗杀是在野反清革命党人的武器，但是临时袁世凯大总统却发掘出它对于当权者的潜在用途，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亲革命党将领被暗杀或处决。暗杀宋教仁的战略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执政者高于法律"，并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战术，即"要

最有效地阻遏反对派运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灭它的领导人物"。这一套伎俩从此被用来扼杀中国的民主力量。

此时反袁情绪高涨。因为袁世凯不惜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换取金钱支持及对其政府的承认。在国内镇压政党政治的同时，他好像在把中国国库的收入支付给外国人。他的财政吃紧。尽管现在他能用个人力量节制指挥大部分军队的各省军事长官，但是在增加流向北京国库的土地税和其他一些少得可怜的收人方面，曾经统帅这些将领的他并不比前任更显得有才能。1911 年4 月满清政府以"币制改革和满洲实业建设"为名向英、法、德、美四大国银行组织破釜沉舟地借款上（众〕万英镑，使本已濒临破产的财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和俄国银行于1912 年6 月又加入这个财团，四大国银行团成了六国银行团。袁世凯很早就开始寻求大规模外国贷款，但六国财团一方面申明自已实际上有垄断向中国贷款的实力，一方面要求袁世凯以盐税作抵押，并且必须通过由一个中外双方共同管理的类似海关司的机构来征收盐税。所有不同信仰的爱国人士一致反对这一系列条件。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3 年3 月改变了塔夫脱1 峨为年时申明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立场，否定了美国在这些事务上继续参与财团活动的可能性，理由是这些贷款的条件威胁中国行政事务的独立自主。经过14 个月的谈判，由银行团提供价值25 佣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还是于1913 年3 月26 日签了字。这一借款活动是袁世凯在未经国会表决，于暗杀宋教仁案证据发布的当天与银行团中剩余的五大国银行签订的。由于债券是以90 ％的票面价值发行，另有6 ％的佣金单独支付给银行，中国实际上只得到84 ％的款额，约2100 万镑，但是在1 叹巧年的最后期限前却要偿清全部本金和5 ％的年息，总计金额为6789 . 3597 万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粉碎人们对反对党的希望并通过借款来支付他军队的开支，主要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他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和平。在1913 年年中，他仍然得到"进步党"的支持，为众多国民党人所容忍，并有北方诸省的军事长官，即其北洋军队中嫡系作后盾。正因如此，他轻慢地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让步，将华中和华南诸省支持国民党的军事长官革职，并同时调动军队随时镇压这些拒不受命的将领。针对袁世凯的嚣张，在1913 年的7 、8 月间，7 个省的政府不顾他们军队武器装备的低劣，再一次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由此开始了短暂的"二次革命"。这次运动既没有发动群众，也未

得到外国的支持，在两个月内几乎兵不血刃便被镇压了下去。孙中山、黄兴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逃往日本，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重新开始，而袁世凯部下的将领们把他们的势力扩一张到了剩下的几乎全部省份。

议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时得到国民党温和派帮助的进步党于1913 年9 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内阁。这个内阁由袁世凯的一些亲信组成，其中也起用了梁启超做司法总长。袁世凯的目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他希望自己通过法定程序由国会正式选为总统后摆脱国会。他使用贿赂和武力胁迫国会对他惟命是从。10 月6 日，国会最终选举他为总统。7 日，他通过外交上的一番要价，成功地让几个大国承认了中华民国。10 月10 日，他宣誓就任由国会选出的第一任大总统。不久他就破坏国会。11 月间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了国民党籍或前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共438 人。1914 年1 月，他先是宣布国会暂时休会，接着终止了各省的咨政会议。2 月，内阁辞职。54 岁的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尽管后来的爱国者对袁世凯的行为唾骂不已，袁世凯当时用蚕食手段瓦解议会制度这堵薄墙，公众中好像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大的触动；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刚从各通商口岸和各省会城市中显现出来的一些未来的议会主义者：列强、蒙昧的民众或城市商人阶层中没多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文职官僚、军队及大多数省军事长官则安于独夫统治，惟求自保。一与日本政治中责任的分配不同，中国式的政治实体惯于由一人在上平衡各方利害，最后一言九鼎，做出裁定。袁世凯现在正是这样，在一部新近制定的宪法旗号下，通过指定设立的机构发号施令。这部宪法就是于1914 年5 月1 日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它赋予袁世凯以独裁者所需的一切权力。他钳制出版业，鼓励由士绅和遗老推行地方自治，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并重新确立儒教为国教。他一下防弹车，就在天坛行古代帝王的祭礼。1915 年底，他成了终身大总统。

外交关系：中华民国与外国列强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失去对前清两个边疆地区的控制。西藏和外蒙古开始分离出去并与英国和俄国的关系日渐密切。相反，它们与北京日渐疏离。中国人在民族一种族自决的名义下驱逐走满洲人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领导人对亚洲内陆省份和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要

求。但是袁世凯在北京继承了前清的权力之后，代表中国申明了中华民国对那些地区拥有传统上的主权。俄国、外蒙古和中国三方很快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允许外蒙古自治。这项协议默许了实际上俄国对外蒙古的支配地位。英国也如法炮制：中国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允许西藏自治，这当然允许英国享有在该地区的永久性利益。1913 年11 月7 日，俄国和英国最终一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与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发生的，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国内税务机构操纵的加强。继承赫德海关司总监职位的英国人于1911 年n 月得到清廷同意，对海关岁入的管理做了根本性改革，因为此时的海关司已经完全成了中国偿付贷款和对外赔款的机构。在此之前尽管海关司的外籍专员只是向北京政府汇报一下他收到的账目单数，但这笔收人至少还经过海关司中国监督的手。而现在各省都已宣布独立，中国的海关体系和对外信贷及偿债能力要得到保全，就只有让外籍专员每收集到一笔收人，就通过海关总督汇给驻上海代表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国际银行集团。在革命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多国领事团在1911 年年底完全接收了"混合法庭"。这一次外国势力对上海和海关收人控制范围的扩大，与一个经过改革由英国人充任总监的新盐务局一起，造成了与早先许多不平等条约一样利弊难明的后果：它们在短期内帮助了中国政府，从长远来看却在继续蚕食中国的主权。中国的偿债信用得到了保证，方便了外国贷款的流人，并且盐税收入也大大增加了。

另外，条约体系的一个利害难定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贪婪会因其他列强的妒忌心理而受到遏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分散了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日本有了可乘之机，开始侵略中国。1914 年8 月，中国宣布中立，但是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后，派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登陆，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这一做法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此后，日本又于19 巧年1 月8 日，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5 款21 条要求。其中的第五款一系列要求意在通过设立日本顾问体系以控制中国政府及警务，垄断中国的军火贸易，参与中国军备建设，以及福建省的开发建设。袁世凯故伎重演地将这些令人发指的条款透露给外国报社，这迫使日本政府同意将第五款留待'旧后协商"；但当日本方面的5 月7 日最后通碟日期将至时，他迫于压力接受了前4 款的大多数要求。没有一个列强站出来维持公义，尽管当时的英国大使认为'旧本

对待中国的行径比德国对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更加卑劣"。中日之间于19巧年5月25日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体现了日本这些要求，这些条约确认了日本在山东和长久以来已被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东蒙的支配地位。此外，日本获得承认在华中的汉冶萍工业基地享有特殊权益。很久以来，汉冶萍就一直被用做向日本贷款的担保，连孙中山在1912年也这样做过。这些条约虽然从未经过任何一届中国国会的批准，日本却把它们视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特许状。由一个代表着日本新兴工业集团利益的内阁提出的21条，其目的基本上是与经济有关的。但21条在中国产生的反响却主要是政治上的，它们的无理要求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各地发生了集会、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强烈抗议。

衰世凯的皇帝梦

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巧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他连自己都不再相信，只知道凡是人都如梁启超所说的一样，"惧锋刃而爱财货"。这一政治信念的匾乏最好不过地体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努力上。1915年8月他在幕后操纵，指使人发动了一场帝制运动。这个运动充斥了要求袁世凯当皇帝的团体、全国范围的民众请愿、由选派出的代表一致通过的投票、旧式奏折一样的上书和其他一些伎俩。这一切只有一个意图：劝袁世凯称帝。为了对这些制造出的"民意"表一个态，袁世凯在一番恰到好处的推让之后，于19巧年12月接受劝进，答应即皇帝位。他建元"洪宪"，以1916年为元年。但这一切终成泡影。

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将士离心。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反对。日本发动了几乎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列强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国国内军界的反对加速了袁世凯政府的倒台，这些反对情绪受了梁启超等人的鼓动。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视历史为不可逆转的力量，此时则积极宣传保存中华民国的国运。他和他的一位

湖南籍学生共谋反袁。此人时任云南省都督，控制着袁世凯势力鞭长莫及的地区。1915 年12 月25 日，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的6 个月里发生的战事有限，谈判却进行得密不透风。先后有8 个西南省份宣布反袁，而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大典，接着宣布放弃称帝，最后于1916 年6 月6 日忧惧而死。

其间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在中国，权利已不再被认为由非人格化的天所赋予和认可，或统制者通过一套灾异说就可让人民默认他的统治。相反，有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这个国家的实际代表— 人民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在1919 年之前漫长的年月里，天子作为一种传统已经逐渐开始丧失他的作用。大命已经被民意所代替，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否成了统治能否持续的关键。被理想化的"民"的概念浸透了新的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民军"、"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等即是例子。尽管只有少数上层人士而不是广大民众要求建立近代代议制度，强人政客袁世凯对这个代议制概念还是过于轻视了。从传统观念上审视，他失信于他的部属，又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为他尽忠?

地缘政治力量也合力反对他。因为各个具有独特地理、文化和行政制度的省份自从1850 年以来，相对于北京的独立性不断加大。另外也存在着使历代王朝劳心的气候、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这些无法消除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不同集团利益和观点的相左冲突。袁世凯死后，外国势力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而其后任不间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把他们逼人绝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在通商口岸古据的战略资源，并且其权威得不到地方的认可；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具有极多的利益和强大的实力，这使他们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省份；第三，五国财团内外的外国银行可以用它们的生杀予夺来造就和瓦解中国的各届政府；最后，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技术一狗范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铁甲的火车和自行车，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文化革命进程和旧秩序的瓦解。

1916 年至1928 年间，中国被混战不休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瓜分；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疆地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军阀实际上处在两个时代之间。他们既不处于以往两个王朝间的转折期，只需一

场"换汤不换药"的变革能够导致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但他们也不是怀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领导人。他们扩充并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军，使用铁路交通和内河汽船航运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在他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政体。革命党人在1911 年有党无兵，没能掌握权力；如今的军阀，有兵无党，同样地软弱无力。他们不断利用、滥用国会和口号正好说明他们缺乏充分的原则和制度。1913 年以来，军备复兴，党派却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够将新兴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府崩溃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到达了混乱的极点。

当年成百上千满身勋章的指挥官们率领各自的军团互相搏杀的历史场面中具有某些典型特征。首先，一名军阀必须有强悍的个性、下属和军队。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训练他们，赢得他们的忠心，然后是发给他们军饱，供给他们装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从一个大城市、一个省、一条商路、铁路的收入那里，从其他军阀或外国势力那里得到支持。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可能给予他战略上的优势，但这个地区的人民只能向他提供军粮和壮丁。这一点和在农民中得到支持的现代游击战争"根据地"具有本质的不同。典型的军阀部队在当地人民中毫无基础可言，他们征税并鱼肉乡里，无异灾星，人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一支军阀部队开进一个新省份时，往往至少能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们可以抢掠一空后开拔走人。

但是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割据混战的军阀并没有其他统治方式来代替军队。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

最后，我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一直不很明确。一方面，军阀们是如此贪心和卑劣，不时背信弃义地使用诡计，几乎使人想起《二国演义》中"多智而近妖"的人物。但当旧的权力结构失去首脑，它的下层机构却还继续存在并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全国性的机构。军阀们最终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于是他们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可以与国会和咨政会合作，甚至召开各省军事首脑会议。由于他们缺乏从事近代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力，互相争斗的军阀们始终无法超越地方割据的层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中国国家的存在。在此期间，北京政府继续对外行使外交职能并保留、维持了多项行政职能，无人打算改朝换代：时代已经变了。军阀和军阀之间、国会议员之间以及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各种争斗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变化，但大势所趋，国会不断被削弱，而国家则日益分裂。起初，梁启超和其他一些原来的"进步党"成员组成了一个"研究系"，在总体__上努力寻求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但遭到南方国民党余部的反对。随着控制华北和华中12 省的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国会和政府的操纵，南力'诸省逐渐疏离北京政府。在第二阶段，南省人士于1917 年退出北京国会，这是一个转折点，它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 上本，孙中山重新以早期利用秘密会党形式发动革命的方式于1914 年7 月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他希望这个党能成为一个服从领袖的、纪律严明的革命四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革命党人缺乏纪律的缺点，而这正是革命事业屡次失败的原因。但是黄兴和其他许多人拒绝宣誓效忠孙中山；这次重新策划革命的努力显然不符合民主原则。同时，它也没有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爱国主义运动产生吸引力，因为孙中山在1914 年召开的革命党大会上删去了民族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原以反满为宗旨，所以这时孙中山很奇怪地认为民族主义已经毫无意义。他此时放眼亚洲，希望与日本合作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和时代的主旋律脱节，孙中山对1916 年袁世凯的倒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17 年，孙中山重新崛起并加人到军阀们的争执中来〔 〕 7 月，他和其他国民党同志率领当时中国海军的大部分舰只来到厂一东：）在那里，他召集了250 名国会议员组成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但是掌握实权的是当地的军阀。孙中山在广东竭力联合当地实权人物，这与

梁启超在北京力图改造军阀政权创为文职政府一样，举步维艰。1917年8月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为支付国内混战的军费开支而大肆向日本借款，借口是"准备与德国人开战"。这就是"西原借款"。北京当局这时与日本结成军事联盟，聘请日本军事指导，并且与被称为"安福系"的一名亲日派政客及军阀集团密切合作。许多爱国人士抗议当局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以求后者支持扩建自己的军备。梁启超最终怒不可遏地退出了政坛。在南方，孙中山的广东国会也分裂了。一个称为"政治系"的小集团开始与军阀合流。尽管如此，军阀们还是开始暗杀孙中山的追随者，迫使他于1918年5月辞职返沪。当时"桂系"广西军阀集团控制了南方，而北方则是"安福系"的一统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北双方迫于压力开始弥合双方的分歧。于是1919年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合作事宜，但毫无结果，1920年，中国的分裂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南北方的少数派们通过争取一切盟友把原先执政集团赶下了台，但仍无法确保对地方的控制。

1922年后，中国文职政府的分裂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并开始在南北方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北方，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抛出了新的领导人，这些人一早年并不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有三位人物最终站到了前排，其中各方均采用了联系第二方打击第三方的策略，于是任何一方都不免被自己的盟友所出卖。这汽位是：

一、张作霖（1875一1928年），人称"东北王"J此人早年做过土匪，在日俄战争中与日本结盟而发迹，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有东北的丰富资源做后盾，经营着远离华北的东三省老巢。

二、吴佩孚（1872一1939年），早年受儒家经典教育，后入保定军事学堂跟随日本军官学习军事，成了一些中国人和英国人安定中华的希望。

三、冯玉祥（1882一1948年），农民出身的赳赳武夫。11岁起当兵，后毕业于保定军事学堂。1913年他受一位基督教青年会长老的洗礼，信奉了基督教，他的外国传教十朋友们戏称他为"基督徒将军"、：他要求部下服从军纪，追求清教徒式的理想，崇尚简朴的生活、务实的教育和社会改革。他于1924年率军发动北京政变，打破了北洋军阀的权力体系，最终摧毁了代议制政府的空架子。

这些军阀和其他割据势力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尽的千丝万缕般的关系。1922 年到1926 年间爆发了6 次省际战争。它们给已被无休止的掠夺和沉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造成通货膨胀、贸易中断、铁路线和水利灌溉系统等公用设施被毁，吸食鸦片恶习也死灰复燃。清政府早在上峨巧年协同各界力量大力打击鸦片的生产和吸食，曾得到爱国人卜的）'一泛支待，使当时已经减少到每年500 万箱的英属东印度进日鸦片继续缩减，鸦片贸易最终于1917 年年底完全停止，而数量大得多的中国国户二鸦片也正走向消亡。这时，山于军阀在适合种植婴粟的土地上几征收极高的地租，农民为支付地租只好种植生产鸦片的原料__一婴策或许罪恶累累的军阀混战大大刺激了爱国青年们的思想；如梁启超曾说过，"今日之中国惟有奸究恶猾之徒方能昌达"。一场学界革命就在这个绝望和耻辱的时代中产生了。

第14 章 中华民国兴衰

一、思想和文化的革命

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战乱和衰落后重又面临复兴和再生〕这场变革规模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改朝换代。对19 世纪早期的社会瘤疾（那时人们吸食鸦片成风）。〕和近几十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中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奉献热情做一比较，我们就必须承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中国在19 场年后的军阀政治中衰落到了极点，但随着政党专政制度的建立而又得到复兴。意识形态领域内儒家思想的衰落与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影响大致同时发生，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确实有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模式曾经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军阀时代既是乱世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这并不矛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先破后立。1916 年之后10 年中形形色色的思想实践和时新试验毫无拘束地涌现出来。随着政治力量的衰落，出现了思想、经济和社会多元发展的态势，在躁动的思想下潜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大潮。

经济和社会背景

在中央集权政府衰落、国内社会秩序加剧恶化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西方对中国减少出口使得民族工业更容易地在外国控制下的通商口岸中发展起来，在这里民族工业的发展可以不受横行内地诸省之军阀部队的肆虐。一个游离于旧式行会制度之外的新兴商人阶层，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从1901 年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4 年为止，全国已有1 仪习多所地方商会，会员达20 万人。但是大型企业主要还由英国人开办，当然也有美国企业（尤其是在上海）和德国企业（1915 年前在山东）的参与。如中国缺乏石油资源，即为外国向中国出口煤油提供了市场；进口的煤油或是用来代替植物油照明，或是作为燃油与煤炭竞争。中国的石油进t - J 完全为美孚石油公司和亚洲石油公司所控制。后者是成立于上叨7 年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由于中国的英资、华资和日资棉纺厂长期进口棉纱，受此刺激中国的棉花种植业发展起来，此时已有能力为这些企业提供原料。

香烟市场最早是由美国人1902 年组建、总部设在伦敦的跨国集团英美烟草公司开发的。打开中国市场后不久，英美烟草就通过它的买办向华北的烟草种植者提供种子和信贷。它建立了一套烟叶收集和烟草熏制工厂网络来为六个下属的卷烟工厂提供中国产的烟叶；但不久后，建于1905 年的南洋兄弟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与它展开了竞争。

到了1914 年，一种现代中国的行政和企业管理阶层出现了。这一阶层后来被不顾历史事实地贴上了"买办阶级"的标签。确切地讲，它是在外国教育家、公务员以及商人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这一阶层的人士在教会学校和其他设有中西混合教程的学校、海关司、邮政局（它于1912 年起从海关司分离出去，到了1918 年，它雇用了100 名外国人和27 仪幻名中国员工）、汽轮航线、工厂、商店以及怡和洋行等通商口岸公司的日常事务中，或在A . P . C 和英美烟草等等新型专业化公司的商务活动中获得了经验。这个新生的中产阶层已经在通商口岸的工作和与外国人的日常交往中掌握了现代经济管理方式。他们已获得建设经济所必须的心态和素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给他们提供了表现自己的机会：

其他工业化所必须的要素还包括中国通过海外华人和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资本。这些资金往往由一些现代中国银行经办。这些银行或受政府监督，或为私营。这类银行在1914 年有17 家，1926 年则上升为102 家，旧式的山西银号就此淘汰出局。但是还有许多因素滞缓了金融资源的发展。作为生产性投资的一种替代选择，旧式高利贷仍能赚取12 ％甚至更高的年息。币制的改革和统一当时还未能取代价值单位不同的银两，尽管早在哀世凯做总统时由政府铸造、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就已进入流通领域：

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吸引了一支劳动大军，因为这些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来看护纱锭、检选烟叶，或在生产火柴、面粉、罐装食品、水泥等物的工厂中做工。而新近开发的铁路交通和汽船航运系统则使这些就业机会，为农民长期以来的闭塞生活提供了新的选择：军阿的捐税和兵役、人口的增长（假定人口增长了）和自然灾害都刺激人口流向了城市。城市生活和工厂做工打破了旧的家庭纽带。当儿女们开始自己挣工资吃饭、女性成员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时，家庭就不再是一个控制着个人生活的自我封闭型的社会经济单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

上，不受私人关系左右、普遍适用的工作能力标准也替代了家庭地位和亲缘关系。在拥挤的贫民窟和剥削劳动力的1 几厂中，新的价值观开始古据主导地位，而工厂中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则缓慢得到增长。到了1919 年，他们的人数已超过100 万，或者可能达到了150 万。社会变革不仅体现于新式资本家和劳工阶级的崛起，而且也反映在青年和女性新型地位的确立上。）年轻人曾领导了辛亥革命，如今学生则取代了旧式学者的特权地位。19 巧年，教育部统计表明，当时已有各式政府出资的学校12 万所，在读学生达《 幻万人。这个数字比过去有所增长，尽管有大学学历者才有几千人。天主教和新教办的教会学校在1919 年拥有大约50 万名学生。新教办的大学为高等教育树立了新的旗帜。传教士们首先发起女子教育运动，在1 . 3 万名新教学校学生里女学生古有可观的比例。1915 年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 金陵大学在南京成立。

工商实业家、工厂工人以及现代学生这些新兴的社会阶层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传统科举考试的合格者（狭义上指士绅阶层）让位给那些在城市里或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在农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喜欢住在城市里，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农村社会：，简言之，对群众运动十分敏感的各阶层人士所居住的城市，其兴起是随农村生活的衰落而来的。在农村，高高在上的大家族统治消亡了，而像以前一样住在村庄里的广一大农民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由于交通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农村人口在数量上有增加，但这些人口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反而下降了。佃户和贫农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这些人受不到教育，既无立身之地，又没有职业，很多人只能去做土匪、加入军阀部队或做苦力为生。旧式社会结构的崩溃迫使学生阶层以领导者和救世主的形象站到社会生活的前列。他们继承了知识阶层以国家为己任的传统，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强国、救国。通过对外国的接触，他们不断产生各种新的想法和动力（。这时的日本仍然吸引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约古总数的2 / 5) ，但有1 / 3 的人开始留学美国。上的8 年美国返还镇压义和团后它所得的庚子赔款（约12 (X ）万美元），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学校。从19H 年起不断有学生拿到它所提供的奖学金赴美留学。1924 年最后一笔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后，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笔款项，成立了一个称为"中国教育文化促进基金会"的组织。另外，为了给一战时期的欧洲提供劳工，中国征集了14 万劳工遣

往法国。在那里，一些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在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发起了为劳工补习文化的活动。此前，已经有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发起了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活动二所有这些活动开始打破长期以来知识阶层和劳工之间的界限。

于是，法国取代美国成了中国留学生接触了解政治运动和培育政治信仰的中心。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劳工阶级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萌芽，但欧洲无政府主义理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互助：演变的因素》（1 如2 年）中宣称，尽管要开展合作互助，但首先必须打破对自由的限制，互助和竞争仍均为自然法则。在东京和巴黎留学的学生试图将无政府主义原则应用于中国，他们反对一切精英集团和任何政府形式（包括民族主义政府），鼓吹平均主义、群众运动和包括暗杀在内的直接行动。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是对公众意志和自愿联合不切实际的信仰，它结合了清教传统、自我牺牲精神和摧毁现存秩序的手段，许多中心城市中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均采纳了这一思想。

北大新思潮

学界革命的中心是国立北京大学。一方面，它在当时的国内教育界执牛耳（当时北大以外，国内只有两所国立大学），另一方面是由于1917 年新校长蔡元培为它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蔡元培为前清进士，25 岁时人翰林院，后加入同盟会并赴德研究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学说，1912 年先后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任总统治下担任第一届民国政府的内阁教育总长。他再次赴德法深造回国后，便着手把北大从培训官僚的衙门学校改造成为兼容并包各种思想的学术中心。蔡元培曾在1912 年呼吁，"学术应当超越政治o o 一学术不应当受制于政治"。由于当时袁世凯执意恢复孔教，他的呼声受到压制；而此后这类呼声也屡经党派独裁的封杀。从长远看，中国的重建需要寻找新的正统理论来巩固其政治实体。但是在军阀混战时代，恰恰是政治结构的弱点而非多党政治中的法网优势，使得自由思想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真正发展起来。蔡元培鼓励在北大自由发表各种观点，甚至允许师生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结果，知识界的百花齐放在思想层面上形成了与辛亥革命双峰并峙的局面。这场思想革命由不可多得的转型期人物发

动，他们大多生于19 世纪80 年代，旧学功底深厚，留学海外后对西方文化也多有熏染。横跨两个世界的这一代人所具有的知识优势使他们能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加以扬弃。蔡元培为北大带来了一位国文系主任，他就是影响颇大的革命记者陈独秀。出身官僚世家的陈独秀为前清秀才，后赴日本和法国留学，并参加过辛亥年革命。他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个人自由理想"的热情宣传者。他把中国的衰败归咎于孔教，认为它宣扬的家庭义务侄桔了个人自由；它的轻商思想导致了民贫国弱。19 巧年他在其本人创建的《 新青年》 杂志上，号召中国青年"要独立，不要做奴隶… … 要进步，不要保守… … 要积极，不要消极… … 要放眼世界，不要封闭，o o … 要实际，不要追求空洞的形式… … 要科学，不要空想"。在北大，陈独秀继续主编《 新青年》 。此时这份杂志成了各种思想均可公开论战的讲坛，并公开刊登各界致编者的来信。它的发行量达到1 日汉刃份，鼓舞了各阶层的学子。

陈独秀在北大的主要盟友是胡适。胡适也是出身官僚学者家庭，早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后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兴趣转向了哲学。他在哥伦比亚学院师从约翰o 杜威时，接受了许多革命者倡导的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的观点；明清两代的白话小说和早期传教士编写的小册子为自话文写作树立了榜样。胡适首创用日常语言写作中文白话诗，反映了当时美国诗坛"新潮流"一派的观点。他和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共同发起了白话文运动。陈独秀在《 新青年》 上表示支持这一运动：此后不久，《 新青年》 就完全改用白话写作了。此次"文学复兴"有好几个目的。首先，人们希望通过它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以适应现代的思维方式。胡适宣称，一种死的语言不能够创造活的文学。他服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故追求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并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书面语言用作批判性思维的工具。第二个目的是用浅近的文字创作一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学，使文学更加深入大众。陈独秀要抛弃"僵化和过分雕琢的"古典文学以发展一种"新鲜而真挚的"现实主义文学，抛弃那种"属于少数贵族的暧昧不清的文学"，创造一种"平实、简练、表现力强的大众文学"。这一运动还有一个更为长远的目的，即摧毁"孔教道德和道教迷信的擎生场"，解放个人。一种"抗议文学"很快出现。《 新青年》 在1918 年5 月号刊登了一篇短篇讽刺小说《 狂人「1 记》 。，小说中的主人公认定人们要杀死并吃掉他。他打开一册历史书，见到"每一页上都写满了仁义道

德"，但靠近了细看却发现"整页书上"的字里行间写满了两个字："吃人！"这篇小说对旧社会的控告体现了作者鲁迅的典型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很快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人物。就这样，到了1919 年，北京大学成了西方和中国古典传统汇集交融的场所。其他不少刊物的创办使《 新青年》 获得了更多切磋砒砺的同志。。在接踵而来的思想震荡中，当时盛行于欧日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理论都在这里得到了表达，尽管其中不乏一知半解的转述。它们包括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等二依靠这些思想武器对旧社会的全面批判引导了两位主角的出场：这两位主角就是陈独秀所称道的"德；创：.''（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写道，只有这两位先生能够医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止的恶疾）此时，从思想仁和沟通方式上看，在政界和学界引发一场知识阶层能量大释放的条件都已经具备。

"五四"运动

"五四"一词来源于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的小威游行活动，但通常它成为指代1917 至！921 年问（甚至这以后时期）整个思想界运动的专用语。关于这场运动的叙述，我们只是开了个头。"互四"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作为主导政治力量的出现。自日本于1914 年占领山东后向哀世凯政府提出21 条要求以来，爱国情绪

不断高涨。在一些人的努力下，中国于1917 年8 月加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这能使中国获得参与战后和平会议的权利以反对日本的战时扩张。但是日本事先已经秘密照会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取得了它们对日本保留在山东权益的承认。同样，日本在1917 年11 月和美国签署的"兰辛一石井"协议中也默认了这一点。1918 年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世界欢庆民主战胜军国主义，但代表北京和广东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1919 年1 月和威尔逊总统本人同样惊讶地发现，后者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和开放外交并不适用于东亚。后来有迹象表明1918 年连北京的军阀政府本身也签署了承认日本在山东地位的秘密协议。于是中国年轻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最终付之东流。中国公众震惊了。数百名海外华人、学生、商人、教育界人

士、工会和政治组织向巴黎和会发去电报，表示抗议。正当学生们为北京军阀政府的秘密卖国行径而群情激愤时，传来了巴黎和会决定保留日本在山东权益的消息。5 月4 日，北京13 所高校的3 仪"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签署了共同宣言。接下去的游行示威引发了暴力事件，学生们痛扫一了一名亲日派官僚并放火烧了另外一位内阁部长的私宅。

"五四"运动的历史影响在于此后学生们发动的政治舆论。北京学生组织了一个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学界联合会。他们的活动很快得到了来自全国范围内的新闻界和商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以及安福系对立面军阀的支持。其他城市的学生仿效北京学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举行示威游行，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并以上街演讲的形式发动大众支持这一运动。他们也发动了教授、教师、作家和新闻记者这一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后者亦组成团体参与政治活动。5 月底6 月初学生在2 仪）多座城市里举行了罢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学生们证明了自己是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相信武力能解决事端的北京军阀政府在6 月初企图镇压这场运动二军阀政府逮捕了1150 名学生闹事者，把半个北大变成了一座监狱。作为反击，女学生加入了男学生的行列，继续上街游行。同情学生运动的上海商人在一场持续一周的爱国罢工活动中宣布罢市。上海4O 多家工厂中，工人以支持爱国运动的名义罢工。这场包括各主要阶层并形成群众运动的真正爱国主义运动终于获得了胜利。北京学生胜利地走出了监狱，三名亲日派"汉奸"官僚被革职，内阁宣布辞职，同时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引发的政治活动迎来了19 世纪20 年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个时代具有三项主要标志：一党专政的兴起、社会主义思潮的成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孕育了政治活动的学界激变仍然不断发展，传播媒介日益增多，西方思想得到更为热心的研究，旧的恶习受到更为有力的打击，新的价值观也更多地得到了讨论。这场运动在1919 年5 月4 日之后的一二年中基本上停止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活动，故又称为"新文化运动"。作为它的宣传媒介，几百份白话刊物此时纷纷面世，尽管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报纸也同样鼓

吹新思想，对一切价值取向重新进行审视。包括西方著作泽本在内的书籍出版也骤然增加了。，通过这些方式，由二十几岁的年轻教授和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发起的学界革命迅速地从北大扩展到了全国。不同目的的学会遍地开花。知名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往往由胡适担任口译。罗素也来华讲了一年学。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很广泛的影响。

对旧儒家等级制度的抨击否定了自古以来"三纲"的合理性。这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应的"忠、孝、节"三德作为国家和家庭专制的支柱也受到了抨击。儒教的反对者抨击了儒教体制下父母的专横、包办婚姻和把成年人当作家庭附庸的现象。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和西方同一时期争取妇女普选权和平等权利的运动媲美。尽管康有为还像1898 年一样积极鼓吹儒教，当时许多保守派人士试图将儒教定为国教的主张却受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儒家礼教常被遣责为压制个人的栓桔以不平等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和理沦受到唾弃：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服侍主子的文化；胜利的主子在千万人的痛苦之上耀武扬威。

对孔教的抨击让人们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古代的传统。北大一批"疑古派"的学者对古史的真实性做了再评价。已经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领导了一项涵盖深广的"整理国故"活动，对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做披沙拣金的扬弃工作。他们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中国佛教史、白话小说和有清一代的思想。这种对民族遗产的关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欧洲物质文明幻想的破灭而得到加强。从巴黎和会归来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在精神领域的破产。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蜕化到崇信物质至上，它已经萎缩、干枯，正在承受着一场由精神饥荒造成的疾病。这一系列的沦争使人们得以评估各种观点的优劣。宗教问题也在讨论之列，有人捍卫它，但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1922 年世界青年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立派学生则在全国范［fi上内组织了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

随着学界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战胜传统秩序，它渐渐失去统一的目标。这个阵营内部分化成厂两大派，一些人倾向于从事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演变，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投身政治行动、暴动和暴力革命。人们主要按照个人气质和出身背景给他们归了类。用实用主义方

法重建中国文明是由胡适提出的；他反对多谈"主义", 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无所不包的教条。相反，他提出应该把力量集中在研究问题上，要用细致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去分析问题。"无所谓彻底解放。解放指的是从这种或那种制度，从这种或那种信仰，为这个或那个个人，赢得解放；它是一点一滴的解放。"这种看法对许多人而言不足以应付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在感觉上也很难令人感到满意。胡适立足教育的长远规划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成效。这一规划只能产生向军阀政府要求保障民权的自由主义宣言，但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们并无能力实施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积极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来源于西方关于天赋人权和法律至上的理论，但在中国并无能够支持起真正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类似理论传统。相反，在军阀肆虐的中国，未来的自由主义者在能"自私地"要求获得他应得的民权之前，首先必须帮助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也是新型爱国思想所要求的。大众关心的焦点一度是如何解放个人，但1920 年之后它又回到更为合乎国情的主题上，即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民族主义又一次夺走了自由主义的优先权。各种政治运动再度兴起，它们将发动个人并将个人及其文化生活纳入它的轨道。

五四事件已经表明，当学生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行动时他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此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开始招募学生，作为他全面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政治行动对于性格活跃的陈独秀也颇有吸引力。正当此时，苏俄的榜样和方针以切实可行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派和某些主要的国民党领袖人物一样，很快感到已经找到了长期寻觅的行动纲领。

学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科学的理论，而当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列强的秘密即在于"科学"二字。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依靠压迫和被压迫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前发展。这一观点对青年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需要有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演化的真义、阐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受欢迎的是一种乐观的信仰，即认为通过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古有制度，可以消灭阶级

斗争和阶级剥削；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上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所有问题刚刚萌芽。不仅如此，列宁还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共产党这个纪律严明的精英组织将成为革命先锋队的观点，并把殖民帝国主义解释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本来被认为适用于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至此还只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小题目，而马列主义就更是新生事物了。1917 年苏俄成功夺取政权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救世主形象由此变得更为可信。它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套能够全方位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在理沦层面上，它提供了一套完整、普遍和科学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教人们摈弃西方"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在政治层面上，列宁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加严密的新型政党组织方法和一种夺取政权、利用政权发动群众、重建社会的领导艺术。这其实是苏俄在借用西方世界政治技术方面迈出的一步。最后，列宁主义向个人展示了一条自我约束并为爱国主义目的而献身的道路。

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本来就与日俱增，而这一理论在中国出现时更是正逢其时，因为这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白热化，正需要一种组织方式来引导。中国在凡尔赛被出卖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是"帝国主义"C 从此，正如列宁所说，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走到了一起。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进而开展政治行动。一向关注中国农民解放问题的教授李大钊曾在《 新青年》 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一文庆贺十月革命；1919 年5 月他负责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会开始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讨论（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李大钊助手的湖南学生毛泽东也在1919 年3 月回到长沙后发起了类似的团体）。到1920 年年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全身心地接受了马列主义。陈独秀于同年9 月和其他一些人聚会，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当1921 年7 月毛泽东和其他11 位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均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组。

苏俄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支持。它首先提出放弃所有帝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此举赢得了全国上下广泛的亲苏情绪。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 年3

月）来华筹建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设立通讯联络处，出版刊物和设立各党小组，并且列席了中共一大。在这个阶段，共产国际的经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战后在法国半工半读的学生中有不少积极分子来自湖南。他们于1920 年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南开大学毕业的周恩来成了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领导集体中最著名的一位。1921 年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使学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抉择，学者或是避开政治埋头学术研究，或是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当胡适和陈独秀在合作四年后于1920 年初分道扬镰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选择。

作家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似，书面化的日常语言开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实验性的应用。长短篇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等新式体裁和主题都有待于人们用中文对它们进行再创造。许多努力刚刚开了一个头，更多的问题有待研究。但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当务之急是社会革命：人们应当铲除旧制度，重建一个新社会。作家们相信他们的任务是教育民众，拯救中国。那些以个人主义方式追求浪漫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与前者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中有素以救治中国瘤疾为己任的鲁迅。最有影响的早期文学组织— 文学研究会，承担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小说月报》 杂志。他们提倡一种多样化的现实主义的"人的文学"，重视西方小说的翻译，并且鼓励新进，其中包括几位女作家。与之竞争的是由郭沫若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起初他们投身于一种彻底反叛的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出版了一些坦白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描写主人公爱情生活和爱国情绪同时受到挫折，从而良心受到谴责，有负罪感。但到了20 年代中期，创造社以同样的热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郭沫若在谈到1924 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写道："我现在能够把所有过去无法理清的思想安置齐整；我已经找到了所有过去看来自相矛盾、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这一表述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并预示了视文学为艺术的自由派个人主义者的厄运。由于缺少一种近代传统和在新环境中进行艺术评价的尺度，或许作家们更容易接受以文学为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初级社会功能的定义。

二、国民革命的背景

19 世纪20 年代在军阀战争达到了混乱的极点之后，目睹了又一场革命的兴起和军阀制度的消灭。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除此之外，还有外交关系上和国内政治上的一系列目标。在外交关系上，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外国特权和外国势力。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但在国内政治上，各派间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分歧。通过组织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发动社会革命，这本来也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但革命领导层的主要人物最终背叛了社会革命，镇压群众运动，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政权。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始于1921 年，直至1925 年年中。它从团结各派，积聚力量开始；两年后达到高潮，然后革命热情才开始消退。作为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一步，国民党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一党专政终于问世以替代旧的封建王朝制度。不平等条约体制也即将走到它的尽头。通过不断修约，中国收回了越来越多的主权。但这些可喜的现象不幸未果而终。国民党独裁政权并未能控制中国所有的省份。国民党赖以取得政权的那场国民革命，原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一旦推行到农村，便戛然而止。同样，中国也未能彻底恢复全部主权，如未能如愿以偿地取消治外法权。这场国民革命与1911 年革命一样，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可能影响至此也将用尽。无论通商口岸的西方实业家还是在内地活动的传教上，对中国问题都无可奈何。任何一个把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身上的西方列强都无法为中国提供一种政治改革的模式。它们同样也没有办法约束迅猛发展的民族主义洪流使之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动力。西方帮助中国打破了旧制度，但它是否能帮助后者建设一种新秩序呢？这成了1921 年到1922 年间重建战后外交关系的根本句题。

拖沓的修约

外强希望看到中国建设成一个和其他国家一样稳定的中央政府。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形成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终止的可能性。由于条约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签定的，其中一方（中国）接受另一方对它主权的限制。外国外交人士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分歧与其说在于中国是否应收回主权，不如说是以怎样的速度、通过怎样的过程来实现主权的回归。西方列强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的（华盛

顿会议于1921 年11 月12 口至1922 年2 月2 日召开）二这个解决方案共分四个部分，但它无论从合法性、条款的可执行度，还是强权政治中的条约约束力来看，都不具备强制实施的可能。首先，方案规定英日同盟自行终止，两国之间不再建立其他替代性联盟。原先的英日同盟约定，一旦日本和美国发生冲突，英国和英联邦应加入日本一方参战。其次，会议就列强海军主力舰的吨位限制达成了一致，英、美、日之间的比例为5 : 5 : 3；附加条件是英国或美国不得在新加坡以东和夏威夷以西建立海军基地。第三，日本同意从山东撤军，同时也撤出东北亚。1918 年年中西方列强干涉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列强军队特别是日军进古了俄国远东的滨海省、中国东三省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这就是说，日本为了答谢英美承认它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权，把它在亚洲大陆上除朝鲜以外的势力区缩小到上卯5 年时的规模。最后，九国条约正式宣布，与会国家一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并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关税问题和治外法权问题，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根据这些协议的规定，日本撤出了山东，英国也归还了威海卫。但关税会议一直拖到1925 年、1 926 年间才召开。即便到了那时，与会各方除了同意中国至1929 年可以实行关税自治外，没有就任何其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同样，1926 年在北京召开的治外法权会议也未产生任何结果。使中国在走向一个民族国家的路途上更加步履维艰的，是它缺少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军阀和土匪的肆虐威胁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中国当局在履行国际义务时的无能使之在外争国权时往往气短。中国的内乱阻碍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修改工作．。

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启发

苏俄对20 年代中国的影响仍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阶段。但和西方列强那种不太热心地逐步改革中国外交体系的做法相反，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国内革命样板。早在1912 年，列宁就已提出工业化欧洲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支持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领导下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1920 年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列宁在他题为《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亚洲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以作为反击，西方

无产阶级应当和亚洲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共同的敌人"金融帝国主义"，因为后者是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剥削者和亚洲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死党。列宁就这样用帝国主义理论归纳了世界形势。它在同一个体系中指出了中国政治中各种因素的历史意义。革命者军事上的对手可以被定性为代表垂死的旧秩序中封建反动派的"军阀"。城市商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也可以"跃过"。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动中国广大农民，一个"联合阵线"就可以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采用这一策略，在帮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击败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很好地组织起来从内部夺取权力。列宁预见了一系列的机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暂时合作甚至结盟组成统一阵线，也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农苏维埃建成独立的政权中心。

列宁的后任们继承了这一理论。托洛茨基鼓吹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而斯大林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阵线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所以斯大林在提出他的观点时不得不首先声明国民党只是一个政治联盟，它是由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这四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后来被称为民族资本家）。这些选择使苏俄对中国的建议具有一种内在的二重性：它既可以强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革命阶级的"联合阵线"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可以鼓吹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苏维埃以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地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在这两种策略之间还存在一种缔结政治联盟联合一些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中间立场；如共产党人可以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除去这一方针上的灵活性，苏俄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公开外交和革命颠覆两个层面上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苏俄外交部的政策以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为开端。经过在北京的九次艰苦谈判，苏俄政府实际上达到了帝俄政府在东北亚的目的。苏俄和北京政府于1924 年5 月签署的协议最终确认了中俄共同管理中国东清铁路的事实以及俄国在外蒙古的势力范围。同时，在苏俄颠覆计划的指导下，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组织机构，并帮助发动一场

由中共领导的劳工运动。共产国际也和北方主要军阀头目及南方的孙中山进行联系。这时，俄国局势的发展使列宁在1921 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紧缩开支，缩减各项活动，"暂时搁置"共产主义的输出。这一做法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未能看到苏俄更为极端的可怕形象。

国民党的重组和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共合作孙中山正在寻找一种政党组织形式，以便把国民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党派改组为能对觉悟不高的广大民众进行"训政"、建立民治政府的政党。苏俄的一党专政此时似乎已成了历史大潮的一部分，而1919 年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提供了不依靠阶级斗争的一党独裁的典范。五四运动启发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新的国民党章程、纲领和宣言于1923 年1 月1 日公布。国民党的重组工作在1924 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正式完成。作为重组工作的一部分，孙中山逐步发展起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关系。

孙中山是在各种形势的逼迫下走向了这一步。列强只顾与北京政府周旋，而未作出任何举措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他在1923 年9 月向列强提出允许广东政府使用广东地方海关税余额，遭到列强的严词拒绝；更有甚者，列强在广东海面聚集军舰，防止孙中山的军队武装占领海关。他多次向西方求助未果，国内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也令他沮丧。国民党在广东成立的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国会同北京军阀政府的国会一样脆弱，随时都会分崩离析。与某广东军阀合作破裂后孙中山被迫出走上海。他函需帮助。

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结盟意味着孙中山必须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共二大于1922 年年中召开，会议同意和国民党平等合作。但国共合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两党合作。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以便形成一个"党内"而非"党外"集团。孙中山允许李大钊在加人国民党时保留中共党籍。紧接着陈独秀也以同样的条件加人国民党，并被授予国民党要职。此外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陆续加入。

根据苏联的建议，孙中山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军队。他派遣其得力军事助手蒋介石赴苏学习建军方法。国民党开始列席共产国际的会议。1923 年年初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开始任用中共党员担当要职。他采纳了一位能干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让他负责规划新的国民党机构。很快孙中山就有了一个政治部，为他培养宣传干部以组织发动

群众。国民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推选代表组成高一级机构（县级和省级），再由后者推选出执行委员会。这样层层向上直到全国党代会，再由它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时却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控制一个列宁主义集权政党。在这次权宜合作的共产党方面，则于1923 年召开了中共三大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部集团"的联盟方式。会议同意由国民党来担任"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一度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一位国民党强硬派人士共事，负责协调两党组织关系。但是党员不足千人的中共为了不让国民党过多地控制其成员而反对进行过分密切的合作。他们计划双管齐下，一方面从内部对国民党进行渗透，同时在国民党外发展自己的群众组织。

孙中山以自信与务实的态度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他看到学生能够有效地组织工人农民，而只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共与拥有上万名成员的国民党相比是不足为虑的。据说列宁曾谈到孙中山有一种"无人能学的、孩子一般的天真"。但孙中山却认为他的党能成为俄国人的长期合作伙伴。他认为国民党是不会被中共这些毛孩子所愚弄的。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军

孙中山需要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以完善新的政党机器。从1918 年孙中山在野寓居上海时起，他就开始发展一套"心理重建"的理论。其中就有"知难行易"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认为革命至此仍缺乏一种思想理论的指导。孙中山内心并不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帝国主义的论断。他同意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间存在斗争的说法，但并不认为应该把这种斗争和每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实际上，当鲍罗廷提出国民党应当有一套更加正式的意识形态时，他拿出了经过修正的"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在1922 到1923 间的冬季所做的零星演讲中，人们可以发现，对于在1905 年被定义为反满、到1914 年被抛在一边的"民族主义"观点，孙中山强调其反帝的内容。它同时也包括汉人和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民权主义"经常被解释成"民主"，此时则区分了国民享有的自主权利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孙中山虔诚地希望"使政府成为机器，人民成为机械师，'；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选举、创制、复决和回收选票的过程二这一套办法当然从未在中国实行过。"民生主义"是最模糊的一条。孙中山特别否定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并重申他坚持早年信仰的限制资本和亨利o乔治用单一的土地税来实现"平均地权"的观点。三原则中，民族主义原则是各方均一致同意的共同核心。

和政党组织与意识形态同样重要的是一支受过训导由党指挥的军队。蒋介石在苏联学习四个月后回国担任了广州附近珠江下游黄埔军校的校长。一批苏联顾问担任他的助手。中共主要代表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不断向政治部渗透，但未能完全控制这个部门。很快，两个团的军校学生组成了国民党的党军，他们受到的训导将使他们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战。孙中山于1925 年3 月12 日逝世。他死后，国民党像对待开国帝王一样，尊他为"国父"。他的著作成为"孙文主义"的教材。为了继承他的事业，他的部下于7 月1 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军事化一党专政，选孙中山的主要接班人汪精卫为主席。这时，革命发展到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阶段。

三、国民党的兴起与执政

劳工组织

1925 年夏大，古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和人数较少的共产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武装起来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反对金融资本的劳工运动相结合，斗争形势不断高涨。这些运动都有各自的理论。"五四运动"之后六年，列强仍然享有累积起来的儿乎所有特权。日本关东军的租古地和由其经营的南满铁路古据了整个东三省。南满铁路和英国的开滦矿务局垄断了中国最大的煤矿。在天津，租界地区仍然由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控制。外国使团的卫兵依旧在北京大街上巡逻。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向地方纳税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通过上海市政厅进行治理。华南的贸易基本上由香港一家独揽。中国海关司、盐务局和邮政局系统的要职仍由外国人担任；这些机构的收人主要都用于偿付外债。外国经营的汽轮航线及各国军舰均可沿内河深入到湖南和四J 日等内陆省份。许多现代工业企业也都是外国人开办的。

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详细地描述这幅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画面。南北方和东三省的军阀们互相攻伐，争夺地盘，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外国势力勾结，使局势更加恶化。反帝情绪在一些大城市里最明显。新兴的工人阶级大量集中

于上海、广州、武汉和天津这些城市。在那里，工厂虐待劳工的恶行几乎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一样所在皆是。工人每天工作12 小时左右；一周工作7 天，只有很少的节假日可以休息；农村来的非熟练工领取计件工资，随时会被退货；童工和女工一样受到剥削，女工在工作时经常把婴儿放在用来缥丝的沸水盆下。工厂没有任何措施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工人经常和中方包工头、外国管理人员及督工头发生争执；工人的工资极低，家中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就是这种让人回想起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场景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了动力。

现代工人运动理所当然需要一种新的劳工组织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手工业行会里，店主仍然控制着手工艺人和学徒。那里时常强调的是行业的稳定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旧式的秘密会党已不再适合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颇有势力的青帮和洪帮始终不能超出走私鸦片、开妓院、从事非法活动和保护依附者的活动层次。在矿工和铁路工人中间已成立起一些组织，以维护工人权益，但早期最有效的工人组织是1914 年之后成立的中国国际海员工会。一阵罢工浪潮曾随"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兴起。此后共产党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方面取得的成绩逐渐超过了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和组织。中共于1922 年5 月在广州发起了首届中华全国劳工组织大会，并在湖南、湖北和华北铁路沿线酝酿罢工。

1925 年，通商口岸的外国势力和各省军阀政权在大多数深谙世故的中国人眼中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罪恶搭档。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把这对罪恶的双胞胎看成"民族主义"的敌人。中国实业家更是急切地反对它们，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来竞争就呈复兴势头。1925 年年初，上海的工会组织和罢工活动有所回升，中华总商会的商人们也抗议上海市政厅不给他们代表权，却制定法规向他们征税。当英国人为首的的警察于5 月30 日在南京路枪杀了13 名示威者后，全国各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罢工和抵制洋货活动，甚至发生了武装反帝活动。这次"五姗运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一场类似的冲突发生在6 月23 日。在面对广州领事馆区沙面岛的沙基海岸，示威群众和英法军警发生争执，游行队伍里的黄埔军校学生和英法军警互相枪击，有52 名中国人丧生。这次冲突导致了一场持续15 个

月的反对港英当局的大罢工和抵制洋货运动，英国在华南的贸易一时陷入瘫痪。这些事件与一些零星冲突为以后组织学生运动和动员各界参加全国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青年积极分子参与了这些事件并成为活动的中坚力量。到1925 年为止，包括共青团在内的中共党员总人数迅速增加到2 万人左右。它已经有力量夺取对城市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了。

北伐和国共分裂

全国各界对1925 年"五琳运动"的强烈反应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提出了革命最终目标的问题，这使在J '一州各方合作力量的团结受到了考验。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得到左右广东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纵容，国民党右派则处于守势。后者的主要兴趣是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联合各个阶层开展反帝斗争而非用阶级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它需要一种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为联合各界反帝反共的斗争服务。对中共和决定其路线的共产国际也很为难：不是冒倾覆的危险与国民党决裂，就是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寄希望于两派的分化。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不断发展独立的力量，同时也领导着农民运动。

事态的发展还是朝着维持国共合作的方向进行，而斯大林也倾向于继续保持国共合作。1926 年召开国民党二大时国民党左派仍然古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会决定继续两党联盟。大会维持了共产党员在秘书处和组织部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保留了七名共产党籍委员，古委员总数的20 ％。这一安排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已经击败了盘踞在广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但在省港大罢工时建立的武装组织已由共产党接管，并正发展成一个在当地拥有武装、听命于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的影响在国民党机构和群众组织中不断扩大，并且实际上控制了海军。蒋介石于3 月20 日借口自卫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逐步排斥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和一些苏联顾问，但同时又重申将忠于广东和莫斯科建立的联盟。这样到了1926 年春，蒋介石作为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主角在政坛上出现了，而中共则再次面临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或与之作斗争的选择。莫斯科依然赞同合作：斯大林需要蒋介石的合作，以便说服主张建立独立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

基，而蒋介石也同样需要和中共结盟以换取苏联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支持。

根据很早以前孙中山的计划，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消灭军阀割据势力以重新统一中国，但也有越过广东地方矛盾、扩大国民政府国库税源区的目的。1926 年7 月开始的北伐，在新建宣传机构的协助下进军神速，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边上的时候已经收编了大小34 支军阀部队。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了沿途人民的欢迎。这些部队中只有一支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共产党基层组织还没有在军队中广一泛建立起来。1926 年底，仍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共依然留在国民政府中，于是中共仍然保持"党内集团"的特殊地位而未及时发动热情高涨的农民或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

1927 年春，北伐军乘胜进军华中。国民革命进入了一个军事力量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此时，凭纯粹的政治手段左右局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军方关于反共的矛盾很快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蒋介石和军方加入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不久，国民党左派也背弃中共并最终与右派合流。这样，争取国家统一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民族主义运动把可能导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共产党成分清洗了出去。

蒋介石挥师东下占领上海附近粮产区的工业基地之后取得了这些进展。正当此时，北京当局冲击了苏联大使馆，发现一些苏联秘密策划颠覆活动的证据。李大钊等涉嫌此案的中共领导人后来被当局处决。紧接着，4 月12 日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协助下，怂恿当地反共分子摧毁了共产党的武装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机构。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城市。4 月18 日，蒋介石在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武汉政权分庭抗礼。事变发生后，留在武汉国民政府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仍然得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要他们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国民党左派在对共产国际失望之余也增加了对中共的戒心。7 月间，他们终于和原先的同志决裂，共产党被逐出了武汉政府。8 月1 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南昌起义，于是两党内战公开。共产国际指责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说他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执

行了相反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导致合作的失败。陈独秀作为斯大林判断错误的替罪羊于1929 年被开除党籍。毛泽东在他写于1927 年2 月的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提出和当时莫斯科指示相反的观点。这时他在湖南领导了一场被称为"秋收起义"的农民暴动。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中共在沙头和广州发动暴动也相继失败。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或被处决，或潜入城市开展地下工作，还有一些人被迫撤到农村。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学右派面前的障碍已经扫清。他们在上海的银行家和商人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左派展开和谈，把南京政权建成了全国的中央政府。军阀割据并未完全消灭，但中国与10 年前已大不相同，它总算有了声称要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维护国家尊严的中央政府。

革命和外国列强

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反应是承认革命政府要求的多项权利。1925 年"五份运动"之后，上海市政厅有了中国人的代表；市立公园逐渐向中国人开放；上海混合法庭被一所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地区法庭取代。1926 年列强准许广东政府征用海关税余额。他们曾在1923 年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同样要求。英国则撤销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

1925 年至1927 年间的战事使大多数新教传教士撤离内地。一支四万人的列强军队集结上海以保卫租界。1927 年3 月国民革命军攻古南京时，有六名外国人死于战乱。英、美军舰曾开炮攻击。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平息了事态。鉴于人们对当时中国人革命情绪和事态恶化极度恐慌，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并无多少中外纠纷发展成暴力冲突。和英国一样，美国国务院在此事件中保持了中立，甚至不愿就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外国侨民深信，中国之所以兴起排外情绪完全是受莫斯科的煽动。但西方几乎听任苏联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占领北京后，易名北平。1928 年底，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东北"少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东三省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政府在新一代欧美留学生的领导下，致力于巩固国家团结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一些西方大国的治外法权依然存在，但南京政府颁布

邮新的法令并与许多小国签约，把他们在中国的侨民置于中国的司法控制之下。1933 年中国恢复了关税自治，同时从海关司、盐务局和邮政局收回了相关的权力。外国租界的数口也从三十三处减少到十三处。

国民政府这一强劲的对外政策不断削减列强在华的特权，但1931 年后放慢了执行的步伐。因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一轮侵略使国民政府和西方列强意识到保留各国在华的法律地位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路线的南京政府面临日本的侵略时便把对外国特权的打击作低调处理。它发现自己和外国人有不少共同利益。这些外国人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和加拿大人，他们继续作为特权阶层参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办大学、医院，设立银行，兴办公司及进行对华投资。以现在的眼光看，共产国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战略恐怕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当时中国城市劳工几乎不可能发展到能像欧洲工人组织那样建立政治组织夺取政权。工会组织要得到发展、增强力量，也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港口城市中才有可能；但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民党上层权力和外国利益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夺取中心城市，也难以从内部夺取国民党的权力，因为共产国际已经为国民党建设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苏式政党结构，要颠覆它谈何容易。在20 年代，共产党也未利用农民的力量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当时的中国共卢党力量薄弱且经验不足，而莫斯科又在万里之外遥控指挥，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国民党和蒋介石从他们当时的胜利中得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结论，即维持国家政权根本上要靠大工业支持下的正规军队。这个结论日后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看不到组织起来的农民同样有能力帮助建立政权并为军队提供支持。有一代人均持此观点，他们的历史比共产党还长，与城市和地主阶级的联系比农民还要紧密，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规划中完全忽略了农村社会革命。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统治

从1928 年到1937 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为期10 年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可惜西方却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这10 年间，苏联开始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时期，而纳粹德国则开始兴

起。日本侵略中国未曾受到亚洲以外势力的制约。南京政府与西方进行了全面的接触，但未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日本侵略不断升级，而中国农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国民党政权同时向现代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国传统寻求答案，结果一无所得，受到挫败和失望的双重打击。在旧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新兴现代国家大多有过此类典型经历。旧的政体和传统看来已经破产，而西方模式又不适合国情，忧心国事的领导人向这两者寻求启示，但没有一个给予他们帮助。

国民党时期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是现代政府和经济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落后。即便到了这10 年的后期，四五亿中国人拥有的现代公路里程与只有2500 万人口的西班牙相当，拥有的铁路总长度不及意大利或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拥有的电报线总长度不到法国的1 / 3 ，创造的工业产值还不及人口800 万的比利时。

为求建国良策，30 年代的中国人纷纷转而师法西方，因为日本和苏联均证明不是友善的师长。这种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成了南京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同时也说明了这个政权根基的浮浅。南京政府制定的现代化规划几乎就是全盘西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们也有"学以致用"的想法，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反映的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管理体制、技术和生活方式，而农业的落后与农民的不满显然不是那些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结果，南京政府对现代金融、外贸、国际交往及交通和通迅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它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醉心于现代事物的官僚一到农村则往往感到不快。

国民党的弱点同样也来自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它先是不断把新占领区的投机官僚吸收进自己的机构，其后又把年轻的共产党对手一一荃除。国民党刚掌握政权就抛弃了创业时期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式组织形式，转而镇压学生运动，对地方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听之任之，丧失了早先的使命感。简言之，国民党已蜕化为一架官僚机器，变成了反革命的政权。

蒋介石

尽管君主制已在2O 年前废除，中国政局还是需要有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这样一种人不是总统制或是主张权力制衡的立宪制政体所能产生的。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这个独裁者必须是一位军事领导人，于是蒋介石

成了惟一的人选。蒋介石其人立志献身国家，意志顽强，政治手腕老练，有时也多少有些迂腐二他出身于浙江地主家庭，一生推崇曾国藩的为人，青年时期在日本士官学校曾受武士道的影响，后来在有军队才有地位的军阀政治时期积累了政治经验。在苏俄学习时期，蒋介石学到的更多的是治军方略而不是组织群众运动。他不相信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发动群众会有什么用处。不管怎么说，他也碰到了任何执政者都面临过的问题：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要应付所有潜在敌手，必须时时控制所属部队和战略资源，并且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蒋介石需要双管齐下，在身居高位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1927 年蒋介石和孙中山遗婿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宋美龄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从此他和蒋夫人一样成了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通过夫人、妻弟宋子文（哈佛大学毕业生）及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奥伯林学院毕业生）的关系与西方保持联系。他任用这些有美国背景的亲戚主持财政，安排有日本背景的老同事主持军事。在党派政治方面，算不得国民党元老的"外人"— 蒋介石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处理好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关系，并通过拉拢、分化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及其嫡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1927 年，蒋介石数次和两派中的一派合作以打击另一派。之后，他和胡汉民合作把汪精卫排挤出政坛。1931 年胡汉民和汪精卫结成联盟，而蒋介石却因日本的入侵而成为不可缺少的军事统帅。后他又与汪精卫合作了4 年。1936 年胡汉民死去，蒋介石在1938 年成了国民党领袖。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1935 年遇刺未死，政治上的失意和个人私怨使他于1939 年投靠了日本人。

"蒋委员长"很及时地驾驭住了党政军这套三驾马车，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动用服从他个人意志的官僚机器稳住了地方势力和竞争集团。他的军队主要由"黄埔系"军官指挥，这些人是他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的学生。他们控制了庞大的军事机器和秘密警察组织，压制广西军阀和其他地方武装势力。在党内，蒋介石的左右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通称为"CC 系"）为首的"组织系"建立了主要培训公务员的中央政治学院、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这个派别的各机构有它们独立的人事档案、经费来源和秘密警察组织。二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政治系"，这是一些与实业界有联系的政客和官员的松散组织，部

分源于梁启超的"研究系"。国民党从来没能对它的成员严加约束。它能控制的党员人数在200 万到《 旧万之间。在它的党建结构上，不断扩大的党员人数产生的影响被党内高层不断加强的集权倾向所抵消。1924 年召开国民党一大时有150 名代表；1945 年召开的六大囊括了各界知名人士，代表人数达到仪旧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 年成立时，有24 名正式委员，17 名候补委员，但到1945 年便发展到222 名正式委员和90 名候补委员。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只开两三次会，它的权力便集中到了常务委员会手中。最初常务委员会只有8 名委员，后来扩大到50 名，几乎每周一次例会。由于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党内要人竞相向最高领袖靠拢。由于训政时期（1928 - 1948 ）掌握政权的是国民党而非人民，通常领导政府的政治局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像组织部、情报部、社会事务和境外事务部等一些原本国民党属下的机构承担着中央政府某些部的职能〔 。党政就这样互相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中国党派政治的第一次试验就显示出许多封建王朝统治的痕迹：所有基层军事和文职官僚机器在最高政治层才统一起来，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由具有延续性的政党实体选出的最高统治者手中，而后者则于各个政治层面上在或公开或秘密的监督人员协助下开展工作。

军国主义的发展

很多证据都表明，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把注意力从国内改革上转移到加强军事防务方面，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当日本军国主义在持续14 年的侵华战争(1931 一1945 ）中最终失败时，中国政府或政府的残存力量要重建国家也只能依靠军国主义政策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国民党政府逼上了相同的军国主义道路，使它否定了在二三十年代所受的西方影响，也失去了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华民族各种问题的机会。在承认这种观点正确性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政客得以发迹的原因。自从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政府就开始在摒弃阶级斗争的同时投身到统一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去。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即共产党人所称的"黄色工会"）受到政府支持，与左派工会展开了竞争，但农会却普遍受到压制。由于未能在农村发动群众并取得支持，国民党政府只好独力与残余军阀作战。1929 年召开的统一善后会议未能就裁军达成协议。军阀割据消失得异常缓

慢，军事统一全国的目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国民党内有一派反蒋势力集结在广东，而云南、四川、山西、新疆等地的军阀只是表面承认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1934 年前在江西、1934 年后在陕西一直是一个地区性独立军事集团。日本军队则从1931 年起在满洲、1933 年起在热河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股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地方军事力量。中央政府的军队年复一年地在国内各地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力量打打停停。在这方面，南京政府的相对胜利就是蒋介石的胜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军事机器越来越不像以前国民党领导下的苏式党军。相反，它日益成为对其缔造者与军事指挥者惟命是从的小集团。

蒋介石在1927 年辞退了苏联军事代表团后，转而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接受德国援助并采用了和日本极为相似的德国军事组织结构。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军队及其指挥官自成体系，并不由国防部长管辖。国民党军队同样独立于文职政府之外，并且不受立法机关的干预。军事委员会在各军事部门之外也不断增设为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的机构。在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中，黄埔军校毕业生毋需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就能担任要职，并在不受预算限制的情况下挥霍国民政府的收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中央军很快就扩充到了30 万人。要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国家财政不胜负荷。上海和南京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到处构筑了防御工事。兵工厂制造出德式武器装备，德国专家得到重用，而他们还未见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合作的战术，但早晚会遇到"运动战"和蒋介石的"焦土战术"。

经济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10 年里，国民政府效法了集权制程度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主要是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但是，当国民政府试图将预算制度和审计程序推行到自行其是的军队中去时，这一计划在这个一向无法无天的部门中搁浅了。至于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实现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就更成了空话。此时美国自己正经历着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尚无通过政府间项目开展对外援助的打算。

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是财政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仍有30 多家外国银行在营业。它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还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

政客、军阀、商人和投机者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它们一度控制了上海白银贮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上的硬通货。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其资产高达5 亿美元。而政府所属、地方支持或私人经营的一百来家中资银行则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及向政府贷款。

为给革命战争筹款，国民党于1924 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1928 年后，它迁到上海，成为发行国民政府货币兼作国库的国家银行。不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参股并垄断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形成一个欧式中央政府银行集团。在所有中资银行中，四家银行拥有2 / 5 的资金储备和一半以上的存款。

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直到1933 年。在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包括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人、取消厘金和废除沿用已久的银两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1934 年后美国实施了吸纳境外白银的政策。白银的继续大量外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中国从1935 年起推行了一项货币改革，即在国家控制下发行纸币以代替白银，同时动用一部分外汇来支持纸币。这一政策旨在稳定国际市场上中国货币的价格，并进一步建立起不受外国势力干扰的银行体系。尽管国民政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不无成就，但由政府通过信贷合作机构或农业信贷署（成立于1937 年）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以发展经济，却毫无可能。此时的农村银行信贷只能用来满足季节性短期贷款的需求，尚不适合为长期生产性投资提供信贷。它在农村的力量只能和旧式的高利贷行业竞争。当时制定的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蓝图中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这些项目包括了从开发荒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到控制虫害、改良种子、改进工具和农作物以及牲畜的品种改良。同时引进的还有美国式的大型农场。但在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乡村一级，政府并没有做出持续有效的努力来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效率。

社会财政状况在现代通商口岸的经济部门里显示了同样的集中趋势。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南京政府放弃了在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而让予各省政府。这样，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广大内地

的控制。放弃历代王朝主要收入来源靠土地税的做法表明南京政府力图避免触动农村的既成格局。与此相反，国民政府有50％左右的收人来自海关税，而这个比例在美国仅为1％。此外，它对烟草、煤油、面粉等公众日常消费必需品课以重税；政府还从盐务垄断上获取了巨额利润。由于不征个人所得税，普通消费者和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公众的购买力在消费循环里不断被削弱。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来弥补年度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25％。而四大银行则在国内市场上发行债券，债券总额很快超过了所欠外国债权人的债务总额。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乃用来应付这些债务。这些债券的国内持有人有不少是南京政府的官僚，他们往往获得极高的利息收入（如果把他们在购买债券时享受的折扣计算在内，利息率常常高达20％一4O％）。由于这些不义之财进的是中国人的腰包，比起上如1年后支付给列强的赔款可能要干净得多。但南京政府的政策既不鼓励国内生产，也不支持外国贷款的参与，几乎没有积累起能支持工业长期发展的资金，也并未提供多少投资。国家的资金潜力并没有得到开发，而现有的资源则主要被用来支持军事工业或流人了"官僚资本家"的私囊。

文化生活和美国的影响

生活在"攘外"和"安内"的阴影之下，30年代那批以"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两大主要集团：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一些学者型人物，他们主张发展科学技术，要求政治不干预学术；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一批有积极思想的作家，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宣传革命的文学。

在文学界，鲁迅是一位老资格的人物。他提携后进，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对左翼文学的迫害，同时也尖锐批评左翼作家的粗制滥造和虚张声势。他认为，"好的文学从来就不是遵命文学"。作为批判社会不公现象的勇将，他在精神上接受了共产主义事业，尽管最终一生未能成为共产党人。1930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发起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一影响广泛的组织得到各方资助，创办了许多讥评时事的刊物，多以言辞激烈著称。"左联"标志着在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旗帜指导下的文艺界中共产党影响力的上升。"左联"日益深人地在青年学生中间传播它的世界观，而国民党当局既无力与之竞争以争取

学生，也无法限制它的影响。30 年代非革命派知识分子受美国改良主义的影响最大。这些知识分子往往留学归国后在学术和科研机构工作。全国十几所教会大学一半以上的办学收人来自中国国内。学校由当地中方董事管理，2 / 3 的教师是中国人，尽管大多数在国外留过学。与拥有41 (X 均名学生的一百来所国立大学相比，只有6500 名左右学生的教会学校似乎算不上什么，但它们在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面却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大型国立大学同样也有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队伍。他们大多是留美学生。美国的影响同样可见于中国地质学会、中央政府下属中国科学院的十几个研究所、设在南京的国家农业研究院、洛克菲勒公司支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其他一些受益于它的国家卫生机构。这些棚勾的建立和发展是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结果。从1901 年到1920 年间约有24 （刃人进入关国大学读书；1920 年到1940 年间有5500 人在370 所美国学校里学习，主攻工程学或经济管理等实用学科。这些人回国后或是在上海的公司中做事，或是到南京的政府部门及上述学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工作。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享有的物质水平和知识层次远远高于普通中国农民的贫穷和愚昧。二三十年代，受西学浸染较深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在许多领域开始取得创造性成就，如发现北京猿人、发掘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前代的碑刻、整理和出版清代文献以及引人西方科学术语和概念等等。

传教团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时，尽管仍以宗教思想为主要工具，但也采用了其他方法。19 仪）年时，在华美国传教士约有1 ］ 为人，分别代表28 个教会组织，到了1930 年，已增加到3 (Xx ）多人，代表着6O 个组织。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组织作了很多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让中国人独立领导自己的教区，外国传教团体只提供指导和帮助。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不拘泥于教义，注重服务社会，吸引了一批中国青年担任领导。这些青年在工厂工人中开办文化补习班，帮助工人开展社会工作。基督教组织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很多活动，如1920 乍到1921 年华北发生饥荒期间它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到1936 年它募集了5 以X ）万美元的外国捐款用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C 这个组织在灾区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在灾区打井、开路、建设堤坝，还在华北建立了拥有20 万成员的农业信用合作社。鉴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重视社会福利，1922 年召开的包括各教派在内的新

教会议组成了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其宗旨一方面施行社会福利、传播教义，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的建设。理事会在它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外开始制订农村建设计划，鼓励农业研究和农业生产活动。这样，到1930 年基督教传教团已经开始触及"农村重建"的问题。

这项运动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詹姆士o晏从192 石年起在北京附近开展工作，后来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的大众教育运动以利用外国援助为中国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率先应用农业科技，推广基础教育。不久，这一运动就遇到了农业信贷、开发市场、创立合作社和成立农会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农会这种形式在受过教育的成员领导下，可以反映农民疾苦，最终提出有关土地租赁期限和地方政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的渐进改革方式与地方势力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地方势力是以前士绅阶层的遗绪，经常在地方军阀或黑社会的武力支持下独霸一方。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重建"计划会威胁到现状的稳定。

政府本能地控制和利用了这种形势。蒋介石通过和教会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的夫人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在刚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江西选择一个地区设立模范县，但当地的赤贫使无论宗教还是社区工作都未见任何成效。蒋介石发起了自创的"新生活运动"，推崇"礼、义、廉、耻"这四种古人的行为准则，同时采用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方法。1934 年到1937 年间，政府通过拥有1300 个支部的组织网络向公众提倡"新生活运动"。但是在"新生活运动"的幕后，蒋介石效仿欧洲法西斯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蓝衣社"以协助他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统治。

当时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快步走向崩溃，这一点为时人所忽略，亦乏统计数字说明。中国巨大的农业人口散布在上百万个小村庄里，国民政府或传教团体的势力都鞭长莫及。农村手工业制品受到工业制成品的全面打击。被无情拖进货币经济泥淖的农业，本身却没有变成资本。农民极端贫困，缺乏资金贮存收获物、改良种子和改进工具，只有借高利贷一条出路。农村的贫穷和混乱日甚一日，而非共产党组织推行的西方式重建计划却始终零星而无效。最终农村重建的希望在外敌入侵和持续的战乱中破灭。

五、日本侵华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中国的反应

中国的东北三省面积古全国上/ 4 ，而人口只古全国上/ ro 。l9（幻年东三省的人口为1100 万，到1930 年猛增至3 中闺万，这部分是因为华北移民的大量涌人。驻东三省的日本军事当局有强烈的扩张欲望，而国民政府兴起后把东三省视为"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中国合法领土之一部分"，这与日本关东军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发生了正面冲突。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军官策动"沈阳事变"，企图占领整个东三省。上海各界群情激愤，起来抵制日货并在租界外举行了大规模抗议；19 犯年1 月28 日到3 月3 日，抵制和游行发展成与日军的正面冲突。7 万日军在遭到中国军队异常顽强的抗击后，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与此同时，日本在东三省发动的一场成功政变粉碎了国联构建的集体安全体系。国联和美国对日本通过暴力取得的利益不予承认，但这并不能遏止日军的侵略气焰。

鉴于以往异族用中国人征服中国的惯例，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并通过指派日本参谋控制了这个政权。1932 年3 月1 日，"满洲国"成立；不久，前清废帝溥仪被立为"满洲国"皇帝。日本当局拉拢一批当地中国人组成"自治委员会"，宣布"满洲国"独立。炮制出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这样外国势力只要不承认新政府，他们无法染指该地区。"满洲国"的军备建设需要工业化的支持，政府对开办公司给予扶持，鼓励个人把私人资本转化为投资。在一家中央银行的管理下，币制得到统一。通讯、交通运输和水电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修建到东三省和苏联接嚷的边境，而原与日本南满铁路竞争的中资经营的平行铁路线则被合并。这样日本人在东三省建立了一个与日本本土竞争并要求大量资金投入的工业基地。虽然日本在其中并未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新的战略基地既满足了军方的帝国主义虚荣心，也为日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日本军队猖狂进犯华北。他们在长城以南的北平和天津一带制造了一个非军事区。在那里，又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怂恿不法分子向华北走私货物和毒品。1935 年中日签定一项协议，华北成为中立区。紧接着，一批日本军官企图策动分离主义活动，将已经中立的华北五省建成又一个傀儡政权—''华北国"。这项阴谋在12 月北平学生

的示威抗议下宣告破产，但学生运动的高涨也使南京政府左右为难：究竟何时何地组织抵抗?

"沈阳事变"后，中国以抵制日货形式开展的非军事抗日运动一度相当有效，抵制活动遍布全国及全海外华人地区，人们拒买日货甚至不与日本银行与商务机构打交道。抵制活动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协助，学生、商人均踊跃参加。活动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采取了地下形式，必要时亦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并通过公众集会、宣传、监督、罚款及严惩汉奸商人的方式推广各项活动和宗旨。日本对华出口额减少了50%。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全国各界强烈抗议，但南京政府低估了非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抗日游击队）的抗日能力。国民政府的武器专家们深知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不可能阻止日军的坦克和飞机的。这当然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但它忽视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的情况：当群众性抵抗力量被动员起来支持常规军事力量或与军事力量合作时往往产生极大的影响。蒋介石有标准军人的战略眼光，他先集中力量建设他的德式陆军而不急于投人战斗。1931 年后的六年间，他凭其手腕与毅力和日本人斡旋、谈判、逐步撤军，动用一切手段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除了训练新军，蒋介石在动员群众、发动全国抗战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由于他反对共产党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斗争的阶级战争方式，蒋介石让新军遵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在1931 年到1934 年间连续五次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了"围剿"。南京政府不抗日反打中国人的政策激怒了非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一时间，南京政府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巨大压力。

1934 年和1935 年间，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到1936 年，共产党在西j 乞又拥有了一块根据地。1935 年8 月，中共和共产国际共同提出为抗日救国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策略目的是转移日本对苏联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1936 年罗马一柏林轴心国协议和德一意一日反共产国际协议的签定进一步增大了侵略战争的危险。12 月，蒋介石在西安被不愿与中共作战而要求抗日的东北军逮捕。这时，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出面调解，终于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7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以北平"七七事变"为始，紧接着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中国正式卷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比欧洲战争还要漫长。在1941 年12 月8 日前的四年里，自由中国孤军奋战，而美国迟至1941 年年中还在向日本出售重要军需物资如燃油和钢铁。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直到那时仍一如既往地顽强抗战，同时也仍然未能摆脱南京时期的政策局限。国民政府本以对外贸易为立国根本，但战事的发展迫使它迁往内地，日渐与外界隔绝。这时它才开始领教内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正确地估计到，日本的疯狂侵略早晚会使其他国家卷人战争，中国会得到它们的援助，战争会成为双方耐力的竞赛。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有力地遏制了日军的前进，但它本身也遭到重创。1937 年底，中国军队受到日军侧翼包抄后被迫放弃阵地西撤，"用空间换取时间"，采用"焦土战术"把许多不能迁往内地的工业设备彻底毁坏。1938 年国民政府在汉口稍事喘息后，继续沿长江西迁，把四川雾瘴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整座整座的工厂、武器库和一些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机构随政府迁渝。他们远离了敌人的坦克，但是无法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

日古区很快被两家傀儡政权瓜分。它们各自发行了货币。进攻华北的日军得利于密布的铁路网，迅速占领了城市，不久也击败了大多数抵抗力量。但在铁路网内人口众多的平原地区，日军势力难以进入，抗日游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华北方面军抢在华中友军之前在北平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成立了临时政府并起用军阀时代亲日派遗老做政府首脑。他们提倡封建礼教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利用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宣传反对西方和反共的思想。在华中，「1 本于1938 年3 月在南京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同年10 月，日军攻陷汉口和广州后宣布他要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欲以对华宗主权取代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使一度留日、此时政坛失意的汪精卫背弃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单独与日木礴和，投靠了日本人。1940 年3 月30 日，经过反复的谈判，汪精卫就任重组后的国民政府首脑。该政权设在南京，打着国民党正统派的旗号，由一批和汪精卫一起变节的反蒋国民党人士组成了一个借尸还魂的所谓"国民政府"。北京和南京这两个傀儡政府和满洲国一样须靠日军刺刀维持统治，他们的伪装面目根本骗不了任何人。但是，一如稍后欧洲的情况，侵略者的军事优势使城市起义无异于白杀，杜绝通敌行为事实仁也往往难以做到。一些人和敌人合作有

时也能缓和一下侵略者的残酷行为，不能说客观上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日本在30 年代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招集到一批汉奸来统治中国的广大地区，也说明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群众性抗口的能力。

由于日军势力在大西南鞭长莫及，国民政府在相对落后的内地幸存下来。这使它卷人了与共产党的竞争。从1937 年年中开始，国共合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两党竞争表面化。国民党很快就发现，共产党在战时社会剧变中会得到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国民党开始在其控制区内压制这种势头，派去封锁西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军队后达20 余万人。两党统一战线只是一面贴上"统一"标签的墙纸，墙背后掩盖不住的事实是两个拥有武装的集权政党互相争夺最高权力。

在避免农村社会变革的同时，国民党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其政治权力。1938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参议会以敷衍公众对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其成员基本上是各界的头面人物，但这个机构只有建议权，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给它答复。1939 年到1947 年间，蒋介石领导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建成了一套和国民党平行的金字塔式组织。但随着团员年龄的老化，它逐渐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而这个团体又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最终只能被国民党回收。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把全国各类法官、军官、教授和政府官员集中起来向他们灌输党义。经过两到三周的讲座、柔软体操等活动之后，这些人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国民党党纲，并由最高领导人接见，聆听训话。地方政府于1939 年实行"新县制"。以振兴县级经济和福利，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只是恢复了古老的保甲监视制度，这对于维持地方秩序多少有些用处。政府宣传说保长由村级选举确定，因此有"自治"性质，但实际上并无记录证明当时内地农村举行过选举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都和重庆政府的抗战作风一样暴露了指导思想的贫乏。最典型者，国民党领导人此时仍热衷于争夺权力。军事委员会日渐行使文职政府的职能，控制的军队人数一度达到5 朋万。而如此庞大的政府和军队却围绕着蒋介石于1943 年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 一书阐述的贫乏思想运转。该书首要观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外国侵略使中国蒙受耻辱、不平等条约罪恶滔天。由于西方国家侵害中国，中国才在现代化道路上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蒋介石在书中提出的第

二个观点是，恢复古代儒家道德伦理，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国家。同时他还要求大规模发展工业、建设国防，并把农民组织起来，闲时务农，战时当兵。

政府公务员同样生计艰难。这些"下江人"一旦随机关迁到住房拥挤、物资奇缺的战时四川，马上就遇到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飞扬的物价摧毁了政府工薪的购买力，公务员的生计等于在慢性自杀。尽管国民政府控制着出产大量粮食、食物能够自给的农业地区，但它未能用征收地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人。相反，它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政策基本没有触动关系民生的农村经济，但却把为政府工作的城市工薪阶层日益推进了通货膨胀的绞肉机，而他们是当时中国惟一的现代化因素。白领人士的情形也不见好。原先用于买书、购衣和添置家具的积蓄都花在了食品上，而营养不良则导致了皮肤病、胃病和肺炎。贫困使许多人不得不靠贪污活命偷生。少数发了国难财的人则宁可囤积居奇或换成黄金，也不愿将逃税得来的利润用做投资。当时的中国各个阶层整日为生计忙碌，日渐消沉，最终只是抱怨政府。而在这时的大学里，国民党力图控制高教系统使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使得学界即便潜心学术的一部分人也开始对国民党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美国的对华援助

在最初几年里，国民政府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远远多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它的支持。苏联甚至派了一支志愿空军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但1939 年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苏联的援助逐渐消失了。从一开始，中国抗战就获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但得到的帮助却很少。除了从海防到昆明的印支铁路和穿越高山峡谷连接缅甸铁路东端和昆明的中缅公路之外，中国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了。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为重庆政府送上一位积极的盟友。美国政府通过军事援助首次在中国国内事物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美国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参与中国社会生活，而中美战时联盟把这种参与热情推到了极点。1943 年1 月中国修改了和英美签定的一系列条约，宣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正式终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时双方的合作努力在中国造成了美国势力前所未有的膨胀。在空军和军事基地、培训学校、军需和运输系统及其他建有无线电网络和航空线的战

时机构中，人们到处可以见到美国势力的影子。其中最著名一例即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阻击日机轰炸中国城市的辉煌战绩。

但是美国的援助遭到了一系列挫折。首先，1942 年初，日军突袭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供应线。惟一可替代的是空运，从印度飞跃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将物资运抵昆明。但空运代价太大且运输能力有限。其次，盟军先击败德国再打击日本的战略部署，使中国战场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租界法案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到1946 年初累积达巧亿美元，只古美国向世界各国提供500 亿美元援助总额的3 ％。援助中国本非易事，而中国又不具备最重要的战略意义，结果不言自明。任蒋介石"总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顽强地展开了重新占领缅北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艰苦战役，他深信以此可建立进攻日本人的大本营。在1945 年初，史迪威将军筑成一条新的滇缅公路，铺好一条输油管道后，终于达到了目的，但美国海军早已在太平洋战争中把战场开到了日本本土。

战争的进展超过了外交形势的发展。最初，美国援华政策有一个目的，即击败日本后把中国扶持成能够稳定东亚局势的"大国"，同时帮助国民党发展军事力量。如果盟军借道中国对日本发起反攻，那么战后中国的形势可能导致国共两党竞争，而不是一边倒地对共产党有利。但是，盟军的进攻绕过了中国，结果使中国战场成了一个只需附带解决的问题。这加剧了任何联盟都无法避免的摩擦：美国人和英国人、史迪威和陈纳德、蒋介石和他的盟友、最后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开始互相责难和讥讽。美国在战争中急于击溃日军的态度显示了一种因本土从未受过入侵、国家长期承平而只把海外战争当作一个插曲的民族心态。而在中国这边，1937 年以前抗击日寇的战争已将国力消耗殆尽。中国政坛已为两大主题古据：国民党要以武力统一中国，而共产党则想夺取政权并推动社会革命。急于打赢日本的美国人向中国施加压力，希望国共两党加强战时合作。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史迪威将军于19 科年11 月被召回美国。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后，美国迅速撤回了它的庞大军队，但它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却使国民党将领们过分自信，认为凭借这些装备，共产党将不堪一击。他们的政府刚从二战的废墟中走出，国民经济满目疮痍，政局动荡，而他们的军队

却拥有了优势武器装备，这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把国民政府拖进了导致它覆灭的内战。在早期一度兴盛之后，国民党何以如此迅速地走向败亡？美国人一直比较关心这个问题。这里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自从1923 年国民党重组为独裁政党后，国共之间冲突不断。发动农民参加战争以影响政治并最终促成革命性转变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但国民党未能抓住这些机会而加以利用。其次，1931 年以后日本的侵略一直是中华民族生活中时刻存在的事实，其紧迫性甚至超过革命。为抵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许多建设事业上撤出精力以全力扩军备战。第三，1941 年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支持尽管达到了百年以来的最高峰，但援助还是迟了一步。如果早在30 年代，美国就像1941 年之后援助其他国家政府那样对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中国历史可能会被改写。美援姗姗来迟，而此时，国民政府已衰朽不堪，援助至多为它提供一根拐杖而不能治愈它的瘤疾。

最后，八年抗战期间南京政府的衰败既是大势所趋，也是缺乏有效领导的结果。南京政权的根据地在沿海城市，政府的内迁对它是致命伤。共产党避开抗日主战场，利用战争局面发展壮大了自己。国民党军队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主力，古日本派往海外兵员的一半。中国军队伤亡300 余万，其中国民党军队古了大部分。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着眼点不同，中国历来认为个人的功过得失影响到国家兴衰存亡。蒋介石既然是最高领袖，一旦国家主权在他手里丧失，他自然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然而只要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蒋介石实际上很少有能够左右全国局势的时候。他个人的顽固不知变通正表明了整个政治传统的僵化。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儒教国家。另一方面，正如西方的援助不能拯救中国的衰亡一样，西方政治模式对于战时的中华民国几乎毫无用处。一个新生事物从大战中的中国崛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

中华民国在台湾

1949 年后，尽管台湾被公认为中国的一个省，实际上它是一个自行其是的政权。作为被共产党从大陆赶跑的国民政府的延续，它值得我们在此提上一笔。1949 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及其余部开始改革国民党，努力把台湾建成一个新的政权基地。

台湾岛长250 英里（如2 公里），宽印至so 英里(97 到129 公里），距中国大陆不足160 公里。全岛2 / 3 是山地。16 世纪葡萄牙商人来到这里时把它称做福摩萨岛，就是美丽岛屿的意思。台湾属亚热带气候，雨量丰沛，被当地人誉为"终年如夏，四季常青"。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台湾的主要居民是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血统的上著。1895 年时土著人口还有12 万。16 世纪晚期，中国商人、盗匪和农民等开始移居台湾。清朝于1683 年收复台湾，把它建为福建省治下的一个府。1885 年台湾建省。这时，台湾的300 万居民实际上都是来自福建、广东两省的移民及其后裔。台湾社会由居住在城市中的地主乡绅所控制。大多数土地由佃农耕种，其比例远远高于大陆。台湾向大陆提供食糖、茶叶和樟脑，再从大陆输人纺织品和鸦片。

台湾建省后第一任总督刘铭传是一位积极的近代改革家。他将省会建在台北，兴建铁路，建设军事防务。但在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后，日军很快在台湾建立了统治。

日本占领期的台湾

世纪之交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它努力把国内实行的改革推行到台湾。19 ( ) 5 年后这些改革同样推行到了朝鲜。日本希望开发这些新殖民地的资源来为建设日本服务，同时也准备把它们最终纳入日本。一如明治时期的日本本土，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也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通常由军人领导。一种现代警察制度则担任执法、维持治安、监督风化和主持公共卫生事业的职能。政府负责发展和协调交通通讯事业、普及基础教育、发展农业、金融业等适合殖民地环境的产业。

台湾之所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殖民地，在于它的居民还没有明确的民族归属感。作为一个边疆省份，它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而即便是中心地区，维新运动所表达的早期民族主义意识也迟至1898 年才姗姗到来。日本接管的是一个民族意识确立前的政治实体，它习惯于接受一种来自远方、操着一种陌生语言的官僚的统治。台湾使用的闽南方言是和官话相去最远的一种方言。新统治者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多地决定于他们的政绩而非他们的国籍。

建设这个新殖民地对于日本是一种挑战。老牌的欧洲殖民强国对一个新兴亚洲国家加人它们的行列并不十分欢迎。日本人很看重外界

的评价，一心想建设一个理想的殖民地。1898 年，儿玉源太郎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为民政长官，台湾的开发正式起步。后藤新平为一位医学博士，为官干练。两位领导人接到手的是一副乱摊子：旧的集权政体已经破坏殆尽，传统的农业经济混乱不堪。他们镇压土匪以恢复秩序，采取措施控制并禁止吸食鸦片，几年内就控制了疫病的流行，全面清查了土地、人口和关税，此外还敦促大众科学利用资源。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后藤新平恢复保甲制度并推行到农村家庭里，使它和现代警察制度融为一体。当局越来越多地在台湾人中招募警力，这些人在日本官员那里受到特殊的训导。待遇优厚、训练有素的警察协助当局开展许多行政工作，如登记户口、征收租税、开展卫生和水利事业乃至参加植树造林。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台湾的人口因素，土著地区的情况忽略不计，那么台湾的警力配备甚至少于日本本土。殖民政府大力推广卫生事业，使1 久巧年台湾的死亡率降到了33 ％。，到1940 年又降到19 甄。

其次，殖民政府重新规划了土地制度。此前中国人的土地税一直未有变化，许多新开垦的土地根本未征地租。而且，在日本人来到之前，台湾的大土地所有者租地给小地主，后者再予转租，这样，同一块地就有好儿个人租古。日本人丈量了土地、绘制新地图、登记造册，到了19 （抖年又用公共债券收买了不事耕种的地主们的土地。这一政策培养了一个自耕农群体，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并支付地租。政府地租收入一时间增至原先的三倍。

接管台湾之时，日本国内正在普及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日本发展缓慢，因为日本没有那么多的职位来吸引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1898 年时，只有很少一部分台湾学龄儿童进中国学堂读书。日本人引进了专为台湾儿童开办的"普通学校"和为日本移民子女开办的全日制日语学校。普通学校教授近代科学、儒家伦理思想和日语。到了1929 年，31 ％的学龄儿童得以人学；到1944 年，则达到71 ％。日本人的日程表把在台湾普及初等教育的时间定为1946 年。（荷兰人从印度尼西亚撤走时，只有10 ％的当地人识字；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归化委员会"的工作也收到了类似的效果。）不过日本人并不热衷于发展高等教育，因为台湾人一旦觉醒可能会反对日本的统治。所以直到1915 年才出现第一所台湾人办的中学，而此前只有一些

师范学校和职业中学。1919 年，殖民当局对教育普遍放宽限制，岛上的日语学校和台湾学校并入同一系统。但通过日语考试进入日语学校读书的台湾人仍为少数，1928 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大多数学生还是日本人。比较富裕的台湾人送子女去日本读大学，那里反而没有台湾那么多针对学生民族成分的名额限制。1922 年至少24 （刃名台湾人在日本读书，到了1942 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

后藤新平意欲把台湾建成经济自给的殖民地以使日本有利可图。他的愿望在1905 年实现了。物质建设的迅猛发展归功于政府的领导和投资。1903 年，台湾南北贯通铁路，每个村庄也都通了公路，总长约有仪众）英里（9 以刃多公里）。农业生产上大力发展了水稻、茶叶和甘蔗的种植。政府引进了高产种子、化肥和新的农业技术。农业试验站引进夏威夷甘蔗，鼓励农民把产品卖给日资榨糖厂。这些日资企业在土地改良、灌溉和运输上作了很大投资。政府用优惠政策吸引劳动力，宣布只要耕种者在开垦新地时留出一部分面积种植甘蔗即可免交地租。政府也科学地制定了各种标准和销售手段。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支持和政策保护，台湾食糖产品免税进入了日本市场。到1914 年为止，台湾蔗糖产量增长了四倍，满足了日本市场的大部分需求。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骄人业绩。战后日本经济的兴盛使它增加了对台湾的投资。1936 年，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台湾发展公司，其投资涉及纺织、陶瓷、机床和化工产品等方方面面。这些几乎都是日资产业，台湾籍实业家很少。但是这一代台湾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获得的技能培训在日后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反殖民主义情绪发展缓慢。日本在台湾建立统治并不需要镇压当地望族或否定整个传统文明。它也没有打破当地原有的农村社会形态。相反，殖民政府成立了农会以促进农业的发展（50 年代农村重建的基础就是此时打下的）。台湾农民能住上砖房、用电并学会使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在亚洲农民中显然具有相对优越的地位。经济上的大发展加上警察署的控制，抑制了反日倾向的发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人建立了政治组织要求得到与日本人平等的地位。这些组织宣扬个人自由和政治改革一类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在日本大学里就读的台湾学生迅速作出了响应。20 年代时台湾人多次向当局请愿，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他们成立了一些文化团体和青年组织，共

产党组织也开展了活动，但均告失败。日本对此做出了有限的让步二当局在1919 年到1936 年间实行"平民政治"，但1937 年中日开战后日本政府即在台湾加强了警力镇压，推行强制同化政策。1945 年日本人撤离台湾前并无多少反日事件发生：

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台湾重新成了中国的一个省。欢庆摆脱殖民统治、赢得自由的台湾人民迎来了祖国大陆的官员。但是，国民党官员们认为台湾人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已非纯粹的中国人，因此对待台湾就像对待占领地一样。他们像蝗虫一样来到台湾，丝毫不改在上海时的腐败和贪婪，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台湾人民忍无可忍，于1947 年2 、3 月间奋起反抗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当局杀害了示威群众数千人；5 月，当局从大陆调来更多军警，又有几千人被杀，其中包括地方政府中的台湾籍要人。1949 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大约200 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蒋介石长子蒋经国任台湾省主席后亦无情镇压一切反对派。白色恐怖中，又有数千人被杀，台湾人的不满被压制了下去。韩国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强劲反对党儿十年后才一出现于台湾。所以国民党在台湾的早期统治是比日本殖民时代更为残酷的独裁政治。台湾人对来自大陆压迫者的反感持续了几十年。

1949 年至今的台湾政权建立在一种官方神话的基础之上。国民党当局声称建立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将来总有一天它会反攻收复大陆，或者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一旦倒台，它将恢复行使全中国合法政府的职能。自称是"中华民国"使台北政府有了一个由少数大陆人统治古人口大多数的台湾人的正当理由，但台湾的顽固立场也使它失去了在五六十年代宣布台湾独立的机会，因为那时其他国家有可能承认独立的台湾。蒋介石及其同僚认为全体中国人民只能有一个政府。随着时间流逝，光复大陆的计划渐渐成了老人们一个模糊的梦。但如果有人敢于指出这一点或宣传台湾独立，他就会被送进监狱。

与官方声明一致的台湾政治结构也相应分为两级。一面是国家级的国民党组织和代表全体中国人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是省一级的国民党组织和代表台湾岛内人民的台湾省政府。时间一久，省级政权

变得日益开放：台湾人可以进入官僚机构或参加国民党，然后通过选举可以进入省会台中的省级国民大会。甚至非国民党候选人也曾赢得席位被选为市长，但国家大权还是保留在国家级政权那里。譬如，"国民大会"是由1948 年在南京国民大会上选出的立法委员组成，因为在光复大陆前不得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新的立法委员。原先的立法委员年老死去后由他们提名的人选接替。实际上，"国民大会"只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橡皮图章。国民党专政得到了警察、情报、军队和国民党保安部队的保障。团年代晚期，台湾社会开始发生变化。九年制义务教育于1 % 8 年开始实施。台湾孩子和大陆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台湾学生也学说"国语"。大陆移民和台湾本地人的通婚亦日渐普遍。80 年代初期有2 乃的初中学生升人高中，而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继续上大学。在每个阶段能否升学取决于考试成绩。举例来说，能否进大学完全取决于全国大学人学考试的成绩，得分最高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结果，台湾成为与日本类似的"考试社会"，学校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学，孩子的母亲个个都是家庭教育家。70 年代后期，随着教育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民众的日渐富裕，中产阶层中形成一种开放的风气，进一步打破了台湾人和大陆移民之间的界限。

台湾政权经历的长期稳定与社会变化一起促成了政治上的解冻。一些政治犯获释。到1973 年，80 ％的国民党党员是台湾籍人士，但大陆籍党员仍古据了要位。1969 年，早先的禁令被取消，首次通过选举补充"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的缺额，几位台湾籍人士进入了"国民大会"。更多台湾人通过1980 年和1984 年的选举担任了"国家级"和省级公职。在1986 年的大选中，尽管国民党以外的党派仍属非法组织，但它们获许提出各自的候选人并有人人选。1987 年，实行了4O 年的军事管制被取消，反对党取得合法地位，但前提是它们必须承诺反共并且支持国民党收复大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改革大多是蒋经国做出的。他历任各项要职，1972 年当上"总理", 1978 年成为"总统", 1984 年大选获胜后又连任六年。他以一位独裁领导人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但也意识到，在国际大家庭中受到孤立的台湾必须得到岛内各界人士的支持。1988 年他逝世后大多数台湾人都为他志哀。

蒋经国死后，李登辉继任主政。李登辉生于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曾在一所日本人办的高中就读。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读过书，战后

取得了康奈尔大学农业规划专业的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1972 年他担任某部部长，成为蒋经国的亲信。1978 年成为台北市长，1981 年任台湾省长，1984 年蒋经国连任后他成为"副总统"。李登辉上台后承诺继续执行蒋经国的政策，包括收复大陆、统一全国的"大业"。李登辉是一位基督徒。他曾经说过，退休后希望做一名传教士。1945 年后另一种塑造台湾历史的巨大力量是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速度。二战结束时，台湾岛的农业古主导地位，到了1988 年，台湾被改造成一个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工业化地区，而台北则成了人流如织的世界大都市。台湾人口也从1950 年时的大约800 万上升到1988 年的约2 仪X ）万。国民总产值则从1 945 年的极低水平跃居1960 年的81 亿美元，1986 年更达到726 亿美元。80 年代，台湾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台湾经济的成功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日本占领期殖民当局的遗泽；台湾人民的工作能力；掌握技术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陆移民的涌人；国民党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对它的援助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方式；以及向它开放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消费了台湾出口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

经济增长是从农业开始的，日本人已经铲除了古地不耕的旧地主，1949 年后台湾政府决心将佃农制也一起消灭。先压低佃户地租，把公用土地卖给农民，用这笔钱把大土地所有者原先租给佃户的土地买下，然后再将这些地卖给农民。用公债来偿付原土地所有者。在一些主要方面，这场改革和战后日本改革不无相似之处：来自大陆移民政府和美国占领军同属外来力量；它在这个地区拥有军事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权；它与当地利益枚关；它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稳定、保守的农村社会：这个目标达到了。台湾当局同样也鼓励农民成立农会（这种日古时期的组织形式得以继承下来），推广农业科技教育，新种子和化肥的使用，以及农村手工艺产品的制造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整个50 年代台湾农业始终大步前进。

台湾的制造业直到50 年代以前还是满目疮咦。最初当局的政策是要稳定局面，不久，50 年代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台湾当局目标遂改为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当局政策的转变以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四年讨一划实施为标志。几十家以前由日本人创办、后来在1945 年被政府没收的企业开始转让给私人企业家。这些人多为和政府有联系的大陆移

民。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如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也已起步。50 年代晚期时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增长点大多集中在为台湾消费者提供日用品的轻止业。印年代中，出口工业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政府取消控制并欢迎外国资金进入台湾。美国和日本公司的投资均相当可观。外国企业可利用台湾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台湾劳动力也从中学到了新技术。60 年代新兴工业的中心是消费性电子产品。6O 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刺激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的情况和朝鲜战争促使日本经济快速恢复一样。新兴工业城市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但即便如此，直到70 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还是求大于供。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工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化，钢铁和化工工业就此发展起来。80 年代涌现了新的工业大潮，快速发展的领域包括计算机、汽车制造和军事装备。1988 年，台湾国民总产值达到950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820 美元，后者是中国大陆的10 倍。

台湾历史中最后要提到的方面是它和世界各国的联系。这可分三个阶段阐述：

第一阶段：1945 年到1950 年，台湾是国际社会中无人过问的"孤儿"。当时美国想让中国内战的尘嚣早日归于沉寂，就只能让台湾陷于前途未卜的停顿之中。第二阶段：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的30 年间，台湾在美国的安全伞下，成了美国的"代理国"。美国第七舰队巡航于台湾海峡。1954 年美国同台湾签署了《 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向台湾提供了约20 亿美元的援助。1968 年，台湾经济迅猛发展，美国取消了不必要的经济援助，但继续予台湾以外交和军事支持。但到了1970 年后，台湾的国际地位开始动摇。中国开始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中站起，逐步放弃了闭关锁国政策。各国相继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政府。1971 年，台湾失去在联合国的席位，1980 年又被驱逐出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9 年，美国和台湾断交，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980 年，《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到期废止。

第三阶段：1950 年后台湾的外交关系很难定性。台湾又陷入了与50 年代以前一样的困境，与它保持外交关系的只有韩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几个国家。但是台湾出口的猛增使得各国在承认北京政府的同时，竞相在台北建立具有非官方领事馆职能的商务代表处。一些主要外国银行也在台湾开设了分行。贸易联系固然不能代替

外交关系，但即使没有外交关系，台湾也还是国际上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这和几十年前的情况显然大不一样。

与台湾断交后，美国仍对台湾有很强的非官方"兴趣"。美国仿效日本，通过一个设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间接维持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这一事实上的美国大使馆被称作"台北美国学院"，由退休外交人员任教。197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与台湾关系法》 ，决定继续保持所有经国会立法审议通过的美台经济联系，并且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迫于北京的压力，美国在1982 年同意削减对台武器销售，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只是"远景规划"。协议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美国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长期以来，台湾对大陆奉行"三不"立场：不接触、不妥协、不与共产党谈判。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北京把它的政策从解放台湾变为呼吁台湾当局自愿回归祖国。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北京允许台湾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实行自治，如它可以保留原先的政府、军队和经济制度。台湾拒绝这项建议，声称这是共产党的诡计。但从70 年代后期开始，台湾与大陆之间通过香港进行的非官方贸易已在稳步增长。！ 987 年，台湾取消了居民不准到大陆旅游的禁令。之所以有这项政策上的转变，是因为缓慢扩大的个人自由、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增加、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台湾岛内文化生活的兴盛，使当局对赴大陆旅游的居民回岛的信心大为增加。台湾当局更希望赴大陆探亲的人能把台湾生活优于大陆的情况告诉在大陆的亲友。北京方面的反应是声明它热烈欢迎台湾同胞回家乡看看。

1949 年后，台湾在美国的视野中变得很是瞩目。和香港一样，它象征的意义和它本身的大小不成比例。但是，在开始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时，我们必须记住，台湾只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

第1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袖

起初，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样认为，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农民在革命中只起辅助性作用。但是毛泽东在1927 年写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很快从实践中认识到把群众性农民组织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1927 年和1928 年之交的冬天，他带领由朱德担任军事指挥的几千人来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在那里建立起了根据地。但是他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为他的武装运动正名。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定义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里，毛泽东在不同的语境下借用了列宁在1905 年使用过的表述方式。《 劳工法》 则将诸多特权赋予了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

红军作为代表阶级的军队享有许多特权。土地被重新分配，但并未大力推行集体化。

毛泽东的地位逐步上升。1932 年，由留苏学生控制的中共中央放弃上海，把中央委员会迁到江西，毛泽东的地位上升暂时停止。1930 年底、1931 年4 月间、同年7 月及1933 年，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红军游击队把国民党军队引入山区加以歼灭，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但是在1933 年年底和1934 年，国民党采用"碉堡战"封锁苏区，步步为营向中共根据地推进。结果，10 余万红军从江西根据地突破重围，趁着夜幕的掩护踏上了长征之路。他们边战边走，一年中步行创X 幻英里，创造了人类意志力量的神话。直到1935 年1 月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会议才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尽管如此，在以后几年的党内会议上继续有人反对他的路线。

延安时期

1935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领不足2 万人的部队到达陕北。自1936 年年底起，他们把总部设在了延安。这是一块贫瘠的黄土地，到处被侵蚀得沟壑纵横，车辆交通不便。这里易守难攻，但是普遍缺水。由于农民很少有余粮，地主也不多，它为简单的平均主义和自力更生生活方式提供了自然环境，不存在都市中的种种弊病。在延安的

10 年为毛泽东提供了机会，他在整整一代中共领导层都打下了他的烙印。当长征结束后，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记者埃德加o 斯诺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时，他发现了一群充满自信和乐观进取精神的革命老兵。他们的穿着及对农民事业的献身精神被斯诺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使全世界的读者为之神往。

1937 年时形势已很明朗，中国抗日战争能够牵制日本进攻苏联并使南京政府无暇对共产党发动进攻。所以在日本1937 年7 月7 日在北平发动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统一阵线加人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队伍。这第二次国共合作其实只是两支军队停火后勉强建立的合作，合作初时双方热情很高，但不久就迅速低落下去了。共产党在全民族解放抗日战争的全新背景下扩张自己的力量，因为全民族抗日本身就要求发动农民武装自卫。有组织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于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儿省边境地区，最早的晋察冀坑日根据地建立于1938 年。到1946 年，据称有19 个"解放区"的根据地，控制的总人口在7 (X 旧万到侧I 心万之间，保卫根据地的有大约2 叨万民兵和号称有91 万共产党正规军。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使它成为在东三省抗日运动中最有力的领导者。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发动农民这一层面上无力与共产党竞争，只能对延安地区进行封锁。

战时共产党暂时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为减租减息。地主获许保留土地，可以收取经过削减的地租，同时也有权参加地方选举。与以前实行的苏联体制不同，共产党这时宣布通过"三三制"进行直接选举。政府中共产党代表古1 / 3 ，另外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各古1 乃。由于人民在战争年代的自由政治角逐中自愿支持共产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不断壮大起来，虽然当时日军及其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权本来都可能取代它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计划包括发动军民从事生产以实现各个解放区粮食自给的"大生产运动"。尽管没有使用种子改良和西方农业科技，共产党通过提倡合作开荒、农民间的换工及运输互助的方式开办小型手工业合作社弥补了这一缺陷。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共同目标劳动并通双领导和宣传控制这些组织，使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通向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新路。

思想建设

毛泽东在1940 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是：在统一战线武装反对日本侵略和在解放区开展党的建设。还有一个不常提到的目标是建设一支百万大军。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长期革命目标的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盟友，以便与国民党竞争、打击日本侵略军和重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战术日趋复杂、灵活和有效。他们使用各种方法孤立对手，把所有可能的盟友和中间力量从对手那里分化出去，关心后者的利益并照顾他们的特殊需要，但永远不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做妥协交易。国统区的"统战干部"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并不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领域被一批能干并献身事业的秘密党员不断渗透，他们心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明天充满了信仰。同样，"友军"互助活动也使一批有才干的将领渗透进国民党军队并得到升迁。但是统一战线也树立了战时友好互助的风气以及为共同事业献身的榜样。事实证明，武装斗争可以与统一战线紧密结合，以此打击被充分孤立的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顽固派分子。

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第二个组成成分是党的建设。共产党员人数从1937 年的4 万人增加到了1945 年的120 万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统一的马列主义政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它其实比以前更不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农民这时被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它的活动范围已超过100 万平方英里，共产党要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必须要有思想上过硬的共产党员干部，于是教育新干部就成了关键。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延安几千名学生先后进入党校学习。

1942 年毛泽东发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整风"运动，力图纠正党员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及发言与写作上的不正确态度。小组中长时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上公开认错和悔过成了标准程式。整风的目的在于保持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党的战斗性，使它能够胜任今后的任务。党做出了很大努力对仍受自由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气质或封建道德影响的新党员进行再教育，使他们服从党的纪律。

这次整风运动也标志着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国际主义者"们最终被清除出共产党的队伍，这些人均曾长期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全党一致同意马列主义思想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推广到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中去，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一种"民族形式"。这一观点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它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创立

20 年后，共产主义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微弱影响下完成了它的中国化，从此以后共产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来思想。它的主要成功就是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基础上建设起了列宁主义政党，证明共产主义制度实际上可以脱离无产阶级而存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向阐释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并不来源于他的阶级归属。根据新的定义，他的阶级归属可以由他的思想倾向决定，也就是说，一个思想进步的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这是主观政治思维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胜利。

毛泽东写于1940 年的《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是一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统一战线定性为一个临时性阶段，同时再次强调了党的长期任务。为了使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能赞同、理解他的观点，毛泽东果断地自称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和"五四"运动的传统，而在面向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为共产主义理论做出贡献的理论家的地位。而实际上，毛泽东的"创新"来自于实践而不是理论领域。他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早期共产主义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表述。他真正的贡献在于创建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群众的支持。

普通人民当中兴起了一种新的信仰，它强调人民的解放，目的是唤醒和激发中国农民的大众活动。文艺领域盛行木版画，因为成本低并且易于大量复制。大合唱和一种古老的乡村舞蹈形式结合，产生了一种称为"秧歌"的新型艺术形式。秧歌是一种穷人的戏剧，它采用民歌曲调串联舞步，寓教于乐地表现日常生活的主题。普通大众对革命理想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现代科技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重塑和丰富农民的生活。人民的坚定信仰激励了广大干部和军队。党的工作者必须住在村里，和农民一起劳动，吃同样的饭，过一样的日子，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只有这样他才能领导人民获得新生。"解放"的客观必然性也成了新的一党专政理论的依据：首先，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新的生活；其次，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威；第三，这种政治权威只能通过一个集权政党实现；最后，一个政党要有力量，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纪律。这样这个政党才会具有一种不断前进的永恒实体性质而肩负起超越个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 年4 月召开，这是1928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首次盛会。会上，共产党决定采用"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以完善其战后政策。1941 年1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皖南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会发生内战。毛泽东此时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包括所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一提议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既可以是它在1946 提出时的原意，即一个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也可以指联合一些小党派和开明绅士反对国民党的联合政府，此即1949 年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这一路线对具有现代思想、对国民党统治失望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特别的吸引力。

国共内战

二战期间，约瑟夫o 史迪威将军作为蒋介石名义上的总参谋长，在印度为蒋介石训练中国军队以图收复缅甸北部。而得到印度空运物资支持的美国空军则保护了一些城市并打击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但同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时走海路绕过中国，美国对华援助最终只是向政治上极端脆弱的国民政府送去了精良武器，使它在1945 年后面对共产党时骄横不可一世。1946 年，乔治o 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政府特使赴中国调停国共争端，当时计划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但国民党将领和斯大林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的力量，而毛泽东则通过发动群众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上大举推进。1946 年之后，美国撤回了驻华美军。

1946 到1949 年的中国内战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型战争之一。战争初期，国民党有300 万军队，大多都配备了现代化武器，其中包括美国提供的卡车、坦克和飞机。它所缺乏的只是能够激励士气的出师之名。蒋介石不听劝阻，执意抢古华北和东北各省的中心城市，而军队一到那里马上被就被共产党军队分割包围，断绝了与外部的联系，一切军需依靠空投提供。共产党采用他们以前在华北使用过的战术，向东北渗透并发动农民支持战争。战争初期共产党军队只有100 万人左右，随着战争的进展，他们从国民党俘虏和投降者那里缴获大量美式装备，人数稳步增加。共产党军队开展运动战、发动农村群众参军和支持战争、毁坏国民党铁路交通，但避免在不利形势下作战，在人数和军事力量上不断壮大自己。他们得到几百万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后勤

支持，这些农民破坏铁路运输线、切断国民党军队的军需补给、用简易运输工具为共产党军队运送军需，同时也挖掘壕沟阻止国民党坦克并为共产党军队侦察敌情。

国民党军队1947 年到1949 年间的崩溃并非由于军备落后于对手，而是输在缺乏明确的目的。蒋介石的军队有优势装备，但他没有振兴经济的能力，没有发动群众的计划，更未看到中国的未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居民因为物价飞涨，其生活朝不保夕。抗战胜利后回到长江下游的国民党官僚像贪得无厌的征服者一样大肆掠夺财富，而把自己的同胞以汉奸通敌的罪名论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有诸多原因：黄埔系和桂系军阀势力相互倾轧，各支军队像军阀时代一样只顾保存实力，大肆积聚物资，倒卖军需品，同时官员相互猜忌，"蒋委员长"也一意孤行地坚持对各战场进行摇控指挥。1948 年年中，共产党军队数目已与国民党持平。10 月，东北的国民党守军被迫投降。1949 年1 月，在南京以北徐州附近的平原上又有大批国民党军队投降。同月，共产党军队进入天津和北平，4 月攻古南京，5 月进驻上海，10 月占领广州，n 月进古重庆。1950 年5 月，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蒋介石和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撤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 年在北京成立。

二、成立人民共和国

政治组织

在28 年充满考验和艰难的通向执政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创建新中国的经验、眼光和自信。50 年代旱期的中国令人回想起明朝初年那种肃清外族残余、统计土地和人口、重整河山的伟大时代。中国从过去时代继承的东西不如吸收的新事物多，它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世界特别是苏联提供给它的一切。到1957 年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八年是一个大胆创新、成绩斐然的时代。

由于共产党只有70 万干部，而新占领的地区却有200 万个行政职务需要填补，所以军事接管各大城市后留用了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共产党干部们给军事接管加上了一种喜庆气氛，居民们在大街上扭起秧歌以庆祝和平解放。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政治蜜月期，共产党致力于消除国民党残余影响、建立联合政府来取代它的势力，同时改革中国的军队、外交和经济体系。毛泽东把新政府定义为一个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又是坚决打击反动阶级或"人民公敌"的专政政府。这种中国式的"人民民主专政"试图用统一战线的形式为共产党政权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并同时消灭它的敌人。在政府操纵下，这个制度可以灵活地去除人群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许多反革命分子遭到了镇压。

由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新中央政府保留了几个小党派并让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一些显赫的职位，以体现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但关键问题在于，要充分利用上层社会那些人的学识和才干，而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于是知识分子被委以要职，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他们共事的是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才干，但是更容易受政府约束。大多数学者从西方回国，这些爱国人士愿为国家的未来而献身。由于长期和国民党疏离，除了与共产党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和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建立了党、政、军三足鼎立的结构，每一部分自成体系，但都统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人数1947 年达到270 万，1953 年为610 万，1959 年为1 中［X ）万，1961 年为17 (X ）万，1973 年是2800 万左右。到了1987 年，这个数字会达到4700 万。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62 年发展到了94 名委员和93 名候补委员，但行使权力的是由19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终做出决定的则是大约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的结构大致分为：主要有六个地方局，28 个省或直辖市委员会；258 个专区委员会；2200 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1 958 年后有2 . 6 万个公社委员会，另在农村、工厂、学校、军队和其他单位中还有100 多万个党支部。

党组织以外还有和它平行的政府结构。政府中也有大量党员存在。人民代表大会也是由村一级向上直到设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等级体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 年在北京召开。这些代表大会是作为群众参与治理国家而设立的，但并没有实权。政府结构于1954 年做了调整，因为那年颁布的新宪法缩减了非共产党人士的权力而增强了总理的地位。这时周恩来领导着国务院（政务院），这个机构有包括10 多位副总理在内的大约70 个部委的领导人。政府被划分为不同的体系，它们包括：处理文化事务的宣传部和教育

部；负责农村事务的农林水利部；通讯工业部和经贸委。每一个系统都同时受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监督。其"垂直控制"系统由__上而下延伸、分支，在遇到相应级别党委的平行协调时，这个等级系统就在"二元控制"中达到了平衡二外交和军事方而亦存在类似的"二元体系"。

在一切事务中，党制定政策，政府机构负责执行；共产党党员古据了政府中大多数重要职务，而地区级、省级和地方党委在和这些部门合作时又可以对它们加以监督。各政府机构中的党员都有他们自己相应的党委或党支部组织。

与党和政府平行存在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群众组织二这些组织起源于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二譬如，成立于1922 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到1956 年时拥有1300 万会员。类似的组织还有妇女联合会（1953 年拥有成员76 (X ）万）、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拥有成员3 中刃万）及其他知识分子组织、学生组织和少先队，等等。这些群众组织覆盖了各类行业和社会角色，其成员往往受到政府不可能向他施加的影响。每个组织都有篇幅很长的政治纲领和遍布各地的行政机构。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就这样被带进了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团体，在共产党党纲指导下开会、学习、讨论。与学校或教育中心合办的培训活动从这些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来实行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经常接触工农群众为基础，党的工作者首先要认真研究群众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其次针对问题和意见制定指导性政策，最后让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白己的意愿去执行，这实际上是一种制造、操纵舆论的做法。在各个地区得到稳步发展后，这一整套政治机构对个人能产生广泛深入的公众压力。制造这种压力的机器便是"运动"。"运动"起初看起来是自发出现的，一旦发展起来它就开始听命于中共中央的指令。它很快把庞大的新型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将打击的铁锤瞄准各阶级中的一个又一个目标及其行为。

这一革命变化的后盾是新成立的公安部门和保密部门。各地的公安局监督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些居民委员会不但负责推行福利政策，

而且负责邻里之间和家庭内部的互相监督与批评。街道居委会协调邻里纠纷，公安局处理性质较为严重的案件，有必要的话把案件递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犯往往先在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接受全面调查，交待自己的罪行和一切同谋，然后案件才交由人民法院审理。由于法律必须反映党的革命政策，因而往往零乱多变。法律行业不健全，司法正义倒向国家一边，法律部门用普遍通用的准则处理不同环境下的个别案件以尽量减少操作程序。诉讼程序无足轻重，立法程序也同样若有若无。尽管法律条文不公开出版，个人行为准则还是通过政治教育为全社会所熟知。所有这些情形中都有中国社会传统的影子。把犯人交给国营工厂或农场"劳改"是效仿苏联体制，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中认为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育和社会压力得到改善的观点。总之，相比过去各个时代，国家大大加强了对个人的控制。

振兴经济

1949 年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中去。首要目标是把工业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在中国东北，苏联占领军移走了价值20 亿美元的重要工业设备，而在中国腹地，铁路系统被毁，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战时城乡之间的隔绝造成农村经济日益封闭自给；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急需得到恢复。大约侧刃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 %的预算赤字。

为通货膨胀消肿的第一步是通过增加国家收人逐步恢复预算的平衡。政府首先在农村实行农作物分类征税，然后在城市中通过商会的"民主评议"决定主要商品的购物税和营业税税率，以便从国民经济中较为富裕的部门中挤出一些钱来。第二，整个财政体制经过重组后，中央政府得以控制原先地方税的征收，同时禁止私人银行经营公款业务并且从整体上削减支出。政府通过接管银行、控制货币和信贷、成立六个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稳定主要消费品的价格。

恢复消费者信心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商品单位"来计量工资收入、银行存款、一部分政府津贴和国库券的价格。在这种制度下，货币价值和一定数量的日用消费品（如大米、面粉、煤炭和面料）挂钩。价格上扬，基于商品数量的货币单价亦随之而上升。持有这种通货，居

民就可以抵挡飞涨的物价。实行了这一系列平衡商品供应和货币收人的方法后，通货膨胀于50 年代中期被消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到rl952 年，国民经济更趋集中统一。重建和新建的铁路线总长度从先前的1 万英里增加到1 . 5 万英里，重新开通的公路总长达到了7 . 5 万英里。，全国金融业受一家中央银行的领导，由一种单一货币覆盖全国。有史以来政府首次能够制定真正的财政预算口私营企业在名义卜获准继续存在，而实际上却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控制；

通过控制信贷、原材料和实行最要商品专卖，国家在控制了重上业、铁路交通和外贸的同时，还控制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另外一项当务之急是实现对剩余农产品的控制。

从1950 午年中开始到1953 年初完成的全国土地改革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华北建立政权时所用的经过实践考验的方法。这不只是一场经济改革，它更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进入农村的［作组先找出反对土改的顽固分子，必要时先把他们清除出去，然后向贫农们讲清实行土地改革的好处，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后吸收他们担任土改运动的领导。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即进入"阶级斗争"时期：在"斗争大会"上，人民群众以"诉苦"或"算账"的方式倾诉自己长久以来受到的痛苦、。不得人心的地主或"土皇帝"被处决、赶走或者悔过自新，而人民群众则通过激烈方式表示拥护新制度：) 下一步是创建农会。通过农会决议，每个人都可以确定他的阶级成分，诸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或雇农。农会只负责土地的归类、没收和再分配。最后的"平均土地"仍是农民起义的老传统。地主阶级的残余一般在人身或社会地位上都被消灭，党代表建立了他们的权威，耕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根据1950 年的宣传，这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私有制形式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实际上无沦对于资本家还是农民，它都并不长久。新政权马不停蹄地开始进行农业集体化建设、、这项改革从北向南按i } , 划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先建妇喻时、常常是季猫性的/！、规模互助组，然后发展大一点的长期互助组，最后建立农业合作社、在农业合作社中，农民共同一起耕种并根据各人提供的土地、工费和付出的劳动分配产品。，农业合作社仍然建立在私人土地古有制和自

愿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但是运动的门标开始改变很快有人提出只有全面实行集体化才能生产足够的农产品支持工业化建设：：

社会变革

很久以来，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家庭亲合观念和孝道就开始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运动"更推动了这一发展。根据1 塑为年颁布的婚姻法，妇女和男子在结婚、离婚及财产拥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一做法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历经本世纪初以来的发展后取得的胜利。旧的家庭制度受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致命打击，人们要求子女反对父母，这极其明显地破除了以孝为百德之首的古代传统。旧式大家庭被当作封建残余受到批判，自由恋爱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政权力随着1950 年底朝鲜战争的爆发，发动群众的工作变得比以往更为容易。中国军队初期的胜利和以后关于美军开展细菌战的消息为摧毁美国以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中国兴起了两场运动，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号召人们为了保卫祖国，监视亲属邻里中的可疑人物，一旦证实某人通敌，则即使是父母也要当众批判，并且把人民公敌送交劳改。被处决的"敌人"和土改中由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者有上万人之多，一说有上百万。

在这样的革命和爱国主义情绪中，外国传教士作为外国间谍而受到批判。他们或被监禁，或受到驱逐。"三反运动"发起后，要求建立不受外国传教士"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会。不受外部影响的"民族教会"终于建立了起来。到1958 年，"一二自"运动统一了各地所有教派的基督徒。发动群众斗争某些个人的运动方式日渐普遍地被用来重建中国社会结构。1951 年和玲52 年间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即采用这种很典型的方式。"三反"的目标是整治干部阶层的不良风气。它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把腐败分子清除出自1949 年后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政府机关，从而增进政府机关的活力。"五反"运动是一场针对商人和企业家这些"资产阶级"的类似斗争。它即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二和所有其他活动一样，群众被发动起来，建立各种委员会，鼓动起群众的高度积极性、义愤填膺的场面和对正义战胜邪恶的热情支持，而以认罪、悔过、改过自

新或自杀、处决和送交劳改等方式消灭替罪羊的程序也接踵而来。通过这种运动，使商人阶层服从国家法令。

以延安时期建党方法为基础，刘少奇等组织者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思想改造方法，以此来改造各类敌人或同志的思想。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交待美军细菌战的计划并与抓获他们的中国人合作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已经在包括党员在内的中国人身上实践过的思想工作方法。这些针对犯人的"洗脑"程序是共产党革命工作的一种表现。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性。

思想改造一般都有某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这一点已在全国受到普遍控制）；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汉语俗语"洗脑"一词的含义在其他地方只见于古代宗教斗争中，其独特之处在于更为全面严谨的组织结构。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来源的学生阶层而言，这种思想感情的改变是在作为新教育体制一部分的大型革命大学中完成的。

这类教育中心一般拥有喇X 幻名左右的学员，可以被分成一两百人的班级，并再细分为6 到10 人的学习小组。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沦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惟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学员不仅仅抽象地抨击社会的丑恶思想，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缺点并全力加以纠正。他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接受其他学员的斗争，身上任何程度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都在斗争之列。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一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一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白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他必须依靠党。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受过训练的积极分子，它更要改变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他们不再听命于家庭和父辈，党和革命取代了二者的地位。

至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归来的留学生，他们思想已经定型，批评、自我批评和悔过并未能彻底改造他们。当北京的教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影响时，实际上的效果与其说是改变了这些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是让大众看到他们站到了新制度一边。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代表西力一非共产主义影响的阶层保持了中立。

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集权主义传统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中闰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理沦联系实际列宁认为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不但能够认识世界而目__可以改造世界。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儒家学者特别是王阳明，曾抨击过知行二元论，认为正人君子应当用合乎道义的行为去体现他的道德观点。濡家的修身即指知在行中得到实现，而行则有助于知的深化，

然而儒家的修身并不是一种群体活动，它强调的是人性有在道德上得到改善的可能。这种中国古代思想认为通过适当的道德教化，可以把人塑造为更为人世的个体。其实个人的修身和群体的自我批评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两者也不乏一些共同之处。延安整风运动术语"古为今用"取得了类似于儒家教化的权威。根据刘少奇的观点，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必须用"自我修养"来要求自己，学会"反省自身"以服从党的领导，更为灵活有效地为党__〔作。这样，原先的儒家思想灌输个人对家族、父辈和皇帝的忠诚，毛泽东思想则把忠诚的对象换成了人民、党和领袖。当时学习、引用儒家经典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思想改造主要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进行，这些人日后成了国家的精英和政府的智囊。在农村的农民群众中间，最显著的社会变革是给每人划分阶级成分以及建立由干部与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新领导层。由于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地方管理阶层

取代了以前士绅阶层的地位。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变革与城市相比仍是慢了一步。

朝鲜战争和苏联援助

早在1949 年毛泽东就宣称他的政策是"一边倒"和"反对金融帝国主义"的。此后，他在莫斯科经过九个星期的艰苦谈判，于1950 年2 月和斯大林签署了为期30 年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是北京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卷人朝鲜半岛的冲突。相反，中国共产党倒是可能有过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台湾的想法。但由于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制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可能采取的渡海入侵行动，这一想法遂成泡影。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的主要战略利益转为确保其重要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南部的安全。这一工业基地是从日本人手中接管过来的。

当美国军队于9 月进逼三八线向北挺进直指鸭绿江时，他们清楚地表明，其作战目的从制止北方军队入侵变成极不明智的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这一军事计划起源于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胜利，而华盛顿对此也表示默许，但它忽视了一点：中国需要一个起战略缓冲作用的邻国，从而避免在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与一位宿敌形成对峙。中国明确发出警告，表示将不会坐视不管。10 月中旬，林彪摩下第四野战军的一部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进入了北朝鲜。11 月下旬，志愿军突袭美军并切断美军各部之间的联系，迫使后者向汉城以南退却。

但是当中国欲以人数上的优势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时，这一努力受到联合国军队的火力压制。最终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对峙局面。停战谈判于1951 年7 月开始，在停火线附近的板门店延续了两年。在此时期战斗仍在继续，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苏联重型武器装备的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1950 年进入西藏，经过一年的战争，在那里平息了战乱恢复了控制。此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采用了苏联模式并得到苏联的帮助。中国按照苏联制式组建起一支职业军官队伍，它指挥着250 万人的正规部队。

但苏联的援助是有代价的。1950 年，中苏间仿照东欧模式成立了"合股"公司，共同开发新疆矿产资源并开展其他合作项目。但在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所有项目全部废止，苏联人也逐步放弃他们在中国东北铁路干线和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特殊利益。

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的经验技术起初曾给中国以极大的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学员前往苏联接受培训，许多苏联技术人员则来到中国帮助建设几百个工业项目。得到苏联贷款的支持，中国的外贸模式发生了180 度的大变化，其贸易伙伴由西方国家和日本变成了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国得到了关键技术上的重要帮助以及不计其数的军事装备和重要设备，但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当时的贷款是用原材料偿还的。中国效仿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发展模式的能力受到一些特殊条件的限制。50 年代初期当中国开展自己的五年计划时，国内状况与其说近似1928 年的苏联，不如说更为接近l9 (X 〕 年的俄国。1 峨刃年时，俄国人均拥有的生铁、钢材、棉产品数量和每平方英里铁路线的长度，都大于中国在1952 年的数字。同时，苏联还拥有一支更庞大的受过现代教育的技术专业人员队伍及远为发达的教育体系二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并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过多的人口（根据1953 年的人日普查达到了5 . 83 亿，并且每年递增1200 万到！《 刃万）加lt －可开发新增土地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中国人［: 上对粮食供应产生的压力比几卜年前的俄国更大C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的社会革命曾试图从根本上把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将群众引人政治生活。但是中国农村还不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事务来自一个更加简单的时代：如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口以及如何分配这些粮食。除了饥荒和疫病，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统治阶级。极少数特权阶层利用其所受教育和拥有的社会关系古有土地并垄断官职。既然统治阶级通常在城市里向村庄发号施令，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的问题便是如何将政权的影响深入到农村，并在那里发动革命。如果它的力量不能达到农村并改变它们，农民就会保留过去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如受过教育者可以统治别人等等），这样，古老的乡村今后依然有可能迎纳新的统治阶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希望通过改造人民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渐渐成为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阶级利益之间受到适度控制的一场斗争。

这场革命的一个特征是道德和政治的交融，以致每项政策的失误往往源自政策制定者思想道德仁的问题。》 这从古代儒家的观念来解释，是行为方式为个人品德的体现；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C 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在人民共和国及以往的儒教封建国家中同样可以实现，或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实现目标。它和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成为衡量思想道德的权威。正女11 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互相渗透，意识形态也必须随着事态的发展转变它的职能：

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强调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譬如，在外部世界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内有工业需求和农业需求的矛盾，个人思想中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自由和纪律的矛盾，民主和集中的矛盾，不一而足。这些矛盾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面。一经发现就会导致斗争、不断分化，最后达到一个新的统一体。这样，一场斗争引发下一场斗争而永无止境。毛泽东巧妙地称之为"继续革命"，认为它像生命一样没有穷尽。这和儒家"和"的理想有着极大的反差。

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的控制

1953 年，北京开始同时规划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不断扩大的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实行工业化需要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集团进日主要物资，而这又需要用农产品支付。为了从农业经济中挤出更多的资源，政府只能成立真正的集体农场。这样做可能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但这是厉行节约、阻止富农阶级死灰复燃的惟一稳妥方法。

集体化过程在最初阶段的进展比顶期要快。到1955 年年中，50 ％的农业耕地和农户被编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花了数周时间到各地视察，了解地方上的民情，然后号召2 , 5 亿农民以每50 户为单位组成200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在全国约100 万个乡村中每村平均成立两个）。这项大胆的计划在热心的干部们推动下，发展速度再次超过了预期目标。据报道，到1956 年，已有90 ％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他们很快又被要求再上一个新台阶，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个人份额（份额根据个人的贡献各不相同），建设社会化农业。与1929 到19 犯年间灾难性的苏联集体主义运动不一样，集体化在中国并没有直接导致农业的国家所有制，而是形成了合作社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即由合

作社买下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活动在全盛期显然产生了可观的成绩，因为当时几乎见不到有关反对集体化的现象。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只用了五年就完成了全过程，但中国农民除了信仰党中央和毛主席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和列宁从城市斗争起步不同，毛泽东在农村开创了他的革命事业，所以农村中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早就被清除殆尽了。

合作社继续发展，形成了完全的集体化农场。每个村庄都有一到两个农场。它们这时成了乡村生活的新热点，负责兴建地方公共事业和开展福利活动。这些事务在封建时代是乡绅阶层的职责。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贩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宏伟的计一划向人们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文化生活会越来越丰富，各种疾病及水旱灾害将得到根治，山岭处处披上绿装，也无人会有失业之虞。对于刚刚读书识字的农家小孩来说，这一信心十足的预见固然令人兴奋，但对于怀疑者和持异议者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强制推行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经起步，银行、工业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国有化转变。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牺牲前者的决定，在为1953 年到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中已经很明显。这些目标直到1955 年才公布：钢产量要翻两番，电力和水泥产量翻倍，但棉制品产量增长不到50 %，粮食作物的增长目标也不超过20 ％。农民的产品被政府间接取走，也通过实物上缴和税收等形式被直接征收这正如在以往战争中中国重枪炮轻人力一样，在发展农业时中国也不得不强调发展资金需求少、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如防洪大坝和灌溉水渠等。饲养的猪既能提供食用肉类，也提供粪肥，但发展化肥产业则有可能受到限制。）同时，资金投人的重点是重工业生产二此时古据党中央主导地位的毛派分子们预言，人民群众将从思想上得到解放，因而像"生产竞赛"之类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方法将会在生产上一举实现"数量、速度、质量和节约"的高指标。这一强制推行的工业化进程最终把约古中国国民生产总值30 ％的

收入划归政府，其'1 ，大约有一半用于投资。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看「去快得惊人。1957 年，中国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同一时期，中国西北的铁路线已经扩展到外蒙古，并且穿越沙漠通到了新疆。这些铁路线的开通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潮打开厂亚洲腹地的大门并为大规模开发扫除了障碍。同时，它们加强了中国对重新获得的内蒙己，和新疆的控制，因而具有政治卜和战略上的意义。

知识分子和干部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动员起包括只有10 万人左右、从事专业技术和学术__上〕 作、"西化"较深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协一个人。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已经从精神上改造了这个阶层，使它和自己结成一了联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新的党组织会窒息党的思想活力〔 少于是1956 年和1957 年间共产党又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协调党的两个战略要素一一知识分子和于部的关系。，1956 年5 月，知识分J ' . 出身的党员上二部和政府官员中兴起一场提倡自由批评的运动，它的「 〕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井下是提泪评论白由的号角。）批评不能越过内容的限度，即个人必须绝对忠于党的至高权威。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满的迹象，此时正值1956 年10 月爆发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对它镇压的余波未平之际。毛泽东于1957 年发表了他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如共产党政权与其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是非对坑性矛盾，是正常的并且可以协商解决的，如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在这个框架内，他希望在其"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健康而有节制的阶级斗争贯彻发展生产力的改策。和延安时期一样，这一辩证过程先是号召人们发表意见，然后针对意见讨论并解决问题。1957 年党和政府不断邀请外界发表意见。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们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集权主义政体及其思想、目标和方法的不满．）意见之多，言辞之激烈，震惊了党中央。这些意见受到严厉的压制。在运动中提出批评的人不久均被迫公开检讨，并互相揭发批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如何控制负责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组织。工农业生产双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可以见到新修的马路、工厂、城市、堤坝和新开的湖泊、

山林，农作物也欣欣向荣。全国6.5亿人民动员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劳动强度和合作规模建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党需要几百万积极分子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大多都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很可能有4/5的党员不到高中学历，刚从党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很容易陷入"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或"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不是通过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农民群众的工作。干部们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灌输，但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开展工作所必需的聪明才智却比较困难，更不用说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影响了干群关系的腐败现象和虚报产量的做法了。农业集体化在推行过程中其实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农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干部空头许诺的误导。

为避免"脱离群众", 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纠正党员干部不良工作作风的思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向知识分子征求意见的运动。1957年年中，这两项活动汇合成了一场"反右"洪流。"反右"运动最终发展成对中国大约50到75万本已很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打击。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灾难。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即把教师、学生、城市干部与公务员遣送到农村，让他们和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以避免脱离群众，同时帮助农业生产。从此时起，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开始造成一系列灾难。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开会时，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有力地控制了经济，各级党委开始负责经济决策。形式主义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生产。集体化实际上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农业陷入了停滞的困境。1952年到1957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30%，但是政府征集到的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增加农业税收以发展工业的苏联模式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在1958年做出"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它能推动现代工业和乡村农业这两个各具特色而又互相联系的部门的发展。在农村往往动员群众以充分开发潜在的劳动力。首先，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控制洪涝灾害，开发荒地；其次，投人更多的人力以提高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第三，就地取材，发展小型农村工业。党希望利用中国人口多的优势，在尽量不依靠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下发展农

业生产。增加的农产品可以增加外贸出口换取资金，也可以作为原料进一步投资于工业建设。

"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与劳动力的过剩，把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转变成经济成果、新思想能解放未经开发的人力资源等观点付诸实践。由于经济学专家已经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下放的厄运，各地浮夸的"大跃进"目标并非由经济学家制定，而是由干部们在竞相攀比中推出的。各地因陋就简发展小型工业的著名例子是让每家农户在后院架起小锅炉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随着运动的深人，经济部门出现了规划、管理不断分散的倾向。中央统计局被分成小块，成了地区统计局。根据未受专业培训的地方积极分子所提供的统计报表，统计局宣布1958 年一年中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领导层陶醉在自己做出的报告之中。中共中央拿到国外进行宣传的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不得不在1959 年夏末很不光彩地收了回去。

"大跃进"的后果一言难尽。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儿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土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二但这冒进的做法也造成了大量失误，许多新灌溉的土地出现了盐碱化现象，本来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大量人力则被自白浪费。

1958 年人民公社成了"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根据发扬群众自发积极性的群众路线而做出决定。典型的人民公社是由一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人民公社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这里一切都接受党的领导。每个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大致等于先前的一个合作社或半个村庄。农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按照规定人们必须在大型公共食堂吃饭。尽管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全部劳动力仍受到严格的控制。村中的男子像军队一样列队向新的生产指标发起冲击，而妇女们则代替了他们在农田里的位置。政府的浮夸风宣传，激起了不了解实情的农民的热情。党希望以此将农民改造为无产阶级，把他们和土地分离开来以建设新型的农业城市。由于拥有自己的上地是中国农家千百年来的执著迫

求，反对人民公社的农民自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由于管理不当而劳民伤财，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场革命终于失败了。政府实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工资制度后生产力不断下降二在人民公社中把劳动者按军队编制随意调动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1958 年12 月，「扫共中央不得不把决策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一级。工资的发放也恢复了以工作量大小和工分为标准的计酬方法。1960 年，农业形势继续恶化，人民公社的权力进一步分散，平均大约40 户人家一起劳动的生产小队成了基本农业单位，私人经营的自留地也得到恢复。1 勿闭年之后苏联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工业生产停滞时期。印年代初期，中国遭受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和苏联撤回援华技术人员等一系列困难。之后好几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处于混乱状态。196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以前减少了大约1 / 3 。人民普遍营养不良。1959 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 万甚至更多。所有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人民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工业生产也停滞不前。政府承认，10 年来不受重视的农业现在应当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了。总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权力造成了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不断鼓励50 年代中国革命中极端主义的发展和"冒进"、"放卫星"的做法。他们认为，马列主义领导团体懂得如何解放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它能够解放中国劳动人民此前受到国内外剥削阶级压制的创造精神。他们相信，一旦党发出号召，群众就会纷纷响应。这种信念当时既未受到全盘否定，也没有得到支持。到了60 年代，中国人民已经懂得如何与共产党政权共处，就像他们和以前历代专制政权共存一样，但他们原来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耗殆尽。更为严重的是，党的上层领导集体和最高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不断扩大。1959 年年中，从"大跃进"灾难中觉醒的一部分中央委员批评了毛泽东不切实际的极左政策。毛泽东挺了过来。他仍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毛主席永远止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毛氏不得不从日常事务退了下来。国内的政策争论从此开始；不久，外交关系上的新情况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外交政策

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这从它的汉语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统治的疆域是"天下"，它代表的国家是中央之国的"中国"。这些称谓显示了中国自给自足、不事扩张的传统。当然对它具有国防战略意义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是例外。50 年代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它囊括了藏族、维吾尔族、内蒙古的蒙古族等40 多个少数民族，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拥有7 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古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继承了一项思想传统，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才能遏止内战和外族入侵，并保证国家的和平昌盛。与同属基督教文化圈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它要求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收复台湾。北京称台湾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收复台湾才能结束国共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

中国国内革命造成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强硬态度。它强调普遍适用的名称，如"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中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帝国主义阵营"做斗争的榜样。在这些话语中，中国新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更大的适用范围内得到了表述。在这种情绪下，中国把苏联看成自己的"老大哥"。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在50 年代的外交战线上采用了和国内斗争中一样的软硬两手政策。

从1950 年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始自中国和美国遏制政策之间的军事对抗。1950 年6 月苏联支持下的北朝鲜军队进攻韩国，这成了中美军事对抗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前所言，这一事件促使美国支持联合国军队保卫韩国并恢复派驻海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此后不久，中国军方干预朝鲜战争，进入西藏，并向印度支那的越盟提供军事援助。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议于1953 年7 月签订。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被击溃后，法国于1954 年7 月在日内瓦签署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中国作为军事大国也参与了协议的签署。在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美国也扩大了对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防卫承诺。在冷战的阵地七，双方都通过军事行动寻求安全保障。1954 年9 月，美国发起创建了一个集体防御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也与汉城政权（1953 年10 月）及台北(1954 年12 月）当局签订了联合

防务条约。这样，当国共双方在厦门海岸金门岛的对峙于1955 年初演变为军事危机时，中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西藏的活动遇到了美国领导并进行经济支持的反共活动的干扰。在早期的军事对抗之后，双方迎来了更多依赖外交沟通的时期。在1954 年4 月至7 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会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就法国势力撤走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磋商。其间中国与缅甸和印度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了1955 年4 月有29 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的主题。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中美双方从1955 年8 月开始进行大使级的阶段性谈判。双方总共在日内瓦进行了73 次谈判，之后于1958 年到19 必年间转移到了华沙，又进行了58 次会谈〔 。

但这一较软的外交路线很快又硬了起来。1957 年8 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一导弹，同年10 月又把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地球轨道。帝国主义一时似居下风。11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毛泽东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关系中采取挑衅姿态。j 这一号召很快就体现在台湾海峡的局势上。美国已于1951 年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了军事力量。此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加对大陆的骚扰，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航空侦察或派飞机散布传单，甚至还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冲击大陆海防〔 〕他们加强了金门岛"前线"的防务，在那里驻扎了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1 / 3 。这最终造成共产党在1958 年8 、9 月间做出炮击金门的反应，引发了第二次金门危机。后来炮击虽然中止，但是国民党守军只保住了一片焦土。国民党当局把金门岛看成他们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属地。

在另一个地区西藏也重新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在那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但被中国驻军镇压下去。次年夏，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西两端的边界摩擦升级，到1962 年发展到了短期战争。中国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尽管后来证明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粉碎性的迅速反击，但在当时西方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制造事端。

四、"文化大革命"

宗派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满足人民的经济需求。随着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党内会议上关于是否采用其他政策的争论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旦确立，它的团结统一就开始受到决策压力的考验，而这一压力随着中共放弃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而逐渐增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提出可能采取的政策。其中毛泽东持有一此观点，而刘少奇与邓小平持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早年生涯使他养成一些独特气质，如独立思考和关心普通农民的疾苦等。20 年代早期和中期他曾与国民党合作，1927 年国共分裂后他懂得了军事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在这两个时期中，他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者。1935 年后在他领导共产党的20 年里，他的武装斗争方式不断取得胜利。由于革命需要强有力的个人领导，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在决策方面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一种路线而反对另一种。

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有两种对待革命的观点：一种把历史看成一出道德剧，革命即是道德改革；另外一种观点把各种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物质意义上的技术发展看做促使新的生产力产生新阶级的革命力量。在研究这一对同源主题时，毛泽东着重强调对社会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追求，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看到了社会发展对于物质文明发展的实际要求。这后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一个社会中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上层建筑是其物质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生产关系改变了，上层建筑才能得到改变。毛泽东所倡导的唯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想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力量一旦得到发动，人民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从毛泽东本人的出身背景中人们也可以看出农民世代相传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地位的痛恨。本世纪早期，中国学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理想做出积极响应，希望消灭一切政府形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在毛泽东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中国古代典籍认为的人性本善，只要予其人适当教育就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而领导职位必须由德才兼备之人担任。这一点成了孕育一位圣人式英雄的温

床，而思想上更接近苏联的刘少奇及其同事们却把毛泽东思想从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删去，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这两种内在选择的二元性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一、唯意志论与计划论：大多数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支持通过系统开展五年计划，积聚投资基金、建设工业，但毛泽东对政治比对经济更加热心。唯意志论是毛泽东的个人信仰。这种信仰导致他支持各自为政的地方积极性，反对中央控制，提倡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并值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红"与"专"：受过政治培养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群之间，即党的组织者与政府专家之间构成了最为强烈的一组对比。

这些通向中国未来的不同道路并非一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很多公开文件中，它们都作为相互联系的原则而加以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度支持具有显著毛泽东式空想社会主义特色的"大跃进"，但运动失败后两人的反对态度迅速转向强硬。1958 年12月后，毛泽东"自愿"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让给刘少奇。这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在每一次革命都会遇到的问题：何时社会革命可以转向社会稳定？或者说，怎样才能保证革命精神永不衰败？追根溯源此即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 苏联也曾经陷人的窘境。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变得日益强大。

中苏关系破裂

鉴于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自我形象及其需求和目标的差异，中苏之间在几个层次上产生重大分歧就不足为怪了。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互相产生了猜忌。13 世纪，蒙古人曾经奴役过南俄地区；而沙俄帝国主义者也曾侵犯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透过共产党的中苏"兄弟"关系的宣传话语，历史确未提供多少能让双方相互敬仰的事实。两国合作以苏联提供援助、中国实物偿还的形式进行。这本来出自双方领导人的意愿，两党交恶后合作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是合作的基本纽带，而破裂过程也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不懂外语，在他接受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种思想在译介过程中已经受到了一些归化"变形"。但毛泽东已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一边前进一边丰富他的思想，折衷了共产主义原理以适应具体国情。俄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把它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声称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

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就可以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声明会采取一种渐进而有说服力的非暴力变革方式，与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激进暴力变革有所不同。

1956 年苏联的"反斯大林化"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这使当时仍将"马恩列斯"并提的中国共产党大为尴尬。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条条道路通社会主义"观点的承认其实接受了中国成为亚洲榜样的要求，但这一让步也松动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根基。自此两党分歧逐渐加大。这时北京和莫斯科一样，成了一个自行其是的意识形态权威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听命于一家之言，即使不发生破裂，中苏间的摩擦也在所难免。苏联成功发射宇宙飞船后，处于巅峰期的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用来"赶超莫斯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指为危险的"左倾"狂热。作为回敬，北京也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卖身投靠资本主义。尽管1957 年时莫斯科曾保证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但援助中止了。1960 苏联技术人员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出了中国。苏联国内产生了对中国疯狂扩张的强烈恐惧，到了1 % 9 年两国军队在黑龙江和中亚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北京首先试图夺取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和他在这一时期的支持者林彪描述了中国革命模式如何应用到古世界人口2 / 3 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去。1965 年9 月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譬喻，鼓吹全世界人民自力更生进行革命，但中国只做一个引路人，并不打算用自己的扩张方式实现世界革命。这种态度使人想起古代的朝贡理论：中国为各国做出表率，但另lJ 国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则取决于它们自己。林彪为世界革命提出的"各自为战"原则在某种程度卜是为了防止中国军方卷入苏联核保护伞下的越南战局，因为这会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运动偏离方向。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部实行连续轰炸。由于得到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所以北京只好坐视这场家门口的战争，而承受无力保护友好邻邦的耻辱。同时，1965 年北京也遭受了其他外交关系上的挫折。6 月中国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

议未果。ro 月，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未遂政变导致大量亲华印尼共产党员被杀。这些事件促使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

党内问题

在60 年代晚期的社会间题背后存在着深层创伤。首先，在新近投身政治的人民中存在着贫困和期望两者之间的矛盾。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飒，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人了每一支稻穗。在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而现在则反映了政府规划的失当。中国共产党为负此重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结构。但集体单位的管理者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譬如长征年代的党政领导并不忌讳送子弟上特殊学校。简言之，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新的党一政一军权力机构就是一个特权组织。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受到严密控制的集团，对其地位和安全极端敏感。上层守旧派日趋保守失去革命性，下层则因受压制而感到失望：革命者取代旧政权后反会继承它的恶习，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产生的鸿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的纵容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形成。

官僚结构内部还存在着斗志和动力的问题。党负责监督所有党员的思想行为，要求他们忠于党、服从党纪。他们从非党员中独立出来，深人参与"党组织生活"：不断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报告下属的情况并想方设法在人事、安全和监察部门的秘密档案中留下一个好的纪录，因为不管是否在党内，一名干部的个人材料几乎比他本人更为重要。他永远不会见到这份档案，但是他知道里面有关于自己的个人履历、家庭出身、政治观点和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的个人陈述。可疑的个人会受到系统的审查，如果遇到一场运动，有问题的个人当然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古代的科举制度使人们在思想上禁锢自己，共产党的制度则让他们在精神上恐吓自己。除了在运动中批判各类丑恶思想，党还不时地找出一批人对之进行系统的批判和当众游

街，这让人意识到，如果不是党的宽大，他们之中也难免有人被游街示众。这些公于付十｛'让人深刻体会到党的权威。动员一些自认为可能受到牵连的人严厉批判那些饱受游街示众之苦的同事，这也是当时常用的一种牛争方式。〕其结果，"运动"这台制造社会变革的机器到了60 年代开始失去它原先的效力〔 〕卜部们学会了怎样不发表实际意见而顺利通过各种会议程式。他们学会了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私交，以免日后被好友出卖而受到批判。积极分子已经掌握如何驾驭运动，如何在动员期伪装出进步和热情，而到了巩固期则变得恰如其分地谨慎和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整个党组织已经学会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大潮下自保无虞，但是它也正在失去真正动员群众的能力。

修正主义的问题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许多党员已经对毛泽东不切实际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冒进方法失去了信心：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也反对毛泽东的革命狂热，认为这只会阻碍经济的恢复。他们忙于解决上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毛泽东于1962 年底发动又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们表现不够积极。毛泽东发起的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

建立于1955 年的苏式职业军官队伍中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倾向。这些军官向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干预军事指挥做出了挑战，他们支持苏式军队的统一指挥原则。随着军队中党员人数的减少，党组织的地位也逐渐下降。但在1959 年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并被指责与苏联人有接触而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后，惟毛泽东马首是瞻的林彪接替了他的职务。军队又吸收了很多新党员，连一级的党委重新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党员阶层这时在深人到连和班的军队基层建立了它的组织，党性教育和政治监督一起得到了推动。政治工作者维持这一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时防止见解相似的持异议者结成私党。军队受到了彻底的党性教育，从而在1964 年发动了一场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1965 年秋天，军队支持毛泽东发动一场他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运动，更准确地讲，这是一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

毛泽东的圣战

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名义上从1 叭涌年5 月开始到1 % 9 年4 月结束，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与其说这是一项有控制

的计划，不如看成是第二次革命。当毛泽东面对公开批评他的人，他发现党内支持这些人的力量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和1956 年"百花齐放"运动中的批评相似，反对意见的普遍存在令人吃惊。但这一次反对意见出自党内。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在党外发动对他的支持。公共场所很快就充斥了群众集会、游行和把毛泽东比作"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宣传展览。几百万青年由于极度乃至过度兴奋而极度疲惫，但不久就恢复了亢奋。在这些活动中最高领袖对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但与斯大林利用党组织秘密从内部对共产党进行清洗不同，毛泽东公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组织从外部对党进行清洗。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处决了几百万人，而支持毛泽东的人则依靠人民解放军，并使用公开侮辱的手段和使用殴打和监禁等手段对付反对派。

毛泽东的第一步是保证他对处在中心地位的大众传媒的控制，所以首先冲击主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人和北京市委。他走出党组织的圈子，召集了一帮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充当"红卫兵"，并亲笔为他们题词，号召他们"炮打司令部"，希望他们"发动革命，学习革命"。另外，他在党组织之外还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其妻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1966 年秋天，在军队的后勤支持下，1100 多万"红卫兵"云集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尔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进行他们的长征— 在公共场合他们武力冲击所有被认为是代表"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的人和事物。1967 年1 月，毛泽东进一步深化发展革命，号召直接冲击党组织，像1870 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样发动"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此时开始出版的上百万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给每一位革命积极分子带来了可供参考的大量"语录"和用来表示忠诚的护身符。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控制了大众传媒。党内实力人物逐个受到冲击，无法团结起来抗拒形势。结果，党组织彻底崩溃，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清洗。

为了取代旧的权力结构，毛泽东最终号召在各级政府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新鲜血液）、军人以及经过革命转化的党内老干部组成。党组织在各处艰难地反击，派出自己的"红卫兵"，一面表示忠于毛主席，一面又不断击败他领导的"红卫兵"。地方宗派逐渐开始"武斗"以致乱到了不得不时时动用军队于预以恢复秩序的地步。到

上% 8 年1 月，全国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这些组织内部并没有建立起有力的领导核心。最后，对党组织的冲击使军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政府权力，他们古据了政府要职并继续经常性地对知识分子和官员们进行打击。在这个疯狂年代里，大中学校已经停止招生好几年。知识分子和专家受到批判，学生则在宗派斗争中接受革命洗礼。1 % 8 年秋天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包括前红卫兵战士在内的几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1 肠9 年4 月召开的"九大"选出了以军人为主导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党章中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70 年代，一些大学慢慢开始恢复招生，但其学生来源并非通过考试竞争选拔，而是由学员所在生产单位群众提名保送。因为竞争性考试仍然会产生一个知识特权阶层，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在中学毕业之后工作过两年才有资格被推选人学，大学毕业后还必须回到原单位工作。这种希望一夜之间就把工人、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做法，由于学员在中小学校中基础打得不好、识字不够多而失败。知识的掌握不可能一娥而就。比较见成效的是为"赤脚医生"提供基础公共卫生培训以使他们能够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城市公务员则被派到"五o 七干校"接受轮训，这种真正的农场锻炼在于体验农村体力劳动的艰辛并不断除去身上的剥削阶级残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体验农民靠土地吃饭的生活是一次很艰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并非像"大跃进"那样使经济建设陷于停止，但其意识形态倾向的确滞缓了经济的发展。如文革中各地区须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禁止农民经营鸡鸭词养等副业。

1971 年9 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据报道，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期整个军方势力抬头过程中扶摇直上的林彪死于发生在外蒙古的一起坠机事故。事件的来龙去脉慢慢得到披露，据说他有篡权的野心，甚至想刺杀毛泽东，当他的无耻阴谋败露后潜逃出境而折戟沉沙。不管这一离奇事件真相如何，紧接下来对林彪长期叛国罪行的及时揭露，看起来和以前受到批判的刘少奇叛变革命事件极为相似。这产生了又一个问题：如此罪恶昭彰的人何以登上这样的高位？在局外人眼中，对于政治失败者的道德低毁好像是儒家思想的一项奇怪遗产。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和信仰再次受到打击。

林彪倒台之后，继续控制大众传媒鼓吹阶级斗争的毛派领导人和追随周恩来总理寻求有序经济发展的中共高层政府官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毛禅东继承人位置的斗争。周恩来在他1976 年1 月逝世之前使邓小平得以平反并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但是在1976 年4 月5 日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后，接替他的邓小平在以毛泽东妻子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即所谓"四人帮"的干预下再次被免职。毛泽东于1976 年9 月逝世之后这群激进派思想家才最终垮台。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十年浩劫"。无知少年的肆意破坏、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和政府机构成员的残酷打击以及使100 多万人受到伤害的人身侵犯、监禁、拷打和折磨是一次空前的人性和文化灾难。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滥用暴力是一种偏执的极端主义行为，虽然它使城市精英得以体验农民生活并由此获得较为深入的认识，但这根本不能补偿它所造成的损失。

中美关系正常化

当中国人民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时，美国人民也卷入了性质不同的另一个泥淖。这就是1 % 5 年至1973 年间的越南战争，美国在越南付出了5 . 8 万人死亡的代价。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与其他几个偶然因素一起促成了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邦交的戏剧化努力。首先，美国从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撤军实现于缓和、谈判政策之后，而不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继续竞争的军事对抗时代实现的。此后美苏在贸易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在1972 年5 月签订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框架内的裁军以及文化交流缓和了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姿态。这反过来使得中美接触成为中美苏三角格局中极受欢迎的一角。

第二，美国把战争限制在越南南部，本不希望引起类似中国抗美援朝的局面。但是，随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却让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美帝国主义相对于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只是一个"次要矛盾"。这一评估使北京对尼克松政府有步骤、有节制的恢复邦交努力做出了积极反应。

中美两国在持续22 年的相互疏远之后取得这一突破是一个重大事件。1971 年4 月，北京出人意料地以"人民外交"的姿态，欢迎来访的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些记者。其后，尼克松总统突然于7 月间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已先期秘密访问了北京。11 月，台湾的"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四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并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在上海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这一文件陈述了双方在儿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但都表示同意共同努力推动两国贸易和文化接触，为最终恢复关系正常化而努力。1973 年5 月，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初具大使馆规模的联络处，由双方各派大使领导各自机构的上作。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双边贸易开展起来，儿十个代表团不断来回互访（主要是科技领域的交流），仁千名华裔美国人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方面，政府也已经制定了一个大型规划，希望在政府控制下把美国人吸引到中国早已建好的面向世界各国游客的旅游渠道中去。这种吸引海外游客的旅游业不过是国内群众性活动的拓展。此前，中国国内代表团就已经被带去参观一些样板示范点，到山西的大寨生产队学习农业或赴东北的大庆油田学习工业。与美国的交往同样也被纳人了改造中国的进程：：

上海公报也确定了台湾的地位。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寻求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与之相应，美国同意减少在台湾的驻军并最终从台湾完全撤军二这份文件和双方所接受的"一个中国"概念隐含了美国的一个意图，即逐步撤回对台北的外交承认以实现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并最终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但是，鉴于这两个独立政权从1949 年起就一直存在，并且均坚持"一个中国"（这一语气强硬的措辞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理想而非事实），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的次年后，美国方面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进展放慢。针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牵制了政府的注意力，该事件于1974 年8 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时达到高潮。基辛格博士不断访问北京，1975 年12 月福特总统也来华访问，并重申恢复中美关系的政策不变。但是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仍都有各自的代表机构，这一点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并不多见，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也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北京的继承人之争也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直到1978 年底才全面获胜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美国公众情感上仍然普遍反对共产主义，但邓小平地位刚刚稳定，卡特政府就于1979 年元旦承认了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的中国政府，此时距其建立政权刚好30 年。效法日本在1972 年的做法，美国国会于1979 年4 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继续保持和台湾的贸易、投资和文化往来提供法律支持。美国撤回对台湾的外交承认，原驻台美国领事馆更名为台湾美国学院，由外交部「了退休的前外交官在此任职。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终于承认了中华民族爱国人士的观点，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四面环海、有着自己政府和军队的台湾只是中国一个分离的省份。不过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它已答应逐步缩减援助的规模。

五、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1978 年底邓小平担任领导职务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口号让位于"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的提法：改革时代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像一座大坝突然决口，毛泽东推行的知识无用论、排外思想、意识形态的狂热与平均主义同时被新政策和新规划的大潮一扫而空。短短几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步调大为改观。

毛泽东晚年的领导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致于所有这些变化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面貌。在只有他能够正确发动的含义不清的"阶级斗争"口号下，毛泽东冲击、毁坏了这个政治实体的基本要素二知识分子被党员积极分子扣__上右派的帽子，冒进政策指导下的工作失误浪费了几千万农民的人力（1958 一1959 年）。党政官员被红卫兵从职位上赶走（1967 年）。军队把互相仇杀的红卫兵青年下放到农村（1968 年）。而全军统帅林彪最终也折戟沉沙（1971 年）。最后，"破巢无完卵"，毛泽东一人坐在了废墟之上。庞大的中国国家机器依靠一个领导集体和一套思想体系而存在，而党内各个宗派争相抛出不同的口号二于是，1978 年以后的改革只能从党内开始。

重新振兴中国领导集体

为了恢复自己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只能顺应人心进行拨乱反正。中央对卯万甚至上百万"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案

例重新进行调查，一直上溯到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被迫害致死的人得到了平反，曾经受到批封和迫害而现在幸存下来的教授、作家、党员和其他一些人终于重见天日。在中国集列宁和斯大林地位于一身的毛泽东必须得到其他后任的公开评价，人民才能对他们的领导产生信心。1981 年6 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做了评价。这份文件在否定毛泽东对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的同时，认为毛泽东早期的贡献和晚年的严重错误是七比三的关系。党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前进的日号，同时坚持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党还需要进一步重建它庞大的于部队伍。粼X 刃万党员中约有一半是在文革期间入的党，他们文化教育不足而思想狂热有余。这样的人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新时代建设。邓小平同时面对着两个问题，一是改变领导结构，二是实现领导千部年轻化〔 领导人退休制度得到了实行。，年迈的领分人被请进一个地位很高但无实权的顾问委员会，他们的收人、住房、服务人员、汽车、特种物品供应和一些特权待遇得到保留。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建立在特权和私人关系基础上的领导人的影响力只能随着时间渐渐增加。直到9 年之后，长征时代的老战士们相继去世，这项退休制度才在1987 年ro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f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几得以通过。！上寸年83 岁的邓小平为他的老同事们做出表率，带头退出一线领导集体（尽管邓小平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当时五六十岁没有经历过长征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掌握了政治局和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同时也全面发动整党活动以把党内不称职的人员清除出去。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尽管有20 万人被勒令退党，32 万人受到党纪教育，这个比例仅仅超过党员总数的1 ％。老党员相继去世，党通过吸收新生力举使党员人数在1987 年达到了4700 万。党员中受过有效的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的人数比例从1 / 3 左右增加到了上/ 2 。

与整党同时发起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建设工作，目的是弥补"十年浩劫"中造成的损失，并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技术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才的短缺。提高教育质量以赶上发达工业国家的运动必然意味着回到发掘人才的传统道路上去。在选拔人才方面，中国人继承了一份相当精致的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总的来说，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分流：

一小部分优秀学生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则接受实用性专业技术方面的职业教育。而大学生中只有更少的一部分出类拔萃者进入几所综合性重点大学，接受到有可能将他们培育成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全面教育。

1978 年之后高考得到恢复，每年都吸收了渴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学生。和毛泽东时代学生被随意分配到某个专业和某所学校的情况不同，这时学生可以表达对某专业的偏好，而高校招生则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学术潜力。同时，学校和每年毕业的学生数目逐步减少以保证教学质量并避免大批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子女在家里较早受到文化启蒙，他们因此有可能被造就成新一代精英。同样，在全国大约1 仪幻所高校中，只有少数儿所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而受到重点扶持。许多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研究所重新发展起来。在北京建立起和中国科学院平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大城市中也都设了分支机构。上千名学有所成的人物被派往国外继续深造，而在诸如工商管理等需要优先发展的专业领域，中闰国内就办有各类长、短期培训班。到了80 年代中期，来自中国大陆的留美学生有1 万到1 . 5 万人左右

在普通大、中学校以外，同时也建立了各类特殊教育院校以满足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四化的需要。上几厂一、地方政府和国家各部委纷纷开办了业余学校、函授学校和技术培训类院校。一些课程通过广播和电视形式提供给了学员。学习英语的兴趣一时高涨，日语紧随其后，俄语则远居第三。在教育的新时代里，这么多人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寻求如此多样的教育，正规教育体系反而变成了冰山一巅。此前已经改变了日本和一些亚洲周边国家的变革看来终于在中国发生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政治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务之急是淘汰超龄军官和恢复专业Ul上练。和高等教育系统一样，要提高质量只能通过减少数量来实现。裁军1 / 4 后军队总人数仍有大约300 万人。尽管中国得不到两个超级大国的高新技术，许多武器装备还是得到了更新，军队的防卫能力高于境外攻击的能力，1979 年初中国要"教训越南一顿"时，部分装备了美式武器并久经沙场的越南人就颇感吃力。而中国人的运载火箭、核武器研制和弹道导弹潜艇则显示了它的军事实力：

经济建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和人川司步发展。在生产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抬头的同时，工资和消费水平却停滞不前一问题部分出在计划方面。由于中国学习斯大林模式牺牲农业以发展重工业，投人大量资金增加工业产品，中国经济规划者一度认为资金／产出比率（即投资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比率有所增大，结果导致单位投入的产量越来越小。譬如，在1976 年到1980 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1 （烈）瓦电时的投人，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 （沁一1970 年）的三倍。尽管投资不断增加，发展速度却降低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者们轻视物质动力、外贸和技术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地区实现自给自足，从而放弃了让各个地区尽其所长以求发展的机会。结果，中国继续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正在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因此，改革者的新政策就是恢复物质动力的作用，把中国的大门向外贸、投资和引进技术开放。物质动力的恢复对农业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中国7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毛泽东的集体主义体制下，被称为"铁饭碗"的农民生计得到保证，但其生产动力被削弱并导致了生产率的下降。农民即便用上了改良稻种和新的科学方法，集体农庄也未能生产出比落后的旧式家庭分散耕种方式更多的产品。

80 年代实行了"责任制"以补救这种状况。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家庭与国家签订合同，为集体生产队生产一定指标的产品，余下的部分农民便可拿到市场上出售。私人承包的责任田扩大到了总耕地的巧％，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要由"责任田"提供的农产品产量奇迹般地翻厂一倍。这恰好证明了物质动力大于毛泽东教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力量。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另外一个变革是允许农户经营副业。此前这类活动曾被毛泽东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这一变革带来了众多成果。大约1 / 6 的农户开始从事交通运输、修理业、私人食品买卖和其他一些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服务性行业。这些家庭被允许使用雇工。农民们潜在的经营才能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他们建起了两层楼房，成了地方__上的名人。〕 人们视之为模范并向他们"取经"学习。

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很快与地方党员干部展开了合作二干部们当然不能从事经济活动或以权谋私，但是其个人关系和影响对新兴的企业家很有用处〔：因此，干部和企业家以一个新兴地方精英集团的面目出现，颇似早年乡绅阶层的情况。发生腐败的契机也相应剧增。从总体上看，经济模式的创新机会大大增加了可能提供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类型，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但在万众趋利的形势下，公社的取消和一些集体单位的凋蔽给一些能力不是很强的人造成了生活上的问题〔：工业改革更具创新精神，尽管这方面取得进展也更为艰难。在毛泽东时代工厂经营者必须与党委密切合作以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计划体制给他们提供原料，但往往并不考虑产品的分配。结果常是全厂工人为完成指标而加班加点，〕币完成后则生产效率低下，直到下一个指标的最后期限公布为止。无人关心效益问题，产品可能会因为无人购买而堆积在露天发霉、生锈。为了改善产值纪录，一些厂长还计划扩建新的厂房，但这些皿厂是否能对经济有所贡献却全然是个未知数。然而铁饭碗仍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奖金已不再能调动积极性，工人们劳动纪律松懈且出勤率低；，

邓小平的改革给厂长们带来了一种"负责制"，他们至少在名义上不再受到党委的严格监控。厂长们不单纯考虑完成指标，他们必须负责偿还国家给工厂的贷款。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一种为偿还贷款、减少利息开支而工作的动力。工厂对效益的重视和国家下放计划控制权同时进行，中央政府指令部分让位于地方行政指导。由于中央只要求厂长清偿贷款，上交所得税，厂长就有了更多机会来改进产品以适应地方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组织销售。中央政府逐步减少原材料供应，厂长们开始通过市场购进原材料。他们在投资决策权上自由度的扩大虽然使他们有更多机会营私舞弊，但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随着企业的发展，信贷需求不断扩大。为此中央银行设立了一系列专门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是中央财经政策的制定者，它监督各专业银行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保险、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交流等活动。这一扩大了的银行网络在全国各地均设有支行，它们通过发放贷款和制定银行利率来指导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是问题的核心。80 年代中期，它古了城市就业人口工业产值的70 %，而集体与

合作制部门大约古25 %，新兴的私营企业只古5 ％。改革者在搞活国有大型企业时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在这些企业中，生产指标和分配到的原材料一直是由中央政府官员决定的，为了解决浪费和效益低下问题，政府鼓励国有企业根据市场计划生产。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按市场价格购进原材料、辞退效率低下或怠工的工人并为产品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但是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工厂破产，因此这一做法遇到了阻力，有人指责它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原先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另外国家还按照传统做法使地方企业有权垄断当地市场。而现在新的自由市场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状况，由之产生的竞争威胁到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把市场经济和指令型计划经济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一巳生产领域内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劳动力和资金的市场化岂能避免？连锁反应恐怕在所难免。

80 年代中国走向一种指令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日本、韩国和台湾经历过这一转变，但在这些地区私人产业古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大陆，尽管在多数产业中都实行了私有化，国有企业仍古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并不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依靠市场力量刺激竞争、提高生产率是中国新工业战略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发展轻工业、生产消费品，从而满足了因个人王资和私人赢利增长所造成的国内需求，而纺织品、服装和自行车等消费品的出口也可用来换取外汇、进「1 外国技术。

打开国门及其后果

中国在80 年代的经济增长亦得益于邓小平另外一项与毛泽东时代相反的政策，即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与毛泽东时代中国拒资本主义于国门之外的态度不同，邓小平的改革则计划把它请进门来，利用它为经济发展服务，。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建设早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毫无疑问，先前的排外政策是当时经济滞后的部分原因。

国门大开后良善并入。但总体而言，开放搞活、吸引投资和促进外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 年后举国上下热衷于引进外国贷款以发展中国的原料产业和工业。由于经济建设规模过大而一度停滞不前。政府不得不让与日、美、欧各国签订的大型项目合同下马。为了吸弓｝外国投资者，中国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特区与中国同行共同经营合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可以

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些地区的经济体制有别于中国经济的主体。与这四个特区相匹配的是14 个以外贸为主的沿海开放城市。这令人想起19 世纪的通商口岸，但现在是由中国人在唱主角了。1980 年中国恢复了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活动。中国用外国贷款建立起了自己的外汇储备。

外贸的发展同时要求培养一支熟悉贸易法，能就合同事宜与外国公司打交道的律师队伍。其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巾本身己经产生了增加合同、劳务、企业、房产等方面立法的要求。这一点在涉及各政府部门的纠纷中尤为突出，因而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人大相应增加了一项审议新法律草案的重要职能。邓小平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不少变化。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毛泽东尽量把北京政府各部委控制下的重工业项目放到内地去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现在让位于重点建设沿海城市及发展轻工业以增加出口的政策。北京对这些部门的发展不做过多干涉。企业要求国家下放经营权，而北京也很快发现比较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一些新的大型公司和组建一些委员会来协调各个行业的发展要省事得多。譬如，一些政府部门被归并成教委，另一些并入石油化工委员会，还有一些则合并成了船建系统。其中最富创意的是中国国际贸易投资公司，它的总裁是原上海一名大资本家，公司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在全世界开展业务。对外开放也导致了对国外经济体制的学习和借用，甚至证券市场也引进了中国。这样，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便以多种形式迅猛发展起来。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很多问题、，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能力依然不足。原油产量增加了，但仍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煤炭仍然是主要燃料，但大型煤矿均在内地（譬如山西），而主要的消费者却在沿海地区。由于缺少外汇，进门外国设备也受到限制。发展经济需要现代企业管理人员，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则远水不解近渴同时，中国因人I : 上与｝j 俱增而！郁晦粮食不能白给的威胁。，

8 。年代早期，现代中国的古次人日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J 已经超过了10 亿，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正处于育龄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国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止式出台厂，尽管这一做法与传统家庭结构严重抵触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中不无成效，但是在农村，农家

为了致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为了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并继承家族的姓氏，农民偏爱男孩，这导致了一些杀害女婴的现象。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乡间难收成效，尽管政府提供了避孕手段和人工流产方式，中国人口到21 住t 纪中叶达到巧亿看来势所难免。儿百年前，这种人口剧增可以因战争与饥荒得到遏制，但绿色革命与先进运输手段的结合却可能在工业化时代造就庞大的贫困人口。一度是世界上最具帝国首都风貌的北京，由于烟雾的侵蚀、城墙和城楼等纪念性建筑物的拆毁、容纳了几百万新居民但毫无特色的大楼的兴建，当年风貌已荡然无存。

城市化的恶果早就在外国统治的上海得到了体现。因为上海很容易受到外国海军力量的攻击，毛泽东最初是想把上海的城市经济拆散内迁，当事实证明上海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一个基地时，在基础设施几乎没有改进的情况下，政府又要求上海发展重工业。而交通、住房、污水处理和社会服务行业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各项设施老化，呕需要彻底更新。此时，新的桥梁和隧道建设起来，地铁开始兴建，港口和航空港得到了扩充。新政策重点发展轻工业以满足消费需求，发展特殊教育体制以扶持高新技术，扩大了与外国资本家一起经营合资企业和发展外贸的能力。

文化和政治

处在这种开放和独立中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控制大局呢？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具产生不合谐音的危险。

中国传统要求"学而优则仕"。国家推行一种正统思想，学者就应当配合维持。人们渴求秩序（"治") , "乱"被视为国家的大敌。这种思想受到主流文化思想的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凡是中国的艺术、文学、哲学和价值观都比外国的好。这些思想中有许多为当代社会所继承，有时还得到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强化。持不同政见被认为是不进步、不爱国的表现。国家希望知识分子既红又专口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干部，具有和儒家思想对于士大夫阶层一样的重要性。

在这种形势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倡打开眼界，发展经济。改革包括逐步放宽党对文艺界的控制。这使"文化大革命"对作家和学者的摧残得以在"伤痕文学"中记载下来，其主题不外是文革后青年人的玩世不恭。作家以此来弥合心中的"伤痕"，治疗心灵的伤口二

政治对艺术重压的相对减轻使各种文化活动得到了新生。中国传统戏曲重新上演，几百份新杂志相继出现，几千种译作和刊登译作的杂志竞相面世，普通中国人能够再次看到一些经过选择的外国影视节目。作家和艺术家不断试验新的写作技巧，并深入探讨中国的问题。此前一直受到压制的主题如爱情、暴力、腐败和不公现象等等，这时也得到了表现。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革命的烧灼后，显然已有能力创造出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为了控制改革的速度，改革运动内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势力消长时有起伏。温和保守派人士震惊于城市青年追逐国外生活方式和新时尚，如跳迪斯科、妇女着比基尼泳衣健健身、对电子产品的热衷以及铺大盖地的商业广告等等。为了控制这种个人的自我满足和物质欲望的爆炸，中央发起了一系列活动：1979年到1980年间反对北京"民主墙"、反对上海报刊鼓吹的用真正民主的方式来改革政治体制；1980年到1981年间反对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1983年到1984年间反对"精神污染"；1985年到1986年间反对"不健康倾向"等等。在所有这些介于容许和压制之间的政策波动中，邓小平时而承认保守派对思想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担心，时而又肯定改革派认为革新和创造性自我表现的必不可少的观点。1986年12月学生又一次上街游行，提出经济现代化必须与政治现代化同步，要求建立多党政治、保障新闻自由、举行真正的竞选和取消官方意识形态。实现这些要求对于时机和调控手段的掌握都提出了挑战。如何把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嫁接到一个官僚化的指令性经济上去就是一个例子。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最高权威的同时逐渐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人大在政策研讨活动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它仍然只有建议权，它可以多提几名候选人，让他们有可能当选中共中央委员，这就已经象征了民主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超越法律，除对自身之外不对任何机构负责。党给予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自由不能超出198l年6月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藩篱。它们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是不容怀疑的原则。

六、中国革命展望

我们观察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进程可以先从国际环境着眼。4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度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中国对苏联模式和领导方式的借用差不多延续了10年，这是不足为怪的。毛泽东没有对外部世界的直接经验。他成长于斯的半殖民地中国看上去的确符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兴衰有时，但其剥削工人的本质则始终不会改变。他认为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建立经济关系并不可靠，于是他要求中国自力更生以求经济自给，但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滞缓。

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呈现在中国面前。改革和经济现实主义大潮席卷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最终也都受到影响。而中国周边的东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现自治并发展起资本主义，它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淮迅速得到提高。这难以用列宁的理论来解释。此外，马克思主义自称"科学共产主义"，科学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老生常淡。西欧、美国、日本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非共产主义的东亚国家也在紧随。所以在1978年之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希望通过发展外贸和投资来搞活经济。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些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则崇尚实用。

另外一组因素也表明了中国发展变化的内部动力。现代创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古今中外各方因素的重要性会因时因事而异。于是，在经济改革中，毛泽东所要求的地方经济自给不得不与全国统一规划的要求相妥协；中央控制不得不与市场力量并用；在计划经济边上不得不发展私人企业。在社会生活方面，妇女和青年人的解放受到旧观念和新情况的制约。工作单位与家庭争夺对个人的指导权，而集团的要求不得不与个人消费观竞争。在政治上也可见到同类旧价值与新实践的摩擦。考试制度的恢复加强了旧的施政观念，当权者可以再次利用豢养的人才进行统治。不通过群众运动和思想竞争，现代传媒和民主选举程序如何能使群众参与政治呢?邓小平改革的耐心和踏实作风使人想起旧时士大夫关心民生、解民忧患的治国传统，而现在的目标依旧是建设一个更加强大和更为人道的社会。但这将要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此时在中国土地上成形的新型国家和社会今后还会使我们为它的革新而惊喜。当然，明显的倒退也可能使我们惊骇。中国社会生活的

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是，科学枝术，相似的产品和机制，从食品、服装、住房、运输到满足人际交往的各类消费品，都无法消除中美两国在社会结构、政治史和价值观念上的反差，两国在生态人口状况和传统上的差异如此巨大，要同化这两种文化是无法做到的。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

译后记

张 沛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是美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曾任美驻华新闻处处长(1945一1946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玉任(1959-1972年)，自1966年起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费氏虽非以"汉学家"名世，但他的影响却超过了-般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

《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在费氏中国问题研究专著中的地位，类似作者在其汉学家同侪中的地位。这部大书洋洋30余万言，上溯半坡、龙山远古中华文明，下迄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其吞吐涵纳端非大手笔莫办。

在这样一部由外因人撰写的通史史论巨著中，固然颇多"文化误读"或隔靴搔痒之处，但也不乏旁观者的清晰认识。如费氏与李约瑟、黄仁宇师弟不谋而合，采用"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视角，将中国封建社会切割为第-帝国(奏一汉)、第二帝国(隋一唐)及第三帝国(元一明一清)。这三大帝国时期与衔缓其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夏等短期政权-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当然，这是作者跳出"天命"、"王德终始"的圈子，从统治者个人因素(如宦官、外戚、党争)、经济和政治因素切入，透析这一历史怪圈的。如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论述西汉政治时指出：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团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这一阴暗的描述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不乏警醒的意义。

又如，作者在第八章第-节讨论明代社会与文化时，拈取"汉族文化中心主义"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起的"。这样，由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即使中国在军事上败于"蛮夷"之手而被异族征服，在文化上却始终处在不败的地位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同时，中国人对异族统治的憎恶也导致其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尔后更逐渐发展为对外界冷漠、憎恶的内向型心态。"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在文化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的今天，中国应如何在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同时，维护、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中国人不能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关键还须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不过，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指出的，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返观自身的"视域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自信来自对自身的客观认识，而认识自身则无疑也需要了解"他者"对自身的看法与评价。同时，"-切对于'他者'的言说都是自我言说"，"他者"的评价恰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者"的某些特性，像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事实上也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读史令人明智"，信矣夫!

在半年的译书过程中，先后发生了李登挥发表"两国论"、"五˙八"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及法轮功的插曲。我们的祖国确

实处于传统与变迁交汇的大潮中，中国必须也必将在这场百年阵痛中获得新生。国庆50周年时我曾作韵句八片云：

西洲已是几重寒，别样风光自在观。

赤县珊珊夔足一，黑名渐渐虎成三。

伤心岂为腰间紫，吮胆当期舌后甘。

翻覆百年局已新，应拈千禧一着先。

这几句话"寡平淡味"，不过倒也说出了译者译此书时的一番用心。

本书第-至十-章由张沛翻译，第十二章由张源翻译，第十三至十五章由顾思兼翻译，最后由张沛修润统稿。另外，在译校过程中还曾得到策划人及责编王立女士的协助，在此亦-并致谢。

译者限于识见，译文中之舛误当非少数，还请读者原谅，并望老师专家不吝赐教!

二00一年九月于北京大学